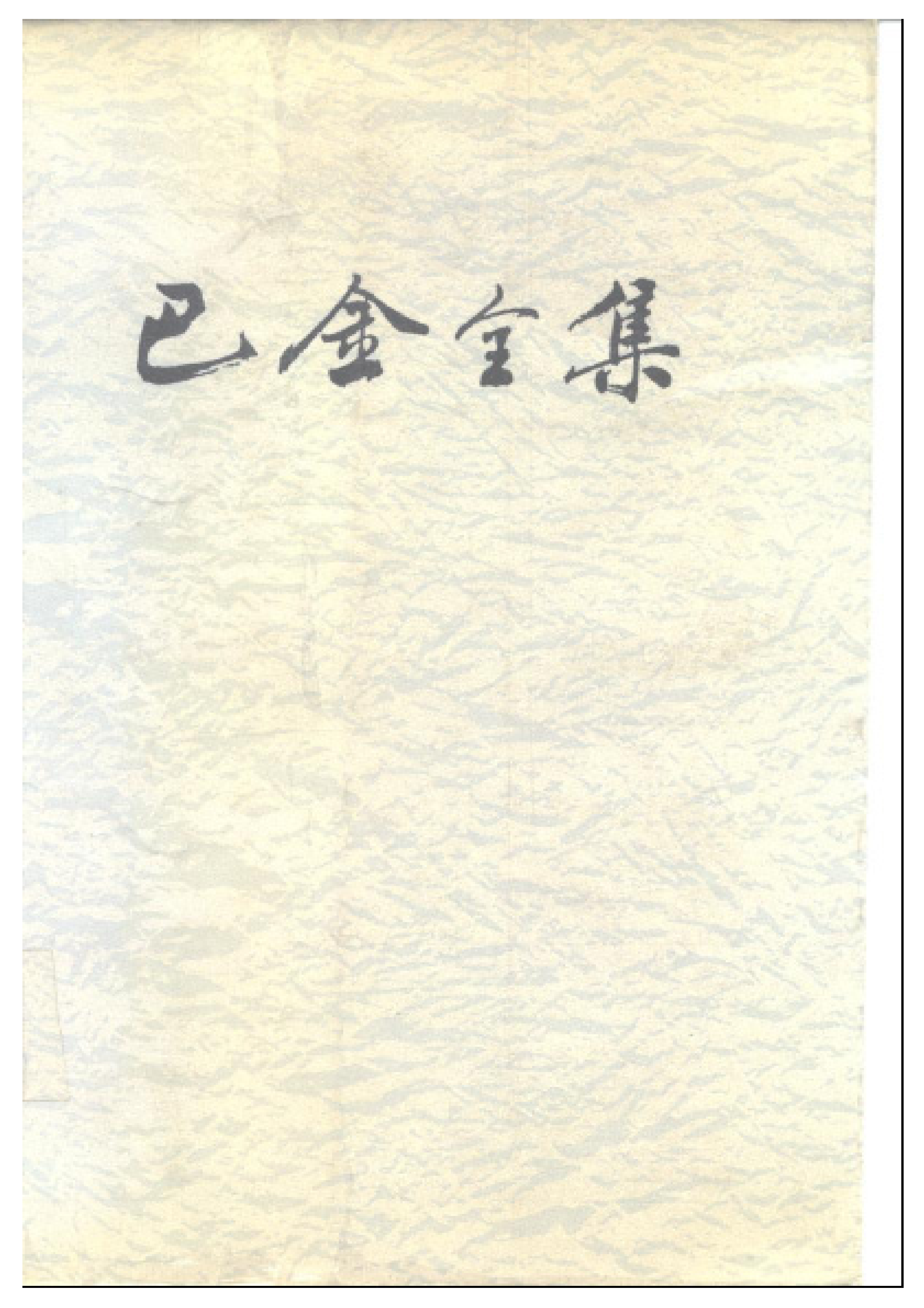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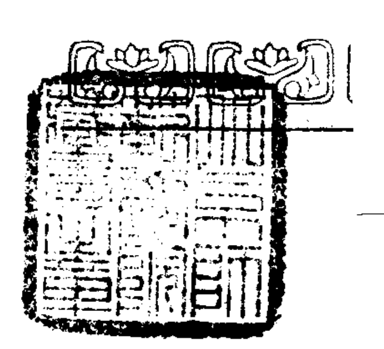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第十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巴金全集
（第十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北京第1版
1989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864—X/I·865
定价 8.10 元

目　录

海行杂记

旅途随笔

生之忏悔

忆

点滴

控 诉

海 行 杂 记

《海行杂记》，原名《海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新中国书局初版，次年五月再版。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开明书店重排新版，改为现名；迄一九四一年五月，共印行五版(次)。

一九四六年四月，由万叶书店排印一版。

序

这本游记是我五年前的旧作，前半部在法国邮船“昂热号”(Angers)的三等舱餐厅中写成，后半部则写于巴黎拉丁区(第五区)一家旅馆[1]里。

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二月，那时，我还不曾开始写小说。我为我的两个哥哥写这本游记，使他们明白我怎样在海上度过了一些光阴，并且让他们也领略一些海行的趣味。

写成后我把它寄给在北平燕京大学念书的三哥，又由他转寄到在成都住家的大哥的手里。这本游记在成都待了将近五年以后，又回到我的手边来。可是我的大哥已经死了一年半了。

当初寄回这本游记的时候，我给两个哥哥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 寄上一本我亲笔写成的小书，这是我赴法途中的见闻，这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记录，请你们好好地保存它。
>
> 我没有给你们多写信。一个人充满手足之情的时候，还有写许多话的必要么？便是一个字一张白纸也可

---

① 旅馆：这是一种性质跟“公寓”相近的中等或中下等旅馆。

以表示我是怎样地怀念着你们了。

我知道你们也不会忘记我，但是请寄一点东西来，从你们那里来的一切，我都是异常宝贵的。

我虽然知道我们的心不会被那无边的海洋所隔断，但是现在我的心确实寂寞得很！冷得很！望你们送点火来罢。

现在重读着这封信，想到当时的心情，再想到我的大哥的悲惨的一生，我只恨这管拙劣的笔写不出来我现在的悲愤。

因此，我才把这本游记整理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在粉笔灰里度岁月的三哥，祝他永远健康，祝他永远幸福。

巴　金 1932年10月在上海。

一月十五日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夜，我给我的三哥写了一封信，那时他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

我去了。是和友人卫同走的。明天早晨就要上船。无论如何，我们没有机会在临行前见面了。我很想念你。我很想再见你一面，但是苏州和上海间的距离阻隔了我们。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我们离得很远。但是我又想到以后我会一天一天地往更远的地方走了。……

你不能来送我也好，免得我在船上流眼泪。话是说不完的，我们且留着将来再见时谈个痛快罢。沿途我自然会写信给你，告诉你我所见到的一切，使你的心也跟着我游历世界的一部分。……

你记住：船名 Angers（昂热），是法国邮船公司的一只小船，听说是拿一只德国兵船改装的，虽然小，航行起来也还平稳。不管怎样，我要在这只船上度过三十几天的光阴。……

我的游记就这样地开始了。

“狭 的 笼”

第二天(一月十五日)早晨八点钟，一部汽车把我和卫还有一个送行的朋友送到了轮船码头，我们的行李已经在早一天送到轮船公司去了。

我们上了船。那位送行的朋友和管事说了几句话，那个矮小的法国人就把我们引进一个三等舱的房间。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走进“狭的笼”了。

走到房门口，我才看清楚我们的舱房的号数是三百零六，这是在船票上注明了的，可是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到了房间里面，卫觉得这一间不好，就要求送行的朋友去找法国管事交涉换一间。法国人说这是规定好了的，现在不能更换。

这间舱房并不小，里面共有八个床铺，每一面是上下两个，重叠起来的。靠外的一面有一个圆圆的窗洞。正对着窗洞那一面的壁上装了一把电扇。顶板上有两盏电灯，白天、晚上都一样地亮着。

床铺相当好：钢丝床上放着厚的褥子，再盖着棕色毛毯和白布被单。我的床位号数是F，卫的是E，都在上层，旁边有一把梯子，我们就由梯子上下。

卫的床位在门边，门的另一边有一个面盆架。我的床位

在卫的斜对面，也就是正对着门，床头有两个面盆架。装面盆架的壁上嵌得有一面大镜。架中一个面盆，盆底装着活塞，洗过脸后把活塞拔起，水就流下去了。下面的柜子里分两格，上一格放着一个盛污水的铁匣，下一格放着一桶清水。在面盆上面镜子下面还有一个木架，托着一瓶供旅客喝的清水和两个玻璃杯。瓶也是玻璃制的。

窗户只有一面，就是那个圆洞，玻璃极厚，两边各有一个粗大的螺旋钉，用来开关这个窗洞。稍有风浪，茶房便来把窗洞关上，螺旋旋紧。其实不关窗，想来也不要紧。关了它，虽然浪不会进来，也就把人闷得难受了。

餐厅在我们房间的对面，里面有九张长桌子，一张可坐六个人。每天吃饭的时间规定如下：

早晨　　七时至八时：咖啡
　　　　十时半：早餐
下午　　三时：茶
　　　　六时：午餐

每一餐连菜和汤一共三样，还有饭后果品。早餐没有汤，用一盘煮豆子或者沙丁鱼代替，面包一块，似乎太硬，起初我有些吃不惯，总要剩下一半。

船的构造大概分六层。最下的一层是货舱。我们住的是第二层，在那里面当然很闷热。不过我们也有一个散步和休息的地方，就是上面第四层的甲板（Pont D.）。在那里仰头看见青天，埋头就见碧海。对面是头二等舱房，那里周围有一转走廊，四面都有篷，不怕风浪。每天两顿饭以后，我们便看

见那些穿红着绿的西洋贵妇和绅士在走廊上摇摇摆摆地散步。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表示出自己那种优越的地位。金钱把人们分成各种等级，到处都是一样！

三等舱里也有浴室，因为那里面没有窗，不通空气，人走进去，便要淌汗，好像进了蒸笼，或者下了油锅一般地难受。

我的眼睛看到的“昂热号”不过如是。在这以后的三十几天中，它就是我的唯一的家了。不管舒服与受罪，我总得在这里把三十几天度过去。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

踏上了轮船的甲板以后，我便和中国的土地暂别了，心里自然装满了悲哀和离愁。开船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开了岸，一直到我看不见岸上高大的建筑物和黄浦江中的外国兵舰，我才掉过头来。我的眼里装满了热泪，我低声说了一句："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①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我无日不在你的怀抱中，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持。我的衣食取给于你。我的苦乐也是你的赐与。我的亲人生长在这里，我的朋友也散布在这里。在幼年时代你曾使我享受种种的幸福；可是在我有了知识以后你又成了我的痛苦的源泉了。

在这里我看见了种种人间的悲剧，在这里我认识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里我身受了各种的痛苦。我挣扎，我苦斗，我几次濒于灭亡，我带了遍体的鳞伤。我用了眼泪和叹息埋葬了我的一些亲人，他们是被旧礼教杀了的。

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这里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义受到摧残。在这里

① 这是一首叫做《断头台上》的歌子的第一句，这首歌在旧俄时代西伯利亚的监狱里流行过，据说是旧俄政治犯米拉科夫所作。

人们为了争取自由，不得不从事残酷的斗争。在这里人们在吃他的同类的人。——那许多的惨酷的景象，那许多的悲痛的回忆！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香港或九龙

开船以后，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第一天我有点头昏，似乎晕船。舱外面风浪颇大，站在甲板上我又有些怕冷，就只好躲在舱里睡觉。所以第一晚的时间有些难过。但是我并没有呕吐。

从第二天起我就觉得习惯了。海上生活甚至是新奇而有趣的。

船上贴了一张法文布告："十八日早晨八时到香港，下午四时开船。"我对朋友卫说：一定要上岸去看看香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船靠了码头，我和卫就跑上岸去。我还以为我们现在是在香港了。

我们走出码头，一路上看见的街道都很整洁。阳光照在我们的头上，到处是绿树，气候比较温暖。我们走过一家邮局，外面用英文写了九龙邮局的字样，但是我们并没有注意。我们进去寄信，先摸出半克朗的银币，邮局的人员不要，说是只收香港币。我们只得出去找换钱的地方。像这样瞎找，本来是不容易的事。去问旁人，又没有人懂我们的话。幸好这一带换钱的地方很多，我们走不多远就看见一家店铺，在门口

挂着“银钱兑换”的招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在这时候我们才发觉这里是九龙，香港还在对岸。先前我们在码头上望见的对岸一层一层的洋房，那里才是香港。

我们回到邮局去交了信。忽然落起雨来了。我们只得扫兴地跑回船上，刚上了船雨又住了。我和卫都觉得在船上很闷，便又下去。

我们找到一家理发店进去剪了发，以后太阳又出来了。我们在马路上走了一些时候，看见一些赤足的女子和穿木鞋的男子在湿地上往来。我们身上渐渐地发热，肚皮也有些饿，待要回到船上去吃饭，又来不及了。我们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充饥，顺便休息一下，却又找不着一家饭馆。沿街茶馆倒很多，里面都有几个打扮得漂亮的年轻女郎。我们只得拣了一家茶馆进去。

十多张小方桌摆在狭长的店里面。还有好些高的竹凳子。桌子上放满了油腻的点心，甜的咸的，应有尽有。我虽然有点饿，但是看见这些东西，倒不想吃什么了。我随便拿了一块蛋糕吃。后来茶房端了两碟新出笼的烧卖上桌，我吃了两只，又喝了三四杯茶。卫也吃得不多。这个茶馆里也有一个年轻女郎，她端坐在靠里的一个凳子上，有时也站起来提了开水壶到每张桌子前去加水。

茶价很便宜。我喝着茶一面看墙壁上贴的那一大张白纸招贴：

日市 岩茶 二分　　夜市 岩茶 二分四
　　 名茶 分二　　　　 名茶 一分六

生意微末故此夜市加茶价四分而已　各诸君祈見

谅之

我们明知道开船的时间是下午四点，但是心里总有些发慌。后来我们回到船上，也不过两点钟光景。要到香港去还来得及，只要花五仙钱就可以坐小汽船过去看看。但是卫不愿意去，我觉得一个人走也没有多大趣味，时间又不多，不能够让我玩个畅快，所以我就索性不动了。

开船时我站在甲板上看那些建筑在山上的香港的房屋，一层一层整齐地排列在那里，非常清楚，永安公司屋后的“大东永安公司”几个字也看见了。

船上的友伴

这次和我们同船到法国去的中国学生并不多。在上海上船的除了我和卫外，还有四个。两个是北平中法大学的学生，一个姓范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姓巴的学数学；还有一个姓杨的，刚在保定育德中学毕业。他们三个一块儿从北方来，买四等舱的票，却在三等舱的餐厅里吃饭。在我们这个房间里有一个四川的彭君，是学工业化学的。在香港也有两个人上船。一个姓黎，是广东大学法科的学生，还有一个姓李，年纪才十六岁，他有一个亲戚在巴黎做生意。

在我们房间里，彭的床位号数是G。一个到新加坡去的程君睡在床位A上。其余四个床位现在都空着。本来还有两个广东客人，但是他们到了香港便下去了。我们的房间里就只有四个人。

程是基督教徒，他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到新加坡去。他是安徽人，没有去过新加坡。他的母亲、兄弟、妹妹都在那里。

我们和程、彭两位以前都不认识，可是在船上同住了几天，就产生了亲密的友谊。程说："大家都是出门人，应该同舟共济，所以我们都是自己人。"他的话也有道理。

程的妻子住在三百零五号房间，就在我们的隔壁，然而中间也还隔了一个放碗碟的房间。她和她的孩子也时常过来玩，船到香港以后，程夫人房里那个英国胖太太上岸了。她的房间里再没有别的人。程有两三夜都到那里去睡。彭就笑着对我说："他们两口儿今晚上又团圆了！"

西　贡

早晨船到了西贡。这一天我特别起得早，天还没有亮我就穿好了衣服。本来我不会这么早就醒起来的。一连几天都热得难受，我在舱里睡觉总要到夜深才能够阖眼。早晨三四点钟正是我睡得正好的时候，卫忽然把我叫醒了。他惊奇地对我说，他先前梦见一个外国人叫他起来帮忙，他醒来以后却看不见一个人，便又沉沉地睡去了。第二次他又梦见那个外国人叫他，他就惊醒起来。这倒是个奇怪的梦。

我也不再睡了，就端了一把椅子到甲板上去。海风微微地抚着我。我似睡非睡地躺在帆布椅上。周围没有一个人，异常清静。我完全不用思想，只是半开半闭着眼睛，望着开始在变化的天空。天由深蓝色变做浅蓝色，淡绿色，最后就变作了鱼肚色。不久天就大亮了。

船已经进了湄公河。两旁尽是茂盛的绿树，被晨风一吹便微微地摇动。船的行动激起了水波向着种树的岸边撞去，接着便涌出了白沫。

船走得很慢，东一个弯，西一个弯，岸上的房屋早就可以望见了，但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船才靠好码头。已经是八点钟了。船上的布告也贴了出来：二十四日六时开船。今天

是二十一日。

船靠了岸，舱里没有风，更加闷热难受。甲板上开始忙着卸货，起重机的辘辘的响声，卸货工人的大声讲话，上上下下、往来不绝的人。这一切使我们不能在船上久坐。吃过了早餐我就同卫、彭两位一道上岸去了。

脚踏上安南的土地，我觉得是到了南方了。我的第一个印象便是：一切十分鲜明。太阳好像永远不会落，树木也永远长青。到处是花，到处是果，到处是光，到处是笑。想到冬天，想到风雪，就像做了一个渺茫的梦。记得有一位俄国人①说过，人一到了南方就像变得年轻了，他只想笑，想叫，想唱歌，想跳舞，甚至想和土地接吻。

我们走进了热闹的街道。马路宽敞。有一两家大咖啡店，里面奏着乐，还有一处在外面张了篷，就在人行道上安放了桌子，好些法国人坐在那里销磨时间。

我们走了一会儿，想找个换钱的地方，却找不到。我们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走。街中往来的行人大都是法国人和安南人；中国人不多，都穿白色学生服。我们想拉着一个人来问路，又怕没有人懂我们的话。东边来的，西边去的，尽是些哼鼻音的本地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我们在一条街上发见了胜家公司分店的招牌，我们便走进那个店里，用英语向店里的人问了几句话。一个穿西装的年轻广东人告诉了我们换钱的地方。他起初以为我们是日本

① 俄国人：指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亚·赫尔岑（А. И. Герцен，1812—1870）。

人，就让我们走了。不知道怎样他后来忽然想起我们是从中国来的，就跑出来追上我们，请我们再到店里去坐一会儿。他会说普通话，不过不很好。他说他新从广东来，上岸的时候受尽了侮辱和麻烦。他把护照给我们看，护照上明显地盖着他的指印。他又告诉我们，法国人怎样统治安南，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剥削两方面同时并进。人要纳税，房子要纳税，生小孩也要纳税。雅片烟倒是可以公开买卖的，甚至设立公烟局、烟话处，鼓励安南人吸食雅片。不错，这样的烟馆我也看见过：一间铺子，外面有门窗，两旁放着长排的竹匟，匟上铺了凉席。许多人像死鱼一般地睡在那里，曲起双腿在吞云吐雾。这就是所谓烟话处了。

我们谈了一阵，喝了几杯茶（在船上没有茶喝），便告辞出来。那位朋友又劝我们乘小火车到堤岸（Chôlon）去玩，说是那里热闹，中国人很多，值得去一次。他指点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乘小火车。

我们并不迟疑就到火车站去买票，因为车站就在对面。火车刚刚开动，看见我们走近，便又停住。我们跳上车去，车就走了。

一路上尽是绿的树林，黄的田畴，红色的花，茅草的屋，流的溪水，吠的村狗。还有说不尽写不完的景物。……我忘记了这是一月二十一日，我以为现在还是五六月的光景。从上海动身以来不过一个星期，我差不多把四季都经历了。

车不停地往前走，过了一些站头。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下车，我们也不知道。恰好旁边坐着一个安南巡捕，他会说法

国话。我们问他堤岸在什么地方。他说他也是到堤岸去，就叫我们同他一道下车。他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我回答说："中国人。"这时候离我们坐处不远，有一个人忽然站起来，走到我们面前，借了卫的自来水笔，在车票背面写道：

"先生等是否初从中国来此？"

"我们由上海赴法求学，道经此地，上岸玩玩，"卫在袋里摸出一张纸条，写了这些字回答他。

这时车已到了堤岸，他便同我们一块儿下去。我们一面走一面谈话。他只能说广东话，普通话也仅仅懂得几句。所以我们只得用笔和手代替舌头。我们知道他姓陈，在小学里教书。

他陪我们玩了半天，陪我们去参观了三所学校和总商会。总商会里虽然没有人出来招待，却也招呼我们在客厅里坐坐喝杯茶，让我们赏鉴这个新建的会所的华丽。学校呢，我们去过穗城高等小学校、东苑小学校、中法学堂三处。教员们引我们到处看了一遍。房子大，教室宽，地方好，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至于思想教育，殖民地的教育哪里够得上谈思想！法国的统治者能够容许你吗？

植 物 园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光景陈就到船上来了。他来邀我们上岸去游植物园，说是西贡的植物园很有名。其实这是一个很好、很大的公园。彭留在船上，我和卫同他去了。

我们上岸后，先到一家广东茶馆喝了茶吃了些点心，然后便向植物园出发，在途中陈顺便在他的亲戚开的一家店里带了些水果去。

我们先走过一些大街，看见几家大商店。渐渐地我们就走入清静的街道了。路很宽，泥土是红色的，两旁没有房屋和人家，只有参天的高树，阳光从顶上射下来，给树梢拦住，只洒了些明亮的斑点在地上。这里除了鸟声外，偶然从远远的地方送过来一点点市声。我们缓缓地走着，脚踏在沙地上，声音很清脆，一声又一声，一步又一步，都印在我们的平静的心上。行人很少，偶尔有一二辆牛车走过，或者安南巡捕骑着自行车跑过去。有时也有一两个行人，头戴白通帽，身穿不长不短开大襟的青色衫子、白色裤子，脚着皮鞋，嘴唇上还留着浓黑的八字胡。

我们走进了植物园，一进门就看见浓艳的热带花卉，和碧绿的热带树木。植物园很大，而且布置很好。不仅有湖，有

桥，有亭，有石，有花，有草；还有禽，有兽。

我最爱一带曲折的走廊。靠外的一边有一尺多高的红石栏杆，上面盖着红瓦，下面铺着一方一方的花石，整齐得就像一幅地毯，并且清洁而光滑。栏杆外垂着新绿的树叶和藤条，恰好遮了阳光。在转弯的地方，栏杆中间嵌了一把可以坐五六个人的石头长椅。椅子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台，上面放了几盆花。靠里的一边是一个天井，用一带铁丝网拦住。里面再用铁丝隔开，成了许多铁丝笼，养着各种奇怪的大鸟：有大嘴的，有长脚的，有的有美丽的羽毛，有的有清脆的声音。梁上挂着许多盆花。花盆小，花垂到外面来，掩盖了花盆，使人只看见叶和花，好像它们就生长在半空中一样。我们在石头椅上坐了好久，一面谈话，一面剖开带来的橙子吃。就在这里我们遇见了程和他的妻儿。他牵着两岁大的孩子，她抱着不满一岁的女儿。我看见他们，就像遇到亲人一般，虽然我和他们认识才不过八天。

程和我们谈了几句话，就牵着孩子走了。他们去后不久，一个本地巡捕带了三个本地人进来，在我们旁边坐下。一个年轻人从怀里摸出了一副小纸牌。于是四个人起劲地打起牌来。

“走罢，”我站起来说，我们就走出去了。

我们去看关老虎的地方。那一大块四方的土地完全敞着。地是用红石铺砌的，上面没有屋顶，只是在四周围了一道铁栏。中央有一个洞穴，大概三尺多高，是用石子和泥土堆起来的，还有许多通风的洞眼。洞子上面长满了牵牛一类的蔓

草。洞旁还有一个很小的圆水池。老虎睡在洞里，人站在铁栏外也看得见。

我们又去看鳄鱼。一个小池子中间一株斜生的大树，树根在外面，水并不深，也不多。有两只大鳄鱼：一只在树根旁边爬着；还有一只半截在水里，半截在岸上，动也不动一下。不用说，池子的四周也有一道铁栏。

离这个地方不远有一座六角亭，六面都是密密的铁栏。亭子中央一株枯树般的东西大约有七八根桠枝。树身上盘着一根大碗口般粗的花蛇，正昂着头东摆西望，地上还有五六根细一点的大蛇。

饲象的地方一面靠墙，三面围着稀疏的铁栏杆。上面没有屋顶，地上铺的石板并不平坦，缝隙里生出一些青草。象真是一个庞然的大东西。我们丢了两个铜子进去，它听见声音便慢慢地走过来，用它的长鼻子放在地上东闻西嗅，找到了一个铜子便卷起来放在口里衔着，又找第二个；第二个躺在石板缝旁边，它第一次没有卷起来，便从鼻子里哼出了两口气，又把鼻子在地上打了两下，就把它卷起了。然后它又转过身子向着栏外东边坐的一位安南女人，把铜子抛过去。她拾起了铜子就掷了两根甘蔗给它。象卷起了甘蔗放在口里一咬，咬成两截，又用鼻把两截一齐放在口里，很快地就吃光了。我们叫它行礼，它向着我们把鼻子在地上点了几下。

我们玩到疲倦了，才离开植物园。出来时我们走过池畔，那里的荷花初谢，莲蓬刚结。可惜我们来迟几天，看不见荷花了。① 陈送我们上船，在我们的房间里谈了好些时候。他临去

时，彭送了他一本漆树芬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我和卫没有适当的礼物送给他，只有在纸上写了几句感谢的话。

① 安徽詹君偕其友人程君后我半月赴法，道经西贡，曾游斯园。程君有句云："故园梅雪争残腊，斯邑芙蕖放满池，"则半月后荷花又大放矣。

安南之夜

晚上我端了那把自己在西贡买的帆布椅放在甲板上，安闲地躺在椅子上面。下面有几只小木船泊在我们这只海轮的旁边。那些船上有人弹起了安南的乐器，一声一声地送到我的耳边，很是凄凉。今天是旧历二十，月亮刚出来，水上还很黑暗，只有对岸的电灯十分明亮。船上本来还在装货，但这时工人都上岸去了。夜非常静。

一个法国水手唱着歌慢慢地走上船来，唱的是《安南之夜》。

…………

安南之夜
闲荡之夜
恋爱之夜
陶醉之夜
温柔之夜

…………

梦幻的国土
异邦人来寻忘忧地

愿忘掉他们的往事

…………

这些断句送入我的不熟习法语的耳里。我在思索这些话的意义。

幼年的往事渐渐地涌上我的心头。许多美丽的景象在我的眼前更换。安南乐器的凄凉的调子在我的耳边就变成我的姐姐的笛声。姐姐爱过我，但是她死了。她是难产死的，死得很惨，那时我远在南京，连和她诀别的机会也没有。……

起重机的响声和安南人的鼻音把我惊醒。工人们又开始装货了。我不想在甲板上再躺下去，就跑下舱拿了毛巾和肥皂到浴室里去洗澡。

我还不曾洗完，卫就在外面叫我。他和彭想上岸去喝茶，要我同去。我匆匆地穿好衣服跟着他们上岸了。我们走不多远，便看见一个咖啡店，里面有一个安南女人在弹琵琶。我们没有进去，又向前走。夜晚的街道就和夜一样，也是很柔和的。我走一步，脚步放得缓缓地，就像在踏进一个梦境。街上半明半暗，又罩上一层淡淡的月光，行人和房屋都带了些空幻的色彩。这梦幻的夜！我不说话，我在领略。……

后来我们走进了一个茶馆，上了楼，拣了靠栏杆的位子坐下，正好望月。等了半晌，茶房才来。我们问他要茶，他却回答说只有饭了。我们只得扫兴地出来，另走一家，也得到同样的回答。我们没有办法，一摸身上，三个人的钱凑起来也只有三角西贡银币，就全拿出来买了几个橙子。

我们回到船上，时间已经不早了。吃完橙子，依旧口渴，房间里的水瓶又空了。我们叫茶房，一个也不来，他们都到岸上玩去了。甲板上闹得很，房里又闷热。我要睡，又睡不着；要不睡，口又渴得难受。

我们在西贡，这是最后的一夜了。明天早晨我们就要往更远的地方去。这最后的安南之夜应该是值得人留恋的。然而热和渴……

新　加　坡

在西贡开船后，第三天我们就到了新加坡。我熟习这个地方的名字。现在我倒要上岸去看看新加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和卫、彭两位同去。我们都是第一次到这里，上了岸就不知道应该怎样走。幸好不久在码头上会见了程的兄弟。他来接他的哥哥。程给我们介绍了。他就告诉我们走哪一条路可以到热闹的街市去。但是他不曾把话说得清楚，我们也没有听明白。结果我们白白地在海滨绕了一个大圈子，依旧走到原处。

后来我们只得随意乱走，居然也走进了热闹的街道。为了找一个邮局寄信，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问了两个印度巡捕。回来时我们才知道离海岸不远便有一家邮局。

我们走过的新加坡的街道并不怎么好。初上岸时我们还看见几条很好的林荫路，路中有印度巡捕站岗，有电车、汽车和人力车。中国人在这里开店的很不少。印度人和马来人也有些，开烟纸店卖杂货做银钱兑换生意的，都是这些人。我们经过他们的店门前，那些盘着腿坐在货摊上、戴着圆顶小帽、穿着白布衣服、围着红花布裙子的马来人便要高叫“Change

money?……"① 头一摇一摆，黑脸上闪着两颗倒明不亮的眼睛。真有趣！

彭带的一点零钱，在邮局交信时便用完了。我们带的是一张一个金镑的钞票。这时候天气太热。我们冬天从上海动身，路上缺少夏季的衣服。卫主张每人买条白帆布西装裤，我们估价至多不过半个金镑。我们走进一家银行去，想换出半个金镑留一半换先令，却不成功。后来我们又走进几家银行，都说不行。而且我们又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卖现成西装裤的商店，走了好几条街，都看不见。

我们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旁边出来一个人，在我们身边站住。他问我们是不是新从中国来的。我们把情形告诉了他。他懂得普通话。他是广东人，姓陈，年纪有四十左右，相貌很和气，说话很直爽。他陪着我们先找到一个地方把换钱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他又引我们到卖衣服的地方去，只坐了三站的电车就到了。他用马来话和卖衣服的商人讲价钱，他说了许多话，我完全不懂，只听见"巴尔巴"的声音。他已经挣红了脸，差不多要生气了，这才把价钱讲妥。我们买了两条白帆布西装裤，只花去三元六角，倒也不贵。斜对面便是中华书局，他陪我们进去看了一阵书，又陪我们走了一节路，他还想送我们回到船上去，我们客气地谢绝了。他便抱歉似地说，他还有别的事情，否则他很愿意款待我们。他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了手告

① "Change money?"(英语)："要换钱吗"的意思。

辞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我真感谢这位陌生的同胞！

船在新加坡只停了八个钟头，下午四点钟就开船了。那时候我还立在甲板上，看见一些本地人划了独木船来讨钱。我们船上也有人把铜子掷下去。

威 司 利

到了新加坡，程上去了，他带走了威司利。

威司利就是程的小孩，现在快满两岁了，是个很可爱又很活泼的孩子。他的身体结实，一天到处跑来跑去，从房间跑到餐厅，从餐厅跑回房间，时常一个人跑。有天晚上他一个人爬上第三层的楼梯，还在往上爬，我和彭从上面下来看见了。彭两只手提着他走下去，把他送到他的母亲的房门口。两只小手已经涂满了灰尘，成了黑手了。我们刚回到自己的房里，威司利又跑来了。我把他抱在我的膝上坐着，指着他的黑手给他看，他只是笑。过一会儿他一翻身爬下去又跑了。这晚上他的父亲病了，他的母亲要看护病人，又要照料他的小妹妹，所以让他一个人跑了出来。

威司利会叫"妈妈"、"爸爸"，也会叫"李先生"，又会说"Good-bye"。你若问他今年几岁，他便伸起两根小指头，又问他的妹妹的年纪，他便伸一根指头。他只能够伸大指和小指；叫他伸起任何两根靠近的指头，他便没有办法。然而我们偏偏叫他那样做。起初他自然弄不好，但是后来他也勉强可以做了。

有一次彭给了他几块饼干，饼干筒子放在床下。他以后

每到我们房里来，就要用小手指着床下的饼干筒子，后来又把它拖出来，抱起它放到彭的身上。彭揭开盖子递了两三块饼干给他。他的母亲在旁边看见了，便用手指头在脸颊上刮，羞他说："威司利丑丑，做贼呀！"他听见这样的话，略一迟疑就把饼干还给彭。他自己觉得难为情，又爬到床底下去搬东西，把一瓶一瓶的药放在彭的身上，有一次竟失手把一个瓶子打碎了。

有时他的父亲在这个房间里，坐在彭的一个大皮箱上面。他跑进来，要他的父亲站起让他，用小手拚命拉他的父亲，一定要拉起来才罢手。在平时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有父亲或者母亲跟随。在甲板上他也是一样地东跑西跑。他的父亲害怕出事，不让他跑到边上去，于是自己跑去阻拦他。他看见父亲一跳一跳地拦住他，他忍不住笑起来，一面拚命向前跑，但是总跑不出他的父亲的圈子。餐厅的桌子两边，每一面可坐三个人，他的父母对面坐着，在横头添了一把椅子给他坐了。他们三个刚刚坐成了一个三角形，这样他的父母才好照料他。但是他常常吃了一两样菜就跑开了，母亲只好离开餐桌去拉他回来。

程的夫人不过二十几岁，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一个整天东跑西跑，另一个才几个月，还不能走路。她要看顾大的，又要照料小的。每天的两顿饭她没有安心吃过，不是因为威司利跑了，便是因为房里的小孩哭了。威司利在西贡受了暑，病了一天，就把他的父母急坏了。她比程更着急，午餐时她也不出来吃饭。啊，母亲的心！

威司利病好以后，程又病了一天。后来他对我们说："有了小孩子，闹得我一刻都不能够安宁，这几天真把我苦死了。"然而他无意间露出了欣慰的神情，好像这痛苦也是有代价的。

到了新加坡，程的母亲、兄弟、妹妹都上船来接他们。这一家人现在团圆了。我也替他们高兴。但是我不愿意跟这十多天来的友伴分别，尤其使我挂念的是那个两岁的威司利。不知道我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再看见他们。

新的旅伴

程在新加坡下船以后，我们的房间里仍然有四个人，因为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广东人姓邓的。他也到巴黎去，但不是去读书。他原是电机科的学生，在法国住过六年，回国以后又在广州服务了一个时期，后来就到新加坡工作。他这次到法国去购买机器。

在我们的房间里邓代替了程的地位。他初来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子送他上船。她是他的妻子，相貌端正，身体健康。她和他讲广东话，我们不懂她讲些什么，但是那心情我也许可以猜到。

后来快开船了，她默默地和他对望了一会儿，然后微微一笑就低下头去。她再抬起头来，他就挽着她的手往外面去了。他们也许有更重要的话说，她也许会流泪给他看。然而我们没有权利妨碍他们的告别。我们知道她送了他两篮子的水果。这以后我们也可能吃到它们。她还送了两本书给他。这两本书我以后也借来看过，都是许钦文的小说，在当时也许是时髦的作品。但是她挑选它们一定也费了一番苦心。书名是《故乡》与《回家》。不管内容怎样，单是书名就可以表达出妻子的心愿。她把这两本书长留在他的身边，希望他时时记着"故乡"，希望他早日"回家"。以后我每看见这两本书摆在邓的床

位上，那个圆圆脸的做妻子的女郎的面影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她一定是很聪明的女子。

邓会讲普通话，我们可以自由地和他交谈。他去过法国，很熟习法国的情况，因此有许多谈话的资料。他的性情直爽，这使他更容易和我们接近。我们这个房间的四个人性情差不多，谈起话来也没有拘束，大家都觉得痛快。

邓来了以后，那两个在香港上船的广东学生李和黎也常常到我们的房间里来玩。他们也买三等舱票，房间在上一层，虽然比我们的房间小一点，却只有四个床位。我们不大懂他们的话，常常靠邓来作翻译。李年纪轻，人也天真。他带了许多线装书准备到法国去研究古文，我们常常笑他。

现在我们同船的中国学生一共有九个了。每天晚上，在甲板的一角安放了我们的帆布椅，九个人中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我们毫无顾忌地谈着各样闲话，讨论各种问题。小孩般的李忽然想起就说："这里是中国的租界，这里是中国的殖民地。"大家都笑了。

于是一个人说："今晚又讨论什么问题呢？"前一个晚上我们讨论了帝国主义，这一晚就来谈贞操问题。邓念"贞操"两个字声音很奇怪，在彭的耳朵里听来却变成了"精虫"。这又是引大家发笑的资料。

有一次年轻的李又提起"中国租界"的话，那时候他刚刚讲过他跟一个法国人打架得到胜利的故事。他学过拳术，虽然年纪小，却很有力气。彭接口说："再过十几天，大家便要各走东西了，租界也会被人收回了。"大家只微微一笑。

耶稣和他的门徒

在新加坡不仅走了一位程君，同时还少了两个波斯教士，其中一个年长的曾经被我们称为“耶稣·基督”。

这两个波斯教士本来是到西贡去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西贡登岸。船刚到西贡时，我们看见一个法国警察在甲板上和他们谈话。那个警察问他们到西贡去干什么。他们的答语我听不出来，然而看他们的神情，像是很受窘了。

这两个教士里面年长的有五十多岁，年轻的一个不过二十几。年长的教士的面貌很像图画里的耶稣。我起初并不曾留意，有一天卫向我提起，我才觉得他的话不错。从此我们就叫他做耶稣，而叫他那个年轻同伴做耶稣的门徒。

这位耶稣是一个苦行者。他永远是那一副受苦的面貌。每天他和“门徒”一起在甲板上散步，讲我们不懂的波斯话。他们没有买帆布椅，别人都躺着的时候，他们仍然站在甲板上。甚至在风浪较大，老人受不住了时，虽然有空着的帆布椅，他也不坐。他抱着一块木头睡在地上，瘦脸上露出无穷的痛苦，似睡非睡地半张开口发出微弱的呻吟。我在旁边看见他这个样子，心里很不好过，就站起来走下舱去了。我把我的椅子拉到他的身旁，暗示着让给他坐的意思。

他们本来住在上一层的房间里，但是船要离开西贡时，他们忽然搬到我们的房里来了。据说他们原来买的是到西贡的船票，如今在西贡不能上岸，改到新加坡，补了票，而床位却已经卖出去了，他们只得搬到下面来。他们搬下来的时候，茶房的脸上露出不高兴的表情，把他们的行李胡乱堆着，并且把帽子塞在床底下。他们找不到帽子，叫茶房来问，茶房却把他们教训了一顿。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但是不知道怎样第二天他们又搬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天气更加热起来了。他们依旧穿着那一身厚西装，照常地走，照常地睡。他们忍受着一切。

这位耶稣有一次用英语对程说："抽烟是恶事，喝酒是恶事。"当时他的声音严厉，态度庄严。他的受苦的脸一直在我的眼前摇晃。他的脸上表现出他过去所受的无数的痛苦，还预言着他将来所要受的更多的痛苦。

这位耶稣到了新加坡，便带着他的"门徒"上岸了，这个地方还没有拒绝他们。他们可能是到那里去继续过受苦的传道生活。然而你这位波斯的耶稣啊，你以为你这样就会拯救人类吗？不，不，除了反抗而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人类得救。你，你一味地忍受，到后来你也会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忍受"会判决你的死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够忍受，我们也不应当忍受。

猴子的悲哀

在最高的一层，就是头等舱的上面，大概是船长住的地方。我们在第四层甲板上可以望见上面的景物。那里的房间有三扇圆的窗户，被蓝花布窗帷掩着。房门不在这一面。房外两边都有空地方，各放了一只小船，左边还放着几个铁丝笼，里面关了三四只大鸟。在一张桌上还有一个笼子，一只猴子被囚在里面。

有一天，猴子居然从囚笼里逃出来了。

我知道这件事是在第二天早上，就是离开新加坡的次日。我看见旗杆上有一个像老鼠一般的东西。旗杆很粗，上面因为有几根起重机的杠杆要靠在那里，就加了一个椭圆的木板，四面也围着铁栏杆。栏杆不高，又不密，倘使有人站在木板上看下面，他的身子只能够被栏杆遮住一小半。所以猴子在上面跳动，我们也看得见。船的两边各有一个用粗绳(也许是铁丝)编成的梯子，一直通到木板上，有时水手也从这个梯子爬上去扫除上面的灰尘。木板上面还有一道小梯，通到旗杆的顶上。

起初我还疑心那个东西是老鼠，因为我们在货舱里看见过大老鼠，而且那时我还不知道猴子逃亡的事。后来猴子沿着梯子爬下来，但是爬到中途又爬回去了。这次我才看清楚

它是猴子，而且就是平日关在铁丝笼中的猴子。于是有人来告诉我猴子逃亡的故事，又有人说它昨晚曾在上面拉绳子弄出响声来。

黎拿了一个苹果出来，问一个瑞士老头子怎样才可以把它抛上去给猴子吃，猴子已经饿了快一天了。瑞士老头子虽然是老于航海的人，却也没法回答黎的问话。

不久一个水手从左边的梯子爬了上去，爬得很快。他快要爬到上面，却给猴子看见了。猴子就从右边爬下来。这个水手马上退了几步，向旁边一侧，同时把手向猴子一扬。猴子本来很狡猾，它爬到半途便停下来观动静，这时又爬回到木板上去。水手看见它爬回去，就很快地爬上了木板。猴子却又从右边爬下去了。于是另一个水手又从右边的梯子爬上去。猴子看见两边都有人上来捉它，便很快地溜到起重机的杠杆上去。右边的水手立刻把脚一蹬手一扬，也就溜到那根杠杆上面。猴子又溜上了另一根杠杆，水手也跟着上去。猴子看见追得急了，连忙溜到旁边吊货的绳子上。下面站的旁观者便拉起那根绳子用力摇动。猴子没有防备，经不住一摇就落到第三层的甲板上面了。旁观的人一齐跑过去捉它。它跑得很快，大家都追不上。后来还是一个法国兵用了一顶大帽子把它罩住了。这时候饲猴人就跑过来，很欢喜地把猴子抱在怀里，走上最高的一层去了。

猴子在饲猴人的怀里不住地哀叫。声音并不响亮，却有点惨痛，在这静寂的海上，在我的平静的心里，许久都不能消去。

锡兰岛上的哥伦波

一月三十一日我们到了哥伦波。关于这个地方，我从前在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里读到了下面的话：

> 哥伦波在楞伽岛，这岛土人唤做锡兰。我佛世尊曾经三度来这岛度人，第三次就在岛中最高峰顶上说了一部《楞伽大经》。①

我们这几天在船上很闷，到了这样的地方，当然想上岸去看看。所以船刚刚进港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痒起来了。

然而我们的船并不靠岸，在这里停的时间又很短，我们上岸去也没有多的时间好玩。譬如那个有名的坎第湖，上岸后要坐四小时的汽车才到得了那里，来回就要花八个钟头，哪里还有玩的功夫？

我们决定搭这个船公司的汽艇上岸。这比较方便些。开船的时间是规定了的，每半点钟一次。但汽艇只有一只，一次从船上开，另一次从岸上开，如果赶脱了一班，便要在码头上等一个钟头。

① 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一九二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哥伦波现在译作“科伦坡”。

上岸的第一件事便是交信。在邮局的斜对角有一个小小的公园。正中有一个喷水池。园里还有一座石像，一手持钵，一手握杖，看起来很像一个化缘的行脚僧。

卫和彭同坐在一把长椅上，我却站在旁边一株小树下面，一只手握着树枝。树根旁边有一块砖，我用脚把砖翻过来。下面有许多黄蚂蚁，它们受了惊，慌张地乱跑，看起来密密麻麻，不知道有多少。有些爬上了我的皮鞋，又被我抖下去了。

这时有两个本地人走过来，站在我们面前，带着笑脸和我们谈话。他们会讲几句英语，卫就叫他们领我们到本地的庙宇去看看。

坐了一阵电车，我们下来，一路上椰子槟榔漫山遍谷，肥大的叶子被风吹起，真像许多绿凤迎风舞翼。常常有几个漆黑面孔的黑美人走过路旁，她们的服饰很漂亮，短发却乱得像鸡窝，牙齿因为常常嚼槟榔变成了红色。

我们走到了卧佛寺。庙宇的建筑相当雄伟。看庙人领我们到各处看了一下。大殿上也还堂皇，四壁和天花板上都绘着菩萨像，颜色很新，像是新近重绘上的。看庙人在殿前一株大树上摘下三片树叶，很恭敬地献给我们三个，每人一片。这是菩提树，土人奉它为神圣。听说每座庙里一定有一株这样的树，树上还挂着一些东西。我们在十字街头也见过一株菩提树，树上还挂得有一个神龛，周围有竹篱围着。

我们得到菩提叶便把它插在西装袋里。那个人又引我们去看卧佛。上殿时他叫我们揭下帽子脱去皮鞋，似乎门前也有一张这样的告白。看庙人开了门上的锁，让我们进去。我

们看见卧佛了。像塑得平常，佛斜着身子躺在那里，右手支持着头。像非常大，塑起来工程倒也不小。供桌上放着几盆雏菊，这是佛教徒敬献的。花开得正好，看庙人也摘了三朵给我们。我们走出殿来，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殿门便锁上了。

看庙人向我们要礼物，我们身边实在没有东西送给他。他便向我们讨钱，彭给了他几角钱，这才罢了。

我们走出庙来，那两个本地人还在门外等候。看庙人用一阵笑声送走了我们。

那两个本地人又把我们引到另一个庙宇去。那里的看庙人出去了，殿门没法打开。但是我们又冤枉地脱了一次皮鞋，揭了一次帽子。在那里我们遇见了几位黑色贵妇，虽然黑，面貌却很美，装束也很华丽。我告诉那两个本地人，我们不要再看庙宇了。我们现在需要的还是咖啡店。事实上我不是佛教徒，佛教的庄严也引不起我的注意了。

我们进了一个咖啡店。五个人一共喝了三瓶柠檬水，两杯茶，十只香蕉。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彭付了一个鲁比（一个银圆）。对面一张桌上有两个本地人在吃炒饭。他们穿一身漂亮的西服，却捧起盘子，用手抓饭来吃。

我们最后到胜利公园去。这个公园很大，花草也多，但是布置不及西贡的植物园。卫、彭和两个本地人坐在一把长椅上谈话。我却拣了大树下面的一把椅子坐下。园里只有寥寥几个游客，和几只飞鸟。远远地有一对年轻人坐在树荫下长椅上讲情话。少女的粉红衫子，掩映在绿树丛中，更显得鲜艳。

过了好一阵，他们走过来叫我回去。我们走出公园，不多远便有电车站，我们坐电车到海滨。下车不几步，我们看见了先前逛过的那个小公园，便又进去了。我独自坐在石像下，默默地望着喷水池。时间过得很快，不到四点半钟，我们便出了公园，打算在附近闲走一会儿，搭五点钟开的汽船回到海轮去。那两个本地人向我们说了告别的话，彭身边还有本地的钱，就拿出七角来送给他们，让他们走开了。

我们随便在街上走走，有些印度人看见我们就叫："阿拉达，"（他把我们当作日本人，就用日本话的"你"字称呼我们）"Change money?" "Drink tea, good tea!"① 彭带笑用英语分辩道："我们是中国人。"后来我们就站在大街上茶担子前面，每人喝了一杯茶，付了三角钱。卖茶的人接连说："不贵，不贵。"

我们走到码头，找了一个地方稍微坐了一阵。后来汽船到了，乘客上岸以后，我们便跳上船去。我们先前上岸时同来的还有几个法国军官，现在我们回去又和他们同船。我们在汽船上坐了好久才开船。有一个法国军官等得不耐烦了，便跑上岸去。他回来时船刚刚离岸。他的同伴们坐在船上望着他笑。他从袋子里摸出一方手帕不住地挥动，一面说："再会，再会。"我们大家都笑了。还有三个法国女子也来迟了一分钟，眼睁睁地望着船走了。要坐下次的船，还得等一个钟头。自己雇划子，既没有坐汽船安稳，又要花钱。

---

① "Drink tea, good tea!"（英语）："喝茶罢，好茶哟！"的意思。

船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开出港口。午餐后我们在甲板上面看装货卸货。工作完毕了，那些本地工人就在船上吃饭。一个人把一张芭蕉叶摊开，白饭就放在那上面，另外还舀了一瓢肉汤倾在饭上。那一群黑工人从工头那里得到他们的晚餐后，便拣了一个地方坐下，把芭蕉叶放在地上，用他们的黑手抓饭吃。有一个正吃得起劲，不提防背后一个法国兵拿了一块布抛在他的身上，他惊得跳起来，却把饭倒在甲板上了。他一点也不生气，默默地把饭抓起来就往口里塞。

货装完了，舱板也上好了，船还没有开。泊在我们前面的一只英国船倒先开了。我看见这只船转了一个弯，然后慢慢地消失了。海面平静，天空黑暗。对岸在放烟火。一个红的或者绿的火球飞上天空，忽然散开了，成了红的或者绿的花。最后的几个会变成两种颜色，先绿后红。卫一面看烟火，一面看手表，据他说每隔四分钟放一次。后来等了四十分钟，还不见再放一个。但是船慢慢地动了。

印度洋中的《茵梦湖》

从哥伦波到吉布的[1]要走七天的海程，在我们这次海行中，这是一段最长的路程了。我们听说印度洋的风浪很大。彭有一个朋友最近从法国回来，经过印度洋，从吉布的到哥伦波的一个星期内，他睡在床位上，不吃一点东西，就像死人一样。我以前在什么人的游记里（也许是孙福熙的游记罢）也见过一幅描写印度洋中大风浪的可怕的图画。如今听见彭这样说，就有些胆怯了。何况第一天我就听说身体很强健的广东学生李和黎在上面的舱房里吐过几口清水呢。

然而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过虑。印度洋中七天的生活是非常平静、非常愉快的。我们在这里看不见一点风浪。水面的绿色洗也洗不掉，那无尽的涟漪，一个接连一个，永远不停地向前面滚去。没有浪涛声，只有海水在船底下私语。白天有红日在蔚蓝的天空里航行，把阳光散布在我们船上，又被篷布遮住了。我们偶尔离开帆布椅站起来，便看见日光在碧波上流动。有时候还有一群一群的海鸥在天空飞翔，或者在水上游戏。天是蓝色的，海是绿色的，在这样的背景里映出来的

---

① 吉布的（Djibouti）：东非法属索马里兰的首府。

雪白的翅膀是分外地鲜明美丽。晚上空气凉爽，天上有月有星。夜很柔和，我喜欢这个美丽的、温暖的海上的夜。

在这些日子里，甲板上的生活的确舒适、愉快。每天除了下舱去用餐用茶点外，我们都留在甲板上看书谈话。杨带了一部《红楼梦》来，许多人都在读它，谈它。彭读了两遍《红楼梦》，晚上睡觉时，还拿着书说是要去会林妹妹。范拿了一本字典读《红楼梦》，遇到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李一个人在读《古文观止》。

某一天李告诉我说这是旧历元旦。但是在印度洋舟中谁还有心思过年呢？我早已把旧历忘在脑后了。这一天和平日过得一样地平淡而愉快。然而也有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是我把一册世界语译本的《茵梦湖》[1]掉在印度洋里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这天早晨我拿了两本《茵梦湖》到甲板上去读：一本大而薄的是世界语译本；一本小小的红书是德文原本。我拿着书靠在栏杆上，带了一本德文小字典在翻看。左手拿着两本书，又按住字典，右手在翻字典的篇页，当时没有留心拿稳书，竟让世界语译本从手中间进了出去，我连忙用右手去捉它，已经来不及了。书页大张开，随风飘舞了几下，就落到了水上，像平日那样地摊开着，正是那一页，有着吉卜赛姑娘的歌的那一页。我用留恋的眼光望下去，好像在看一个亲人一样。但是书渐渐地往后面退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再往下看，已经看不见它的一点踪迹。这样大的海洋里，一本小小

① 《茵梦湖》：德国作家斯托姆（T. Storm，1817—1888）的中篇小说，有郭沫若和钱君胥合译的中文译本。

的书！

吉卜赛姑娘的歌的最后两句，还在我的眼前荡漾，我怅惘地轻轻把它们念了出来：

Morti, O, morti,

Mi devas sen vi! ①

① 世界语："死，哟，死，我应当没有你！"

伊利沙白与来印哈德

为了纪念《茵梦湖》的坠海，我就使里面的男女主人公在船上复活起来。

这时候船上有两个法国小孩，女的大约有七岁，男的比她小一岁的光景。他们两个常常在一处玩，而且玩得很亲密，真有点像《茵梦湖》第二章《儿时》里所描写的来印哈德和伊利沙白。所以我就用那两个名字称呼他们。

来印哈德和伊利沙白是在这只船上认识的。来印哈德同他的父母一块儿旅行。伊利沙白是跟着她的母亲和两个姨母上船的。他们很快地成了亲密的小伴侣。

有时伊利沙白拿了朱古律糖①上甲板来，看见来印哈德，便分几块给他吃；来印哈德有玩具也拿出来和她同玩。

我们的海轮在西贡装了许多袋米，一到新加坡这些米袋就被人搬下去了，散落了好些白米在甲板上。伊利沙白和来印哈德两个便一把一把地将白米拾起来，装在他们的木碗里，说是要拿去做饭呢！

在海上我们常常看不见什么东西，所以一有船来，大家都

---

① 朱古律糖：现在的译名就是巧克力。

非常高兴地抢先去看它，就像它是一个熟朋友。这时候来印哈德便高叫“bateau①！”伊利沙白也跟着跑去。

船上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小孩名叫利利的，也很可爱。他有时也跟他们两个在一起玩。有一次三个小孩都爬在货舱的舱板上面玩什么游戏。后来伊利沙白和来印哈德都爬下来了，而利利却站在上面不敢动，高声叫：“利利要下来！”他的母亲才跑过来把他抱了下去。

---

① bateau（英语）：船的意思。

救生带之试验

舱里布告板上贴了一张法文布告：

今日下午十六点钟试验救生带……

我并没有注意它。到了下午四点钟，我正在餐厅里写信，忽然听见了一个大的响声。我吃了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要放下笔到上面去看，管事就跑来叫我到上面去试验救生带。我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便把纸笔收起跑进舱房里。我看见卫和彭都在取挂在壁上的救生带，便也取下挂在我床位旁边的那一副，拿着它走上了第四层甲板，像许多西洋人那样把救生带缚在身上。我起初想也许会把船停了，放一只小艇下海去，让我们在小艇里面演习救生带的用法。但是我们站了许久，还不见一点动静。舱面上站满了人，你望着我笑，我望着他笑。

又过了一会儿，那个管事才慢慢地拿起一张名单来点名。他把我的姓名叫成了“李要扬”，虽然读错了字音，我也答应了一声。我充满好奇心等候试验的到来。但是，怎么？管事竟然走开了。许多人都下去了，甲板上只留下我们几个。我这时才知道所谓试验，所谓演习不过如是。

我走下舱来，经过布告板，又看见一张法文布告：

明日上午船将突然停止进行，以便检验机器有无损坏，乘客勿惊。

我笑了笑。放心罢，我是不会惊慌的。

两 封 信

在平静的印度洋上，我写了两封信。

一封是给我的两个哥哥的，里面有这样的话：

今天除了思念你们而外，我什么都不想。只是我这样地思念你们，你们果然能够知道么？你们也许不会了解我。这一年来我是一天天地走向孤独了。我和家里的人差不多完全断绝了消息，便是和你们两个也很少通信。然而我又不能不思念你们。我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有时候我愤怒地对自己说："你快些使自己被别人忘却罢，不要使别人将来为你的不幸的生活而悲伤，不要使有一个人为你哭泣！总之，你叫别人忘却你，你也就忘却别人罢！"

然而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够忘记别人，即使我自己可以被人忘却。这一年来的生活，尤其是这半个多月来的生活，更使我认识了我自己。无论什么人，只要我见过他一面，只要他曾用和善的眼光看过我一眼，我就不能够忘掉他。何况你们是我曾经相依为命的两个哥哥……

另外，给我所敬爱的一个年长的朋友，写了下面的话：

……我们从卧佛寺出来，菊花和树叶还插在我们的衣袋里。此行于我不会生什么影响。我不是佛教徒，佛教的庄严已经引不起我的注意了。然而我在过去的某一个短时期里也颇有意皈依佛教。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我也曾与许多和尚往来(虽然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但是结果我并没有得到什么。那只是一个妄想，那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这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你自信你看破生死罢，然而你看见或者身历可悲、可喜、可愤的事，还是不能不悲喜、愤怒，否则你便不是人了。然则你又何尝看破生死呢？所谓虚无是与现实的人的世界相冲突的。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我所见到的人们的痛苦，也是不能够拿玄妙的理论来解除的。于是我不能够忍受下去了，便重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这样的我来到了佛教史上的重要地方，站在伟大的卧佛之前，会有什么感想呢？我已经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了。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

繁星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

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它们就是我的朋友，它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

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霎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有一夜，那个在哥伦波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着：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下面的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星算是腰带。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看，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吉 布 的

吉布的到了。

下午五点钟的光景，我正在餐厅里写游记，黎进来说："海水已经变了颜色，可以看出分明的两种颜色来。船快要靠岸了，上去看看罢！"我答应了一声，就收拾了纸笔，跟着他到舱面上去了。

海水果然现出了两种颜色：远处的是蓝色，近处的却是绿色。看起来界限也很分明！远近都有小船往来，船里坐的是戴红色圆顶帽的阿拉伯人。还有些黑人，光着头，赤着身子。海鸥一群一群地在水面飞舞游戏。不远处，还有跳起来的大鱼。

看见岸了。这一个星期来的唯一希望就是靠岸，它马上就要实现了。但后来我才知道船并不靠岸，却停在海中。一只汽艇载来了几个本地警察。他们陆续上了大船。红色高帽，黑色制服，手里握着警棒，下面两只脚不穿袜，也不穿鞋。黎忽然笑起来了。警察们并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只顾摆起架子站在扶梯旁边，监视上下的行人，好不威风！

卫叫我到左边去看。那里围了一大群人，都在望水面上的什么东西。我挤进人丛中去，在栏杆旁边找到了一个地位。

水很清。一些黑脸浮在绿水上面，口里不住地叫。这是什么？五个黑小孩！他们泅水过来向船上的人要钱。他们的脚在水里不住地上下拨动，我看得很清楚。一个法国人丢了一个铜子下去，他们中间有一个就把头往水里一埋，脚一翘，跌了几个觔斗，钻下水去不见了。忽然水面起了一个大声音，好像一尾大鱼跳起来似的，于是那张黑而紫的脸，短而卷的头发又出现在水上面了。黑小孩用手抹一抹脸，手里拿着那个铜子，朝我们晃了一下，便把钱放在他的口里衔着，然后泅着水走了。

"这也是人的生活，"卫侧过头对我说，他的面貌很严肃。

我不答话。我望着黑小孩跟波浪搏斗的情形，我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搔着痛，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残酷的景象罢。

“我们旅行了非洲了”

船二月七日下午到吉布的，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离开。船不靠码头，船公司又没有汽船往来接送，乘客上岸很不方便。第一天因为时间太晚，第二天因为船开得太早，我两次都没有上岸。但是邓和黎在第二天早晨上去了。

这天早晨，我喝过牛奶以后就到舱面上去。在我们这只大船的右面，并不十分远，有一只沉没的船斜卧在海中。船身已经起锈，有两个烟突，看起来船并不小。据说也是这个公司的船，半年前从马赛开往上海和横滨，在红海里起了火，不久就扑灭了，走了一天到吉布的，船又烧起来，终于沉没在吉布的海港里。幸好乘客都没有遭难。有八个中国学生，行李都烧掉了，在吉布的住了两个星期，才搭上这个公司的下一班船回国。这个故事也许是真实的罢。今天我看见这只沉船，还想象得到半年前海上的惨剧，耳边仿佛还听见遇难者的呼救声。

我走到第三层的舱面。船尾有一个法国人在钓鱼。水很清澈，便是钩上的饵在水里也看得见。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有上钩的鱼，那个人就不耐烦了，抛了两块牛肉下去，马上就有许多小鱼围上来吃牛肉。这些鱼真是小得很。忽然水面上

起了几个泡，一尾大鱼跑过来一翻身就把那块肉吞下去了。但是饵还浮在水上，没有鱼来吃它。钓鱼的人愈来愈性急了，每过两三分钟就要把钓线拉起来看。他钓了一个钟头，还不曾钓起一尾小鱼。后来他又换上几次新的饵食，也没有用，终于收起钓竿走了。

水里小鱼密密麻麻地聚成一团。忽然一只海鸥飞在水面上，像要啄食什么似的。于是水面一声响，水花四溅，一群小鱼就随着水花飞到各处去了。

快到十点钟的时候，还不见邓和黎回来，我们有点替他们着急。后来我们下舱去等开饭，但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两个上岸去的朋友。一直到开船前的几分钟，他们才走进房里来。邓手里拿了两筒新买来的香烟。黎得意地用英语说："我们旅行了非洲了。"

红 海 不 红

以前听见人说红海很热。我们在红海里走了四天，却觉得一天比一天冷，到第二天许多人就受不住了，不但天气变冷，而且风浪也很不小。舱面上许多帆布椅凌乱地放着，没有人过问，连那几个法国军官也常常躲在舱里。

红海的水是深蓝色的，一点也不红。我不知道红海这个名字的来源。我也看过红海的日落，这自然不是平凡的景象。太阳快走下地平线的时候，云被日光蒸得鲜红，又反照在水面上，这时候海水的确有些红，但是这红色也只限于一个地方，并不是整个海面成了一片鲜红。而且这种景象也并不是红海所特有的，我记得在印度洋看落日，也有这样的印象。

卫看见红海的日落，便坚持地说："这里的海水的确比别处的红，不然何以叫红海呢？"彭在旁边就笑了起来，接口说："你不曾听见昨天那个瑞士老头儿说过，'红海的水是红的，你到浴室里用海水洗个澡，就会变成布尔什维克。'你能相信这样的话吗？"

卫无话可说了。然而我们依旧想不透红海是怎样得名的。我们只知道红海不红而已。

海上的日出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层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光亮的不

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么？

通过苏彝士运河

二月十二日十点钟船到了苏彝士。我们没有上岸，只买了几套拿上船来卖的风景片。

下午一点钟开船，我们进了苏彝士运河了。

两边是岸，两岸的距离大约只能容两只轮船通过，可是同时又不能够走两只大船。岸上的风景很好，有整齐的房屋，有茂盛的树林。右边空地多，没有种什么东西。水很平静，是浅蓝的颜色，只有细微的波纹。经过了红海的风浪以后，我到了这个水明如镜的运河，心里的快慰真难以形容。

不久我们又经过一个很好看的大树林。几个西洋人带得有望远镜，就用它们来看岸上美丽的景物。还有两个法国人拿出照相机来拍了照。

一只英国轮船慢慢地跟着我们的船走。我们在船尾上看这只来船，看见船头，倒把船身缩短了。这样地看来船，在海上很少有这个机会。

这里海鸥不少，有时一群一群地飞下水去，离船并不远。我身边还有十几个中国铜子，现在没有用处，便摸出它们拣一个向海鸥掷去，没有击中，就落到水里去了。李和卫他们也拿铜子来掷，都没有打中海鸥。李偶然掷了一个铜子在岸上，便

快活地说："从此苏彝士河岸上有了中国钱了。"我们都笑了起来。

船走了几个钟头以后，似乎走出运河了，一时看不见了两岸。后来船又进了运河。快到午餐的时候，船忽然在河中停下来。我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问别人，有的说不知道，那个瑞士老头儿说是等别的船来。这里的水的确像一面镜子，映着落日的霞辉，非常美丽。

到了晚上，船又开了。夜里天气很凉，我们在房里闲谈，没有到舱面上去。在十一点钟的光景，我们就睡了。

大概在早晨两三点钟罢，我忽然醒了，到上面的厕所去。我听见抛锚的声音。我在船尾站了片刻，看见水面上远远地现出一盏大的灯，在这深蓝色的天和水之间，放出异样的亮光，我很爱这一盏河口的明灯。

波赛[1]到了。明天早晨我们要上岸去呼吸陆地的空气。离开哥伦波以来，我就再没有踏过陆地了。

① 波赛(Port Said)：现在译作"塞得港"。

波　赛

到了波赛，船不靠岸，船公司又不派汽船来接送客人，我们要上岸，实在不方便。卫和彭因此决定留在船上。范和杨颇想上去看看，可是他们在上海动身的时候，并没有拿护照到英国领事馆去签字，现在就不能在这里上岸。

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游了波赛。

我是和那个在哥伦波上船的英国人同去的。我们把护照交给站在扶梯旁边的本地警察看过以后，便顺着扶梯走了下去。在许多小船中拣了一只，跳上去，叫舟子马上把船划走了。

其实船停的地方离码头很近，不过二十步的光景。我们在船上就看得清楚岸上的一切。但是没有小船，谁也没法上岸。

照规矩，划船的人并不收船钱。岸上有一个收钱的地方，我们便把钱交到那里。船钱是五个便士，我拿出一个六便士的银币，那里没有钱找，说是暂存一个便士，回来时再补。那个英国人给了一个先令，那里也只找出六个便士来。

我们上了岸，英国人要去看勒赛卜斯[1]的铜像。我也想看看这个法国人是什么样子。铜像在海滨。我们先走过一道

铁栅门，一个警察来把我们的身上摸了一下，算是检查过我们身上有没有违禁物。这里是海关。过了海关，我们便沿着海滨走去，看见一条堤一般的石路突出在海中，石路的末端就立着铜像。勒赛卜斯左手拿着运河图，右手指着红海，眼睛望着地中海。铜像正面的石座上刻着一行拉丁文，据同来的英国人说，是“我开凿了这个地方”的意思。我们在铜像下面徘徊了一阵，便从石路走回码头，然后走进城去。岸边有无数的小船，望过去，桅杆就像树林一样地密。

天气很好。早晨下过微雨，现在太阳从云里露出来了。我们就在温暖的日光下面慢慢地走着。船进红海以后天气又变冷了，这时我穿上大衣并不觉得热，我们正好借散步来使身体暖和。街道清洁、宽敞，两边有各样颜色的房屋。路中间还有一种有轨马车。我们一面走，一面闲谈，那个英国人尤其高兴。偶尔有一两部出租马车来向我们兜生意，他便对车夫说：“我们在这里散步，觉得非常快活。对不起，用不着你的马车。”

路上行人并不多。我们偶尔遇到几个阿拉伯女人，她们蒙住脸，只露出眼睛来，额上顺着鼻梁挂了一根长的牛骨环子。男人戴红帽，穿的衣服也很奇特，一般人都说英语。后来我们走过一个菜市，那里又污秽又吵闹，我们不曾停留，就匆匆地过去了。

---

① 费·勒赛卜斯(1805—1894)：法国的外交家和冒险家，发起、计划和主持修建苏彝士运河的人。他的铜像在一九五六年年底被站起来了的埃及人推倒了。(一九五九年注)

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把城里重要的地方都走过了。我很想乘火车到开罗或者亚历山德利亚去看金字塔和斯芬克司①，但是下午一点钟就要开船，时间不给我方便，我只好在一家照相馆门前看看金字塔的照片罢了。

我们正要回去，忽然听见了一阵钟声，这是从教堂里传来的。英国人是一个基督徒，听见钟声，便起了到教堂去的念头。我也就陪他去访问那个教堂。我们朝着钟声走去，果然走到了教堂的门前。教堂里正在做礼拜。一辆马车停在门口，一个年老的绅士携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姑娘从车里下来。英国人走过去问他这是什么教堂。老绅士回答是天主教的。英国人是新教徒，不肯进去。我们等到老绅士进去以后，在门缝里张了一下，就走开了。

我们又往前走，走不多远，便看见一个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我们走过去，正门已经关上了。我们正在踌躇间，前面来了一个阿拉伯人。英国人便问他这是什么教堂，他说："这是英国教堂，你们要进去，可以走那边的小门。"他领着我们转了一个弯，果然走到小门前面，轻轻地推一下，门就开了。英国人向他道谢一声，便进去了。我也跟着进去。

我们进了门，看见花丛中有一条小径，便沿着小径走去。转一个弯，经过一个花棚，走到花棚尽处，我们看见右边一道石阶，石阶上便是礼拜堂。门是锁住的。对面有几间房屋，屋里的人听见了我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便从窗里露一个头出

① 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有双翼的怪兽，常常坐在路旁岩石上，拦住行人，要他们猜一个难解的谜，猜不中的人便会给她弄死。

来问什么事情，接着人也走出来了。

这位年轻的英国牧师客气地跟我们握了手，接着就问我们的来意。和我同来的英国人开始叙述自己的历史：他是一个生在印度的英国人，这还是第一次回英国，先搭船到马赛，然后再转伦敦；他是医科学生，又是基督徒，所以到教堂里来祷告。他说完以后，我就简单地说我是中国学生，现在搭船到法国去读书，路过这里，上岸来玩玩。牧师问我是不是从上海来的，我说是。他问上海还有没有战事？我说没有，战地离上海还远。他又问我是基督徒还是孔教徒。我说了两个“不”字，正要接下去说我是一个非宗教者，英国人却代我补足道：“他们中国人大都是孔教徒。”我也只好微微一笑。我们又谈了一些闲话，牧师就打开礼拜堂的门，让我们进去，然后又跟我们握手告别。

我们脱了大衣，放在门外的长凳上，再把帽子压在大衣上面，然后空手进去。里面墙上挂了不少的宗教画，我也不大看得懂。礼拜堂内有一排一排的座位，每个座位前都放了一个蒲团一般的东西，每一张小桌上有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

英国人跪下去祷告起来，他的态度不用说是很虔诚的。我坐在旁边，心里暗笑。等到他祷告完毕，我们才一起走出去。今天是星期日，十点钟有礼拜。然而这个英国人爱礼拜的心，不及他爱面包的心，他要回到船上赶早餐的时间，便只好把礼拜牺牲了。我听见他这样地在和自己商量。

我们出了礼拜堂，就往归路走。我们又走过那个博物馆，门依旧关着，真不凑巧，偏偏遇到星期日。英国人后来又说要

到别处；我不想等他，就一个人回去了。

到了付船钱的地方，收钱的人收了我一个先令，只找出来六便士，连先前欠的一个便士，现在共欠两个便士了。这样的债，要什么时候才还得清呢？那么为什么又不把船价改为六便士呢？这个道理我始终猜不透。

我从头等舱的梯子上了船，正望见卫、彭、邓、黎在对面第四层的甲板上散步。我心里高兴地想：我也旅行了非洲了。

卖 艺 人

我走到第四层的甲板上，卫便向我说："刚才有个阿拉伯老头儿到船上来玩把戏，可惜你没有看见。"我问他是什么样的把戏。

"用三个铜杯，叫每个杯里面都变出一个木塞来，然后又叫三个木塞都跑进一个铜杯里去，"卫说。

"这没有意思！还有别的吗？"

"还有把一只小鸡的头一扯，立刻跑出另一只小鸡来，"卫得意地接下去说。

这时早餐的铃声响了，我们便停止谈话走下舱去。在开饭的时候，餐厅里来了三个穷音乐师，给我们奏起乐来，里面那个年老的还唱了几首歌。老歌者的破声痛苦地在餐厅里抖着，一直抖到我的心上。他唱完以后，便拿着一个盘子挨次走到每张桌子前面。吃饭的人全高兴地摸出钱来放在盘子里，老歌者道了一声谢，再歌了一曲，便走了。

饭后我们又到舱面上去。不久一个老头儿走了过来。他有红黑的肤色，飘散的短发，满口灰白的胡须。他穿着灰白色的衣服，瘦脸上堆着笑容，说话的声音颤动得厉害。他的年纪大概五十多了。他拣了人多的地方坐下去，就开始玩起把

戏来。

他起初玩着木塞的把戏，我觉得这个把戏并没有意思，不过我也看得出来他的手法灵巧。以后他忽然从怀里摸出一只黄色小鸡，说一声："poulet"①，把这只小鸡放在地上，让它走了几步，然后又把它捉在手里，拾起一个木塞，说了一声"mangez"②，就不由分说把木塞塞进了鸡的嘴里，马上又从鸡屁股后面取出来。

观众们都笑起来了。男人大声哈哈笑。小孩望着母亲笑。女人一面笑，一面用手拍她们的儿女。老人突然左手捉住鸡，右手拉住鸡头拚命地一扯，随着他的右手出来了一只黑色小鸡。两只小鸡很活泼地在甲板上安闲地走着。他又拿出一个木塞放在旁边一个人的怀里，后来把手一扬，这个木塞又回到他的手里了。他又玩了一些类似的把戏。最后他忽然问那个人要鸡，那个人诧异地伸手在怀里一摸，果然摸出了一只小鸡来。这自然是先前放木塞的时候放进去的，不过人们不曾想到，不曾注意到罢了。他出其不意的这么一来，惹得许多人大笑。于是铜子、银角就像雨一般地抛到卖艺人的四周了。

---

① "poulet"（法语）：小鸡的意思。

② "mangez"（法语）："吃罢"的意思。

地中海上的风浪

我在房里睡着了，醒来时船已经离开了波赛。船身动得很厉害，海水打到了窗洞的玻璃上面。我们进了地中海了。

在上海上船的时候，我就听见人说过，地中海的风浪很大，这一段海程很不容易过。现在倒要由我自己来体验了。我虽然有些担心，但是我又高兴。我的好奇心在鼓舞我，我倒希望能够遇到大的风浪。

果然我第一次感觉到船进了地中海的时候，彭已在下面叫受不住了(他的床位在卫的床位下面)。不久听说李在呕吐，后来黎也吐了。但是我还好。

他们都躺在床铺上。房里没有人说话。我一个人跑到舱面上去看。我刚走上楼梯，一阵冷风迎面吹来，我不觉打了一个寒噤，连忙把大衣领扯起，把帽子按紧。海水全是白色，真是白茫茫的一片。浪很大。一阵风吹过，便涌起一股浪，浪花更高，被风吹得四处溅，差不多要溅到我的脸上来了。船上机器的声音，风打浪的声音，船篷被风吹起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响成了一片。船不但往左右颠簸，而且还上下地摇起来了。我勉强支持着在甲板上走了一会儿。我常常拔起右脚，左脚便站不稳，再拔起左脚，右脚又要倒了。船一动，身子就一偏，幸

好有栏杆挡住，不会跌下海去。

甲板上如今非常清静了。许多帆布椅凌乱地摆在那里，没有人坐，也没有人来管。我端了一把椅子放在可以避风的地方，躺下去，默默地看着浪和风的搏斗。

这个晚上我们睡得特别早，午餐后照例的散步虽然没有取消，但是我们都把时间缩短了。大家都不愿意在甲板上受风吹浪打。

地中海上的第二日

早晨醒来听见的第一句话，便是彭说的："这个样子真要叫人死。"我微微一笑，照常地下床去洗了脸，就到餐厅去喝牛奶，然后又到舱面上去。

海水已经变成了深蓝色，风浪仍然很大。蓝色的水波里冒起了丝丝的白色浪花。风一吹，船上音乐齐鸣。

杨这时候也走上舱面来散步。他一偏一倒地走着，一个不小心，就滑倒在甲板上。他慢慢地爬起来，就回到下面去了。他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并没有笑他的心思。

苦尽甘来

经过了两天的暴风雨之后，我们居然遇到了晴天。从此一直到第五天过完地中海，都是风平浪静的。彭高兴地说："现在是苦尽甘来了。"

"苦尽甘来"的确是一句美丽的话。这几天来熟读了《红楼梦》的彭解释说："要是没有前日的'苦'，对于今日的'甘'，也就不会感到多大的味道。既然经过了昨日的痛苦以后，到了今天慢慢儿去回忆它，又慢慢儿去细嚼现在的'甘'，于是才恍然大悟这'苦尽甘来'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地中海上最后三天的航行，可以说是整个旅程中最好的三天。风平不消说，浪静更不消说。天气不热，海上又有很好的风景。船经过意大利的时候，岸上的景物非常美。山坡上建筑的洋房一层一层地排在那里，整齐和朴素中露出一种新鲜的风味。

我们还看见一座意大利的火山，山顶上在冒火，下面流着硫磺一类的东西。可惜是在白天，若在夜里，一定有一番奇丽的景象。

后来又走过几座山，山顶还有积雪，白皑皑的在发光。在广东生长的李和黎同那个生长在印度的英国人都很兴奋，说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的雪。

这几天舱面上人不多，因为一则天气凉爽，在舱里休息也还舒服；二则船快要到马赛，有些人要整理行李。我没有什么事，一个人拿了书安静地躺在帆布椅上，晒太阳。我看了几页书，就闭上眼睛睡一会儿。这种安闲的生活，的确不错。

老　歌　者

在印度洋中船上开过一个游艺会，是由头二等舱的旅客发起和主持的。据说每次的航行中都要开一次这样的游艺会，游艺会的全部收入，都捐给那个抚恤海上遇难者的团体。我们买了票，但是没有参加会。游艺会的节目单贴出来时，我们也不曾注意。

听说游艺会的结果很好，有一些西洋的夫人和小姐在会上出了风头，自然也有绅士们肯捧场。

游艺会闭幕后，三等舱旅客的音乐趣味也渐渐地高起来。从那个时候起，除了进地中海的头两天外，第四层甲板上，每晚都在举行小型的音乐会。晚上九点钟光景，一个老头儿跑上舱面来，拿了一只曼陀璘，一面弹，一面唱法国的小调。

这个老头儿是在船上服务的，年纪不小了。他年轻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出色的歌者，可是如今声音哑了。破喉咙唱着柔媚的小调，老年人歌唱年轻人的情怀，尤其是唱到使人动感情的地方，许多人都大声笑起来，女人笑得特别厉害，她们连各种各样的声音都笑出来了。于是两个年轻的水手便在歌声中相抱地跳起舞来，这也是使人发笑的资料。

利利的父亲会拉提琴。在那个老歌者叫哑了声音以后，

他也奏一支曲子来娱听众。据说他拉得很好。大家都静静地听着，让提琴的柔软而悲泣的调子，在静夜的海上飞舞。

老歌者的兴致非常好。他虽然常常唱着同样的几支小曲，但是并没有人讨厌他。而且我们还应该感谢他，因为他肯花费每晚的宝贵时间来排遣长途的旅客的寂寞。

海上生明月

四围都静寂了。太阳也收敛了它最后的光芒。炎热的空气中开始有了凉意。微风掠过了万顷烟波。船像一只大鱼在这汪洋的海上游泳。突然间，一轮红黄色大圆镜似的满月从海上升了起来。这时并没有万丈光芒来护持它。它只是一面明亮的宝镜，而且并没有夺目的光辉。但是青天的一角却被它染成了杏红的颜色。看！天公画出了一幅何等优美的图画！它给人们的印象，要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这面大圆镜愈往上升便愈缩小，红色也愈淡，不久它到了半天，就成了一轮皓月。这时上面有无际的青天，下面有无涯的碧海，我们这小小的孤舟真可以比作沧海的一粟。不消说，悬挂在天空的月轮月月依然，年年如此。而我们这些旅客，在这海上却只是暂时的过客罢了。

与晚风、明月为友，这种趣味是不能用文字描写的。可是真正能够做到与晚风、明月为友的，就只有那些以海为家的人！我虽不能以海为家，但做了一个海上的过客，也是幸事。

上船以来见过几次海上的明月。最难忘的就是最近的一夜。我们吃过午餐后在舱面散步，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盏红灯挂在一个石壁上面。这红灯并不亮。后来船走了许久，这盏

石壁上的灯还是在原处。难道船没有走么？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船在走。后来这个闷葫芦终于给打破了。红灯渐渐地大起来，成了一面圆镜，腰间绕着一根黑带。它不断地向上升，突破了黑云，到了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一轮明月，先前被我认为石壁的，乃是层层的黑云。

最后的一夜

经过了风平浪静的三天以后，经过了意大利和瑞士两个山明水秀的国土以后，我们的船明天就要到达它的目的地马赛了。

今天上午法国管事开了账单来要洗衣服的钱。安南茶房也来要酒钱。他们这几天对我们特别客气。往常下午喝茶时，茶房照例只给每人斟一杯，这几天他们常常拿了茶壶自动地给我们添茶，今天甚至斟了三次。对于打扫房间的茶房，我们每人给他二十法郎；对于餐厅里的两个茶房，每人也给他们各十个法郎；对于法国管事，我们每人给他五十法郎。

照例星期六的饭食比平日的好。这一天因为是最后的一日，所以也很不错。往常星期六的午餐多一杯冰琪琳，今天的午餐多了一样点心。

我的行李在上午就整理好了。床头上堆的那些书，今天也给放进皮箱里去了。我又把那一套比较好一点的衣服取出来，准备上岸时穿。

晚上我们同船九个熟人在房里开了一次会，商量第二天下船的事情，大家推邓做“总指挥”，请他主持一切。我们预定的明天的日程如下：

船上午七八点钟靠岸，我们等验过护照后上岸时恐怕在十点钟光景。我们再把行李弄到车站上去(我和卫的重要行李还存在货舱里，临时要拿单据去取)，买好车票出来，至早也会到十二点钟。火车晚上开，我们吃过中饭，还可以去逛一些地方，兴尽了便买点面包和火腿到车站上去等车。

我们这样决定了以后，大家放了心。但是也有一些人很急切地盼望着明天的到来，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乡　心

我不想睡，趁大家酣睡的时候，跑到舱面上去走走。

我上了舱面就感到一股寒气，不由得扯起大衣的领子来。四周没有一个人，只有吵人的机器声时时来到我的耳边。

浪很小，船也平稳，风并不大。一轮明月照在万顷烟波之上，蓝色的水被月光镀上了银色。月光流在波上，就像千万条银鱼在海上游泳。我这时真想拿一根钓竿，把它们钓几尾上来。

我默默地在舱面上走着。明月陪伴着我，微风轻抚着我。有无涯的大海让我放观；有无数的回忆尽我思量。人生难得几良宵。是乐么，还是痛苦？

三十四天的旅行到此告了一个段落。明天太阳照眼时，我们就要踏上法国的土地了。这时候似乎又觉得船走快了些。现在对于海上的生活又感到了留恋。这三十四天的生活的确是值得人留恋的。然而明天我们一定要上岸了。

"明天要上岸了，"和以前在家时，在上海时，"明天就要走了"的思想一样，激动着我的心。这种时候要说是快乐罢，自己心里又不舒服；要说是痛苦罢，又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是怎样的矛盾啊！我一生就是被这种矛盾支配了的。

不知道怎样，我竟然被无名的悲哀压倒了。四周有这么好的景致，我却不能欣赏，白白地拿烦恼来折磨自己。时候不早了，明天还得走一整天的路。倘若在家里，我的大哥一定会催我："四弟，睡得了——"现在呢，即使我走到天明，也没有人来管我。能看见我的，除了万顷烟波之外，就只有长空的皓月一轮。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①；"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②——锋镝余生的我，对此情景，能不与古诗人同声一哭！

然而过去的终于是过去了。我应该把它们完全忘掉，我需要休息。明天我还得以新的精力来过新的生活。

---

① 见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望月怀远》。

② 见白居易的七言律诗《因望月有感……》。

到了法国

大清早船在马赛靠了岸。我们到了法国了。

我走上舱面，看见船上的水手和岸上的人打招呼。岸上有许多法国女人，来迎接她们的亲友。

码头上有许多穿制服的人，大概是搬运公司里的人罢，他们来来往往向船上的乘客兜生意。一些人在岸上摇着白手巾，一些人在岸上握手。

乘客们只好留在舱面上闲谈。谁都要等警察来验过护照以后，才能够上岸。什么时候开始验护照，布告上虽然规定了时间，但是不一定靠得住。有些人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也有些人很安闲地在向岸上的女人打招呼。回到故乡的人心中的快乐，常常在无意间流露出来。

岸上的人愈聚愈多。船那边，在林立的烟突中间现出来一轮斗大的红日。

"Passport！"① "Passport！"法国管事走上舱面来大声叫着。我们知道要验护照了，便跟着他走到头等舱的吸烟室里。

一个四十岁光景的法国人坐在沙发上，面前放了一张桌

---

① Passport（法语）：护照的意思。

子，旁边坐着一个穿警官制服的人。那个法国人一面叫名字，一面看护照，随便问一两句话，盖上一个印，就算了事。虽然别人心里很急，他却很从容地办这件事情，慢慢地从一大堆的护照中间取出一本来，故意做出郑重的样子翻几下，东一看，西一看，好像极力要找出什么毛病似的，有时又跟警官商量几句。这时候吸烟室内挤满了人。谁都害怕叫到自己的名字时听不见，错过了机会，便不敢走远，而且也不敢作声。因此连这种单调的问答声都可以听得很清楚。西洋人沾了他们高鼻子的光，先验过护照走开了。我们的轮值却在后面。

"从哪里上船？"

"上海。"

"到什么地方？"

"巴黎。"

"到那里做什么事？"

"读书。"

这样简单地回答了以后，我们拿到了自己护照，高兴地回到舱房里，现在我们真要走了。

邓出去叫脚夫来搬运行李，我们留在房里等候。不久他就带了一个脚夫进来。脚夫点过了行李的数目，又去把我们存放在货舱里的箱子取了出来。每点一件行李，他就给我们一张票子。我们把钥匙都交给他，便径自上岸去了。这是旅馆的脚夫，有点像上海旅馆的接客人。我们把钥匙给他，因为海关还要检查我们的行李。

“昂 热，再 见！”

我们正要上岸，在船面上遇见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人。他看见邓便讲起广东话来。我后来知道他是马赛一家中国转运公司的办事人。他得到李的舅父从巴黎拍来的电报，到船上来接李。

什么事情都弄妥了，不必再留在船上了。于是大家都“开步走”。

走上了岸，再回头望望我们的船。它的巨大的身体横在岸边，动也不动一下。人们像蚂蚁一般在它的身上爬来爬去。

“昂热 (Angers)，再见！”我冲口说出了这句话，我用留恋的眼光看了它最后一眼。

别了！三十五天来的伴侣，载我到这个“美丽的国土”来的昂热啊！

马　　赛

加上李的朋友，同行一共十个中国人，走过海关，因为说是学生，承他们优待，没有留难，就让我们过去了。现在踏在我们的脚下的，确实是法国的土地了。

第一瞥！这第一瞥的印象是什么呢？街道么，宽敞而整洁；建筑么，高大而漂亮；人物么，两边人行道上来往的有无数服装整齐的男男女女。没有坏的印象，但也没有特别好的印象。

我们跟着李的朋友走，上岸不久就去坐电车。天气很冷，我站在车门口，风刮着我的鼻子。在车上看外面的景物倒有些模糊。到了一个站，李的朋友下去了，我们也跟着下去。

马路上汽车很多，走路也得小心，因为在船上颠簸久了，走上岸来总有些不惯。我们又不认识街道，也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只好跟着别人的脚跟走。不久我们在一个商店的门口站住了。玻璃店门上挂着中文招牌："梁忠记"。这就是李的朋友服务的那个转运公司。他陪着李、邓、黎三个广东学生进去了，我们在外面等着。后来有一个年老的法国女人开了门，请我们进去，我们也就进去了。外面是办事的地方，两张长方桌子，中间留了一条过道。我们走进里面，那里是梁本

人的办公室，房子并不大。靠着进门的一边墙壁放了一张方桌，上面堆了些文件，墙上钉了八张风景片，都是火山的景象，而且是在晚间摄的，比我们在船上亲眼看见的要奇丽若干倍。对面一堵墙上挂了一张轮船航线图。

在这里坐了十多分钟，我们又出发了。我们先到邮局，我在那里拍了一个电报给巴黎的友人吴。从邮局我们又到旅馆去看行李。旅馆也还不错，外面装了一排玻璃房子，里面是饭厅，楼上是房间，但我们并没有上去。旅馆里的人告诉我们，行李已经送到车站去了。我们决定在这里吃过中饭，再到车站去看。

在饭厅里我们十个人（连李的朋友在内）坐了两张桌子。大家点了菜。我要了一样汤，一样小牛肉，一样马铃薯，一杯咖啡；他们要的也差不多。菜还可口。吃饭时有两个茶房在旁边伺候，还有三批音乐师来奏乐讨钱。我们喝了咖啡以后看账单，才知道每人吃了二十多个法郎，倒并不便宜。杨却吃惊地抱怨说太贵了。行李费每件十七个法郎。我和卫两个共有五件行李，都是很重的，多花一点钱也不算什么。杨只有两件很小的行李，却也花了三十四个法郎，未免不值，所以他又在叫屈了。

饭后我们就到火车站，买了车票，把行李票也买了。我们六个人买的是三等票。那三个广东学生一定要买二等票，票价比我们的贵一倍，是三百多法郎。我和卫的行李过重，行李费加到了一百七十几法郎。彭的行李并不多，然而他那件大箱子本身就太重了，也花了一百十几法郎的运费。

从火车站我们又走到公园。我们在公园里玩了好一会儿，才出去买了火腿和面包。我们经过的街道都很宽敞，常常在十字街头或者广场上看见铜像、石像和别的纪念碑。这些艺术品把马赛装饰得很美。

买完东西已经六点钟了，我们便到一家中国饭馆去吃饭。饭馆的名称是共和饭店，到了那里就好像回到了中国。里面有一间小房子，四个中国人在那里打麻将牌，吵得很厉害。外面的房间里只放了一张大餐桌和几张方桌，几个华工在那里谈话。我们围着那张大餐桌坐下，点了十多样菜，半点钟以后菜端来了。我们好久没有吃中国菜，大家都吃得很高兴，算账下来不过七十多个法郎，众人都说便宜。

饭后茶房来把桌子收拾干净，我们又坐下来闲谈。这三十几天来的旅伴，明天早晨就要分散了。这是最后一次的聚会，大家有点依依不舍，便互相把姓名和通信处抄下来，珍重地藏起。

从饭店出来，我们坐上两部出租汽车到车站去。到了那里，自然还有许多麻烦的事情。但是人多也就不怕麻烦了。不用说我们很顺利地上了火车。

前面有不可思议的未来，后面是三十五天的长途旅程，我的心真难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

夜很冷。在我的模糊的睡眼里看来它又有些梦幻的色彩。火车开了，我似梦似真地离了马赛。

三 等 车 中

三等车厢里一个房间坐八个人，有皮垫子，有蒸汽管，可以说是相当适意。然而我们六个人占一个房间，真没法睡觉。

坐过夜车的人，总知道每次车停、乘客在睡眼朦胧中看窗外的站牌、或者听站丁报告站名的时候的感觉罢。单调的车声忽然停止，车也不动了。由于物的"惰性"，人的随车行而频点着的头，受了震动，便也突然惊醒起来，才知道又到了一个新站了。于是又连忙问同伴这是什么站，或者打开车窗伸出头去东张西望，一看见站牌知道路程还有多远，心里也就稍稍宽慰了。我坐夜车，总要在车上打盹，然而又不能够熟睡。这晚上也就是这样地过去了。虽然在马赛车站里买了一本左拉的短篇小说，打算在火车上翻看，却没有看完两页。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天才亮了。

一轮红日从树林里露出光芒来。两边尽是田畴。法国乡村的景致还不错，可惜火车跑得太快了，我不能够仔细欣赏。每个站上都有人摆摊子卖咖啡，许多法国乘客都下车去喝一两杯，我和卫也下去喝了。

大约在九点钟左右，我们到了巴黎的里昂车站。这是巴黎的最大车站，自然很热闹。

吴在月台上找我们。他先看见卫，后来便认出我来。他伸出那只大手把我的手紧紧握着。我和他通信两年多，还没有见过面。

病榻看雪

到了巴黎，我第二天便病倒了，那时我住在 Blanville 街五号的旅馆①里，时间是二月二十日。我是一月十五日离开上海的。

二月的天气在这个多雨的城里算是最冷的时节，我又住在第三层的高楼上，看不见阳光，房里一切都是灰色的。开了窗我又受不住冷风，关上窗户，房里就成了黑暗世界。窗外便是对面的高楼，下面是窄狭的街道。天空是阴暗的。

早晨吴和卫来看我。他们谈得很起劲，我一句话也不曾说，他们也没有注意。吃中饭时，他们约我出去，我说，不想吃东西，我病了。他们两个就出去了。

我头昏，心里难受，四肢无力，疲倦地躺在床上。忽然想起昨晚在吴那里拿来的一本书还在枕头边，是昨夜临睡时读了几页后放下的，我拿起来读了一页，就觉得读不进去，不能够把心放在书上，只得抛下它，一个人在床上胡思乱想。后来我居然睡着了。还是卫和吴的敲门声把我惊醒起来的。

他们给我买回来了酒精灯，锅子，糖。卫在这里照料，吴

① 旅馆：还是指公寓。

又出去买了酒精和牛奶。他们把牛奶煮好拿给我喝，我本来不想喝什么，却也听了他们的劝，勉强喝了一大杯，又重新睡着了。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们又把我唤醒，煮了一杯牛奶给我喝。窗外有白色东西在飞舞，像柳絮，像棉花，又有些细微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卫，他说："落雪了。"

"落雪了"，这三个字把我心头的烈火完全弄灭了。窗外的雪霏霏地落，我心里的寒冷也不断地增加。吴在旁边读报，他忽然告诉我：丹麦的文学批评家乔治·布朗德斯[1]病故了。

① 乔治·布朗德斯（G.Brandes，1842—1927）：《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流》（六卷）和《俄罗斯印象记》等书的作者。

巴　黎

一个月后我写信给三哥，那时我已经搬到 Tournefort 街的旅馆里了。

你叫我把整个巴黎城描写给你看，这是超乎我的能力以上的事情。

我来巴黎不过一个月，住在拉丁区的一家旅馆里。每天除了照例到卢森堡公园去一两次，晚上到学校补习法文外，就把自己关在六层高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里面。我所看见的只有一个四方的小小的天，连阳光也看不见。

黄昏时分我也常常去街上走走，附近的几条街上，晚间向来很清静，商店往常在六七点钟就关了门，所以街上也没有多少行人。我一个人默默地在宽敞的马路上散步，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关住了一般，在我的周围尽是无形的墙壁。路旁关上了的商店的门，都把它们的秘密关在里面。那无言的墙壁似乎也现出了痛苦的颜色，使人知道它心里有无穷的隐痛。一盏煤气的街灯，一个破败的烟突，都有它们的痛苦的历史。还有那好像在燃烧

的红天，像两块墓碑一般高耸着的圣母院的钟楼，整日整夜悲鸣的圣母院的钟声……静寂的街上仅有的行人：穿着破衣服的工人和穷学生，以及颈项上围着狐皮的中等人家的太太小姐，都匆匆忙忙地走过去了。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唱着歌，说着笑话。然而就在这歌声和笑声中也含得有一种痛苦的声音，好像每个人都在强为欢笑！他们笑只是为了止住哭。从此我才觉得我不曾了解人，也不曾了解巴黎。巴黎的秘密也不是我一个短期的旅客所能够了解的。那么我非但不配描写巴黎，就是想描写也不能够！

以后假若我还有精力再提起笔，我会写一部《巴黎杂记》给你看……



旅途随笔

《旅途随笔》，一九三四年八月由生活书店初版，迄一九五一年七月，共印行十四版(次)。

一九五三年六月由平明出版社重排新版，同年十一月再版。

序

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是孤独的，我有朋友，我有无数的散处在各地的朋友。

我常说我是靠朋友生活的，这并不是一句虚伪的话。友情这个东西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我有时候禁不住要想，禁不住要问自己：假如我没有那许多朋友，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可怜的人？对于这问题我自己也不敢给一个回答。

我和别的人一样，我在生活里也有过快乐和痛苦，也有过眼泪和欢笑。但是在这些时候，总有什么东西激动着我的心，这就是同情。通过广大的空间，朋友们从各个远近的地方送来了眼泪，送来了安慰，甚至送来了笑和祝福。我的眼眶里至今还积蓄着朋友们的泪，我的血管里至今还沸腾着朋友们的血。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的暖热的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朋友们给我的东西的确是太多，太多了。然而我拿了什么东西报答他们呢？我是一个心地贫穷的人，我所能够献出来的，就只有一些感谢的表示。所以我要到各个地方去看朋

友们的亲切的面孔，向他们说一些感谢的话，和他们在一起度过几天快乐的时间。抱着这个目的，这一年来我走过不少的地方，而且我也许还要继续走下去，到另一些我的脚不曾到过的地方去。我并不是因为喜欢“名山大川”才开始旅行的，虽然我也很想知道各个地方人民的生活状况。

在旅途中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朋友们慷慨地给我预备好了一切。要是没有他们给我的种种方便，我决不会走完这许多地方，而且我也没有机会写下这些见闻和感想。这些不过是一个纪念，我现在编成一本小书，我愿意把它献给所有我的朋友，并且跟这本小书一块儿，我还要献上我的感激的心。

这一样小小的东西算不得一件礼物，但是，朋友们，请大度地接受它罢，因为我真挚地把它献给你们。

巴　金 1933年12月在北平。

再版题记*

这样的小小的书居然在一个多月里面就销售了三千本，这是连我自己也料不到的事。自然我为这事情高兴着，因为这本小书在我看来是一件礼物，奉献给我的每个朋友的礼物。是的，每个朋友，见过面的和未见过面的；这本小书里提到的和未提到的。如今它果然到了他们的手中了。

对于朋友们我的感激是无限的。这本小书出版后他们从各地方寄来了一些回答。我感谢他们的鼓励，但我更感谢他们细心地指正了书中过多的印刷错误。有一个朋友更从北平的旅居中寄了快信来，很严肃地指出了八十三页里面“×和我的夫人”的“我”字。（其实这不过是“手民”和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何必严肃地来看它呢！）从这些事看来朋友们更给了我一个凭证。他们的确大量地接受了这个礼物。

这本小书是为朋友们写的。它是一个纪念物。但它也是一个凭证。我诚心地把它献给朋友。他们可以留着它，看几年后我是否会违背书中一些约言，去做一个朋友们所鄙弃的人。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现在我又要往更远的地方走了。对于朋友们的宝贵的信函，我不能够一一地回答，就让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我的感谢，同时还要求他们的原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在这再版本里我把好几处印刷的错误都改正了，同时也删改了几个不很适当的字，另外加入了一篇新作。我想这再版本也许比较像样一点。

巴　金 1934年10月在上海。

重排题记

这本小书曾由生活书店印过四版。在付印前它在审查老爷的朱笔下受过刖脚的重刑。出版后书店方面又说文艺书没有销路。我一则不愿意让书店多亏本，二则不愿意让删改过的书多流传，便要求书店同意我将版权收回。

这还是前年的事。我把改订后的《旅途随笔》交给开明书店出版。这改订本也不能说是完璧，不过腿下已装上假肢，不像残废者了。《亚丽安娜·渥柏尔格》给收进了《短篇小说集》第一集，所以删去。《捐税的故事》因为原稿已经遗失，而且文章也该重写了，就让它仍旧阙着。其余的则依照原稿补入。

去年我两度去广州，重温旧梦，在那里过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日子。今天，在那个可爱的城市沦陷以后，重读几年前初到广州时的旧作，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禁感到深深的惆怅。

但是我并不绝望。我对朋友们说过，甚至在阴云蔽天的时候，我还看见未来的晴天的亮光。现在我还是和以前一样，能够站起来做人。我始终相信我们民族的新生的力量。

这本小书是为朋友们写的。它是纪念物，也是凭证。它证明我过去、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人，将来也会是怎样的人。倘使有一天我违背了书中的诺言去做一个朋友们所鄙弃的人，那么让他们毫不怜惜地弃绝我！

1939年3月11日之夜。

海　上*

五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离开了上海。那只和山东省城同名的轮船载着我缓缓地驶出黄浦江，向南方流去。时间是六点钟。

我是在前一个晚上上船的，有一位朋友同行。我们搭的是统舱，在船尾舱面上放着我们的帆布床。晚上落过大雨，把我们的铺盖都淋湿了。好几位朋友到船上来送别，其中有一位就留在船上和我们整整谈了一个夜晚，直到天明开船时，他才跨着大步上岸去。他的瘦长的身子消失在码头上拥挤的人丛中去了。这个朋友平日被我们称为粗暴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憎恶女性的。但是他那晚却用颤抖的声音向我们吐露了他的心灵的秘密：他的恋爱的悲剧。去年先后有两个女性愿意把她们的爱情给他，却被他无情地拒绝了。他这样做，他自己很感到痛苦。可是他并没有悔恨，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献给一个理想，不能再有个人的感情了。

这个朋友的叙述引起了我的赞美。自然在我的朋友中像这样拒绝爱情的并不止他一个。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毫不顾惜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大陆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地让爱情毁了他们的理想和事业，等到后来尝惯了生活的苦味，说出抱怨爱情的话来时，已经太迟了。我对他说，我要写一个中篇小说，题名做《雷》，朋友只是微微一笑，他的笑里带了一点苦味。

统舱客人的生活自然不是舒服的，但我们也习惯了。在海上，篷布下面，甲板上面，帆布床载着我的身子，我的眼睛望着深蓝色的吐白沫的海水，我想起那个瘦长朋友的苦笑，我想起在我们朋友中间常见的为了理想抛弃幸福、拒绝爱情的事实，我想起巨大的生活的斗争……我想起种种的事情。我如今有了思索的时间。

船整整走了两天，我整整想了两天。我偶尔也和那个同伴谈几句话。但是除了吃饭的时间外，他常常蒙着铺盖睡觉。晚上的时间很不容易度过。甲板上没有灯光，所有的人都睡熟了。海的吼声和人的鼾声响成了一片。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够闭眼，思想折磨我，热情折磨我……

1933年5月底在广州。

一个回忆*

回忆折磨我。我好像又回到去年春天里了……

在上海闸北的宝山路上有我平日称做“家”的地方。① 然而一个多月来，我就不能够回到那里去了。许多穿制服的人阻拦着我，每一条通到闸北的路都被铁丝网拦住。我冒险地奔走许多次，始终找不着一个机会回到我那个“家”，回到我在一个凄清的夜里分别了的那个“家”。

我一个人带着一本书离开了微雨中的上海，那时宝山路上只有寂寞和寒冷。等到十多天以后我从南京回来时，就只能够看见闸北的火光了。

轮船驶进黄浦江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我看见黑烟遮满了的北面的天空，我听见大炮隆隆的怒吼和机关枪密放的声音。我冷静地看着黑烟的蔓延，我冷静地听着船上许多乘客的惊叫。我又望着那些江边的高大的建筑物，我又望着外白渡桥上拥挤的行人，我又望着外滩马路上来往的载行李的车辆，我咬紧我的嘴唇，不让它们发出任何的声音，我觉得我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读书中学》第一卷第一号。

① 我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从法国回到上海，就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

血已经冷了，冷得结冰了。忽然一阵恶毒的憎恨抓住了我，使我的全身颤抖起来，我明明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说："历史上没有一次血是白流的。"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十六浦码头登了岸。如今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晚上我没有固定的住宿的地方。这样地徬徨了几天以后，我才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找到了住处，同时我还找到一个可以消磨时间的工作——我拿起了我的笔。我就这样地度过了将近三十天的痛苦的生活。三月二日的夜晚，得到闸北落在侵略者手里的消息，看见半个天空的火光，听见无数人的绝望的叹息，我又一次被恶毒的憎恨压倒了。我一个人走在冷静的马路上，我也叹息，我也呼吁，我要血海怒吼起来把那些侵略者淹没掉。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到闸北去了，我同一个朋友从北四川路底绕进去。我们受到了两次的搜查。

我们的脚踏在闸北的土地上。在我们的面前横着许多烧焦的断木和碎瓦，路已经是不可辨认的了。到处是瓦砾，大部分的房屋都只剩下空架子，里面全是空洞。我同行的朋友曾经住过的江湾路口的房屋就只剩下光光的一堵墙壁。房东也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是在战争发生的第二天被日本帝国的兵士赶出来的，他没有带出一件东西，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后来就回到故乡去了。我从前常去他那个地方。那个房间内，哪里是床，哪里是桌子，哪里是书架，我都记得很清楚。然而如今我就只看见一片瓦砾！我的朋友，那个在困苦中不断地挣扎的朋友！我简直不敢想下去……

我们在废墟中慢慢地走着，我认不出哪里是我曾经进去过的饭馆，哪里是我常常看见的店铺，哪里又是我的一些朋友居住的地方。我们踏着瓦砾，有些地方还有热气。我们非常小心，害怕踏着没有爆炸的炸弹。

“看，这血迹！”朋友埋着头说。在地上瓦砾堆旁边，我看见了一滩黑红色的迹印。人的血！活人的血管里流出来的血！

在一堵残缺的墙壁下，瓦砾中躺着好几具焦黑的尸体。身子那样小，而且蜷曲着，完全没有人的样子。然而活着的时候，他们分明是人，跟我一样的、并且生活在我周围的人呀！

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的头上，四周是死一般的静寂，走了这许久，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人影，连日本兵也不见一个！我以为我可以看到我的家了，虽然这时候我还不知道房屋是否存在。我这样一想，心就厉害地抖起来。然而几个日本兵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穿便服的日本人站在路旁用上海话对我们说，前面不许通行。

失望压倒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过是两个徒手的青年，四周又没有别的人，只有一条开始脱毛的死狗躺在我的脚边。

几天以后我第二次走进了闸北，陪我去的是另一个朋友。这一次我们从虬江路进去。

我以前很熟习虬江路，如今我居然认不出它是什么地方了。我看不见一间完好的房屋，瓦砾堆接连着瓦砾堆，这样遮住了我的视线。两三部黄包车载了劫余的用具迎面过来。几个乡下女人在我们前面低声叹气。十字路口被沙袋堵塞了，只留下容许一部汽车通过的地方。在沙袋堆上骄傲地站着日

本帝国的兵士，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小兵毫无原因地叫嚣着，故意威胁、留难来往的行人。我们受过几次盘查，终于进到里面去了。

我们走在似乎还有热气的路上，我用憎恨的眼光看周围的一切。一队日本帝国的兵士在瓦砾堆旁边走过了，尽是得意的面貌，他们在一些乡下女人面前表示他们的英勇。几个江北人躬着腰在瓦砾堆里挖掘。一个老妇人坐在她的成了废墟的家门口低声哭泣。另一个女人牵着两个孩子找寻她那个失去的丈夫。几个中年人一路上摇头叹气。“完了，什么都完了！作孽呀！”许多人这样说。

鸿兴坊的世界语学会已经成了一片焦土。那个学会是一些朋友带着献身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在它的短短历史中我也贡献了一点点心血。过去有一个时期我每天晚上都要在那里写字台前一把藤椅上度过两小时的光阴，椅子是我坐惯了的，书橱里的藏书也是我常常翻阅的。但是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一段不可相信的梦景。许多可以表示友情的证据都消灭得无踪无影了。我和那个朋友站在一堆瓦砾前，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

于是我回到了我的家。衖堂门关着，我们只得埋着头从隔壁的劫余的墙洞里进去。我们这个衖堂并没有毁掉，房屋全在，我可以分辨清楚哪一家从前是什么人住的地方。但是如今都只剩下空屋了。

在我的家里楼下，有人挖了一个大坑，亭子间是我放书的地方，被一个炮弹打破了，不过只毁了几十本书。除了书

和家具外，什么东西都给人拿走了，却留下地板上的几堆人粪。……

“你的书还在，这真是幸事！”那个朋友安慰我说。

我起初微笑，我很高兴。但是后来我和朋友将一本一本的书整理的时候，我忽然带着厌恶对自己说：“我已经被书本累了一生了！”……

我的记忆模糊起来，许多影子在我的眼前晃动。日本兵的枪刺……海军陆战队中队长的蔼然的笑脸……一对逃难归来的贫家夫妇……一个脱了肉只剩牙齿的头颅……两三次日本兵的严厉的查问……在江湾路上偷玻璃被日本兵打伤腿的两个江北人……狗吃剩了的人腿……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弹……以及许多许多……

我没有做一个“海的梦”，轮船就到岸了。

1932年春在上海。

1933年5月底在广州改写。

南国的梦*

在南国的一个古城里我度过了将近一星期的光阴。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对朋友说这一星期的生活就像一个美丽的梦，一个多么值得回忆的梦哟！

记得赫尔岑曾说过这样的话：人一到了南方，他就觉得自己的年纪变轻了，他想哭，他想笑，他想唱歌，他想跳跃。南国的景物的确是很迷人的。单是那明亮的阳光就够使人怀念了。

我们坐了贯通大山的汽车，我们坐了过海的小火轮，我们看了红的土块、青的海水、绿的田畴、茂盛的榕树和龙眼树，我觉得我是一刻一刻地变得年轻了。

我们的汽车驶进了古城，它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我还认识它。只是我去年来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在修造那大桥，我不得不跟着众人搭那过渡的船，如今汽车却可以安稳地在桥上通行了。

这古城是我常来游玩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我的不少的朋友，他们都是我所敬爱的。和他们会见便是我的生活里的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大陆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大的快乐，这欢聚至今还温暖着我的心。

他们和最近在上海逝世的匡互生（对于这我所敬爱的人的死，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表明我的悲痛。他的最后是很可怕的。他在医生的绝望的宣告下面，躺在医院里等死，竟然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许多人的眼泪都不能够挽救他）一样，都是献身于一个教育理想的人。他们在极其贫困的环境里支持着两三个学校，使得许多可爱的贫家孩子也尝到一点人间温暖，受到一点知识的启发。他们的那种牺牲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的眼泪。

没有充足的饮食，没有充足的睡眠，没有充足的休息，他们沉默地把那沉重的担子放在肩上，从没有一个时候发出一声怨恨。他们忘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给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他们也许不是教育家，但他们并不像别的教师那样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上面，做一个尊严的先生。他们生活在学生中间，像一个亲爱的哥哥，分担学生的欢乐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导那些孩子，帮助那些孩子。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在他们中间生活了将近一个星期，我不曾给他们帮过一点忙。我沉默地旁观着一切。当他们要我写下一点感想的时候，我甚至回答说我没有什么感想。可是我别了他们回到日光岩下的岛上来，在一个旅舍的楼上听着窗外的雨声，望着躺卧在窗下的海景，我想起在那古城里所看见的一切，热情开始来折磨我，我的眼泪禁不住畅快地淌了出来。我拿起笔一面流泪一面给他们写信。我说我一定要

他们知道我这时候的感激的心情。我说我的心还在他们那里，我愿把我的心放在他们的脚下，给他们做一个柔软的脚垫。不要使他们的脚太费力。

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了那个美丽的岛屿，搭了那只和山西省城同名的轮船往前面走了。

1933年5月。

香　　港*

以前两次经过香港，我都不曾在香港登岸。我只逛过九龙的街市。

现在我的脚终于踏上香港的土地了。朋友洪和我，两个人，两件行李，没有一点麻烦。洪是时常往来香港的，他知道这里的许多事情，他又懂得这里通行的广东话。

洪找到了他的一个旧同学，是一位小学教师。我们把行李寄放在他那里，空着两手出来，在街上闲走。一个小孩拉住我要给我擦皮鞋，另一个小孩又过来给我刷白通帽。朋友洪也让第三个小孩拉住了。

我站在人行道上，一只脚踏着踏凳，让小孩慢慢地给我擦鞋。我的眼睛在看香港的街市和匆匆来往的行人。街小人多，车也不少。阳光照亮了街道。到处都是白衣服白帽子的男子，短衫长裤的少女，各种颜色旗袍的女人……

我们去坐登山的电车。登山电车和普通电车不同，车里很宽敞，却只有寥寥的几个乘客。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大陆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车开了。它慢慢地往上爬。两旁的树木都向后退去。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空隙射进车里。微微的凉风一阵一阵地吹进来。我回过头有时可以看见一段海景，有时这海景却被山壁和树木遮住了。

车不住地往上面爬。我知道我们离地面已经很高了，然而我们在车里很安全，用不着担心。我希望电车把我们一直载到山顶。

然而到了半山，电车就不再前进了，众人都下了车，我知道这是电车的终点站了。我们下车来，沿着旅馆(Peak Hotel)前面的人行道走了好几步，就站在路旁看海、山、天的景致。下面是山谷，谷里长满了丛丛的绿树；我们再望过去，还看见一片浅蓝色的海水，海水平静，三四只帆船点缀在那里，像几个黑点。远处是一些岛屿，最远的颜色最淡。天也是浅蓝色，天边有云。有时候望过去，我很难分辨出天和水的界限，云和岛的界限；天和水差不多，岛屿又很像云。

我们回转身沿着上山顶的路走去。路很宽，走着并不吃力。我们愈走愈高。许多建筑物和树木都在我们的下面了。我时常掉头往四面看，到处都是沐着阳光的绿树，还有海水，还有各种颜色的洋房。我们离山顶不远了，忽然从后面吹过来一阵风，几片云飞过我们的身边，往对面的山顶飞去。有几片云很薄，淡白色的，就像几缕丝，几股烟。我们登上太平山山顶的时候，对面那座较低的山已经是烟雾弥漫了。

这时香港的全景陈列在我们的眼前。我看海：海水平静得就像一幅图画，十多只大轮船排列在画面上，两三只一排，

很整齐，小得像玩具一样。还有多少小火轮、汽艇、木船，它们密集在边沿上，或者像黑点似地散布在全个画面。我知道它们都在动，都在走。但是在我的眼里它们却成了固定的东西。

我再看街市：房屋很有秩序地排列着，它们变得很小，就像许多长方块一条一条地摆在那里。偶尔还可以看见街上的行人，他们到了我的眼睛里，小得和蚂蚁差不多。我简直不能够想象先前我也在他们的中间。

香港的两层电车引起了我的兴趣。朋友洪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就请他的旧同学陪我们去坐电车，那个人给我们选了一条最长的路线。

我们在先施公司门前上车，一直坐到筲箕湾，然后又搭原车回到先施公司，车价来回一共两角：头等票每次一角，不论远近都是一样。

头等座位在上面一层，这就是电车的楼座，由前面的楼梯上去。座位不多，但车里不会拥挤，座位一满，下面的铁门就关上，不让客人上车了。

我拣了一张单人椅坐下，朋友们坐在后面两人坐的椅子上。我的座位在靠海的一边，我倚着窗，埋头看下面的街市。

车缓缓地向前走。太阳快要落下去了，只有一抹最后的阳光留恋地挂在屋顶上。车里没有闹声，也少有人走动，中途不过两三个人下车。我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我把眼睛埋下去看下面的世界。同时我慢慢地在思索一

些事情。我的眼睛看见的景象不停地在变动：热闹的街市、花园、学校、树木、海水……

到了海滨游泳场区域（那里有几个游泳场），全车的男女乘客都陆续下去（我们看见许多人在那里游泳或者划船）。车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我们始终没有下车，就坐这辆车回到了先施公司，街的两旁已经是灯火辉煌了。

1933年5月底在广州。

香港的夜*

我们搭小火轮去广州。晚上十点钟船离开了香港。

开船的时候，朋友洪在舱外唤我。我走出舱去，便听见洪说："香港的夜很美，你不可不看。"

我站在舱外，身子靠着栏杆，望着渐渐退去的香港。

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天上有些星星，但大半都不明亮。只有对面的香港成了万颗星点的聚合。

山上有灯，街上有灯，建筑物上有灯。每一盏灯就像一颗星，在我的肉眼里它比星星更亮。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是一座星的山，放射万丈光芒的星的山。

夜是静寂的，柔和的。从对面我听不见一点声音。香港似乎闭上了它的大口。但是当我注意到那座光芒万丈的星的山的时候，我仿佛又听见了那无数的灯光的私语。船在移动，灯光也跟着在移动。而且电车、汽车上的灯也在飞跑。我看见它们时明时暗，就像人在霎眼，或者它们在追逐，在说话。我的视觉和听觉混合起来。我仿佛在用眼睛听了。那一座星的山并不是沉默的，在那里正奏着出色的交响乐。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大陆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我差不多到了忘我的境界……

船似乎在转弯。星的山愈来愈窄小了。但是我的眼里还留着一片金光，还响着动人的乐曲。

后来船驶进群山的中间（我不知道是山还是岛屿），香港完全给遮住了。海上没有灯，浓密的黑暗包围着我们的船。星的山成了一个渺茫的梦景。

我还呆呆地站在那里，我想找回那座星的山。但是我什么也看不见。外面的空气很凉爽，风吹得我的头有点受不住了，我便回到舱里去。舱里人声嘈杂，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把脚踏进舱里的时候，我不禁疑惑地问自己：我先前看见的难道只是一个幻景？

1933年5月底在广州。

省港小火轮*

从香港去广州，搭小火轮一个晚上就到。海上没有浪，舱里也相当舒服。

我们买的是二等票，搭的舱是尾楼。每人一张帆布椅，许多帆布椅紧密地排列着，而且背靠着背，一共有五六排，中间留了两条过道。一个舱里容纳好几百人，每个人都要吃点心，谈话、吵闹是意料中的事。不过舱里有好几面窗，还有电扇，所以空气并不十分坏，至少不会使人透不过气来。

有茶，还有瓜子和糖果。舱里本来干净，但是不到一会儿，地板上就满是瓜子壳、痰和别的脏东西了。

舱里有卖黄色小说的，也有卖《良友》和《时代画报》①的，但生意比起卖中西饮食的来却差了些。还有一个叫卖牛肉干的人，他开始了长篇的说教。我不懂他的话，只听见一些单字，如"人生"之类。但是听他的声音，看他的姿势，我觉得他很可以做一个大演说家。结果，他把一个小箱子的牛肉干卖光了。

那个人卖完了牛肉干，马上又挂出一方红白布做的药房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大陆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① 《良友》和《时代画报》都是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图画月刊。

的广告旗，卖什么“十灵丹”。他自然不会忘记他的漂亮的说教。他的声音很响亮。我正预备睡觉，却给他吵得不能够闭眼。后来他卖完了“十灵丹”收拾起箱子走开了，我斜对面那四个姑娘又叫茶房摆好桌子打起麻将牌来。

这一晚我总算睡了三四个钟头。天刚亮，一个叫卖“化痰止咳药片”的人就把我吵醒了。我不愿意听他说教，把脸洗过（等候洗脸的轮值，是要花费许多时间的），便跑到舱外去。天已经大亮，船也驶进珠江了。

两岸都有树木，树丛里忽然响起了有规律的、缓慢的锣鼓声。我正在惊疑间，一条龙船从树林后面的支流中驶了出来。接着又窜出另一条，船身比前一条更短。

小火轮上的人看见龙船就高兴地叫起来，龙船上的人也用欢呼回答。那条长的龙船上面有几十个划船的人，他们一齐下桨，船很快地流起走了。

我才知道今天是旧历端午节。

我回到舱里，看见那个叫卖药品的人正在做生意。一个顾客给他一个银圆，他接到手里不留心把它落在地板上，后来他费了许多功夫找寻，都找不到。他马上收拾了药箱，带一副焦急的面容在这附近徘徊。他接连搬开几把椅子，又移动客人的行李，也没有用。后来茶房把帆布椅全收起来，地板上再没有什么东西遮拦他的眼睛，看看希望就要完全断绝了时，一个客人忽然无意间在脚边一张破报纸下面发见了那个银圆，他才欢喜地提着箱子走了。

船到了广州，每个客人争先恐后地上岸，扶梯上变得格外

拥挤了。我们不愿意跟别人抢先，便把行李提到舱外走廊上栏杆旁边，在皮箱上面坐下来，安静地望着对岸的景物。

船上一个工友被海关警察追赶着，从里面跑出来。他穿一身香云纱衣裤，手里拿了两个纸包。他很快地翻出栏杆，往水里一跳。扑咚一声。起初我们还看见他的头，以后他就完全藏进水里去了。海关警察朝水面望了一阵，笑着骂了一声“丢那妈”，也就走开了。

我们等别人都下了船，才从容地作登岸的准备。我刚走到扶梯口，又看见那个工友。他一身湿漉漉的，手里的纸包却没有了。他的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一对眼睛活像老鼠眼。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水里爬到船上来的。

朋友笑着对我说：“这就是生活的斗争。”

那个工友听见他的话，望着我们笑了笑。

我也会意地笑了笑。

在一个小火轮的“尾楼”里，我看见了中国社会的轮廓。

1933年5月底在广州。

西班牙的梦*

在古城的几天的勾留中，我在一个朋友的抽屉里翻出了C的来信。我读完它，我知道C已经回到法国了。一个暗影压在我的心上。

C是我的一个未谋面的朋友。我们平时并没有通信，但是关于他的事情我却知道了许多，因为我很留意他的行踪。他的名字闯进我的脑筋里大概是三年前的事情。那一年里我有一个时候心情陷落进绝望的深渊。他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了这事情，写了一封安慰的信寄给我。我并没有回他的信。但是从那时候起我就把他当作一个敬爱的朋友了。

我想我是了解他的。好些人对我说起他的缺点。但是革命的热情把他的缺点掩盖了。两年前他怀着一颗燃烧的心从法国到骚动中的西班牙去的时候，一些朋友曾经非笑他，说他“到西班牙去学革命”。自然这些非笑不会印到他的心上去。在巴塞罗那他写了不少的热烈的信寄回来。在那里他的物质的生活是很困苦的，但精神的生活却使他非常愉快，这愉快里自然时常渗合着眼泪。那样的精神生活，他只有在西班牙才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十五号。

能够找到。

他没有写过一封信给我，但是他寄回中国的信函，我差不多都读过，因为他的那些朋友也都是我的好友。他的信总是很长的，每次他很详细地叙述他在那里的生活情形。每一封信都会给我煽起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把我的心引到南欧的“诗之国土”去。那些时候我清楚地记着“到西班牙去学革命”的嘲语，但我没有一点惭愧，没有一点疑惑，我只有一个憧憬。我也要到西班牙去！

是的，我也要到西班牙去。记得前年上海《申报图画周刊》登出西班牙骚动中民众推倒电车的照片时，我曾带笑地指着那图画说：“我要到西班牙推电车去。”所以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拿“什么时候去西班牙”的话来问我。

一些人整日价在书本堆中打圈子，终于从书本里得着一点东西。他们就夸大地想，我可以拯救人类了。另一些人却想在书本里学习革命，拿几句死人的话，拿几个玄学的公式来统治民众。却很少有人肯像C那样生活在革命的民众中间，和他们共同经历那艰苦的生活。目击着他们怎样和统治阶级苦斗、失败、继起、入狱以至于死亡。这样学习革命，并不是一件无益的工作。从革命民众的行动里学到一点东西，其真确性总要比那些玄学的公式的产物高过若干倍罢。这样获得的知识总要比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宝贵过若干倍罢。更奇怪的是到现在还有人相信关于革命的知识是不用学习的。

C到了西班牙后就住在巴塞罗那，那个地中海岸上的美丽的城市是革命的骚动的中心。他在那里的生活很紧张。他

的房东是一个贫苦的革命的工人，他是C.N.T.① 的一百三十万会员中的一个活动分子。那妻子也是一个革命党人。从他们夫妇那里C知道了西班牙革命的斗争的全景。那夫妇的生活是困苦的，但他们却很大量地而且亲切地接待C。C的经济状况也是很困窘的，他住在他们那里时常增加了他们的生活负担，然而他们并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从C的信函中流露出来他在巴塞罗那的丰富的活动的生活。譬如在一封信里他说他怎样去参加秘密的集会，和那集会的情形。在另一封信里他就叙述他怎样看见一次暴动的爆发和压服。在第三封信里他又描写C.N.T.的发展的状况。在第四封信里他却形容那里白色恐怖之猛烈。在第五封信里他又叙述他怎样遇见侦探，和那侦探玩了什么把戏。在第六封信里又描写他不得不离开西班牙而回到法国的经过情形。在第七封信里他又叙述他再到西班牙的经过。他的信太多了，太长了！这些信被许多的朋友宝贵地读着，而且辗转传诵。这些信，这些充满了热烈的话语的信，对于某一些青年快要成鼓舞的泉源了。

我常常想难道这不就是C的胜利么？

然而现在C又因为经济困难和别的情形不得不第二次离开西班牙了。这在他自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而且在我和别的朋友们，这也是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再接到那些美丽的信函了。

---

① C.N.T.：即"劳动总同盟"。

C 自己并没有绝望。虽然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他叙述他回到法国以后的贫苦生活时(他有时候不得不在葡萄园里睡觉),那调子是有些悲伤的。但他却带了大的感动来叙述一些作工的法国朋友们大量地帮助他的情形。他还说他预备第三次到西班牙去。这西班牙的梦在他大概是永远不会醒的罢。

然而 C 究竟已经两次踏过巴塞罗那的土地了。他比起我还算是幸运的。我很早就做着西班牙的梦。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电车整天价行驶着。我没有一个时候能够把它忘掉。我,我的梦要到什么时候才实现呢?我常常这样地问我自己。

1933 年 5 月在广州。

庶务室的生活*

在朋友洪和他的朋友们办的一个乡村师范学校里，我过了五天快乐的生活。快乐这个形容词用在这里并没有一点夸张，这里的生活的确是很快乐的。

献身的精神，真挚的友情，乐观的态度，坚强的信仰，这一切把一个像我这样的客人深深地感动了。

在一座小山的脚下，并排地立着三座灰黑色的祠堂。这个纯粹中国式的旧建筑物便是“乡师”的校舍。里面有着礼堂、课堂、膳厅、寝室、图书馆、厨房、盥洗室等等新式的房间，这都是“辅导员”（这里称教师做辅导员）和学生们劳动的成绩。寝室一共三大间，辅导员和学生分住在里面。他们把寝室布置得十分整洁，和欧洲一些中学校的寝室没有大的差别。

左边的祠堂的一角，有一间阴暗的小屋，许多行李堆在里面，门口挂一块木牌，写着“庶务室”三个字。庶务室里有床，有方桌，有椅子。窗洞只有一个，圆圆的，高高的，高得快挨到屋顶了。

我就睡在这间庶务室里。我的床放在那个养病朋友的床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二十八日《生活》第八卷第四十二、四十三期。

的对面。我和那个朋友一样，晚上睡得比别人早，早晨起得比别人迟。庶务室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庶务室里是阴暗的，是闷热的。白天我很少在里面。我有时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在办公室里和朋友们闲谈，有时进城去拜访友人，有时就和那个养病的朋友翻过山到公园里喝茶。有时候我就躺在半山上榕树下面一根石凳上睡觉，就是在正午，那里也很凉快。

傍晚，我也去观泳台看学生游泳。我也在田坎上散步，看牧童赶牛回家。或者我就坐在学校门前草地里石凳上和朋友们谈天。

我坐在石凳上抬起眼睛望出去，草地前面是一片新绿的田野。一条明亮的河流给田野划了界限。河对岸是一条汽车路，路旁有一带小山，半山上白色的庙宇掩映在绿树丛中。太阳已经落下山了，晚霞正在天边燃烧。天空是乳蓝色的，山是青的，明媚的晚霞一半粉红，一半紫色，挂在天和山中间，像一些得意的画笔，又像几条精致的纱罗，颜色是一秒钟一秒钟地在变换，天也不停地加深了它的蓝色。到后来晚霞淡到了肉眼看不见的光景，山脚下汽车路上，灯光就出现了。

有一次学生和辅导员在草地上面开谈心会。我躺在石凳上旁听。朋友洪第一个讲话。他的广东话我听得懂。他的讲题就是《庶务室的生活》。他说："庶务室的生活是神秘的，有趣味的。"

大概在今年正月，洪患过一场大病，在病中他从寝室搬到了庶务室，在这里他整整住了两个月。他发着高热，整天躺在

庶务室里一张木板床上，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学生们在功课完毕以后自动地跑来陪伴他。他们坐满了一间屋子，有的就坐在床沿上。他们轮流地说故事、讲笑话给他听。他的脑子常常昏昏沉沉，不能够完全听懂他们的话。有时候他已经睡熟了，他们还起劲地讲着，等到他醒过来睁开眼睛才知道他们还在他的身边。但是他们方才说的什么他却完全不知道了。

有些学生很富于感情，他们谈话的时候，常常无缘无故地哭起来。其实这"无缘无故"不过是朋友洪病中的感觉，我想这应该是有缘故的。有个学生送他一只口琴，他问那个学生为什么对他这样好。学生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对你好，是出于我自己情愿，只要我自己知道，自己情愿就够了。至于你知道不知道，你对我好不好，那是没有关系的，我不管它。"

这个天真孩子的话使人感动，这是真情的流露，并没有半点虚伪。这样的学生在这个乡村师范里的确很多。他们把学校当做自己的家庭，辅导员当做自己的哥哥。辅导员也是一样，他们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弟弟。这许多哥哥和弟弟愉快地、亲热地在一起生活，他们用自己的手创造出这个美满的家庭，把三座古庙式的祠堂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学校。"用自己的手"五个字用在这里是很恰当的。在这个学校里并没有一个校工。一切工作，日常的和建设的，完全由学生和辅导员轮流来做。学校门前的小路和花园、后山的运动场、两三处散落的农场和花圃……无一不是他们两只手的成绩。

朋友洪在这种爱的环境中生活着。他完全不是一个利己

主义者。他接受了学生的爱护，同时也拿慷慨的牺牲来报答。他和几个朋友都把他们的全部精力耗费在这个学校上面。学校只有很少的基金，因此他们不但不支薪水，反而拿了家里的钱到学校里来大家公用。我知道洪好几次把他母亲的积蓄拿出来捐给学校。这种不自私的精神在农民中间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却不能使官僚化的督学感动，所以在学校立案时会发生许多困难，督学来调查时，甚至当面对洪说，这种不支薪水和捐款的办法是不可靠的，于学校的前途有妨碍。然而同时省城里许多没有稳固基金的野鸡学校，却因立案批准而大开庆祝会了。

洪和他的朋友们并不灰心，他们反而更努力地工作。在这种努力中，他们的教育理想逐渐成长了。不久以前一个年轻朋友从上海到这个学校来，他写信给他的女友说：

> 你不是称我做爱太阳的燕子么？那么我告诉你，燕子向南方飞去，飞去，他看见一线曙光了。他想到不久就可以追到可爱的太阳的那种欢悦，他是如何努力地追去呢！
>
> 好友，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会是这样地乐观呢？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生活所给我的影响。从这生活里我仿佛看见了理想社会的轮廓，因而生出了大的希望。他们的亲爱、热情和天真，使我忘却了现社会里的仇视、欺骗和倾轧，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了。

朋友洪继续讲他的故事：有时候，他的病势轻一点，常常

在昏睡了一整天之后，晚上他清醒了。他的心跳得厉害，全身在发烧。他不想再睡，也不能够闭眼。他勉强支持着，摸索着走到桌子前，点燃了煤油灯，摊开信纸给外面的朋友写信，告诉他们这个学校里的情形，一直写到天亮，他才放下笔，吹熄灯，疲倦地往床上一倒睡了。

在美丽的月夜（乡村里的月夜比城里的更美丽，更清洁），田里的蛙声响得像敲鼓一样。学生们很早就睡了。洪在庶务室里醒起来。他的心很热。对于他，这个乡村也许太清静了。他在床上接连翻了几次身。他终于下了床，走出窄门，经过一条小巷，到了学校门前的花园。他在草径里来回走着，让月光洗他的脸。他在想，怎样使自己碎骨粉身来报答学生们的爱护，来给这个学校、这个乡村建立一个光明的前途。

我没有病，但是我陪着那个养病的朋友在庶务室里住了五天（这中间我曾到别的乡村去睡过四晚），我的庶务室的生活也许不是神秘的，有趣味的罢，然而我也有一点点经验。

我初去的时候，晚上没有月亮。从庶务室的开着的门望出去，只有一片黑暗。看不见天井，也看不见阅报室。屋里一盏煤油灯，两张木板床，夏布帐子放下来垂到床脚。我们（或者我，或者那个朋友）把灯吹灭，钻进床里，就好像进了黑暗世界。只有蚊子在帐外的叫声还不时吵闹地送进耳里来。

有一晚我睡不着，在床上不停地翻身，脑子里想着许多事情。充满斗争与活动的回忆折磨着我，使我不能够在这种愉快、平静的环境里得到心的安宁。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依旧睁开两只眼睛望着浓密的黑暗。在这种难堪的情景中我忽

然听见那个朋友在咳嗽。我试着唤他一声，他毫不含糊地回答我。

"你还是醒的？"

"不知道怎样我今晚老是睡不着！"

"我也是这样，越睡越有精神。"

"…………"

我这时真是异乎寻常地高兴了，仿佛在沙漠里遇见了一个同路人一样。

又有一晚，我半夜里醒来，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天是暗灰色的，我看得见一点点白光。吹着风，有砂石的响声。又有别的声音，仿佛有人在走路，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叫。开着的门忽然给风吹得关上了。眼前是一片黑暗。那个朋友并没有醒过来，他睡得很熟，低声在打鼾。……后来我又渐渐地睡去了。

还有一个晚上，那时我刚从另一个乡村回来，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半夜里醒了，出去小便。我走到外面，只有我一个人，前面躺着一片碧绿的田野，边沿上有一道河流在灿烂地发光。蛙在田里敲鼓。蟋蟀在草丛中唱歌。整个乡村沉睡着，罩上了一面柔软的月光的网。我的心很热。我感到和洪当时的相同的心境了。我也在草径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让月光梳我的头发，我在批判地回忆我过去二十几年的生活，我在绝望地问我自己：我是否也能够像洪那样献出自己的一切，做一个建设理想社会的小小的基石，来报答朋友们对我的爱护。

1933年6月在广州。

谈 心 会*

一

我离开乡村师范的前一晚，是一个很美丽的月夜。学生们在举行谈心会。他们坐在草地上，围成一个大圈子，中间是花坛，前面是一片田野，田畔有一条小河。后面有三座并排的灰黑色的祠堂，就是他们的校舍，在一座小山的脚下。起初没有人说话，四周静极了。大家安闲地听着青蛙同蟋蟀合奏的月光曲。

这样的谈心会每星期举行一次。今天正是适当的日子。学生们非常高兴。教员们也很高兴。因为在这个谈心会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讲自己心里的话。

他们给我留了一个座位，但是我却愿意躺在旁边的一根石凳上。我仰卧在那里，望着上面的无云的蓝天，明月就在海上安稳地航行。小虫在我的赤足上爬来爬去。偶尔有几只蚊子飞来。我在石凳上翻身好几次，我的眼皮渐渐地垂下来了。

他们在那边谈话，全是我的耳朵不大习惯的广东话。偶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十八日《生活》第八卷第四十五、四十六期。

尔有几句送进我的耳里，我仿佛也懂得。起初是朋友洪谈他去年病中的生活。以后是一个学生谈他的过去，谈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接着另一个学生谈他在小学里教书的经验。一个女学生发言希望大家真正打破男女间的界限。一个年轻学生开始讲故事。后来朋友陈就讲我们这几天的乡村旅行。

我迷迷糊糊地在石凳上躺了好久，许多有价值的话都在我的耳边飞了过去。渐渐地我觉得不舒服，身子在石凳上发痛了。我翻一个身坐起来。我不知道时候的早迟，只是空气变得更凉爽，月亮在天空中的地位也大大地改变了。

我走到谈心会那里，一个女学生无精打采地讲话，好几个学生在打盹，一小部分人已经回寝室睡觉了。

洪看见我走近，便要我坐下，接着大家要我讲几句话。我没法推辞，只得零碎地讲了几段关于生活的话，洪担任翻译。

二

我从英国人汤·苦卜尔(T. Cooper)的一个小故事讲起："苦卜尔晚年有一天，一个女孩走到他面前，手里拿了一本纪念册，翻开空白页对他说：'苦卜尔，给我写点什么在这上面罢！'苦卜尔就写着：

'爱真理，孩子，爱真理罢，
它会使你青春的早晨欢欣；
爱护真理使它永远光明，

在人生的正午
虽然会给你带来痛苦，
但是它会使你永远保持正直和真诚！……'"

我接着就说到生活的态度：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严格地批判自己，忠实地去走生活的路，这就会把你引到真理那里去。……"

我又引用了法国青年哲学家居友的话来说明什么是丰富的、满溢的生命。

居友说："个人的生命应该为着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着他人放弃……"

我接着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报酬。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的干枯，正如居友所说：'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即使开花以后接下去就是死亡，它仍然不得不开花。'……"

以后我又举出好几个例子，来说明生活的道路与生活的目标，最后我说出我的生活的信条：

"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

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我还声明：“这只是我对于生活的一点见解，一点经验。”

三

这些话都由朋友洪翻译出来给学生听了，他的翻译我也可以听懂。公平地说，他翻译得并不好。他甚至把“水流”译成了“水牛”。譬如我说生活可比之于一股水流。他却把生活比之于一条水牛，这条水牛在山上到处乱跑乱冲，沿途溅起了种种的水花。至于这水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自己却不知道了。

这个错误马上就由朋友叶出来更正了。但是我也没有理由责备洪，因为他这一晌实在太忙了。他把他的精力完全花在学校的事务上面。他今天太累了，他应该休息(他每天只有很短的睡眠时间)，我本来就应当请另一个朋友来担任翻译。

叶还说了一段话补充我的意思。一个学生也说了几句，于是大家就站起来散了。我在月光下摸出表来看，是十一点四十八分。

众人都进学校去睡了。我一个人还留在外面。月光是如此明亮，乡村是如此安静，但是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浑身发热，我仿佛看见我的血在沸腾。我在草地上散步许久。露水打湿了我的赤脚，我仍然没有睡意。我反复地问我自己：

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

这对于我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第二天傍晚我离开了那个学校，以后也就没有再去。我再没有机会参加那里的谈心会了。但是一些学生的天真、活泼的面貌还不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1933年6月在广州。

别*

黄昏时分，我们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朋友洪拿着他的皮包，陈带了一个小藤篮。我来的时候空着两只手，现在除了一些愉快的回忆外，也没有带去什么东西。

我们三个人从庶务室走出来。学校门前站满了学生。陈临时让一件事情耽搁了，洪又回到庶务室里去拿东西，我不得不站在门前等候他们。

“你一定要来呀！”

“你过一个礼拜就回来吗？”

“下次来一定要多住几天呀！”

许多年轻的声音接连地送进我的耳里来。我被学生包围着。有的说乡里的话，有的说广东式的国语。这些简单而意义深长的话我还能够了解。我找不出适当的回答，我只是点头，我只是微笑。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站在阶上的那个患病的朋友这样问我。

“没有了，反正我不久就会回来的，”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活》第八卷第四十七期。

因为在众多的听众面前演说，我从来就不习惯，况且在这里说话，还得请人翻译。

“我跟着你到广州去！”一个学生挤进来对我说。

洪和陈都来了。学生们马上散开了。

“走罢，”我对洪说。“迟了恐怕赶不上船。”

“好，”洪应着，我们就穿过草径往河畔走去。从学校到河畔小船码头，路是曲折的，走起来至少要花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我走上那条唯一的石板铺的小路，夜已经来了。我知道再往前走，我就会失掉这个可爱的学校和许多朋友了。我停住脚用留恋的眼光回头去看。三座祠堂静静地立在模糊的夜色里，石级上、草地上到处都是人影。许多头在动。我看不清楚那些熟识的面貌，他们都被夜涂上了灰色，就像戴上了面网一样。我只看见许多头的轮廓。但是刚才的许多笑脸，许多送别的声音好像还在我的眼前、耳边荡漾。周围的景物都是空幻的，一切都失掉了现实性。过去五天的生活都远远地退去了。我仿佛就在做梦。

“别了，”我暗暗地说了这一句，就掉过头继续往前面走，这时候我心里有点难过。五天的生活使我认识了许多乡村孩子的真诚的心，使我懂得了牺牲的精神和真挚的友情，使我在朋友们的工作里看到了希望。我在这里生活着像一个平凡的自由的客人（不，应该说是这个家庭化的学校的一分子），他们给了我一些方便，同时也嘲笑我这个城里人的一些缺点（譬如我每天到井口打脸水，以及平常走路的姿势等等，在乡下都显

得很笨拙)。没有一点拘束，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麻烦，这种痛快的生活，我一生中间并不常遇到，尤其是近年来被自己习用的笔名剥夺去了大部分的自由以后。但是现在我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分别了，这么短的时间！想到这里我不能没有留恋。

“当心点，不要跌跤啊！”洪看见我把脚步下得很慢，以为我走不惯这条路，便这样嘱咐道。

的确这条路是不好走的，石板滑，在灰暗的夜色里它又显得模糊，我的眼睛把它看不实在，脚踏下去，我总觉得有些恍惚。这情形就像我有时不戴眼镜在街上走路那样。但是我又不能不走快，因为洪和陈都走到前面去了。

“洪辅导员，××先生，”一个孩子的叫声在后面响起来，同时我听见了赤脚在石板上跑路的声音，后面一个称呼是这里学生用来叫我的。

我回过头，看见了那个叫做林的孩子从后面赶上来。

“林，你来了？……回去罢，”我对他说。

“不，我来送你，”他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他已经赶到我身边来了。

“今晚上又有月亮，”他自语似地加了一句。不错，月亮已经从山那边升起来了。但是这里还不亮。我看不清楚他的脸，我却接触到一对火一般的亮眼睛。

“啊，”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先前洪告诉过我，林这个孩子在学校里不是用功的学生，但是这时候我却不曾想到这上面来，我倒为他的赶来送别所感动了。

我默默地走，他默默地跟在后面，我们一共是四个人，八只脚，在这静夜里。于是小船码头就在我们的前面出现了，一只大篷船泊在那里。我们都上了船。船头没有遮拦，我们抬头正望见一轮明月。

船还要等候别的客人。我们蹲在船头，林坐在船沿上。我们刚谈了两句话，陈忽然站起来说，要到对岸汽车站里取一件东西，就上岸去，走到那边渡船上。渡船在水面上缓缓地流动，月光送着它，一直送到对岸。然后陈的影子就消失在岸上了。

"你下个礼拜和洪辅导员一道回来呀！"林低声对我说。

我答应一声。洪就吩咐他："林，你回去罢。"

林不肯走，他也不多说话。他望我，他又望洪。他的眼光仿佛还在说："你要回来呀！"

这情形倒使我为难了。我用什么话回答他呢？我应该怎样安慰这颗跳动得厉害的小小的心呢？结果，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只有把惭愧和感激藏在心里。

一个客人挑了担子上船来。林只得离开船走上岸去。于是船开了。这个孩子的眼光还在岸上说："你要回来呀！"他就转过身半跳半跑地去了。

到了对岸的码头，船又停了，它还要等客人。陈没有来，我和洪跑上岸去找他。他安静地坐在另一个码头上，手里多了一个小藤包。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今天把这个藤包遗失在汽车上，现在居然在车站里找回来了。

我们三个人一面谈话，一面走，慢慢地到了船上。客人还

没有来齐。又过了好一会儿，才来了两个客人。于是船开了。

我们睡在舱里，船向着月亮走。天空没有一片云，月光正照在船上，时时射进舱来。船经过学校前面的时候，我们都把头伸出去看。三座祠堂依旧安静地立在那里，红黄色的灯光从里面射出来。没有人影，草地上却闪着好几道手电筒的白光。但是它们都消失在开着的祠堂门里去了。

"现在上自修课了，"洪含笑地小声说，声音里带着感情。这说明他对于学校里的任何事情都感到兴趣，而且很关心。

船慢慢地往前面走了。我们还用留恋的眼光去看学校，但是终于让一带树林遮住了我们的眼睛。

"别了，"我轻轻地说了这两个字，我想到我是否能在短时间里回来的事情，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惆怅。

1933年6月在广州。

农民的集会*

三个朋友陪着我，花了五天的功夫，看了一些南国的市镇和乡村。

我在一个六七千居民的乡村里住过一个晚上。乡村的名字和上海一家大糖果店的招牌一样。

南国的夜是很柔和的。我和朋友梁在另一个村子里吃过晚饭以后，就向着这个乡村出发。我们在暮色苍茫中走过石板铺砌的小路，渡过两条小河（渡河的代价是一次一枚铜圆）。第二次渡河时，我立在船头，看岸边模糊的景色，看船夫缓缓地拉着一条铁丝把小船从一个河岸拉到另一个河岸，我完全忘记了上海，那个大都市里的一切都像噩梦似地给一阵暴风吹散了。

我们上了岸，走过好几家茅屋，就到了一所小学校。朋友叶和他的夫人在那里等候我们。这个朋友得到农民的拥护跟土豪劣绅斗争了好几个月，才做了这个乡的乡长。但是一年一度的选举现在又到期了。那些失败了的土豪劣绅便利用金钱和官厅的力量企图夺回他们已失的权力。然而过去受惯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十五号。

他们压迫的农民决不肯让他们再出来把持乡政。于是新的斗争又开始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情形我前几天就听见说过，这时候朋友叶又给我详细地讲了一番。

乡村里的小学校大半设在祠堂里面，地方并不大。朋友叶的小学校也是这样。我们坐在天井里谈话。那里还有好几个人，但是我看不清楚他们的面貌。天井里那张桌子上放了一盏煤油灯，从那里射出来黯淡的光。

这个地方很热闹，进出的人很多，大半是本地的农民。朋友叶告诉我今晚在这个乡村里有一个农民的集会，参加的人不多，只是一些代表。他要我去做一个旁听者，我自然非常愿意。

于是我们出发了。我和同来的朋友梁、朋友叶和他的同乡兄弟，我们四个鱼贯地走过几条石板的小道，走过一些矮小的房屋。半圆月已经升在天空了，淡淡的银光染着道路。一些晒干的葵叶摊在地上，一些农家男女坐在小屋前面挥扇歇凉，有时候发出几声笑语。陌生的、曲折的道路在这平静的环境中，在淡淡的月光下带着浓厚的梦幻的色彩。我不说话，只跟着朋友们走。我每走一步，就好像踏进一个梦境。但有时候叶的兄弟的热情的谈话把我惊醒了。他在讲他们和土豪劣绅斗争的情形。土豪劣绅曾经运动官府来逮捕他，但是农民(尤其是妇女)把他救出来了。那些人后来又请了官厅里几个小职员到乡里来威胁农民，农民识破了他们的欺骗把他们赶走了。从他的叙述(叶后来也告诉我许多事情)里，我知道那些单纯的农民怎样在不断的斗争中渐渐地认识了自己的力

量。我平常爱说没有一次的斗争(即使表面上得到了失败的结局)是白费的。这句话被朋友叶弟兄两个的经验证实了。他们的谈话中最使我感动的一段，就是他们的母亲从前常常抱怨他们，为他们的行动感到痛苦，现在却自愿地站在他们这一边跟土豪劣绅斗争了。

一路上我们遇见了好些农民，他们带笑地招呼我们。不久我们就到了集会的场所。这是一所大的祠堂，前面是一片大的广场。旁边有些草堆，有些树，有些人家。已经有人拿了方凳坐在广场上面了。

我们没有进祠堂去，朋友叶说里面热，不及外面凉爽，主张在广场上开会。他的同乡兄弟表示赞成。有些人走过来和他们谈话。大家决定在广场上开会，忙着从里面搬出凳子来。许多根长凳和方凳都摆在广场上面。我坐了一根方凳，朋友叶和梁坐在一根长凳上。叶弟兄两个却时时站起来找农民谈话。

我坐在方凳上，仰起头望天空。明月在我的头上航行，把银白的光辉洒在这个广场上。草堆、树木、房屋都蒙上了一层月光纱。这应该是一个多么平静的境界。

但是说话的声音渐渐地大起来了。农民们接连地来。一盏汽灯也带来了。人们就把它挂在祠堂的门檐下。

一切都预备好了。一张桌子当作讲台。朋友叶站上去宣布开会。他开始报告他们这一区县参议员选举的经过和土豪劣绅怎样花钱买票而获选的情形。我注意地听他说话，他的话我只听懂一半。女学生装束的他的夫人就站在桌子旁边。

这时候广场上已经放满了长凳，坐满了农民的听众。后来的人找不到座位，就站在旁边。还有好些农妇，她们不肯让大家看见，便躲在旁边房屋前面。在那里她们可以听见一切，别人却不会注意到她们。

叶在台上说话的时候，灯光照着他的脸，他的瘦长的身子显得很有力量。听众都注意地望着他，每个农民的受苦的脸上都现出诚恳和信任的表情。下面没有一个人说话，会场上异常清静。叶的声音虽然不高，却也能够被我的耳朵完全捉到。

叶说完了，听众热烈地拍起掌来。梁在旁边感动地对我说："这里的农民对叶几个人很信仰，因为他们过去受的压迫实在太厉害！"

接着叶的兄弟就上台去讲话。他的话很长，里面夹杂了更多的土话，我简直没法听懂。但是台下的农民听众却显出了更大的兴趣，他们时常笑出声来。

叶的兄弟的演说得到农民的更大的欢迎。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下台以后，另一个青年又上台演说，他的话我完全听不懂，因为他讲的是本地农民的话，这是农民听得懂的，而且喜欢听的。

然后开始了讨论。他们在讨论组织农会的问题。叶又站上讲台说话，许多人在下面发表意见。他们显出非常关心的样子。在长久的压迫下开始觉醒起来的农民，对于他们自身的事情绝不会表示冷淡，许多口在说话，许多简单的意见发表出来。但是我听不清楚他们的话。我只知道他们举出了农会

的负责人，而且规定了两毫钱的会费。许多重要的话都被我的耳朵遗漏了。

这时候叶夫人走下了石阶，过来在我旁边的一个方凳上坐下。她带笑地问我道："你听得懂吗？"我只是微笑。接着从旁边房屋前面的农妇听众中，走来两个穿香云纱的中年妇人。她们笑着和叶夫人说了几句话。于是叶也走过来，他指着她们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勇敢的战士，她们常常很勇敢地跟土豪劣绅们斗争。她们也给我们帮过不少的忙。"

我用惊讶的眼光去看那两个女人，她们不好意思地笑了。

会议结束后，叶夫人给我们领路，把梁和我送到叶的小学校去。在那里有人煮好了一大锅鸭粥等候我们。真是一大锅粥，后来来了许多人才把它吃光。这已经是深夜了。

1933年6月在广州。

鸟的天堂*

我们在陈的小学校里吃了晚饭。热气已经退了。太阳落下了山坡，只留下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在山头，在树梢。

"我们划船去！"陈提议说。我们正站在学校门前池子旁边看山景。

"好，"别的朋友高兴地接口说。

我们走过一段石子路，很快地就到了河边。那里有一个茅草搭的水阁。穿过水阁，在河边两棵大树下我们找到了几只小船。

我们陆续跳在一只船上。一个朋友解开绳子，拿起竹竿一拨，船缓缓地动了，向河中间流去。

三个朋友划着船，我和叶坐在船中望四周的景致。

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在这附近很少有那样的塔，那里就是朋友叶的家乡。

河面很宽，白茫茫的水上没有波浪。船平静地在水面流动。三只桨有规律地在水里拨动。

在一个地方河面窄了。一簇簇的绿叶伸到水面来。树叶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二号。

绿得可爱。这是许多棵茂盛的榕树，但是我看不出树干在什么地方。

我说许多棵榕树的时候，我的错误马上就给朋友们纠正了，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棵榕树，另一个朋友说那里的榕树是两棵。我见过不少的大榕树，但是像这样大的榕树我却是第一次看见。

我们的船渐渐地逼近榕树了。我有了机会看见它的真面目：是一棵大树，有着数不清的桠枝，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上，进了泥土里。一部分的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棵大树斜躺在水上一样。

现在正是枝叶繁茂的时节（树上已经结了小小的果子，而且有许多落下来了）。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船在树下泊了片刻，岸上很湿，我们没有上去。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只鸟在这棵树上做窝，农民不许人捉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但是等到我的眼睛注意地看那里时，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像许多根木桩。地是湿的，大概涨潮时河水常常冲上岸去。"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我这样想道。船开了。一个朋友拨着船，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

在河边田畔的小径里有几棵荔枝树。绿叶丛中垂着累累的红色果子。我们的船就往那里流去。一个朋友拿起桨把船

拨进一条小沟。在小径旁边，船停了，我们都跳上了岸。

两个朋友很快地爬到树上去，从树上抛下几枝带叶的荔枝，我同陈和叶三个人站在树下接。等到他们下地以后，我们大家一面吃荔枝，一面走回船上去。

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叶的家乡去，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从陈的小学校出发，我们又经过那个“鸟的天堂”。

这一次是在早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我们的船也在树下泊了片刻。

起初四周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朋友陈把手一拍，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地这个树林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

我注意地看。我的眼睛真是应接不暇，看清楚这只，又看漏了那只，看见了那只，第三只又飞走了。一只画眉飞了出来，给我们的拍掌声一惊，又飞进树林，站在一根小枝上兴奋地唱着，它的歌声真好听。

“走罢，”叶催我道。

小船向着高塔下面的乡村流去的时候，我还回过头去看留在后面的茂盛的榕树。我有一点留恋。昨天我的眼睛骗了我。“鸟的天堂”的确是小鸟的天堂啊！

1933年6月在广州。

机 器 的 诗*

为了去看一个朋友，我做了一次新宁铁路上的旅客。我和三个朋友一路从会城到公益，我们在火车上大约坐了三个钟头。时间长，天气热，但是我并不觉得寂寞。

南国的风物的确有一种迷人的力量。在我的眼里一切都显出梦景般的美：那样茂盛的绿树，那样明亮的红土，一块一块的稻田，一堆一堆的房屋，还有明镜似的河水，高耸的碉楼。南国的乡村，虽然里面包含了不少的痛苦，但是表面上它们还是很平静，很美丽的！

到了潭江，火车停下来。车轮没有动，外面的景物却开始慢慢地移动了。这不是什么奇迹。这是新宁铁路上的一段最美丽的工程。这里没有桥，火车驶上了轮船，就停留在船上，让轮船载着它慢慢地渡过江去。

我下了车，站在铁板上。船身并不小，甲板上铺着铁轨，火车就躺在铁轨上喘气。左边有卖饮食的货摊，许多人围在那里谈笑。我一面走，一面看。我走过火车头前面，到了右边。

船上有不少的工人。朋友告诉我，在船上作工的人在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十三号。发表时题为《机械的诗》。

百以上。我似乎没有看见这么多。有些工人在抬铁链，有几个工人在管机器。

在每一副机器的旁边至少站得有一个穿香云纱衫裤的工人。他们管理机器，指挥轮船前进。

看见这些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的昂头自如的神情，我从心底生出了感动。

四周是平静的白水，远处有树、有屋。江面很宽。在这样的背景里显出了管理机器的工人的雄姿。机器有规律地响着，火车趴在那里，像一条被人制服了的毒蛇。

我看着这一切，我感到了一种诗情。我仿佛读了一首真正的诗。于是一种喜悦的、差不多使我的心颤抖的感情抓住了我。这机器的诗的动人的力量，比诗人的作品大得多。

诗应该给人以创造的喜悦，诗应该散布生命。我不是诗人，但是我却相信真正的诗人一定认识机器的力量，机器工作的巧妙，机器运动的优雅，机器制造的完备。机器是创造的、生产的、完美的、有力的。只有机器的诗才能够给人以一种创造的喜悦。

那些工人，那些管理机器、指挥轮船、把千百个人、把许多辆火车载过潭江的工人，当他们站在铁板上面、机器旁边，一面管理机器，一面望着白茫茫的江面，看见轮船慢慢地驶近江岸的时候，他们心里的感觉，如果有人能够真实地写下来，一定是一首好诗。

我在上海常常看见一些大楼的修建。打桩的时候，许多人都围在那里看。有力的机器从高处把一根又高又粗的木桩

打进土地里面去，一下，一下，声音和动作都是有规律的，很快地就把木桩完全打进地里去了。四周旁观者的脸上都浮出了惊奇的微笑。地是平的，木头完全埋在地底下了。这似乎是不可信的奇迹。机器完成了奇迹，给了每个人以喜悦。这种喜悦的感情，也就是诗的感情。我每次看见工人建筑房屋，就仿佛读一首好诗。

1933年6月在广州。

朋　　友*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

七八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真的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

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罢。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

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划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二号。

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见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

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需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它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

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

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

眼泪。

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冻馁。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

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

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

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么？

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

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933年6月在广州。

捐税的故事*

我离开厦门的时候，一个老年的朋友从鼓浪屿把我送到“太原”轮上。在过海的小船里那个朋友愤慨地给我叙述了许多捐税的故事。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的话是不会骗人的。

某一天一个警察到理发店去剪发，那个理发师剪完了发擦了头油以后，却在警察的头发上贴了一张印花，并且用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个十字。警察就因此和理发师争吵起来，说理发师侮辱了他。但那理发师却很有理由似地辩解说：“你们平常强迫我们营理发业的也买印花，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票，我们没有地方可以贴印花，要是不贴，你们又会把我们抓去罚钱。我们剪好了发在顾客的头上贴一张印花，正是遵守官厅的命令呢！”于是两个人扭着打起来，后来闹到公安局去，两个人都受了一番训斥，这事情才算了结。

现在印花税又改成营业税了。这种税也是很普遍的。一个挑夫靠着一根扁担生活。这根扁担每月要纳三元的税。而一个挑夫每月的收入多也不过十几元，少就只有几元。这三块钱上面的确染满了一个贫苦的挑夫的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二号。

那个朋友也叙述过他自己的事情。他经营着一个小生意。有一天他拿了一本账簿到厦门去收账。那账簿是二十一年度下半年开始用的，上面自然贴了印花，但因为里面剩了大半的空白篇幅，他便把二十二年度的账目接着写下去，他以为不必再贴什么印花了。然而一个警察在路上拉住他，翻看他的账簿，结果说他漏税，把他拉到公安局去，等他缴纳了罚金才放他出来。

那朋友的生平我是很清楚的。他一生就为着他所相信的真理奋斗（我觉得有时候他的这真理是有些模糊的）。我们都叫他做大哥。他完全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曾经办过一个报，而且把那报纸当作生命般地来爱护，那报纸的确替民众说过几句话，但因为得罪了几个小党员，就在两三年前毫无理由地给封闭了。他的愤慨是很大的。

在广州一个朋友的书斋里我又听到航空救国捐的故事。这救国捐也是很普遍的。甚至每个小学生也要出三块钱。据说有的贫家小孩在学校里读书缴纳不出这笔钱，就给学校当局扣留起来，要等到他们的父母当卖了东西去赎出他们。这航空救国捐在上海不是也很流行的吗？

捐税的种类太多了。我没有时间把他们全都记下来。我最近在某某报的副刊上面看见一个标题《从花轿捐联想到屁捐》。那文章的作者说据最近的情形看来，征收屁捐不久就会成为事实。有钱人在公馆里放屁，当然不怕警察抓他去罚钱，担负这屁捐的也一定全是贫民。

中山大学为了建筑伟大的新校舍，开始征收肥料捐好久

了。占地九千亩的新校舍，的确如邹校长所说，要占着全世界大学中的第一把交椅。但是肥料捐征收以后每一个农民买一包肥料要担负几元的捐税。这捐税在农民的贫苦的生存上将成为一个沉重的铁块。它会夺去他们的好几天的食粮，它会使他们流出更多的汗和泪。这些事情那位坐在高楼大厦里的校长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有一天那座巍峨的校舍建筑成功了，一些富家子弟会在那里面更快活地销磨他们的时间，而农民的子弟却不得不在田间更劳苦地工作。他们一辈子休想踏进那大学的门限！

捐税的负担永远放在那些劳苦的贫民的肩上。这两三年来我走过了许多地方，许多省份，最近我也看过几个乡村。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看见一件事实：捐税太多了，太重了！渐渐就要超过贫民的力量以上，使得贫民连维持最卑贱的生存也不可能了。现在在四川大概已经征收到民国五六十年的粮税了罢。

这些情形使我想起一幅图画：几个怪物在一张圆桌面上大吃大嚼。桌面是放在一群跪着的贫民的头上。他们差不多没有力气来顶这张桌面了，他们的身子一天天地缩短下去。但是桌面上的怪物却更加快活地跳舞起来。

这情形是不能够长久继续下去的。将来不是那一群贫民被压成肉饼，就是他们站起来，抛开桌面，去干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无论如何，那时候是再没有人去给那些怪物抬圆桌面了。

1933年6月15日在广州。

一千三百圆*

一个朋友在西关宴客邀了我去，同去的连主人一共是七位。

我早就听说西关是很热闹的地方。那里还是许多旧式大家庭的根据地。马路宽阔，但也有不少的窄巷和石板铺的小路。在那些密集的房屋里面隐藏着种种神秘的事情。每天下午马路上出现了许多服饰华丽的年轻女人，后面还跟着女佣。据说这些女人都是大富人家的姨太太，她们的主人害怕她们逃走，专门雇了女佣来监视她们。

我们的汽车停在大马路上。我们下了车，走进一条窄巷，路是石板铺砌的，两旁是些矮小的房屋。

我们转了一个弯，走到一座大酒楼的门前。这样漂亮的酒楼立在这条街上就像一个奇迹，叫人不能相信。

酒楼里面很宽敞，是旧式的建筑，有楼，有阁，有廊，有厅，有天井，有树木，又像一个大公馆。我们在里面走了一转，就登楼，在一个名称很美的房间里坐了下来。

主人点了菜。我们嗑着瓜子饮茶谈话。楼房很大，还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二号。

着电风扇。露台上摆了好几盆鲜花。檐下垂着竹帘，遮住了阳光。从外面不时送来鸟声。这个地方倒还清静。

一个五十多岁的黄脸女人拿着一把伞在楼房门口出现了。她起先在门外徘徊了一阵，然后走进来，对我们说了几句话。我不懂她的意思。一个本地的客人和她问答了几句，她便走了。

他们在笑，我想我懂得他们笑的原因。等一会儿那个女人又来了，在她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中年妇人。

姑娘相貌平常，却打扮得很漂亮。她坐下来，并不说一句话。她垂下眼皮，手里拿一把折扇不停地挥着。她在众人的陌生的眼光下有点害羞。

没有人讲话，主人也显得不好意思了。后来还是那个本地的客人和那个老妇人问答了几句。他们的谈话我也懂得一点。他问她多少价钱，老妇人回答说，一千三百圆。我现在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姑娘不过是一个候补姨太太，等待合意的主顾来把她买去。

大家没有话说了。于是那个老妇人接了两毫银角(这是她应得的数目)，把姑娘带走了。走出房门，姑娘还回转身向我们微微鞠躬。

过了一会儿，我们正在吃菜的时候，那个老妇人又来了。这次她带了两个姑娘进来。一个年纪很轻，据她说只有十六岁，颈后拖着一根辫子。一个年纪大一点，头发剪短了，据说只有十八岁，实际的年龄恐怕已经超过二十了。

这两个姑娘就在旁边的靠背椅上坐下。两个人都不停地

摇着折扇，大概因为手闲着没有事情做的缘故罢，或者是被人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她们也不说话，只有那个本地客人直接问起她们的姓名时，她们才开了口。

她们的相貌显然比先前的一个漂亮，身价也就贵了许多。年纪小的一个要价一千五百圆，年纪较大的索价到一千八百圆。一个朋友嫌身价太高，老妇人就得意地说她们两个都读过书认识字。她还到外面去找了纸笔来，放在茶几上。年纪较大的姑娘便侧着身子拿起笔写出自己的姓氏。她写完就把笔递给垂着辫子的姑娘，那个少女也写了自己的姓名。

老妇人把两张纸条都送到我们的席上来。我们依次传观。第一张纸上的字比较好一点，是“黄旭贞”三个端端正正的字。另一张是那个十六岁的姑娘写的，她的姓名是“李盼好”。

虽然两个姑娘都会写自己的姓名，结果依旧是各人拿了两毫银角走了。走出楼房门口，她们也回转身给我们行礼。

客人们继续在谈笑。他们还说，他们选定在西关吃饭，是为了给我找小说材料。他们的话也许是真的。他们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对于文学并没有兴趣。他们只知道我会写小说，却不曾读过我的作品，即使有机会读到它们，也未必会赞美。我自然感激他们。但是他们完全不了解我。我的心里并不快乐，方才见到的一切似乎放了一块石头在我的心上。我不敢想象那三个少女离开房间时行礼的一瞬间的心情。难道她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

在这样的环境中训练出来的姨太太将是怎样的一种人

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然而朋友们却热闹地谈着“放白鸽”的事情，以为这种做姨太太的女人的心地都是很“坏”的。

自然买卖人口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我知道它也是我们的畸形的社会制度的一个产物。每天每天在各个地方都有许多这样的被称为“女人”的生物让人们当作商品来买卖。

我的祖父买过姨太太，我的叔父买过姨太太，我的舅父也买过姨太太，我的一些同辈还准备学他们长辈的“榜样”。关于这件事我知道得很多，很多。但是公开地在茶馆酒楼把女人当一件商品来招揽主顾，当面讲价钱（而且据说在讲定身价付了定钱以后，还得由主顾把她的全身仔细检验一遍），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对这样的事情我不能没有愤怒！

1933年6月在广州。

海　珠　桥*

河南同河北虽然中间只隔了一条珠江，却是不同的两个世界。从前没有桥的时候，人就靠着篷船和电船往来两岸。如今有一座大桥把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了。这就是新建成的海珠桥。

我在中国都市里见过的铁桥，这算是最大的一座了。但是桥上只有胡汉民的题字，修桥工人的名字是看不见的。

我住在河南的最大建筑物机器总工会的三楼上。一个小房间做了我的寝室，从整夜开着的窗户里，我看见对岸灯烛辉煌的河北夜市和西堤一带的高建筑物。

机器总工会晚上总是人声嘈杂，因为那里住得有一些失业工人（因工潮而被“开除”的），那里时时有工人开会，而且每隔一夜在下面娱乐场里还要演出机工剧社的粤剧。

夜里我睡得很迟。但是第二天早晨一起床，稍微休息一下，或者读一两小时的书，我就离开寝室到河北去，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我才回到河南来。我不喜欢搭电船，我不喜欢坐手车①，每天我至少走过海珠桥两次。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中学生》第四十三号。发表时题为《广州·四·海珠桥》。署名马琴。

海珠桥的形状有点像上海的外白渡桥，但是比外白渡桥长，在河北的一端连接着维新路，长堤还横卧在它的下面。桥下有汽车，有行人。我每天走过那一段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脚一步一步地踏在别人的头上。

这桥并不是一个整块，它是一道活动的桥。桥中间有一条长的裂缝，从这里可以看见河水的流动；有时候大船经过，桥就从这里分裂开，成了两段，高高地向天空举起，就像起重机的杠杆一样。

上午我经过海珠桥，那时太阳晒在桥上，行人们挥着汗在那里拥挤地走着。车辆很少，人行道上也挤满了人，有些人在走，有些人倚着栏杆望下面的水。桥下面许多木船很整齐地排列在那里。这些船都是人的家，蜑民就生活在船上，而且是靠着船生活的。我走得很快，我没有时间看两旁的景物，太阳太热了！

晚上我从河北回来，有时经过长堤。从那里的石级一步一步地走上桥。我拖着疲倦的身子慢慢地在桥上移动。空气凉爽。到处都是人声，人行道上坐满了工人，有些睡在那里，有些就坐在铁架上面。桥上电灯明亮，海珠桥就像一个会场。夜晚好像是工人的节日。

我也挤进人丛中去。我走到栏杆旁边，我埋头看下面的珠江。夜里的水面是平静的，依旧是那几排木船泊在下面，没有亮光，没有声音，大概人已经睡了。沿着长堤一带也泊了许

---

① 手车：即人力车。

多只船，那些船都是醒着的，我看见它们在眨眼。船上的姑娘这时候正站在长堤上，娇声软语地呼唤客人。

我回到机器总工会，在三楼走廊上，望远镜拿在手里，我在眺望广州市的夜景。我慢慢地移动脚步，到了走廊的另一端，便看见海珠桥的一段，高耸的灰白色铁架，玩偶一般的往来的行人，在黑暗的背景里分明地显露出来。

我在走廊上立了许久。我不想把眼睛离开铁桥，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那景象是真实的。铁桥真实地摆在那里，我自己也曾在铁桥上面走过。人的力量（劳动者的力量）能够完成一切，我每次想到这个，就被一种创造的喜悦抓住了，这喜悦会渗透我的全身，使我的身子慢慢地颤抖起来。

我爱都市，我爱机器，我爱所谓物质文明。那是动的，热的，迅速的，有力的。我知道都市里包含着种种的罪恶，机器使劳动者受苦，物质文明只供给少数有钱有势的人以高级的享受。然而这应当由我们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负责（所以我们应当把它改造）。

让那些咒骂都市、咒骂机器、咒骂物质文明的人，拿“精神”安慰自己罢！至于我呢，我再说一次：

我爱都市，我爱机器，我爱物质文明。

1933年6月在广州。

长堤之夜*

看表，我才知道已经是十一点钟了。长堤静静地躺在珠江旁边。机器总工会的三层大楼耸立在对岸，高出于那一大片"高等戒烟室"和"银牌现钱的公司"（换个名称就是烟馆和赌场）之上，而成为河南最高的建筑物了。

我不坐手车，我也不搭电船。三层大楼就是我步行的目的地。我应该回到那里去，因为一天的工作时间已经忙碌地度过，现在是夜静的时候，我的疲倦的身体应该躺下来休息了。

我是从太平路走出来的。我一连走过了好几条热闹的街道。许多店铺都是灯烛辉煌，旅馆酒楼的门口也有不少的人进出。海珠戏院里正在上演薛觉先月团圆班的《梦断秦淮月》，用电灯泡扎成的这几个字正在戏院门口发光。门廊里坐着一排查票的人，他们在那里谈笑，表示这一晚的生意不错。明珠大戏院的美国影片刚刚映完，一大群高等华人像参加时装表演会一般地挤在戏院门口。手车全被吸引到那一带地方去了。各种声音在空气里追逐，这应该是最热闹的时候。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生活》第八卷第三十八期。

是很快地车子和人都散去了，向许多街道散去了。留下长堤，依旧静静地躺在珠江旁边。

我的脚步并没有停止过。但是我愈走离灯光愈远了。程璧光的铜像孤零零地立在海珠公园的废墟上，一两座亭子，一片没有树木的荒土，一些小贩搭的布篷。在路旁站着好些中年妇人和青年女郎，没有搽粉，是普通的装束，看见人就做个媚笑，娇声说：

"叫艇吗？"

这简单的话是一个广东朋友翻译给我听的。有些女人还要多说几句，意思总不外乎叫人去坐她的船，在船上睡觉。

我用不着害怕，她们不会动手拖客人。我平静地走过她们的身边，看看她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这些面孔都躲在半黑暗里，配上一身黑衫裤，在深夜看来真有点像鬼魂。我偶尔回头去看后面，灯光已经远远地退去了。

长堤静静地躺在珠江旁边。珠江也是静静的。江上只有稀疏的星星似的灯火，许多只篷船都睡了。河南比这一边似乎是更冷静。连机器总工会的灯光仿佛也是很昏暗的。

"Peaceful River Don!"①

看着躺在我旁边的静静的珠江，我不禁这样地想了。

我继续着我的行程，我幻想我的脚踏在顿河岸上，但是突然我发觉一堆黑云盖在我的头上了。不，这不是黑云，这是海

① "Peaceful River Don!"（英语）："静静的顿河！"当时公映过一部影片《铁骑红泪》，据说是根据苏联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改编的。我只见过绘着静静的河上几点灯火的海报。

珠桥。一座桥压在我的头上。于是我逃走了。我不向东堤那边走，我转了弯，走上石级，上了海珠桥。长堤现在躺在我的脚下。

我的脚踏在别人的头上，一些人在我的脚底下走呀！我简直不能够相信这个。

海珠桥也到了疲倦的时候，需要休息了。中间马路上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都是很快地走来或者走去。两旁人行道上直伸伸地睡了不少的工人。一个小孩子坐在那里卖流行的两毫钱一张的《科学灵乩图》。虽然这和罗广庭医生的“生物自然发生之光明”① 一起在广州算是近来很时髦的两大“科学发明”，这时候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主顾，不过这小孩也许就是海珠桥上度夜者里面的一个罢。

我也走到人行道上去。我在栏杆旁边找到了一个地位，我站在那里回头去看长堤。远远地西堤那一端有许多颗星星在霎眼。东堤一带就黯淡了。一些黑影在下面移动，手车拖着微暗的灯光经过桥下，往亮的地方或者暗的地方去了。

“叫艇吗？……”

我仿佛还听见这样的声音。其实这声音不会送到我的耳边。但是我的眼睛里还有那些等待客人度夜的船家姑娘徘徊的影子。

我掉头去看江面。在我的脚下珠江是静静的，许多只船睡在那里，排列得很有秩序。偶尔有几点星子似的灯光，稀疏

---

① 罗广庭医生认为生物是自然发生的。他出版过一本《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书上有不少当时名人的序文和题字。

地点缀了黑暗的江面。

“Peaceful River Don!”

我不觉又这样地想了，我仿佛又踏上了顿河的土地。

回到机器总工会，我在三楼上打开窗户，又看到热闹的西堤的夜景（我用望远镜看）。那里依旧有许多灯光，依旧有许多行人，一阵风送来楼下剧场里的锣鼓声，我似乎从梦中醒来了。

我明明是在珠江岸上。这里并没有顿河的夜景。

1933年6月在广州。

薛觉先*

在长堤上立着的许多房屋中间，我发见了海珠戏院。门口有红纸的招贴，有电灯扎成的字；《薛觉先难忍相思泪》；《薛觉先梦断秦淮月》；《薛觉先还我河山》；《薛觉先华丽缘》……这样一天天地变换着。

在那些把《吴三桂轶事》、《侍儿艳闻录》等等文章刊登在第一版的广州报纸上，这几天正讨论着“陈皮梅下嫁薛觉先”消息的真伪之类的问题。

薛觉先的名气这样大！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偶尔谈到这个在广州流行的名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告诉我十年前他们刊印《春雷月刊》时，薛觉先曾经捐过毫洋二十元。奇怪，难道薛觉先也赞成社会革命？

我决定去看薛觉先的戏。于是在某一个晚上我便进了海珠戏院。同去的是一个做新闻记者的朋友和他的未婚妻。票价每张毫洋一元四角，是“散厢”，自然不是好座位。好的要售三元，其次还有二元几毫的座位。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四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时题为《薛觉先——旅途随笔之一》。

散厢是楼座的中间的几排，和许多地方的旧戏院一样，座位是不会使人舒服的。至于普通旧戏院的特点：吵闹，谈笑，喝茶，嗑瓜子，人走来走去，空气龌龊，闷人……无不应有尽有。这地方完完全全是中国的，不带一点欧化的色彩。

震得人耳聋的锣鼓声突然响起来。我睁大了两只眼睛，仿佛周围的景象全变了。我进了另一个世界。

幕拉起来，于是戏开场了。所谓《华丽缘》就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但今晚演的只是第二本。没有开场，也没有结束。

先出来的是官，官自然戴纱帽，穿高底靴，后面跟着四个小兵。接着又出来了女人（叫这做女人当然不恰当，这是男人扮的）。女人穿旗袍、剪发，完全近代的装束！这两个隔了好几个世纪的男女居然对面谈话了。似乎没有人觉得奇怪。

这些都不是薛觉先。然而薛觉先出来了。高底靴，绣花长袍，两支野鸡翎插在头上，长脸，两道竖起的长眉。不是近代人的装束，不是近代人的脸貌。他和别的脚色不同，他张开嘴唱的时候，舞台上就多了一个人来拉提琴，这似乎是专为他设备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一样：别的脚色说"广州国语"的对白，唱广东话的戏词，他也是说"广州国语"，唱广东话。不过朋友说他比别的脚色唱得好。他的确得着观众的热烈的欢迎。

所谓"缘"自然还在舞台上继续着。许多人在我的眼前走来走去：皇帝、妃子、大臣、武将、小姐、公子……他们说话，他们行动，整整闹了好几个钟头。他们进去换一套新衣服又出

来，展览给我们看，好像这是他们对我们的应尽的义务。

许多人满意地笑了。到处都是带着满意的微笑的面孔。连我那朋友和他的未婚妻也看得很有兴味。然而我的心却渐渐地沉重起来了。我忘记了是在一九三三年，我忘记了是在这困苦的中国。旧时代的鬼影又一次在我的眼前显现了。舞台上没有一个人，完全是些鬼魂。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举动着不像一个人，而像一些已经死去的鬼魂。男的是奴隶，女的是娼妓，无论是国王、大臣，或者王妃、小姐，没有一个例外。广东戏和平剧以及一切的中国戏没有分别，它们都是尽量地在把旧时代的毒汁注射进民众的身体里去。扮着忠臣、义夫、孝子、英雄的薛觉先和别的戏子一样，不过是旧时代的一个鬼影罢了。

我们如果承认戏剧是民众教育之一种的话，那么我们就看见中国民众所常常得到的精神的养料是什么样的东西了。这些东西抓住他们，使他们一天天往后面走，不让他们前进一步。然而那些靠"文化"吃饭的高等绅士们除了提倡国剧外，还送了扮女人的戏子出洋，在外国骗了招牌回来欺骗民众。他们说是拿这种"文化"在精神上征服了外国。

舞台上的粉红幕在这晚上最后一次地落了下来。观众争着走出去。许多人拥挤在门口，情形显得很混乱，要通过那门是比较费力的。在一阵肉与肉的撞击以后，我和那两个朋友终于走下楼出了戏院，站在长堤上了。

时间已过十二点。那个朋友还约我到一个小店里去吃点心，但疲倦使我推辞了。我别了他们，一个人走在长堤上，穿

过黄包车的包围，慢慢儿向着海珠桥走去。

我的心是寂寞的。许多忧郁的思想包围着我。眼前是一片阴暗，没有光明，没有前途，有的只是一些鬼影。一种强烈的憎恨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诅咒中国的一切旧戏，我诅咒中国的一切旧的遗产。我诅咒整个的东方文化。我绝望地问：现在是不是真有一个人关心着中国民族的前途？（我相信一定有的。）为什么就不看见一个人出来对那真正毒害着中国民族的所谓东方文化加以严厉的攻击？（我相信一定有的。）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知道现在充满中国的那些畸形的怪物都是所谓东方文化的产物，他们思想行为没有一样不是和那些鬼魂的相似？（我相信一定有的。）

《四库全书》是宝物，故宫里的古董是宝物，佛寺是宝物，古迹是宝物……凡是一切可以在这向新路上挣扎的民族的脑里留下阴影的东西都是统治阶级的宝物！然而事实上没有这些东西，中国民众倒可以生活得更好一点。为什么现代的人就应该知道那些旧时代的鬼把戏？人类不是靠历史生活的。历史虽然叫人不要怎样做，结果反而是叫人去模仿了。游凡尔赛宫的人至少总有一半想做路易十四。游故宫的人在那一瞬间总会有一点异样的鬼影似的思想。

我们正需要忘掉一切，以一种新的力量向新的路上迈进。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出路。然而别人却拿种种的古董来抓住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永远陷在奴隶的深渊里。高等绅士们提倡旧戏是无足怪的。现在连一些本来与笔墨无缘的人也在提倡读经了。在这种环境里想到中国民族的前途我不能不感到

悲愤。

我的思想大概是不会有人了解的。记得在《东方杂志》本年的关于梦想的征文里我曾表示过上面的那种意见，我说东方文化这名词里所包含的种种古董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而且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这意思是很明显的。

然而许多人都因此称我为悲观论者。

我果然是悲观论者么？

回到河南的机器工会，我宽松地叹了一口气。我现在回到人间来了。

后来我又和那朋友谈起薛觉先，他说薛觉先在十四五岁时就加入了社会运动。他抱了改良戏剧的决心去演戏，结果却是戏剧改良了他。那么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933年6月在广州。

鬼　棚　尾*

一个傍晚我走过长堤到太平路新亚酒店去看朋友郑。他是那个旅馆的账房。三十圆毫洋的月薪，他就用这个小小的数目养活他一家人！

十年前我和他曾经通过好几封信，那些信里充满着青年的献身的热诚。他和我一样在十五六岁光景就看出了现社会制度的罪恶，投身在社会运动里面。我第一次读到他编辑的杂志①，第一次和他见面，那时我们都还是年轻的孩子。可是如今在多年的分别以后，我再看见他，他的嘴上已经生了一圈胡须。从他的谈话，从他的举动，我看出来：他老了；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知道，三四年前他在南京铁道部服务时，也曾有过一些物质上的享受，那时他的境遇好，收入也不错。他就在那个部里，认识了他现在的夫人。他们结了婚，也有过快乐的日子。但是生活的担子渐渐地压住他的肩头了。

物质上的享受很快地变成了生活的负担。这个担子一天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中学生》第四十三号。发表时题为《广州·五·鬼棚尾》。署名马琴。

① 指《春雷月刊》，大约在广州刊行了三、四期。

重似一天，许多年轻的肩头就被它压得紧紧地不能动弹。我亲眼看见我的许多朋友就是这样地给毁了的。他们从反抗现社会的路出发，结果却走到了拥护现社会的路上。他们自己似乎并没有疑惑，也没有悔恨，却使得一些人暗中为他们痛惜。我写《一个女人》① 时，我的心很痛苦。

郑自然不曾走到这一步，他至今还在生活的担子下面挣扎，他曾经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但是现在他老了，他的肩上已经挑着一个妻子和一个小孩了。

在这种情形里我们的会面是快乐的，但又是悲痛的。我们谈起十年前的情况和十年来的变化，我们都不能没有感动。

我们谈了不少的话，另一个朋友又跑了进来。郑便约我出去"饮茶"，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恢复了自由，晚上的时间他还不曾卖给旅馆。

茶楼上很吵闹，两个姑娘在那里轮流唱戏。锣声太响，把人的耳朵快震聋了，我们对面谈话都听不清楚。我们实在没有福气享受这种吵闹的音乐，就逃了出来。

"还是到长堤上散步去，"郑在和那个朋友商量。我没有什么意见。

三个人在路上慢慢地走着。郑领路。他走过一条街，又穿过一条巷，有时候他和那个朋友低声说话，有时候他也告诉我一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打算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到了江边，在一段较僻静的路上，许多女人在那里闲

---

① 《一个女人》：短篇小说，见《全集》第十卷。

过路人要不要小船。他们雇了一只小船。一个中年女人把我们引到了黑暗的码头边，许多船在黑暗的背景里显出来。

我们走下几级石梯，一条窄的木板放在我们的面前，把我们引到一只小船上，我们又得从这只船再跳上另一只。

船上有一个中年男人，他看见我们坐下，就把船撑起走了。中年女人在后面荡桨。我们的船开始在许多船只中间找一条路穿出去，这样地划船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地方是这么小，许多船都挤在一块儿！

很奇怪，一转弯，在我不知不觉间我们的船就好像流进了一个闹市。我仿佛坐着黄包车走过一个小城市的热闹街道。我的眼界变换了。两边都是灯烛辉煌的商店，每一家门前都坐了几个人，里面至少有一个年轻女子，有时候还有两三个。她们的脸上粉擦得很多；衣服却并不讲究，大都是一身浅色短衫裤；脚全光着……

这是什么样的街道呢？

不，两边并不是什么商店，它们都是船，都是画舫。它们比我们的船大，比我们的船好。它们排列在两边，中间留下一段路让往来的游船经过。这样的街一共有四条。我们的小船就要走过这四条街。

“这两毫子也不容易拿啊！”朋友看见船夫费力地撑船的样子，发出了同情的感叹。这时候许多游船在街中间拥挤着。桨简直没有用处。船靠着船，而且靠得那么紧，差不多没有一点缝隙。要移动船，就全靠着一根竹竿和一些手。这时候四面都是人声。

迎面来的也是画舫，画舫里面常常是一对男子抱着一双姑娘，或者一个女子陪着两三个男人，坐在小圆桌旁边谈笑。有一只画舫里坐着一个老头子，他的左右两手各抱一个姑娘。那些年纪大的人，种种肉麻的样子都做得出。这些终于都流到我们的后面去了。

这闹市还没有完结。我们的船继续往前走。两旁的画舫依旧固定地摆在那里。一只一只地紧紧挨着。有几只上面客人在打麻将；有几只上面姑娘就坐在船头向过往的船只兜生意；有几只上面姑娘们对着镜子在擦粉。

四条街终于走完了。我们的船离开明亮的地方往黑暗里流去。它走过最后一只画舫时，我却看见了一只大船。这只船与其余的完全不同。船上也是灯烛辉煌，但是它摆起了庄严的面孔。不知道怎样我先前竟然没有把它看进眼里，现在我的眼光却自然地落到它上面了。我看见站在船头的一个警察和挂在船头的一块招牌，招牌上大书着"×××××花捐征收处"。

这块招牌不过十个字，它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真正靠着女人的皮肉吃饭的是一些什么人。至于国家每年收入的花捐数目之大，这也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情了。

我们三个人忍不住失声笑起来。在付了"两毫子"的船钱上岸以后，我们谈起这件事情还觉得好笑。

回到机器总工会，时间已经很迟了。我进了房间，把手里拿的一册福耳的《拿破仑论》① 往桌上一放，就躺在床上睡了。

---

① 《拿破仑论》：法国福耳著，伍光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本《拿破仑论》是郑借给我的。他说写得很好，要我读一遍。我后来果然读了。我简直看不出书的好处，我连译文也读不懂。

我第二次再看见郑，我把《拿破仑论》还给他，我很抱歉地说我看不出这本书的好处。我又问他那天晚上我们去的地方是什么名字，他说是“鬼棚尾”，并且解释道：“鬼棚”是租界（即沙面），因为中国人从前叫西洋人做洋鬼子。“鬼棚尾”不用说就是靠近租界的地方。

1933年6月在广州。

一个女佣[*]

一个下午我和朋友洪在朱① 的实验室里谈论罗广庭博士的科学常识。谈到六点钟光景，我们正要出去，外面忽然落起雨来。

这些日子在广州差不多每天都要落雨，但是时间不会久，往往在下了半点钟的雨以后，太阳就会拨开掩盖它的黑云，射出炎热的光芒。

"等雨住了再走罢，"朱脱了外衣说，就把它挂到玻璃书橱上去。

于是我们又坐下来，继续谈话。

雨一落，就落了一个多钟头，后来才慢慢地小了。已经到了七点半钟，夜色降临了。

我们冒着微雨，走下楼去，出了东堂②，穿过矮树中间的石板道，正遇着朱的女佣撑着油纸伞，穿着木拖走来，叫他回家去吃晚饭。

那个女佣认识我，因为我常到朱家去玩。她看见我们是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生活》第八卷第三十三期。

① 朱：指朱洗(1899—1962)，当时中山大学生物系的教授。

② 东堂：指中山大学校舍的东堂。

三个人，就知道朱不打算回家吃饭了，但是她也唤了朱一声。

“我们不回去了。我们到外面吃东西，”朱简单地说。

她答应一声，不再说话，就转身走了。她的脚步很沉重。她平日是一个多嘴的女人，脸上常常堆着笑，今天她的举动似乎跟往日不同。

“你昨天不是说她回家去了吗？”我指着她的背影问朱道。我知道她的家在顺德。

“她去了三天，今天早晨回来了，”朱用低沉的声音回答。“她杀了一个人。”

我还以为朱在跟我们开玩笑，我并不留心他的话。

“她这次回家去杀了一个人，所以她今天的举动、说话都跟平日不同了，”朱继续说。

“真的？杀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新从乡下出来的洪插嘴说，他显然不相信朱的话。

“怎么不真？她今天亲自告诉我们的。她身上还有伤痕。”朱的态度是一本正经的。

我知道朱的性情。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对于社会上任何事情都不肯轻易相信。假若他说一件事情是真的，那么他至少有一些证据捏在手里。他的叙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又是你的好材料了，”朱对我说。他并不等我回答就接着说下去：

“这个女人倒有胆量。她家乡有一个土豪，时常压迫农民，她一家也免不掉常常受欺侮。最近她的兄弟又给土豪打

伤了，她就为这件事情跑回家去跟土豪理论。第一次她是赤手空拳去的，所以也挨了土豪的打，身上有好几处伤痕，我们也看见几处，是她给我们看的。”这时候我们已经走过了两条街，雨还没有住。

朱依旧撑着布伞，我们和他挨得很近，并不是为了避雨，却是为了听他讲那个女佣的故事。

“她挨了打以后就跑回家去，第二天拿了一支手枪再去见那个土豪。”我相信这句话，因为我知道在广东和福建的乡下，许多人家里都有手枪或者长铳。我有一个广东朋友最近正在领导他家乡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不久以前在选举乡长的会场上，他聚集了一些武装的农民跟土豪劣绅的走狗对抗，几乎发生一次大械斗。

“在一个小河旁边她遇见了土豪，那个人蹲在那里。她一声不响地走过去。

“‘你还要来挨打吗？昨天还没有挨够打？’那个人看见她就嘲笑道。

“‘好，我就让你打，让你把我打死！’她生气地回答，就走到他身边去。

“那个人回头一看，骄傲地说：‘我今天不高兴打你！’他掉过头去，不再理她。

“‘好，你不打，就让我来打！’她马上掏出手枪，对着他接连开了三枪。三颗子弹都打进了他的身体。他叫了两声就倒下去，跌进了水里，从此就不曾再爬上岸来。

“这时候有许多人站在河边。他们不说话，也不动手。

“她丢了手枪，对众人说：‘你们亲眼看见我打死他，你们就把我捉起来，送到衙门里去。我是不跑的。’她的态度很安详，一点也不害怕。

“起初没有人说话，众人彼此望着，后来有人发言了：‘你走罢，我们不捉你！’的确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她捉起来，反而有人感谢她，因为她杀了一个土豪，这个土豪是全乡人民所憎恨的。

“这样她就离开了家乡，再跑到省城里来，回到我家里做娘姨。现在还没有人来捉她，农民是同情她的。不过假若事情的真相给衙门里的人知道，那就难说了。

“她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但是她一点也不害怕，她等着官厅的人来捉她。她一直很兴奋。她今天中午对我们说：她对自己的生命现在都没有把握，她再不能够顾到别的一切了。

“这个女人真古怪，我以前简直想不到！据说顺德女人的性格常常是很奇特的，她们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独身主义者，她们把嫁人当作一种耻辱，也许她们都是憎恶男性的女人罢。她便是一个这样的女人。”

朋友朱这样地结束了他的故事，他再没有别的批评的话，但是从他的声音里，我知道他现在也有点兴奋。

这个故事是完全真实的，并没有一点捏造的地方。然而我仿佛读了一篇高尔基的《草原故事》。那个我常常看见的女佣却成了高尔基早期作品里的女英雄。

那个女子，一张黄黄的方脸，一根大辫子，一双赤脚，一口广东音的普通话。朱常常向我们说她不老实、赚钱。据说，她

从朱和另一个朋友两家人的伙食费里面，每个月要赚去二十圆。她的生活过得比朱的夫人还好。她吃东西，穿衣服都像一个有钱的女人。她以前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观察错误了。

我想，我们很少了解别人。我们常常凭自己的一点点不完备的观察，就断定某某是怎样的人，某件事情是如何如何。许多人都犯了这样的错误，有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我们里面谁能够肯定地说：他不曾把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的女英雄错认作一个贪财的女人呢？……

1933年7月在广州。

赌*

据说人有赌博的根性，这句话究竟是否真实，我不去管它。但是我的父亲的板子从小就给我打掉了赌博的兴趣。因此，我对于那些整天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牌桌旁边、赌窟里面的人，就觉得有点不近人情了。

在西方有蒙的卡罗，在东方有澳门，这是出名的两个赌城，而且人知道那里的行政费就是靠赌税维持的。这两个地方我至今还没有去过，澳门也许就有机会去，① 因为它离广州很近，从这里去非常方便。至于蒙的卡罗，我这一生不会看见它了。去欧洲并不是艰难的事，可是像一个绅士那样地在蒙的卡罗过几天豪华的日子，我就从不敢做这种梦。但是这也不曾阻止我听人家谈蒙的卡罗的事情。气候温暖，风景优美，蒙的卡罗是这样，澳门也是这样。大旅馆、大赌场，蒙的卡罗有，澳门也有。至于名媛贵妇、豪绅伟人，那当然是赌城的上宾。不过一个是聚集了欧美上流阶级的英俊，另一个却网罗了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

① 一九三八年我和靳以到澳门去了一趟，住了两个晚上。在“中央饭店”那个大赌场里参观了“轮盘赌”，也在我们住的那个旅馆里买过两张“白鸽票”。

中国的达官贵人。据说星期六那一天，有不少的人带了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钱从广州或香港到澳门去过两天豪华的日子；也有些人就长年整月地把东方赌城当做了世外桃源。这是近的见闻。远一点的，就有好来坞和柏林的电影公司给我们供给了《蒙的卡罗》和《蒙的卡罗一美人》的影片。最近乌发公司还有一部《蒙的卡罗的疯狂》，但是到了上海却变成《春波艳影》了。西方赌城的豪华、淫逸和疯狂，单从这几部影片中就可以看出来。可是许多人还觉得不够，甚至在别的爱情的影片里也常常加上几个蒙的卡罗的镜头。这对于被囚在上海交际社会里的高等华人倒是很适合的。要去蒙的卡罗，似乎太远了；去澳门也有些麻烦。幸好上海还有赌场，大的、小的都有。

上海的那些轮盘赌窟是半秘密的，大的我根本没有办法进去，小的我却有机会进去一次，但马上就出来了。这里说小，其实也不能算小，每天出入的也是一笔很大的款子，不过在这里，只有几块钱的人也可以放心地押注。至于大赌场，听说在那里面一个赌客一次所付的小费，也够开支贫苦人家一年以上的生活了。

大赌场，有身份的人才能够进去；小的，一个生客要进去也得经过一番严密的搜查。门口有侦探徘徊，走廊上坐着十多个北方大汉；“避免危险，一律搜查”，墙上挂着写上这八个字的牌子。可见要把钱送进赌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知道怎样，许多人却甘愿去找这种麻烦。

在广州，河南就是广州赌城的根据地。我住在河南，每天经过海珠桥到广州市去，在河南的马路上总要看见许多公开

的赌场。名称是××公司，是两层的楼房，门口有一个武装兵士守卫，招牌上还写着“楼上银牌”，或者“银牌现钱”一类的字样。生意很好，每一家都挤满了人。

这种公司真是多得叫人无法相信，也许它们就挤在我所经过的一段马路上，所以我走几步路就看见一家，但是一过桥，赌场就绝迹了。

一个晚上，我和一位朋友走进了较大的一家赌场，大概是裕泰公司或者裕丰公司罢，因为我并没有留心招牌。楼下靠里放着柜台，台上铺了席子，一个做庄家的人安坐在柜台里面，旁边有两三个帮手，他们干着吃注、赔注的事情。好些赌客就站在这个高高的柜台前面，没有座位，没有茶。他们不像有钱的人。但是他们一押注总是好几张钞票，有的一伸出手就是好几张十圆的香港纸。这些注很快地就给庄家吃进去了。每次胜负决定得很快。这叫做番摊，赌具是一堆围棋子。庄家从那个堆里抓了一把棋子放在桌上，叫人家押注，然后用一根尺子拨弄着棋子来计数，每四粒一次，看最后剩几粒，就归押那个数目的人赢钱。数目只有四个，押和赔的方法也有几种。办法很简单，人人可以懂。

楼上，屋中间是一个大的长方洞，四面围着栏杆，栏杆旁边放着凳子。赌客就坐在凳子上，身子倚着栏杆，从方洞里望下去，望着下面柜台上的棋子押注，楼上有招待人，他用一个小篮子把赌客押的注吊下去。楼上的赌客可以记账，有茶喝，有纸烟抽，有红瓜子嗑。他们是受优待的。这时候人并不多，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两个中年妇人。她们穿得很平常，不像

有钱人家的女人，但是她们安闲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埋着头看那下面钩心斗角的“生存竞争”。

一个这样的“公司”里面有多少房间，也就有多少赌摊。每天银钱的进出是很大的，据说还要给政府抽去十分之一。多大的一笔赌税！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一个人进赌场想不输钱，是如何困难的了。不然，开办赌场的人靠什么吃饭？那笔大的赌税又从什么地方支付？

但是人依然不断地进赌场，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无益的事情上。拿有钱的人来说，也许他们是闲得没有事情干了，钱多得没有地方花了。钱少的人也许是想在赌场里发财。没有钱的人当然不会进赌场，然而娘姨、车夫之流又爱“打花会”。虽然眼前摆着不少的可怕的例子，他们却依旧走那条别人走过的失败的路。

赌博并不是人的根性。但是在我们的这种混乱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发横财却成了一般人的愿望。谁都想以极少的代价换得最大的报酬，而且有的人，他们一生就只有极少的代价。但是他们不能没有获取最大报酬的幻想。所以“打花会”、买彩票的大半是贫苦的人。这些“生意”能够顺利发达，这是无足怪的。

但是……

用不着我再说下去了。

1933年8月在上海。

扶梯边的喜剧*

船到厦门，并不靠岸，它在海面停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上午，我们游了日光岩匆匆回到船上，担心着就要开船。

西的哥哥从漳州赶来看他，又叫人送了一大筐荔枝到船上来，是那么满满的一筐。

账房间门前挂牌说，下午两点钟开船。两点钟快到了，船上还没有动静。依旧是：人拥挤，叫卖声嘈杂，一些人在搬行李，一些人在做生意。卖荔枝的，卖甜橙的，卖面条的，卖茶水的，卖黄色小说、唱本图画的，还有卖别种物品的。生意是那么好，主顾是那么多。

舱面上太热，太阳直晒到人们的头上。

"我们到那上面去看！"一个朋友抬起头指着船尾的一层甲板说，那个地方就在我们的对面，一道楼梯可以把我们引到那里去。

"看，那个扒手，"西指着一个站在扶梯边叫喊的黑衣汉子低声说，"我哥哥认得他。刚才我哥哥下去走过他旁边，故意看他几眼，他就说：'既然认得，又何必多看呢？'他的神气好像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生活》第八卷第三十二期。

在说：你认得我，我就要显一点本事给你看。他们这种人胆子大。”

“好，我们到那上面去看，在那里一定看得很清楚。”我这样答应，就第一个走上楼梯，到了船尾的甲板上。

甲板上没有阳光，那是给布篷遮去了。到处都是帆布床和席子，人躺在那上面，人坐在那上面，完全不给过路人留一点空隙。我们很费力地走过这人山人海，好容易在救生船前面找到一个地位。我们倚着铁栏杆朝下面望，正看见扶梯旁边的一切：上船下船的人和行李；泊在我们这只大船旁边的许多小艇；那个黑衣汉子正站在下面忙碌地活动。

“看，那是他们的头脑，”西忽然说，他指着一个穿白麻布短褂、戴软草帽的年轻人，那个人的相貌、装束活像一个安份的小商人。但是，奇怪！他的手在干什么？他把右手伸在左胳膊底下，身子不住地跟着一个刚上船的学生的身体转动，他的右手手背紧贴着学生的西装裤袋，用两根指头在那里面搜索，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在替那个学生着急，学生却一点也不觉得，终于被他挟出了一束纸件，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这个头脑马上就挤在人丛中不见了。现在是那个黑衣汉子在活动。还有一个穿学生服的，他也在把手伸进别人的袋子里。一个老太婆躬着腰走上船来，他居然把她衣衫的钮扣都解开了，他还在解她的裤带，却被一些人走过来挤散了。

“这不行，他不应该偷这个老太婆的东西。老太婆已经穷得可怜了！我们应该下去干涉！”朱气愤地说。朱虽然是大学

教授，但他是从农民中间出来的。他有不少农民的气质。他说怎样，就是怎样，而且说了就做。他有农民的结实的身体，他不怕跟人家打架，虽然他的性情相当温和。因此在广州他就被罗广庭博士之流批评为“没有学者的风度”，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做了我的朋友。

“你下去有什么用处？你得罪了那班人就够你麻烦的！这又不干你的事！反正那个老太婆并没有丢什么东西，”另一个朋友劝阻道。

他们的谈话引起了下面的人的注意。黑衣汉子先抬起头望了我们一眼，眼珠奇妙地动了一下，接着那个穿学生服的也抬头看我们。

“当心点，他们知道我们在看他们了，”那个朋友小声说。

我忽然看见那个小商人模样的头脑站在一个摊子前面吃冰淇淋，先前的那束纸件被他丢在地上了。他揩了嘴，走到扶梯旁边，黑衣汉子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他马上抬起头望着我们笑了笑，接着又摸出一包纸烟，从里面抽出一根递给一个站在他身边的中年人。这时候我才觉察出来，他的短褂上面口袋真多！那个黑衣汉子也是一样：一身都是口袋！

“看！他们又要活动了！”朱带了紧张的神情说。

在下面，几只小艇正向着我们的大船摇过来，慢慢地往扶梯边靠。三个扒手就一齐拥挤在扶梯上。不，不止三个，他们一共是四个，五个，六个……那个打扮成挑夫模样的，那个穿运动衣的，那个流氓样子的都是。他们留一半人守在扶梯上，一半人走下去。他们走到最后几级扶梯，就碰到从小艇到大

船上来的客人。三个人就把客人包围着，其中的一个放胆地搜索那个人的衣袋，最先搜的是西装裤袋。

我们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非常替那个客人着急，几乎要叫出声来。但是客人却让他们去搜，他一点也不躲开。他们如果在扶梯上没有搜到什么东西，就会把客人挟到船上去，趁着客人照应行李的时候，再一次搜索他的其它的衣袋。

他们就这样忙碌地在扶梯上往返上下，除了摸人家的衣袋外，再没有别的事情。本来扶梯上很空，每个人都可以很快地自由上下，现在他们把路堵塞了。他们好像在把守一座关口，每个人经过，都要让他们搜查一番，或者更适当地说，都要纳一点捐税。

一个，两个，三个，我们看见好些人做了他们的捕获物。那些人从小艇爬上大船，颤栗地走着扶梯，不是害怕自己跌在海里，就是害怕行李给挑夫多要了搬费。他们绝对想不到还有一只别人的手在摸他们的口袋。

我们注意地看这一切，不肯放过任何细微的情节，就像在看一幕紧张的戏。这一天他们的生意似乎并不好。据我们亲眼所见，他们得到手的不过是些银角和铜板。一到手他们就把这些分散了。有纸片时他们就把它撕碎丢在角落里。

我们替人家担了许久的心。后来那些摆摊子的小贩给人赶了下去，舱面上的布篷也扯了起来。我们想开船的时候快到了罢，扒手们的戏大概已经演完了。

我和朱走下去，到了舱面，我们还看见扒手头脑在那里。我们走过他身边，便站住看了他一眼，他连忙摸出香烟来敬我

们。朱取了一根衔在嘴里。

“今天没有什么生意，‘出门靠朋友’，大家都是知道的，”他陪笑说。

我们找不出话来回答，只是点一下头就走开了。

“这也算是生活的斗争罢，”朱低声说。回到舱里，他却带笑地告诉他的夫人：“我又学会一样手艺了。”

船五点半钟才离开厦门，在我们这里时间是不值钱的。

1933年8月在上海。

游了佛国*

从广东回来，我就到普陀去。花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我走遍了被称为“佛国”的普陀山。我问自己，我究竟得到了些什么，自已却不能回答。

我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山林隐士，更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我陪了几个朋友到普陀来，不过想在友谊中消耗一些光阴。所以在普陀的几天里面，我整天没有停过脚步，一定要走到身子疲倦、脚趾疼痛的时候，我才慢慢地走回寄宿的寺院去。朋友们也和我一样。

每天早晨天刚亮，我们就起床。窗前远远地立着一座高山。山上长了一些树木。这座山，看起来很陡，但是它并不曾给我们遮住阳光，反而让我们看见阳光那样灿烂地照在它上面。环境很幽静，小鸟的悦耳的叫声，冲破了夏天早晨的空气。

吃过早饭，我们六个人穿上麻线鞋，颈项上围着一条毛巾，向着新的路线出发了。一个朋友拿着地图，我们就请他做向导。别的朋友又带了照像机。我却只有两只脚跟着大家瞎跑。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三、四、五日《申报·自由谈》。

我们都没有到过普陀。地图也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一次我们倒没有感到困难。路是不难辨认的，路旁又有到某寺、某禅院进香的指路牌。

同路的没有女人，朋友朱的母亲和妻子另外坐轿子进香去了。大家都走得很快。花了一个上午的功夫，我们畅快地游完了前山，给二龟听法石照了像，还在盘陀石上睡了觉。下午天气更热，在太阳下面走路不大舒服，两只脚也感到疲倦了，我们便回到寺里吃饭。

在寺里睡过午觉醒来，不过三四点钟的光景。我们又约好一道出去，到海滩上去洗澡，或者爬到岩石上去捉动物。海滨有卖咖啡的帐篷，我们把外衣、鞋袜都寄存在那里，在海滩上玩累了时，便回到帐篷里去喝汽水。

我们第二天游后山，日程和前一天差不多，只少了一个朱，他陪他的母亲坐船到洛迦山拜佛去了。朋友朱是一位科学家，很天真，他第一次跟和尚见面，就痛驳佛家的道理，几乎跟和尚吵起来。但是为了满足他母亲的多年的心愿，他这次也只得牺牲了同游后山的快乐，到那座充满烟雾和香客的洛迦山去了。那座山上没有庙，只有一些茅棚，他在茅棚外面整整站了大半天，看着他的母亲在里面烧香叩头。这一次我们游了梵音洞，和昨天游潮音洞一样，我们所得到的只有失望。在地图上印得有"普陀名胜举要"，人们把潮音洞和梵音洞形容成非常神奇的地方。据说有一些虔诚的佛教徒到了那个地方就会"眩目震耳，悖魄堕魂"，甚至会"投崖碎体，求生净土"。但是我们在那里就只看见一些破屋旧洞，并没有奇异的景象。

一些险峭的岩石高耸在海边，刮风的时候，海涛怒吼起来，不住地向岩石撞击，有时打进了洞里，于是水花在石上四溅。人靠着栏杆看下面，也会感到一点紧张。但是这样的景象在别处海边也可以见到。我们的失望并不是毫无原因的。

千步沙还不错，我们来回都走过了这个地方。地上全是沙粒，望过去是一片黄色，两端接连着山坡。路中间留了一连串的脚印。印迹很深。同时有人在路中间放了许多个竹筛子，一个接着一个，相隔只有几步远近。我起初还以为这是给行人垫脚用的，免得人在沙上移动脚步感到吃力。但后来逼近了看时，才知道这也是和尚化缘用的东西，果然有人丢了一些铜板在筛子里面。沙上的确不好走，脚一放下去就像陷进了沙里，再提起脚时，鞋里已经积了不少的沙粒。太阳很热，把沙粒蒸得快发火了，脚不能够在沙上停留一分钟。我脱了麻线鞋赤脚走路，做了跑步的姿势，虽然吃力，但也终于走过去了。一个年纪稍大的朋友却自认吃了败仗，雇了轿子。

这次我们没有游佛顶山，回去时路过仙人井，从井里舀起一瓢凉水喝了。井位置在一个矮矮的洞里，水很清凉，我们每人都喝了几口。前一天在梅福丹井我们也都喝了井水。出了仙人井，我们遇见两三个客人。他们闲谈着从下面走上来，一个说:“普陀山的景致，要算佛顶山最好。”但是我们知道已经太迟了。我们就只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再过一天，大家就走了。寺里的知客师说，那天上午有船开往上海，六点钟以前他就把我们送下山去。海面上没有一只轮船。我们在码头上等了一个钟头还没有动静。码头旁边

有一座小庙，我们进去在庙里歇脚。庙很小，常常有轿夫来打扰。一个看庙的和尚在殿里洗刷锡器，他向我们抱怨他的单调生活。我们正在谈话，外面又有轿夫在打门，等一会儿闹得太厉害了，和尚就提着一根木棒开门出去。

我们在小庙里等到十二点钟，寺里的人送饭来了。我们想不到还有这顿饭吃。吃完饭不久，外面有人进来说船到了。我们高兴地出去看，才知道这是从上海开来的船。朋友朱要到海门去，他就和他的母亲、妻子、兄弟走了。我们问别人有没有去上海的船，说是明天上午七八点钟有一只。我和另一个朋友不能够回上海，只得在普陀多留一天。我们疲倦地走回到那个寺院，连先前送我们的知客师也有些惊讶了。他也许高兴，因为寺里又多了五块钱的进账。

下午两点钟光景，朋友留在寺里睡觉，我一个人去游了佛顶山。这一趟路程不算近，差不多要走瘦了我的脚。路并不难走，但是过了法雨寺不久就上山了。那许多石级，一层一层，一梯一梯，接连不断，从下面再往上走，似乎没有路了，但是走完一段，一转弯马上又现出新的一段路。我这样地走了许久，并没有看见一个同路的人。只偶尔在转弯处石凳上坐得有一个戴斗笠的和尚，等着香客来“结缘”。我扶着铁栏杆不住地登上石级，有时看见路旁有石凳，就在那里歇歇脚。旁边是山，山上长满了树，阳光照在树叶上，给它们镀了一层金色。我只顾往上面走，不知道离海面多少高了。有时我回头看，山坡躺在我的脚下，全被绿树掩住，山坡尽处，是一片黄沙。蓝色的海水正向沙滩流过来，海水蓝得可爱，像一匹缎

子，但是没有一只汽船来剪破它。

雷祖殿过了，“海天佛国”过了，看见了那两块古怪的大石头，我不知道到山顶还要走多少路，而且不知道山顶上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但是我也只得继续往上面走去。愈到上面，我回头看下面的景致，山景也愈显得美丽。我仿佛就置身在绿树丛中，听自然界的微妙的音乐。旁边有较低的山，山上烟雾弥漫，我快活地想，云在我的下面了。

我终于到了慧济寺。这也是一座大庙，但是因为庙修建在山顶，香客不多。这时候没有佛事，庙里静悄悄的，山门前有几个和尚在谈天，看见我就换了面容高声叫起“结缘”来。我没有钱给他们，他们也就笑了。在普陀山靠“结缘”吃饭的和尚不知道有几千，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会遇到，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盘脚坐在路旁，有的立在树荫下，都伸出手向香客化缘。他们从我这里得不到铜板，就批评我说：“朝山进香，不结缘，真奇怪！”但是他们不知道离开普陀山，奇怪的事情还多着呢！

游了佛顶山，没有看见一样奇怪的东西，我还想上菩萨顶去看天灯，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还要到海滩上去会那个朋友，这是我们先前约好了的。我应该趁太阳未“落坡”时走下山去。

这一晚我们睡得不畅快，外边有人打麻将，闹了许久，后来茶房们又因为分赏钱吵起来，到夜深才静下去。早晨我们还没有醒，寺里接客的人就来敲门，把我们唤了起来，说是船到了。我们吃过早点便跟着他走下山去。时候很早，不过五

六点钟的光景，太阳已经升了起来，空气很新鲜，一路上就听见鸟的歌唱，看见树叶的绿影子。快到码头时，我们就听见轮船在鸣汽笛，等我们跑到码头，船已经开走了。我们看得见黄色的船身，黑的烟囱，灰黑的烟雾。昨天别人明明告诉我们去上海的船要七八点钟才经过这里，现在不过六点多钟船就开走了，而且走得远远的，我们没有办法追上它。接着有许多女香客坐了轿子到码头上来，行李给人挑着。她们也只得在这里停一会儿，说了好些抱怨的话，就让轿夫抬着她们，挑夫挑着她们的行李回到庙里去了。

照这情形看来，我们恐怕永远没有机会搭到去上海的船了。我那个朋友在上海一个工厂里服务，他的归心真正像箭一样，我也不想留在普陀山多看和尚们的嘴脸。然而没有办法，我们又只得回到寺里去。这一次更使那个知客师惊讶了。后来还亏他给我们想了办法，让我们搭了小火轮到舟山去。在舟山搭船方便，每天都有小火轮从那里开往上海。

这天早晨十点钟，我们就离开了普陀。我们心里很痛快，虽然知道我们会在舟山住一个晚上，但是那里有朋友照料我们，会给我们种种的方便，会使我们看见一些新奇的东西，这些东西至少比和尚们的嘴脸有趣。

这里特别提到和尚的嘴脸，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普陀和尚太多了，到处都是。和尚也会应酬客人，也会计算银钱，也会奴使用人，也会做生意，跟普通商人没有两样。寺里有客房，客房就像上海的旅馆，新式的设备应有尽有，除了伺候客人的茶房外，还有接送客人的接客者。饭菜是素的，但客人

也可以买荤菜带进去。有钱的人在这里也可以得到种种的方便。我们曾经在客房里沙发套子下面发现一根烟枪，我们也听见过麻将牌的声音，就只差看见人带娼妓进来。

离开普陀的前一晚，我们曾经和知客师谈过一番话。他生得来肥头大耳，却有一副聪明的脑子。他说话漂亮，懂得好几省的方言，他尤其会巴结女香客。他对我们说的话倒是很坦白的。他说："普陀山的各个寺院每年就做这几个月的生意。但是开销太大了。这两年各家竞争得太厉害，生意又不大好，所以各家都不免要亏本。这种生意真不好做，不过许多和尚就靠它生活，不做又没有办法。"所以遇到香客上门他们就得大敲竹杠了。做一次水陆道场，起码得花去千把圆。做个小佛事，也要用百圆以上。但是绅士家的太太、小姐是满不在乎的。我在另一个庙里看见了一次水陆道场，和尚们对于女香客的巴结，我找不出话来形容，那副嘴脸只有古典派的画家画得出来。

我们在普陀山是受着相当优待的，在寺院里面我觉得比在上海旅馆里还舒服。我回到上海，有人问我带回来什么印象，我回答说，我游历了一个大商场，在那里贩卖的货品是菩萨，做生意的是一些超等的商人，我自己不过做了一个最不慷慨的顾客。

1933年8月在上海。

在 普 陀*

到普陀的那一天，在海边的岩石缝里我们看见了不少的isopod①。大的、小的，成群地在岩石上爬着。许多对相等的细脚，鱼鳞似的甲壳，两根长的黄须，黑的眼睛。大的有蝉身那样大，小的就很小，在这里我们看出了 isopod 的发育的全个阶段。

“我倒没有见过这样大的 isopod，”朋友朱看见一只很大的 isopod 从一个缝里爬出来，不觉惊喜地叫道；“在地中海边我都不曾见过这样大的。德拉日②研究这种东西很详细。他也没有找到这么大的。”

“我们捉几只来看看，”我说。那个小动物的两只眼睛似乎很机警地在看我。

“好，明天去买一瓶酒精来，在这里采集些小动物回去，”朱说。

第二天上午我们游完了前山，下午四点钟以后我们一共五个人走出寺院，到街上去买酒精。在普陀山买酒精，似乎是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大众》月刊第七期。

① isopod（法语）：等足类动物。

② 伊・德拉日（1854—1920）：法国著名动物学家。

一件奇怪的事情，起先在寺院里我们就问过和尚，和尚还疑心我们想喝酒。但是朱却相信在这里一定可以买到酒精。

街很短，中间是窄狭的石板路，两旁是旧式的店铺。进香袋、香烛、画片、地图、矾石的雕刻，以及汽水等等都摆在门前。我们问了好几家杂货店，那里不但没有酒精，连酒也没有。我们失望了，正打算回头走时，朱却在一家较大的店里买到了高粱酒，要了一个瓦罐盛着，提起来往海边走去。

海边有人游泳，可是只有寥寥的几个人。海滩上有人搭了布篷，做饮冰室，卖着汽水之类的东西，生意不大好，不过座位舒适，是帆布椅和藤椅，脚下全是沙。我们到了那里，就脱下外面的衫裤放在藤椅上，让一个爱喝啤酒的朋友看守，其余四个人赤脚经过沙地，往海边岩石上走去。那一罐高粱酒就拿在朱的手里。

沙滩上有许多小蟹在爬，人一走近，它们全钻进洞里去了。它们在沙滩上打了不少的小洞。

潮打湿的沙地是柔软的，脚踏在上面，使人起一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们爬上岩石，不平的石块就刺得脚掌发痛了。我们从一块岩石跳过另一块，往最近海的高的岩石上爬去。潮水在我们的下面怒吼，一匹一匹的白浪接连地向这些岩石打来，到了岩石脚下又给撞回去了。那奇妙的声音，那四溅的水花……

但是我们不去管这些。我们走上岩石，就分散开来，各人找寻自己的捕获物。这类东西很多，除了isopod以外，我还看见了海葵、海螺、蟹、佛手和其它的几种小动物。

我在一个岩石边沿上跪下来，伸一只手去捉一只小蟹，这只蟹在岩石缝隙里，岩石缝隙里全是红色，就像涂了许多动物的血。许多海螺钉在那上面。我把手伸下去，那只蟹却向着更窄的缝隙跑进去了。但是我还看得见它的两只脚。我去向朱要了小刀来，用刀刺进手伸不到的缝隙里去，起初蟹还不肯动，后来我把它骚扰得没有办法了，它只得跑出来。我连忙伸手去抓它，它就往里面一逃，可是已经迟了，它的一只螯和一只脚都被我抓住了。它终于被我用刀拨了出来。我把我的俘虏拿在手里看，它可怜地动着，一只螯和一只脚已经断了。

我走到朱那里，把蟹放进了酒罐。朱和西正在捉isopod，他们已经捉了好几只大的。朱的兄弟在两块岩石中间下凹处洗脚。

浪已漫上了前面的岩石，那里已经积了一些水。我又往前面走去，把脚浸在清凉的水里。石上有好些花朵似的彩色的东西，那是海葵。它们浸在水里像盛开的花。我伸手去挨它们，它们马上缩小起来，成了一团。我便用刀去挖它们，它们像生根在石头里一般，起初简直弄不动，但是后来我终于把它们一一地弄起来了，这些奇怪的动物。

前面的某一块岩石上浪还没有漫上来，虽然最前面的岩石已经有一半浸进了水里。在那个岩石上我看见了一只佛手插在缝里，松绿色，很可爱，一半露在外面，好像很容易弄出来似的。我伸手去拿，没有用，又用刀去挖，也挖不动。我还在用力，不觉得潮已经涨上来了。我的耳边突然有了响声，一个大浪迎着我的头打来，我连忙把头一埋。全身马上湿透了，

从头到脚都是水，眼镜也几乎被打落。搭在肩上的那条毛巾却落在岩石上给浪冲走，马上就看不见了。

“金，当心！不要给浪打下去！”朱在后面的一块岩石上警告我说。

我退后几步，坐到另一个岩石上去，取下眼镜来揩了一阵，因为镜片给浪打湿了。

我又戴上眼镜，俯下头去看海。下面全是白沫。水流得很急。浪带着巨声接连不断地打击岩石脚。前面较低的几块岩石已经淹没在水里了，只露出一些尖顶来。

我要是落到下面去，一定没有性命了。这样一想，我就觉得自己方才没有被浪打下去，真是侥幸得很。但是过了片刻，我看见那几块岩石还高出在水面上，我又想起了那只佛手，我的心不觉痒起来了。结果我还是到那个岩石去把佛手弄了出来，自然费了很大的力气。这种东西店里好像也有卖的，这个我并不是不知道。

在这些岩石上我们花去了一点钟以上的时间。后来我们回到布篷那里，我还在沙滩上睡了一觉。

傍晚大家穿好了衣服。朱提着酒罐，我们五个人沿着山路，跟着庙里的钟声，有说有笑地走回我们寄宿的寺院去。

路上有好些和尚和好些男女香客用惊奇的眼光看我们这个奇异的行列，看朱手里的酒罐。

1933年8月在上海。

三等车中*

坐火车似乎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三等车更不是舒适的地方，但是这两年来我的一部分的时间就在三等车里面花掉了。仿佛有人说过羡慕我的生活一类的话，这些情形他们是不会知道的。

说要走，说了两个星期了。一些朋友在路上遇见我就会问："怎么还在上海？"我除了"明天走"这句短短的答语外，就找不到第二句。的确我每天都是准备着"明天走"的。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明天"却捱到两个多星期以后了。

在一个黄昏里到北站送了卫夫妇上车回来，我同梅走着到中国旅行社去的马路。我们两个人都不熟习上海的街道，当时我并没有决定这个晚上就走，也没有决定就到中国旅行社去买车票，我们不过在那些比较平坦的马路上散步，谈谈那些许多时候以来折磨我们年轻的心的问题。

天色逐渐阴暗起来，我们却不觉得；灯亮了，我们也不觉得。在我们的眼前隐约地现出那光明美丽的未来的远景。我们到了北四川路的中国旅行社，我说："进去问问票子罢。"我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们就进去了。

“哪天走?”

“今天晚上。”

我没有踌躇地回答。出了门,我才想起:今天晚上就要走了。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把时间浪费在火车上、轮船中是一件怎样不幸的事情。

行李是临时收拾的,也花不了许多时间。周夫妇送我到车站时,不过十点多钟,可是火车要到十二点钟才开出。我是一个漂流惯了的人,本来用不着人送我到车站,但是周夫人说:“一个人走,冷清清的,没有人送,很可怜。”我也不能够拒绝他们。

在月台上我们找到了梅,他在那里等我,现在谁也不会觉得寂寞了。周提着我的藤包,我们上了车。

车厢里客人很少,有许多空座位。我从藤包里取出了薄被在长凳上摊开来,心里想一定可以畅快地睡一夜了。

平常朋友们在一起大家总有许多话谈,这时候我们对坐着,我却觉得说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让时间在沉默中过去,于是周夫妇下车了,于是梅也下车了。接着火车的轮子动起来,我的旅程又开始了。

车厢里的人突然加多了,我只好把薄被卷起来,睡觉的事成了渺茫的梦,这个晚上我就在人堆里糊里糊涂地混了一夜。对面一位乘客整夜开着窗,风就对着我吹,煤灰堆满了我的脸,使我的眼睛睁不开来。但也终于过去了。

第二天八点钟以前火车到了南京。天落着雨，早晨的空气很冷。但是我不得不跟着众人下车，冒着雨走到江边的轮渡上，拥挤在前舱里一张帆布篷下面。

小火轮一开，风就大起来，雨点全打在我的身上，我只得掉转身子，但是裤子却给打湿了。这狼狈的情形如果给朋友们看见，一定会引起他们发笑。

到了浦口，进了月台，我找不着火车，站在月台上只觉得身子冷。过了好些时候，终于看见火车来了。月台上突然热闹起来。在一阵拥挤之后，我进了三等车厢，在那里找到一个好座位，就高兴地坐下来，把藤包放在头上的架子上面。我的薄被又在长椅上摊开了。

火车在细雨蒙蒙中离开了浦口，时候是十一点钟。我没有留我的脚迹在南京，我是有遗憾的。在南京我有好几个朋友，我本来应该去看看他们，本来应该分出一些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但是雨把我阻止了。尤其使我挂念的是那个害肺病的朋友①和他的夫人。他最近还写信给我说："你的心灵的纯洁，生活的洒脱，只要在我得到一刻沉静的时候，我便追怀着你。我是渐埋渐深的成了一个泥人了。我常常希望着因为我有痼疾而早结束了我的生命。"去年我在北平承他款待了一个多星期，和他在一张床上度过了那些夜晚，听了他多少次的咳声和梦呓，我留下在颐和园买来的一对石球在那间公寓的小屋里就走了。我带走的他的印象到现在还没有褪色，依旧是

---

① 指散文作家缪崇群（1907—1945）。

去年那样地鲜明："心灵的纯洁"，只有他可以接受这个评语。但是没有人了解他。他如今在艰苦的生活的斗争里、社会的轻视的眼光下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我每次读着他那些混合着血和泪的散文，我的整个心灵都被扰乱了。我常常在心里狂叫着："他是不能够死的，他应该活下去，强健起来，去享受生活里的幸福。"但是谁能够使这愿望实现呢？

我的思想像车轮那样地转动着。雨却渐渐地小了。到了一个站，雨完全住了。天气依旧不好。我的心上的重压也没有减轻。但是火车又向前开行了，就像一只怒吼的饥饿的猛兽。

车里的客人并不多，好些座位都空着，一个人可以占据一张椅子。车是新的，而且洗刷得很干净，有百叶窗。我对面一个老客人不时地发出了惊讶的赞叹。

后来天气变好了，太阳从云里露出脸来。车窗外有树木，有田野，有山，但是我时时刻刻都记着我是往北方走了。

人一往北方走，就会觉得自己是一刻一刻地变老了，尤其是对于离开广东不久的我。见惯了南国的乡村，吃惯了南国的食物，呼吸惯了南国的空气以后，这感觉是特别锐敏的。南国的碧绿的榕树，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了。这里的一切景物都给罩上了古老的、沉重的暗影，我找不到一点南方的轻快、活泼的颜色。

津浦路沿途的车站是值得注意的。每个大站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样式，虽然同是西洋风味的旧建筑物，但没有两个是相同的，有的车站竟使人联想到教堂。

车上的生活很沉闷，很单调。乘客多的时候还可以看到

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去年那一次的旅行里我就看见了不少。譬如，一个老妇因为没有车票就被赶出车厢，在扶梯边的走廊上蹲着，让夜晚的冷风吹打。又如，一个土匪上车来捉一个替人送款的忠厚的农民，农民几乎被他拖下车去，却给一个车警来打救了，土匪就在火车行驶的当儿跳了下去。

这一次我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到什么值得注意的谈话。到了站，乘客上下，或者向小贩买食物，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两角钱一只烧鸡，一角钱几个梨子，这是最受人欢迎的食物。时间过得很慢，但是也很平淡地过去了。夜晚我幸运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晨醒来，火车已经过了济南。

窗外北方的平原是可爱的，虽然树木少，虽然只有一点光秃的山，但也可以给人引起另一种感觉。沉着、朴实，没有一点夸张，没有一点掩饰，北方的景物就像北方的人，他们沉默地挑起生活的担子，坚忍地跟困难斗争，一直到死不发出一声叫唤。

在山东境内某一个车站旁边，人们搭了草篷开“追悼大会”。会已经开过了，剩下来对联、供桌和遗像。据说追悼的是前次劫车中被害的车警。原来两个多星期以前，津浦车曾经在这附近给土匪抢过一次。

下午五点多钟火车到了天津东站。我在上海中国旅行社买票时，曾为了“东站”和“总站”的问题把卖票员麻烦了好一阵，那里只有到天津东站的车票，我当时却以为火车先到“东站”后到“总站”，现在才知道是我自己弄错了。

1933年9月在天津。

平津道上*

火车九点一刻从天津东站开出，我八点三刻以前上车，可是三等车里已经没有一个空位了。

头二等车厢里没有几个乘客，座位空着，让灰尘占据了那些柔软的皮垫子。隔壁是三等车厢，两扇门分隔了两个世界。三等车厢里的拥挤，叫人想象不到。我推开门，看见到处都是人头，耳边不用说是嘈杂的谈话声。窗户全关着，车厢里充满了热气和烟雾。

我提着一个藤包，走过一个车厢又一个车厢，在人丛中穿来穿去。倘使我看见一张准备给三个人坐的长椅上只坐了两个人，在那里停留一下，打算请那两位客人让给我一点地方，那时候就会有一些箭镞似的憎厌的眼光射在我的脸上、身上。要是我居然放下藤包，冒险说出请让一点地方的话，结果就会得到意外的答复："这儿有人。"

我只得拿起沉重的藤包往另一个车厢走去，心里想今天恐怕会"站"到北平了。

在最后一个车厢里，我终于找到了座位，在一张三人坐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现代》第四卷第一期。

长椅上坐下了。虽然那里已经铺了毯子，但是先来的一个客人并不拒绝我。

我在车上等了快半点钟，火车开行了。依旧没有人开窗，车里很闷热，到了总站，上来了两个客人(上车的自然不止两个，不过我只注意到两个)，于是那个坐在我对面的客人站起来坐到我这一边，把两个空座位让给他们，每一边各坐三个，身材差不多。对面中间坐的一个戴黑眼镜、穿长袍马褂、钮扣上挂着天津律师公会的证章。他借了我买的报看，他买了樱花糖吃，他还说中原公司的樱花糖比车上小贩卖的更便宜，更好。

车上忽然响起了京戏中青衣的尖声，就在我们的后面。好些人站起来伸着头往后面一个角落里看，律师和他的两个朋友也不是例外。他们带笑地接连说："话匣子。"我知道北方人口里的"话匣子"就是留声机。

律师的朋友离开了座位，又走回来。他说："他们一定是考学校落了第的。"

"他们多半考戏剧学校罢，"律师很聪明地说。

"他们有话匣子，一定是有钱人。有钱人的子弟不会用功念书的，"律师的朋友这样地发议论。

律师微笑了。他那一对在黑色镜片下面闪烁的眼睛有着什么样的表情，我看不出来。

我站起来，走到那个角落里去看"话匣子"。这个东西在两个学生中间占了一个座位，机器转动，唱片也转动，戏一出一出地接连唱下去。学生，一个穿长袍，一个穿西装，我看不

出他们是不是去投考戏剧学校的。

我回到座位上来，车已经走了好远了。窗外的景象很荒凉，好些田地被水淹没了。几棵树孤单地立在水里，水上飘浮着枯草，人在田里撑船，人还下了网在田里捕鱼。

时间似乎过得很慢，车厢里依旧很闷热。我把我带在身边的一本斯托姆的《迟开的蔷薇》[①]翻开来读，从昨天在津浦车上中断的地方继续读下去：

> 龙骨在水上滑动。在寂寞的正午，伊莎德坐在甲板上。夏天的风吹拂着她的金发；可是泪珠充满了她的眼睛。她悲伤地思念家乡，又恐惧地想到异邦的景象，到了那里她就应该做老王的妻子。特列斯坦想安慰她，却被她拒绝了；她恨他，因为他杀死了她的叔父莫洛特。
>
> 空气闷热，她口渴了。舱房里有“爱的药酒”，这是准备用来燃起伊莎德对老新郎的情焰的。一个年轻的宫女说：“看，这儿有酒！”特列斯坦无心地顺手把酒杯递给了王后。

这是哥特弗利特[②]的名著《特列斯坦与伊莎德》里面的故事，是十三世纪的作品了。特列斯坦替舅父马克王亲迎王后伊莎德，陪伴她坐船回国，在船上因为“爱的药酒”的魔力，两个人发生了恋爱，悲剧就这样地产生了。

---

① 《迟开的蔷薇》：《茵梦湖》作者的短篇小说，原名“Späte Rosen”。

② 哥特弗利特·冯·司特拉斯堡：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的德国诗人，《特列斯坦与伊莎德》这首长诗还没有写完，哥特弗利特就死了。

她踌躇地端起杯饮，她的心很沉重，

她把杯递还给他，他也饮了杯中的酒滴。

的确正如斯托姆所说，我也看见古诗人的魔力在散布了，这样的诗句使我也生活在书本里面。我听不见了青衣们的戏，因为“话匣子”已经哑了。许多人垂着头在打盹。车里的空气也很闷热。火车不停地向前跑，发出单调的叫声。七百年前的诗人的图画像薄雾似地慢慢地升了起来。

我仿佛看见那一对年轻爱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肩并肩地靠在船边，眼睛望着水面，沉醉地谈着奇怪的话，谈着海和雾，谈着风和水，还谈着许多渺茫的远方的事情。

我也仿佛饮了魔术的酒了。这诗篇好像给我唤醒了另一个世界，我在生活里简直没有注意到它，就让它沉睡了这许多年。但是现在德国的古诗人却逼着我跟着特列斯坦和伊莎德去接受他们的命运了。

“爱的药酒”证实了它的效力，美丽的伊莎德和特列斯坦不能够彼此分离了。做舅父的老王把他的外甥和他的王后流放到远方去。这一对爱人就给古诗人引入无人迹的荒地去了。

空气闷热，我的心也渴了。“爱的药酒”的魔力继续发展下去：

没有人窥探他们的踪迹。太阳照耀着。草放出了芳香。广大的荒原上就只有他们两个人。陪伴他们的还有微语的森林和隐身在高空的小鸟的歌唱。他们浴着夕阳在草原上徘徊，听着冷泉的声音；他们坐在菩提树下回头

望那个岩洞，那儿就是他们过夜的地方。早晨太阳一出，他们就起身骑着马驰过露湿的荒野，手里握着弓箭，两匹马紧紧靠着，伊莎德的金发拂着特列斯坦的肩头。

慢慢地，慢慢地那一对年轻爱人唱着爱之高歌骑着两匹白马向远方走去，消失在露湿的草原的深处去了。我仿佛看见茂盛的野草吞食了他们。但是伊莎德的金发还在我的眼前荡漾。草原的香气包围着饮了药酒的我。

我的眼睛呆呆地望着远处，望着窗外的枯黄的高粱，火车单调地叫着。于是列车进了站，在丰台停了。

"离北平只有三十里了，"律师的朋友说。

"明年我不到青岛就要到上海去，"律师说，上海两个字似乎是想了好久才说出来的。

"要是带了嫂子去，至少要花五百洋钱，"律师的朋友羡慕地说。

"要是两处都去不成，我明年一定到济南府去，"律师坚决地说。

"济南府没有什么好玩，"朋友这样地接下去。

又提到律师的儿子，律师说给这小孩起名叫"桐林"，因为他五行缺木。

于是律师又一次微笑了。那对神秘的黑眼睛突然变大起来，给我遮住了一切。茂盛的草原，伊莎德的金发全没有了，我的手里只有一本破旧的小书，我并不曾饮过"爱的药酒"，我不过在混乱的现实里做了一个梦。先前我是拿幻梦欺骗了

自己。

我用力抖了抖身子，为了证明我已经从梦里醒了过来。我把眼睛掉向四处看，都是些受苦的黄脸。没有美人伊莎德，没有勇士特列斯坦。“爱的药酒”是不存在的。它不能鼓动我的心。我的心已经献给一个巨大的斗争了。

我埋下头看手里的破书，书页已经给我翻破了，因为这些时候我就拿了它来温习德文。这一本破书能够有什么力量呢，为了唤起那个已经给我埋葬了的世界？我把小书放回在衣袋里。我说我以后不要再读它了。

啊，青春啊！美丽的蔷薇花开的时候。

我念着书里的最后一句诗，我并没有感伤，因为我知道我的青春是不会消失的。

火车已经进了城，乘客中起了一阵骚动，再过一会儿，在十二点零七分的光景，火车进了正阳门车站。

1933年9月在北平。

亚丽安娜·渥柏尔格*

想不到我会在故都遇见成，更想不到会从他的口里听见亚丽安娜这个美丽的名字。

三年前的冬天我从温暖的南国回到了上海，住在闸北宝山路一个阴暗的亭子间里。在一个阴雨的早晨，我想起了在巴黎遇见的那个波兰女郎，一股火焰在我的心里燃起来。我的心没法平静下去，我的回忆要我写。我就写了那篇题作《亚丽安娜》的短篇小说。

在那篇小说里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事实。亚丽安娜就是那个波兰女郎的名字，吴是我的一个朋友，金自然是我。那时我到巴黎不久，吴和亚丽安娜就因为所谓国际大会的事情被法国政府驱逐了。这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到吴的房里去，接着亚丽安娜和她的男朋友杭可来了。据说杭可就是她的爱人。他们跟吴谈了许多话，神情很紧张。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那天的大会被警察解散了，警察还查看了每个到会的人的居留证。严厉的处罚在等着他们，这是不会久待的。我看出来他们都没有恐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

惧，尤其是亚丽安娜，她在谈话时候常常露了笑靥。我注意地看她，这是一个身材细小的女郎。她有一头浓密的金丝发，两只蓝色的大眼睛，一张红红的圆脸。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波兰少女所常有的。吴告诉过我，她刚刚二十岁。

第二天侦探到旅馆里来搜查吴的房间。后来听说亚丽安娜的房间那天也被侦探光顾过。以后几天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于是一个早晨，吴突然被传到警察厅去，领取驱逐出境的命令，缴还居留证，给人强迫着打了手印，照了像，限期三天内离开法国。许多人都得到同样的处罚，亚丽安娜自然不是例外。

吴从警察厅回到旅馆来就忙着写信，又忙着出去会朋友。亚丽安娜来了，她送来写给吴的信。从那封信里我们知道她要回到波兰去。波兰虽是她的故乡，然而她是一个被通缉的人。她要是在波兰给人捉住，至少得关上好几年。我们不愿意她回去，但是又没法阻止她。吴自己的悲哀也是很大的。他写给好些法国朋友的告别信上都说："我要离开法国了，我爱这个地方，而且我永远爱它。"我的悲哀也很大，失掉了这些朋友，我在巴黎的生活就更寂寞了。

吴读了亚丽安娜的信，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用他那忧郁的眼光看我。他感到寂寞的时候，他常常是这样的，我知道。第二天下午吴就约我去给亚丽安娜送行。在第六区的一家旅馆里，我们找着了她。除了亚丽安娜外我们还看见两个年轻的女人。这一次会见的情形，倒有点像我在小说《亚丽安娜》中所描写的，但是小说里只有一部分是真的事实。小说里提

到我们把亚丽安娜送到火车站。事实上，我们送她到一个朋友住的旅馆，就跟她分别了。

分别的时候，吴把手里的小皮箱交还给亚丽安娜，我也把手里提的递还给她。我们紧紧地握了手，三个人望着，大家微微一笑，不说 au revoir，却说了 adieu。那时候我的心情是没有文字、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我觉得热情在我的身体里满溢，要奔放出来，要把我的全身胀破。

我和吴痴痴地立在人行道上，望着亚丽安娜的背影在旅馆的大门里消失了。

“金，我们到赛纳河边走走罢，”吴忽然用留恋的声调说，“巴黎是很可爱的，可是我后天就不得不走了。”

我能够拿什么话来安慰吴呢？我并不像吴那样爱巴黎，然而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吴的心情。我不能不回答他。我就说：“不要紧，法国政府会收回命令的。不然你到了比国还可以偷偷地回来。”因为这时候巴黎几个进步的律师正在向警察厅交涉，要求延长执行驱逐令的期限。

“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在巴黎监狱里绝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人理他们。你想我们的事情有希望吗？”吴大声说，声音里充满了悲愤。

是的，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的事情，这时候正激动着全巴黎的良心。他们没有什么罪名，不过是西班牙国王亚尔丰琐的仇敌，亚尔丰琐到巴黎来，他们就给法国警察逮捕了，他们的两百多个同乡就被驱逐出境，说是为了保障西班牙国王的安全。但是亚尔丰琐回国以后，忽然从阿根廷送来了公文，说

他们在那里犯了普通的刑事罪，要求法国政府引渡他们。为了反抗这种法律的谋害，他们就在狱中实行同盟绝食。这件事情就跟轰动全世界的沙柯、樊宰底的事件一样。刚刚在几天前，美国的绅士们最后一次判决了沙、樊两人的死刑，准备结束那六年来的激烈的斗争。

整个的西方世界似乎都沉沦在反动的深渊里了，到处充满着压迫、苦恼、流血，我们就看不见一线光明（自然光明是有的）。我们的年轻的心被寂寞、被离别的情绪所苦恼着。

赛纳河畔的情形跟平日没有两样，长排的旧书摊，扰攘的行人，圣母院的钟楼……可是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所看见的只是我的心，我所听见的也只是我的心。

"我们到圣母院里面去看看。我在巴黎住了这几年，还没有到钟楼顶上去过，"吴的交织着留恋和悲哀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我抬起头来，才注意到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我们正迎着它们走。那两个钟楼，我知道，雨果的小说里的教士就是从钟上面跌落到街心来的。圣母院，我还记得，在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大概是爱利·邵可侣的日记罢）里说过当时有人在圣母院里面发现了几百具因奸情被杀害的贞女的尸体。而且我在拉丁区的旅馆里，还整天整夜地听见从那里送出来的钟声。

"好罢，"我这样应着，就跟着吴走到那里去了。我们进了大门，从下面沿着阶梯一直走到最高的钟楼顶上，我没有说一句话。

“看，巴黎是这样美丽的！”吴站在石栏杆前面，望着下面整齐的、模型似的街道说。

他这时候的心情，我想我是能够了解的。我也把眼睛望下面：这里是赛纳河，一道一道的桥横架在河上，河里有船经过，烟囱不断地一伸一曲；那里是圣米雪尔大街，车辆和行人就像玩偶似地在那里移动。我的眼睛好像在看一幅图画。但是画面上四处都摆了那张同样的少女的面孔，一头金发给那张面孔镶了金边。那个波兰女郎的面影又占据了我的脑子。接着我又想到那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艰苦的斗争，和我们已经付出了的代价。我忽然流下了眼泪来。

这并不是悲哀的眼泪，就在那时候我也不是绝望的。我想到过去的斗争和牺牲，只有感激。我愿意把我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自由的祭坛。我心里的牺牲的火给那个波兰女郎点燃了。

这一天终于过去了。亚丽安娜没有走，吴也没有走。法国政府并未撤消驱逐的命令，不过将期限延长了一些时候。起初是一月，以后又是一月，这其间杭可先回到了波兰，亚丽安娜搬到巴黎郊外霞微尔去住了一些时候，和吴发生了像我在小说里所描写的爱情。但是不久她就离开了巴黎，那时我已经在哀斯纳省了。再过两三个月，吴也就动身回国。等我再到巴黎的时候，亚丽安娜的名字已经没有人提起了。

那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就像流星似地飞下天际不见了。后来我回到中国，见到吴，连吴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那还是一九二七年的事情。谁知六年后的今天，亚丽安

娜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了的时候，成却无端地提起她来，而且从他的口里我又知道了下面的事实，也就是我所想知而未知的她的身世。

“我还为她写了一首诗。那时她正患肺病躺在蒙伯里城的医院里。”成用一种充满怀念的声音开始了他的叙述。我们正在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走着。

他的话像一阵狂风吹起了我心里的波涛。那激动，那惊讶，我找不出话来形容。

亚丽安娜有了下落，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像她那样活泼的少女会患肺病，我不相信。

“她读了我的诗，就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

“这封信在什么地方？可以给我看吗？”我听见说有这样的信，就忍不住打断了成的话。

“我留在巴黎了，那是一封很动人的信，”成叹息地说。我的喜悦又被他的话赶走了。

“她的身世你知道吗？”成忽然改换语调问道。

“我不知道，”这几年来我想知道她的身世，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她生长在华沙，是一个很聪明的女郎，她成熟得很早，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社会运动。最初唤醒她的人是一个青年学生。她爱他，就做了他的情人。但是打击来了，她所敬爱的人死在华沙的绞刑台上。”

成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曾在欧洲各国的革命者和亡命者中间生活过，他叙述这

些事情，绝不能够没有一点感动。

“她自己说：‘从此我就把爱的门关上了。任凭什么人来叩门，我也不给他打开。这许多年我就不曾为谁开过这扇爱的门。’

“她接着又说：‘然而人生也需要快乐。我们这种人不会有长久的生命。我活着就有享受快乐的权利。所以我要找男人。跟我发生过关系的男人不止一个。但是说到爱情，那只是一场梦。我不需要任何男人的爱情。我爱过的就只有那个死了的学生，他是我最初的爱人，也是我最后的爱人了。’……”

成说到这里，声音有些苦涩了。我知道是过去的事情搅乱了他的心。那个波兰女郎的灵魂的一隅曾经为他开过，现今又因为他而在我的眼前打开了。我觉得我现在更了解她了。

“她的回信里还说：‘我爱你的诗，不爱你这个人。’我后来写过好几封长信给她，她回信都说：‘我谢谢你的信，我真爱你的信。’她永远不说爱我这个人的话。后来我不写信了。她却常常来信叫我不要对她残酷。我临走时，她说不到车站送我，可是我一到车站，她已经先到了那里等我了。她对我说：‘成，我不爱你。我不能够为你打开爱的门。’然而我却用一颗炸弹把那扇门给她炸开了……”成不能够再说下去，他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这一次我并没有流泪。但是我却在心里哭了。我没有悲哀，没有怜悯。不，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扮演过这样的悲剧么？我们不是都为了某种原因就把爱的门关闭了么？牺牲是不会

完结的。我们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最宝爱的东西献到那个祭坛上去。亚丽安娜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她一生已经给人留下不少"含泪的回忆"了。这眼泪是感激的眼泪，这是灌溉灵魂的春雨。

"回国以后我就没有跟她通过信了。你知道她如今在什么地方？你有她的通信地址吗？"过了一会儿，成忽然怀着希望地问我。

"我不知道，我正要问你呢！"我的回答不仅赶走了成的希望，同时也把我自己的希望毁灭了。

像一股电光，亚丽安娜的面影在我的眼前一亮，但是马上又消灭了。

肺病、医院、学生、爱的门，这些字眼轮流地在我的脑子里打转。我的脑子开始痛起来。我无意间把眼睛掉向街心看，恰恰吹来一股风，灰尘就迷住了我的眼睛。

"你还记得她的姓吗？……渥柏尔格，亚丽安娜·渥柏尔格。"成的充满怀念的声音依旧在我的耳边温和地响着。

晚上我在成的家中读了他为亚丽安娜写的诗，回来在寄寓里做了一个梦：我在一份法文杂志上看见了亚丽安娜在华沙受绞刑的消息，杂志上有她的照片，也有她的信札，就是那封给成的长信。在信里果然有这样的话：

> 我把爱的门关上了。任凭什么人来叩门，我也不给他打开。

于是我醒过来了。时间是在半夜。房里静得跟坟墓里一

样，暗得看不见墙壁，外面只有风声。风吹得树叶响，就像在落雨。寂寞和凄凉的滋味捣着我的心。我躺在床上，铺盖压住我，使我不能够动弹，我仿佛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绝望地念着亚丽安娜的信上的话。我绝望地问："她果然还活在人间吗？她果然还会回到我们中间来吗？"没有人回答我。

我知道梦里所见的只是幻象。但是这一刻我却不能不祈祷着她安全地回到我们中间来。假若她还活着的话，我愿风把我的祈祷带到她的梦里去，让她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带着感激的眼泪在怀念她。

1933年。

一个车夫*

这些时候我住在朋友方的家里。

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雨已经住了，天空渐渐地开朗起来。傍晚的空气很凉爽。方提议到公园去。

“洋车！洋车！公园后门！”我们站在街口高声叫道。

一群车夫拖着车子跑过来，把我们包围着。

我们匆匆跑上两部洋车，让车夫拉起走了。

我在车上坐定了，用安闲的眼光看车夫。我不觉吃了一惊。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一个瘦小的背影。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我估计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四。

“小孩儿，你今年多少岁？”我问道。

“十五岁！”他很勇敢、很骄傲地回答，仿佛十五岁就达到成人的年龄了。他拉起车子向前飞跑。他全身都是劲。

“你拉车多久了？”我继续问他。

“半年多了，”小孩依旧骄傲地回答。

“你一天拉得到多少钱？”

“还了车租剩得下二十吊钱！”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一期。

我知道二十吊钱就是四角钱。

“二十吊钱，一个小孩儿，真不易！”拉着方的车子的中年车夫在旁边发出赞叹了。

“二十吊钱，你一家人够用？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方听见小孩的答话，也感到兴趣了，便这样地问了一句。

这一次小孩却不作声了，仿佛没有听见方的话似的。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想大概有别的缘故，也许他不愿意别人提这些事情，也许他没有父亲，也许连母亲也没有。

“你父亲有吗？”方并不介意，继续发问道。

“没有！”他很快地答道。

“母亲呢？”

“没有！”他短短地回答，声音似乎很坚决，然而跟先前的显然不同了。声音里漏出了一点痛苦来。我想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我有个妹子，”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说出来；“他把我妹子卖掉了。”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这个“他”字指的是什么人。我知道这个小孩的身世一定很悲惨。我说：

“那么你父亲还在——”

小孩不管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他抽白面，把我娘赶走了，妹子卖掉了，他一个人跑了。”

这四句短短的话说出了一个家庭的惨剧。在一个人幼年所能碰到的不幸的遭遇中，这也是够厉害的了。

“有这么狠的父亲！”中年车夫慨叹地说了。“你现在住在

哪儿?”他一面拉车，一面和小孩谈起话来。他时时安慰小孩说:“你慢慢儿拉,省点儿力气,先生们不怪你。”

“我就住在车厂里面。一天花个一百子儿。剩下的存起来……做衣服。”

“一百子儿”是两角钱,他每天还可以存两角。

“这小孩儿真不易,还知道存钱做衣服。”中年车夫带着赞叹的调子对我们说。以后他又问小孩:“你父亲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不敢来!”小孩坚决地回答。虽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含的怨气却很重。

我们找不出话来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思索过。在我知道了他的惨痛的遭遇以后，我究竟应该拿什么话劝他呢?

中年车夫却跟我们不同。他不加思索，就对小孩发表他的道德的见解:

“小孩儿，听我说。你现在很好了。他究竟是你的天伦。他来看你,你也该拿点钱给他用。”

“我不给!我碰着他就要揍死他!”小孩毫不迟疑地答道,语气非常强硬。我想不到一个小孩的仇恨会是这样地深!他那声音，他那态度……他的愤怒仿佛传染到我的心上来了。我开始恨起他的父亲来。

中年车夫碰了一个钉子，也就不再开口了。两部车子在北长街的马路上滚着。

我看不见那个小孩的脸,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从他刚才的话里,我知道对于他另外有一个世界存在。没有家,没

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然而他能够倔强！他能够恨！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不害怕，不悲哀。他能够做别的生在富裕的环境里的小孩所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

生活毕竟是一个洪炉。它能够锻炼出这样倔强的孩子来。甚至人世间最惨痛的遭遇也打不倒他。

就在这个时候，车子到了公园的后门。我们下了车，付了车钱。我借着灯光看小孩的脸。出乎我意料之外，它完全是一张平凡的脸，圆圆的，没有一点特征。但是当我的眼光无意地触到他的眼光时，我就大大地吃惊了。这个世界里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对眼睛里，我找不到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骄傲、这么倔强、这么坚定的眼光。

我们买了票走进公园，我还回过头去看小孩，他正拉着一个新的乘客昂起头跑开了。

1934年6月在北平。



生之忏悔

《生之忏悔》，一九三六年三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前　记*

这本小册子① 应当是我的忏悔录的一部分罢。

我常常想，我第一次拿起笔写文章，那就是我的不幸的开端，从那时起我开始走入迷途了。以后一误再误，愈陷愈深，终至于不可收拾。于是呻吟，呼号，自白，自剖都由我的笔端泄了出来。发泄以后便继之以沉默，这其间我很想挽回以前的错误。

几年来我编印了好几本小说和随笔。但拿杂文来说，这却是第一部。其实我所写的杂文原不只此，但是有一些我自己也已无法见到了，即使见到我也未必完全同意当时的论调。现在将这里的一部分杂文集起来付印，也无非希望一些厚爱我的读者由这小书多了解我一点。

这本小书虽然出于一个无学者的手笔，但决非我一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它也可以代表一部分年轻人的思想，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水星》第一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生之忏悔·题记》。

① 这本小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搁了一年半，才印出来。全书分五部，共收散文、评论、序跋等二十六篇，其中有两篇已经作为序文印在小说集里面了。现在编印《文集》，我又删去评论、序跋等十二篇，只保留了十二篇散文、序文和类似小说的东西。（一九六一年注）

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而且至今还没有脱离他们的圈子。让他们来判断我和我的书罢，我诚恳地把它献给他们。

巴　金 1934年11月在上海。

我 的 心*

近来不知道什么缘故这颗心痛得更厉害了。

我要向我的母亲说："妈妈，请你把我这颗心收回去罢，我不要它了。记得你当初把这颗心交给我的时候，你对我说过：'你的爸爸一辈子拿了它待人，爱人，他和平安宁地过了一生。他临死把这颗心交给我，要我将来在你长成的时候交给你，他说："承受这颗心的人将永远正直，幸福，而且和平安宁地度过他的一生。"现在你长成了，那么你就承受了这颗心，带着我的祝福。到广大的世界中去罢。'这几年来我怀着这颗心走遍了世界，走遍了人心的沙漠，所得到的只是痛苦，痛苦的创痕。正直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和平在哪里？这一切可怕的景象，哪一天才会看不见？这一切可怕的声音，哪一天才会听不到？这样的悲剧，哪一天才不会再演？一切都像箭一般地射到我的心上。我的心上已经布满了痛苦的创痕。因此我的心痛得更厉害了。

"我不要这颗心了。有了它，我不能够闭目为盲；有了它，我不能够塞耳为聋；有了它，我不能吞炭为哑；有了它，我不能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平等月刊》第二卷第三期。署名P.K.。

够在人群的痛苦中找寻我的幸福；有了它，我不能够和平地生活在这个世界；有了它，我再也不能够生活下去了。妈妈，请你饶了我罢，这颗心我实在不要，不能够要了。

“我夜夜在哭，因为我的心实在痛得忍受不住了。它看不得人间的惨剧，听不得人间的哀号，受不得人间的凌辱。它每一次跟着我游历了人心的沙漠，带了遍体的伤痕归来，我就用我的眼泪洗净了它的血迹。然而它的伤痕刚刚好一点，新的创痕又来了。有一次似乎它也向我要求了：‘你放我走罢，我实在不愿意活了。请你放了我，让我把自己炸毁，世间再没有比看见别人的痛苦而不能帮助的事更痛苦的了。你既然爱我，为何又要苦苦地留着我？留着我来受这种刺心刻骨的痛苦？’我要放走它，我决心让它走。然而它却被你的祝福拴在我的胸膛内了。

“我多时以来就下决心放弃一切。让人们去竞争，去残杀；让人们来虐待我，凌辱我。我只愿有一时的安息。可是我的心不肯这样，它要使我看，听，说：看我所怕看的，听我所怕听的，说人所不愿听的。于是我又向它要求道：‘心啊，你去罢，不要苦苦地恋着我了。有了你，无论如何我不能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了。请你为了我的幸福的缘故，撇开我罢。’它没有回答。因为它如今知道，既然它已被你的祝福系在我的胸膛上，那么也只能由你的诅咒而分开。妈妈，请你诅咒我罢，请你允许我放走这颗心去罢，让它去毁灭罢，因为它不能活在这样的世界上，而有了它，我也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有了这颗心以来，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

理想中的英雄。到而今我的爱被人出卖，我的幻想完全破灭，剩下来的依然是黑暗和孤独。受惯了人们的凌辱，看惯了人间的惨剧。现在，一切都受够了。可是这一切总不能毁坏我的心，弄掉我的心，因为没有得到母亲的诅咒，这颗心是不会离开我的。所以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的缘故，请你诅咒我罢，请你收回这颗心罢。

"在这样大的血泪的海中，一个人一颗心算得什么？能做什么？妈妈，请你诅咒我罢，请你收回这颗心罢。我不要它了。"

可是我的母亲已经死了多年了。

1929 年春在上海。

《灭亡》作者底自白*

一　我底思想与杜大心

谭正璧君在他底《中国文学进化史》里说我是新写实主义一派，另外一位先生在《新文艺月刊》上却说："巴金思想的立场是安那其主义的。"而《现代小说》的刚果伦君又说："这是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的创作。"毛一波君在《真美善》上则说杜大心"似乎是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阿志跋绥夫的虚无主义的人格化"。从这些批评家的文章看来，我连自己底思想究竟是什么似乎也不能确定了。其实问题很简单。这部创作里面的主人公并不是上述的几种主义中某一种主义之人格化。这是很显然的：杜大心底思想近于安那其，但严格说来他不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底思想近于虚无主义，但他不是个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不是唯物论者，不是实在论者；他底思想近于个人主义，但他不是个人主义者。杜大心底思想里面含得有不少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一直存在下去，崔皎君说得好："等到这矛盾止了的时候便是杜大心毁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开明》月刊第二十二期。

灭的时候。"我承认，我底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思想确实是那样，而且也矛盾得很厉害。但是现在我底主张就和杜大心底主张不同了。我写杜大心底思想时完全采取客观的态度，我并不曾把我自己底思想完全放进去。我虽然并不是杜大心底信徒，但是我爱他。我自信我对他的态度是公平的，我写出他底好处，同时我也写出他底弱点。不过像刚果伦君底批评却有点不公道。他说杜大心"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他是以工作抑止自己的苦闷，以革命发挥个人的理想"。我承认杜大心"是一个罗曼谛克的革命家"，而且他还是一个病态的革命家。但要说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不正确，就未免太冤枉他了。他之所以为罗曼谛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恶人类，一是由于他底环境，二是因为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他参加革命是一件事，他以工作抑制自己底苦闷又是一件事。他并不是为了抑制自己的苦闷才来参加革命的。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东西，而有肺病的人更是多感的。杜大心参加革命之后，他不能就变成一部机器。他底环境依然使他苦闷，但是他并不幻灭，并不放弃一切，当然只有拿工作来抑制自己的苦闷了。我当时也曾得到一个国内朋友底信，他说他很痛苦，日来"以忙为醉"。这不也是和杜大心一样吗？至于杜大心底死亡，我以为这是必然的，刚果伦君说："仅止因着一个朋友的被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报仇，……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态度。"这是不错的。不过他如果再深思一下，他一定会明白杜大心底面前只有死这一条路。一个憎恶人类、憎恶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被杀，就是自杀，并没第

三条路可走。何况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复仇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底第二期的肺病使"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的苦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事实上在他，也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着安静的幸福"。俄国政治家拉吉穴夫在青年时期中有一个同学得了不治之症，那个人叫拉吉穴夫拿毒药把他毒死，拉吉穴夫不答应，却在自己底日记上写道："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毁掉。"他自己后来也自杀了。杜大心"知道他自己在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当然会采取用暴力毁掉生命的这一条路。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

二　第二十一章以后

《中学生》底读者黄叶君"有个朋友看完《灭亡》后，说'第二十一章以后就不好了'"。事实上第二十二章在本书内是非常重要的。我把我自己底希望寄托在这一章上面。在前面的二十一章里，我根据自己底一些痛苦经验抹杀了群众底力量（这个弱点连刚果伦君也未指出）。固然看杀头叫好（这与迷信有关）的事实，我没法否认，然而我自己依然觉得中国民众是可爱的、有望的，他们底无知，不能说是他们底错，而且这也是可以补救的。所以为了对于中国民众保持公平的态度起见，我在第二十二章里留下了希望，说到四年后的胜利，同时给我的三部曲中的《新生》和《黎明》开了端（《新生》是李冷底

日记，《黎明》是李静淑底历史)。

三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我活了二十几年。我生活过，奋斗过，挣扎过，哭过，笑过。我在生活里面得到了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并不是事先打定主意要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要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在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我写的时候，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我不是因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我是为了自己(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是写给我底哥哥读的)，为了倾诉自己底悲哀而写小说。所以读者底赞许与责骂，我并不在乎。不过我希望批评家多少了解我一点。

1929 年在上海。

我的自剖*

——给《现代》编者的信

你批评《复仇》集的文章我读了两遍。我佩服你的批评的态度，但是我觉得你并不了解我。有些地方你的确说出了我的弱点，譬如你说我避难就易地在手法上取巧，常用第一身讲述故事的形式，这是我没法否认的。我的确"取了巧"，但这并不是故意的。我写文章，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我没有时间想到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是为了申诉，为了纪念才拿笔写小说的。《复仇》集中的十五篇小说里，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我的朋友，都保留着我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今天我翻读这本书，还会产生一种温情，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这样我就决不能够承认你所说的"中国作家写外国题材……只能说是因袭"和"凭书本，凭想象，凭皮毛的见闻"的话了。

我觉得当你说"《复仇》里所表现的'人类共有的悲哀'……却偏偏是中国人所万万不会有的悲哀"时，你并不了解我在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发表时题为《作者的自剖》。

《复仇》集自序中写的那段话的意义。我明白地说过，人类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失去了这一切以后所产生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这对于中国人无论如何决不会是例外的。而且现在的中国人与欧美人比起来，他们失掉青春，生命，活动，爱情的机会只有更多。就譬如你以为“坡格隆”① 和“亡命”很难为中国人所理解。而实际上我的许多朋友却正被那样的悲哀所苦恼着。并且你如果离开编辑室到租界上去走走，或者最好能到这里② 的租界上来看看，你就会明白在今天的中国，的确有不少人感到坡格隆时代犹太人所感到过的悲哀了。他们感到了悲哀，或者盼望着有一天日子会变过来，但是他们的思想阴暗，找不到出路。我得承认，我的小说也没有给人指一个出路，虽然席瓦次巴德(在《复仇》里我却改成福尔恭席太因这个假姓)在巴黎刺杀“坡格隆”的一个主持者白俄将军彼特留拉是事实，那经过情形正如我在另一篇小说《海的梦》里所描写的那样。至于其它十几篇小说，不但题材对中国人并不怎么生疏，而且有几篇小说的真实主人公还是中国人呢!

我的短篇小说的另一个缺点应该是：结局常常很阴暗，没有给读者指示一条出路。有几个朋友常常因此责备我。我承认这个过失。但是我也想在这里分辩一下。我虽然有信仰，

---

① “坡格隆”：对犹太人的有组织的屠杀。

② 这里：指天津。

但我并不是说教者，我不愿意在每篇文章的结尾都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而且实际上那些真实的故事往往结束得很阴暗，我不能叫已死的朋友活起来，喊着口号前进。我只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的牺牲者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他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也许有些人会憎厌地跑开，但是聪明的读者就不会从这些伤痕遍体的尸首上看出来一个合理的制度的新生么？

我的短篇小说除了上面的两个缺点外，自然还有别的。我并不想替自己掩饰。但是我得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些缺点，又为什么不能够避免它们。而且我也不能如你所期望，"把对于量的重视转移到质一方面去"。因为我和你不同，我不是一个艺术家，同时也不想做一个艺术家。我也爱读你的《将军的头》，而且也为里面某一些奇丽的图画所感动，但是我写不出它们，同时也不想写它们。我太热情了，并且还有一种比艺术更有力的东西吸引着我，它随时都会把我拉去使我完全抛弃文学的制作。我时时刻刻都在和它战斗，但时时刻刻都准备对它屈服。我的生活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的。我有时候拚命写作，有时候又感到果戈理焚毁《死魂灵》原稿时的心情。结果我并没有焚毁什么原稿，却反而更努力地写作，为的是害怕明天我会抛弃艺术，害怕明天我会亲手割断自己的文学的生命。这就是我近年来"多量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还要指出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缺乏一个艺术家的素质，我不能把小说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制作。我写文章的时候常常忘记了自己，我简直变成了一个工具，我自己几乎没

有选择题材和形式的余裕和余地。正如我在《光明》集序里所说：这时候我自己不复存在了。我的眼前出现了黑影。这黑影逐渐扩大，终于变成了许多悲惨的图画。我的心好像受了鞭打，很厉害地跳动起来，我的手也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动。许多许多人都借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了。朋友，假若你能够看见我对着那张堆满书报和破纸的方桌，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坐下去，接着又站起来，或者蜷伏在沙发上那样激动地写作的情形，你想我会有希望写出像你的《将军的头》那样细致、华美的作品么？你想我还能注意形式、布局、焦点等等么？我自己差不多是不能够自主的。一种力量驱使着我，使我在“多量生产”上得到满足。我没有方法抗拒它，这在我已经成为习惯了。在艺术家的你们看来，这也许是可悲的事情。便是我自己有时也为这个惋惜，然而我也没有办法。我这一生就是被矛盾的网掩盖着的，而且就是在矛盾中挣扎下去的。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像你现在这样写下去是没有几年的功夫好写的”，这就是说我的文学的生命不会长久。他好像为我惋惜。我自己也明白这个，而且也不能不感觉歉然。但是我仔细一想，我又反而高兴起来了。因为要这样我才可以下决心抛弃艺术，而没有牵挂。在艺术方面失了生命，在另一方面我就会得到新生了。我知道另外一些朋友是这样在替我祈祷的，他们很早就不赞成我写小说。

但是那些爱好文学的朋友却并不了解我的苦闷。他们常常逼着我把那些艺术上不成熟、但里面却充满着我的热情的作品交给他们发表。那些朋友是属于各方面的，甚至不同的

党派的，所以我的作品就常常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了，终于到了多得使人讨厌的地步。但是我又有什么好办法呢？都是我的朋友，给这个朋友的杂志写文章而不给那个朋友的刊物写，是不行的。为了这个得罪朋友也有些不值得（其实我已经这样得罪过一两个朋友了）。所以我最后的决定还是：尽量地写罢，趁着我还有精力和机会的时候。也许我的作品会跟着我消灭，也许它们甚至比我先消灭，这对于我都是没有关系的。灭亡于艺术，也许就会新生于别方面，或者会应验塞翁失马的谚语也未可知。我的努力写作也许就正是趋向于在艺术方面灭亡的一条路。不过可悲的是将来会有人把我列入×××[1]先生之流，以为我是在开什么著作公司，或者想从小说方面发财。"多产作家"这几个字已经使人够受了。况且连你的批评文章里对于每月写四五万字的我，也用了"生产的多量和迅速"这些使人难堪的字眼！这些字眼常常使读者嗅到钱的气味，他们也许不会知道为了友情没有稿费也会写文章的事情。现在不是已经有什么小报在说我为各杂志写小说是在贪图巨额的稿费么？……

1932年秋在天津。

---

① ×××：指张资平（1893—1959），后来做了汉奸。

我的呼号*

——给我的哥哥

你的车七点钟开，我不到六点三刻就离开了月台，我并不是害怕赶不上轮渡，小火轮要到七点二十分才离开浦口。你也许注意到了罢，临行我只和你松松地握了握手，淡淡地笑了笑就转身走了，我不曾回头再看你一眼。可是出了车站我却不肯走向江边，我和惠生①一起在长廊上慢慢地走着，我们往返地走了好几次。我们彼此都不说话。突然，火车的放汽声尖锐地冲进了我的耳朵，车轮驶动的声音接着响了起来。我知道你开始往北方走了。我的眼前模糊地现出了你的瘦脸，我的心隐隐地痛起来。我没有流泪，但是我的声音有些哑了。

“走罢。”惠生在催促，他的声音也和我的一样。我们就这样地离开了浦口。于是这十天来的生活完全消失了，我仿佛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时题为《苦笑呻吟与呼号——给我的哥哥》。

① 惠生是我们的表弟。我的哥哥李尧林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请假来上海看我。我陪他游了杭州的西湖，然后送他到南京浦口，搭津浦车回天津。

从一个长梦中醒了过来。

你回到天津去了。你还没有上车的时候，别人都说那个地方有些危险，劝你不要回到那里去，我却没有说一句劝阻的话。并不是我不知道这几天来所谓抗敌军事的变化，并不是我不顾念到你的安全。但是我更知道一件事情：你和我一样，你也是一个注定了在困苦中挣扎的人，你也没有偷安的机会和权利。生活的担子压在你的年轻的肩上，八十元一月的薪水就买去了你的全部光阴。你没有思想的自由，你更没有行动的自由。从这十天来的谈话中我已经了解你的平淡而痛苦的生活的全部了。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带笑地说出来的这句话里一定含得有悲哀。当你想到上面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会因悲愤而痛苦罢。但是你如果再一思索，想到在那一带地方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枪炮、炸弹下面呻吟挣扎，你也许会觉得你自己的命运倒不是怎样可悲的了，你也许还会舍弃你的平淡的、痛苦的生活而投身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罢。我想你会这样做的，因为我看出来，在谈到那千千万万的人民在铁蹄下面呻吟挣扎的时候，你的被艰苦生活摧毁了的面容忽然发了光，你的疲倦的身体忽然充满了生气。我知道如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鼓动你的心。但是我怕，我怕再一个大的打击就会把你整个地打碎了。

你回到北方去了。这八年来我们聚在一起总共不上一个月。如今我要开始我的漂泊的生活。在我的想象中似乎就再没有我们安静地聚在一起的时间。昨天晚上在一个朋友的家

里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要找一个机会把我这年轻的生命拿来作孤注一掷。我想做一件痛快的事情，甚至就毁掉我的整个生活也不顾惜。当时你没有说什么，你不过微微一笑。

这情形你也许不会了解罢。"为什么应该舍弃写作的生活呢？"在你的思想里这个问题是得不着解答的。但是事实上你知道我整整三个月不曾动笔写什么了。我宁愿把时间花费在马路上、火车中，和朋友的家里来消磨我的年轻的生命。但是我所希望的机会终于连影子也不见，而外面却有人放暗箭似地在文章上说，我已经在自叹我的笔快要写完了。

自然，你是不会相信这种谣言的。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生活，你知道我是以一颗怎样的心经历过这一切的。我的信仰和我的为人你都知道得很详细。我从没有写完过我所想写的东西，我也从没有一个时候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到现在还活着，不曾躺下来。然而人家却拿种种的谣言来掩埋我了。对于这些谣言，我并不曾发出一声抗议。我只有苦笑，我只有呻吟。

这呻吟，这苦笑，在我的肩上堆积着，两年来它们就堆积了这么高，如今在我的身后就留下那么长的阴影。我渐渐地憎恨起我的名字来。起初我说我爱我的文章。然而现在在我的文章被人糟蹋够了以后，我也就憎恨我的文章了。如今我依旧在黑暗里挣扎，眼睛望着前面达不到的远处的光明，而我的文章差不多窒息了我的呼吸，我的名字差不多毁灭了我的信仰和我的为人。今天我不能够再苦笑了；我不能够再呻吟了。我说，这一切都应该终止了。

当初我献身写作的时候，我充满了信仰和希望。我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以忠实的态度走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我抱定决心：不做一个文人。你知道我素来就憎厌文人。我们常常说将来不要做一个文人，因为文人不是直接做掠夺者，就是做掠夺者的工具。在做小孩的时候我们就见惯了文人的丑态了。谁知道残酷的命运竟然使我自己今天也给人当作文人看待，而且把我们所憎厌的一切都加到我的身上了。造谣、利用、攻击、捧场，这两年来它们包围着我，把我包围得那么紧，使我不能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有一个时候我甚至疑惑我马上就要进坟墓了。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出了我的《灵魂的呼号》①。那篇文章是去年秋天我们在天津相会时，我在你的同事的那间小屋里写成的。它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以后，一个未见面的朋友读着竟然流下了怜悯的眼泪，他说料不到我的生活竟是如此地痛苦。

在那篇文章里我说过我要把文学生活结束了。可是我从北方回来，我的生活就陷落在更多的造谣、利用、攻击、捧场里面。这些侮辱伴着病把我压得不能够动弹。我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天，我想到我未写小说以前的生活，我想到我在生活里所私淑的几位先生，我的心就被悔恨折磨着。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你不能够再像这样生活下去了。你应该站起来做一个勇敢的人！"

① 《灵魂的呼号》：即《电椅》集代序，见《全集》第十卷。

不错，我太懦弱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确实是太懦弱了！这两年来我让一切侮辱加到我的身上，我从不曾发出过一声抗议。我苦笑、呻吟的次数确实是太多了。我怀着一颗孩子似的幼稚的心旅行了所谓中国的文坛，我相信着一切的人，我爱着一切的朋友。于是种种使我苦笑、呻吟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说了我没有说过的话，我做了我没有做过的事。而那些话和那些事都是和我的思想相违背的。有些人在小报上捏造了种种奇怪的我的生平。有些人在《访问记》、《印象记》等等文章里面使我变成他们那样的人，说他们心里的话。

你不知道我如今怎样地憎恨我的名字啊！有几次在不眠的夜里，我用力抓我的头发，我用力打我的胸膛。强烈的憎恨刺痛我的心，无边的黑暗包围着我。那时候我真希望能有一种力量来把我毁灭。我实在不能够忍受这种生活了。我分明爱自己的文章，然而现在我的文章却被糟蹋得使我不得不憎恨它们了。这情形就像一个母亲看见她的孩子被人摧残得失了人形。那痛苦你也应该了解罢。

现在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过去的生活结束了。为了做一个真实勇敢的人，为了忠于我自己的信仰，为了使我不致有亲手割断我的生命的一天，我应该远离开那些文人，我应该投身在实际生活里面，在行动中去找力量，如我在《灵魂的呼号》中所希望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拿生命来作孤注一掷”的意义了。

我究竟还有没有冲出重围而得到新生的那一天，连我自

已也不知道。然而我如今是在呼号了。你是我的唯一的哥哥，我希望你在危险和困苦中时时记着我，给我帮助。

1933年春在南京。

我 的 梦*

我不喜欢夜。我的夜里永远没有月亮，没有星，有的就是寂寞。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一个朋友。

我的心上常常起了轻微的敲声。我知道那个朋友来了，他轻轻地推开了心的门，进到我的心里面，他就昂然坐了下来。和平常一样我就只看见他的黑影子。

"你放下笔！"他命令说。

我顺从地放下了笔。

"你今天又写了几千字了！"他嘲笑地说。

我默默地看我手边的原稿纸，一共有十三张，全是今天写的。

"这有什么用处？谁要读你的文章？"他继续说下去。"几千字，几万字，几十万字，几百万字，你不过浪费了你自己的生命。你本来可以用你这年轻的生命做别的有用的事情，你却白白地把它糟蹋了！"

我沉默着。

"你整天整夜地乱涂着，你的文章在吸吮你自己的血，吸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无题——一个自白》。署名余七。

吮排字工人的血，吸吮那些年轻读者的血。你真是在做梦啊！你以为你的文章可以感动成千成万的新的灵魂吗？你这个蠢人！他们需要的全不是这一类的东西。

“你不记得一个青年写过信给你，说他爱你他又恨你吗？他爱你因为你使他看见了一线的光明；他恨你，因为你使他看见更多的黑暗，他要走去接触光明，却被更多的黑暗绊住了脚。你单单指了光明给他看，你却让他永远在黑暗的深渊里挣扎。你带给他的只有苦恼。你这个骗子，你真该诅咒啊。

“你不记得一个青年写过信给你，说他愿意跟你去死吗？你拿了什么给他呢？家庭束缚他，教育麻醉他，社会宰割他。你把他唤醒了。你让他瞥见了一个幸福的幻景，但你又把它拿走了。那个幻景引诱着他的心。他不能够再闭上眼睛躺下去，他愿意跟着你去追求那个幸福的幻景，一直到死。然而你却撇弃他不管了！你，你这懦夫，你真该诅咒啊！

“你不记得许多许多的青年曾经怀着痛苦的心求助于你吗？他们是年轻的，纯洁的，天真的。他们到你这里来，是因为周围的血快淹没了他们，周围的黑暗快窒息了他们。他们像遭难的船要把你这里当作一个避风的港口。然而你拿了什么给他们呢？你说：‘你们应该忍耐！永远忍耐。’本来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丹东曾经对法国青年说过：‘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你却拿忍耐封锁了你的港口，把那些破船全赶走了，让它们漂流在无边的海洋上，受狂风暴雨的吹打。你，你这残酷的人，你真该诅咒啊！

“你说你那些文章使人家看见了光明，看见了爱，看见了

自由，看见了幸福，甚至看见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然而你自己呢？当一些人正为着光明、爱、自由、幸福，为着那个目标奋斗、受苦以至于死亡的时候，你却躲在你自己写成的书堆里，让原稿纸消耗你的生命，吸吮你的青年的血。你抛弃了光明，抛弃了爱，抛弃了自由，抛弃了幸福，甚至抛弃了那个目标。你永远把你的行为和你的思想隔开，你永远任你的感情和你的理智冲突，你永远拿矛盾的网掩盖你的身子！你，你这个伪善者，你真该诅咒啊！

"文章和话语有什么用处？自从有人类社会一直到现在，所说过的话，所写过的文章倘若都能够遗留下来，堆在一起也可以淹没了世界。然而到现在人类还被囚在一个圈子里面互相残杀。流血、争斗、黑暗、压迫依旧包围着这个世界，似乎永远就没有终结。文章粉饰了太平，文章掩盖了罪恶，文章麻醉了人心。那些呼声至今还是响亮的，它们响得那么高，就压倒了你的轻微的呼号。你不久就会过去了，然而那些青年的灵魂是要活下去的。你说你唤醒了他们，你却又抛弃他们走开了，让他们留在黑暗的圈子里面梦想那些光明、爱、自由、幸福的幻景。你完全忘记了他们，让各种打击破碎了他们的肢体。你，你这个制造书本的人，你真该诅咒啊！

"我恨你，我诅咒你，我愿意我永远不再看见你！我愿意我能够毁掉你的那些原稿纸！我愿意我能够毁掉所有你写的书！我愿意我能够毁掉你的身子！"

那个朋友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他气愤地关上我的心的门。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寂寞里。在我的手边无力地躺

着那十三页原稿纸。

我记起来一件事情，这是那个朋友忘记了说的。半年前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写信给我，说："有人告诉我说，你将来会自杀，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自杀是一件愚蠢的举动。"同时另一个女孩子却带着同情来信说："我怜悯你，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实在太苦了。"

这些天真的、幼稚的、纯白的心越过了那许多栏栅到我的身边来了。他们大量地拿安慰来萦绕我的梦魂。我不是一个忘恩的人，我也知道感激的意义。但是我不禁绝望地问："我果然需要人来怜悯么？"

"我究竟做过了什么举动会使人相信我要自杀呢？难道我是一个至死不悟的人么？"

欺骗的，懦弱的，残酷的，伪善的，说教的，值得怜悯的，至死不悟的……这些形容词渐渐地一齐逼过来，压在我的心上，把心的门给我堵塞了。

我不能够再打开心的门，看见我自己的心。我不能够回答我自己的问话。

但是我并没有哭，因为我知道眼泪是愚蠢的。

我抛下笔，我把原稿纸全掷到地上。我说，以后不再写文章了。于是我默默地取了一本书，翻开来，看见上面有这样的一些字：

> 我驱走了一切的回忆；我把它们全埋在一座坟墓里面。十年来我埋葬了它们，十年来我努力忘记了一切。……

悲哀死了，爱也死了，雪落下来，用它的白色的大氅覆盖了过去的一切。我呢，我还活着，我还很好。①

我希望我能够懂得这些字的意义。

1933年冬在北平。

① 引自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

我的自辩*

最近在"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这题目下，我的两篇作品被列在第三种人的创作之林，而身受了左翼批评家的解剖刀。

对于这个，我并不愤怒，因为那解剖者似乎没有恶意，而且他并不像别的一些批评家那样从一篇作品里面引出了几句对话，就拿来代表作者的思想而加以攻击。

但这样我也并不承认这批评就是正确的。因为这批评是来自一个政党的立场，而我的政治主张和这政党的主张就不是一致。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当然可以得着"用政治上的术语讲，是错误；用艺术上的术语讲，是失败"这个罪名，而且被加上"人道主义，安那其主义"这头衔。

对于这个，我也不抱怨，但可惜的是那批评者没有指出我的作品中"所发挥的人道主义、安那其主义的观点"是什么。诚然我不必否认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虽然我觉得我还不配），可是我的作品的立场常常不一定就与安那其主义相合，《海的梦》里的确只表现了"对于自由、正义以及一切的合理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现代》第二卷第五期。

东西的渴望。"《罪与罚》里暴露了司法制度下面的种种丑态，给法律一个致命的打击。这自然不能说是纯正安那其主义的立场，并且在表现方面我常常无意地流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这是我的缺点。我觉得是应该克服的，但这克服却和左翼批评家所说的不同，因为我并不相信辩证法的唯物论。

谷非先生① 将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并列，把二者同时加在我的作品上，而且还有一些左翼批评家也拿人道主义，虚无主义，安那其主义来解释我的作品。然而他却没有说明这人道主义究竟是十九世纪社会运动中的 Humanitarisme②（十九世纪中西欧许多卓越的社会主义者都常被人称为人道主义者），抑或是近年来左翼理论家笔下的人道主义；如是后者，则它与安那其主义或我的作品都无关系。（同样虚无主义无论是巧尔里雪夫斯基、毕沙列夫所提倡的虚无主义，或司特普尼克所实行的恐怖主义，也都与左翼批评家所加于我的虚无主义不同。）他们因为断定人道主义（他们所解释的），虚无主义（他们所解释的）和安那其主义是同样的东西。同时又从别的地方知道（或者猜想）一个作者是安那其主义者，于是就把这作者的一切作品冠上那三个头衔，就如他们先拿出一个政治纲领的模子，然后把一切被批评的作品拿来试放在这模子里面，看是否相合。全合的自然就是全好，合一部分或不合的就该遭他们摈弃，对于构成一个作品的艺术上的诸条件，他们是一点也不会顾念到的：这是他们的一贯的态度。

---

① 谷非：即胡风同志。

② Humanitarisme（英语）：人道主义者。

这样，谷非先生就把我的两篇作品放在那个模子里面了。结果当然是不合，因为他已经预先断定了我的政治主张是不同于他们的。不合的作品当然应该摈弃。于是在批评《罪与罚》时，他就说我“向刑事法庭要求公道”。

事实上我的忠实的读者会知道我根本反对在“公道”的假面下的阶级的裁判。《罪与罚》这题目是很显明的，并且那事实的确是一件“铁一般的事实”，这“一个断片的现象”，就可以暗示出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存在。而谷非先生却完全主观地说它是“……心理描写”，又说作者多少受了主观的歪曲。

《海的梦》是一个寓言，写的时候正是我的心情陷于绝望的时期，所以带了深的忧郁性，但是结尾却被一个显明的希望掩盖了。我自己当时的挣扎也是很苦痛的。

> 没有悲哀，没有回忆，我只有快乐，我只有希望。
>
> 过去的阴影死了，一切的苦难都跟着死了。我还活着，活着来翻开我的生活的新的一页，来达到那最后的胜利！

这是沉闷的悲观情调么？

自然在《海的梦》里我也犯了一些错误。譬如谷非先生说我“把女主人公写成了一个救苦救难的基督，把她的杨写成了一个基督的基督”，这虽然是他“过甚其辞”，但我也得承认一半。这原因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是我在表现方面常常无意地流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这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克服，当然是必要的，但也不是容易

的事，因为我常常会为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所限制。这一点我不否认。

最后谷非先生劝我“和新兴阶级的主观能够有比现在较好的接近”，这好意的劝告似乎是应该接受的，但是我也应该问一句：这所谓新兴阶级是单指在一党独裁制（或者如他们所说一阶级独裁制）下面卓绝地完成了五年计划的苏联的工农阶级呢，抑还是并指在C.N.T.指导下面与玛西亚专制勇敢地斗争的西班牙一百三十多万的无产阶级和在F.O.R.A.①指导下面与白色恐怖艰苦地战斗的阿根廷无产阶级。或者和前者所要求的政治纲领似乎是两样的。如果谷非先生是单指前者而摈弃后者，那么对于他的好意的劝告，我就只得恭敬地璧谢了。因为我不妨明显地说我的政治纲领是和后者的一致的。

① F.O.R.A.：我无法在这里加上注释，因为这个组织早就不存在了。（一九八八年注）

新年试笔*

在一九三二年的元旦日，我曾经写了下面的一段话，作为我的新年试笔：

黑暗，恐怖，孤独，——在寂寞的沙漠里我又度过一年了。

心啊，不要只是这般地痛罢。给我以安静，那片刻的安静也可以安舒我的满是伤痕的心。

不要战抖，不要绝望，不要害怕孤独，把一切都放在信仰上面。我的路是不会错的。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向着它走去。不要因为达不到那目的地而悲伤。不要把自己的命运看得太重，应该把它连系在群体的命运上面，在人类的繁荣里看出你的前途来。

我还年轻，我要活下去。给我力量，给我力量来活下去，来忍受痛苦，继续挣扎。现在还不是应该放弃一切的时候。我还没有写尽我所要写的，我还要继续写下去。

要强健起来，勇敢起来，应该忍受一切苦难而存在，不要让苦痛埋葬了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文学》第二卷第一号。署名比金。

这是为我自己写的，没有第二个人读过这悲痛的自白。

现在却又轮到我来写一九三四年的“新年试笔”了。

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欺骗没有宽恕的。让我再来打开我的灵魂的一隅罢。在夜里，我常常躺在床上不能够闭眼睛，没有别的声音和景象来缠绕我。一切人世间的荣辱毁誉都远远地消去了。那时候我就来做我自己的裁判官，严刻地批判我的过去的生活。

我的确犯过许多错误了。许久以来我就过着两重人格的生活。在白天我忙碌，我挣扎，我像一个战士那样摇着旗帜呐喊前进，我诅咒敌人，我攻击敌人，我像一个武器，所以有人批评我做一副机械。在夜里我却躺下来，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抚着我的伤痕哀伤地哭了，我绝望，我就像一个弱者。我的心为了许多事情痛楚着，就因为我不是一副机械。

“为什么老是想着那憎恨呢？你应该在爱字上多用点力量，”一个熟识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在过去我曾被视为憎恶人类的人，我曾宣传过憎恨的福音，因此被一些人把种种错误的头衔加到我的身上。为了那恨，我曾求过凡宰特的宽恕，因为他教过我爱；为了那恨，我曾侮辱了克鲁泡特金，因为我使人误解了他的学说。那憎恨所带给我的苦痛确实是太多太多了。

“你为什么就不抛弃掉那憎恨呢？”我也常常拿这话来问我自己。但是我永远得着同样的强硬的回答：“我不能！在这样的社会里我是不能爱人的。”我说这些话也费了很大的力量。那挣扎是很苦痛的。我知道为了这恨，我还要继续把苦

痛当作糖果般一粒一粒地吞进肚里。

许多人指摘过我的错误了。有人说世界是应该用爱来拯救的。又有人说可憎的只是制度，不是个人。更有些人拿了种种社会科学的术语来批评我的作品。他们说我不懂历史，不懂革命。他们说这一切只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悲哀，他们说我不能够体验实生活。

我也曾将这些批评仔细考察过。并且我早已用事实来回答了他们：我写过十三四万字的书来表示我的社会思想，来指明革命的道路，我在许多古旧的书本里同着法俄两国人民经历过那两次大革命的艰苦的斗争，我更以一颗诚实的心去体验了那种种多变化的生活。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从十五岁起直到现在我就让那信仰指引着我。

我是浅薄的，我是直率的，我是愚蠢的，这我都承认。然而我却是忠实的，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曾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在生活里我的探索是无休息的，无终结的。我不掩护我的弱点，但我不放松它，我极力和它挣扎，结果就引起了一场的斗争，这斗争是激烈的，为了它我往往熬尽了心血。我的矛盾也就从这里产生了。

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组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把我抛掷在憎恨的深渊里，让那些狂涛不时来冲击我的身体。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弄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

黑暗，恐怖，孤独——在我的灵魂的一隅里永远就只有这些东西。在那长期的探索中，我永远走着那寂寞的大沙漠。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因为我就不肯让人了解；但正因为没有人了解，我又把我的苦痛增大了。人只看见过我的笑，却没有人知道我是整天拿苦痛来养活我自己。

我的憎恨是盲目的，是强烈的，是普遍的。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对象描写成一个可憎的面目，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制度加以人格化，使它变成了怎样可恨的人，我常常把我的爱极力摧毁，使它变成憎恨。

这一切在别的人看来也许全是不必需的，他们也许会以为我是被雾迷了我的眼睛。其实这全不是。我很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我不能够免掉这一切，完全是由于我的生活的态度，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我忠实地生活在这黑暗的混乱时代里。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而我又不能够消灭掉它们。我固然有一个坚强的信仰，但我却不是像克鲁泡特金那样纯洁完全的人，或像奈其亚叶夫那样意志坚强的人；我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青年。

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苦痛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但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己找寻来的。对于这我不能够有什么抱怨。

我承认我不是健全的，我不是强项的，我承认我已经犯过许多错误。但这全不是我的思想，我的信仰的罪过。那责任应该由我的性格，我的感情来负担。也许我会为这些过错而受惩罚。我也决不逃避。自己种的苦果就应该自己来吃。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做了这过渡时代的牺牲者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甚至在像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柏洛夫斯加亚，妃格念尔这般人中间发见和这类似的悲哀，虽然他们的成就是我所不敢想望的。

然而不管这些错误，我依旧要活下去，我还要受苦，挣扎，以至于灭亡。

那么在这新年的开始就让我借一个朋友的话来激励自己罢：

> 你应该把你的生命之船驶行在悲剧里（奋斗中所受的苦痛，我这样解释悲剧），在悲剧中振发你的活力，完成你的创造。只要你不为中途所遇的灾变而覆船，则尽力为光明的前途（即目的地）而以此身抵挡一切苦痛，串演无数悲剧，这才算是一个人类的战士。

呓　　语*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

在一篇短文的开始我写过了这样的一句话:

沉默,这半年来的沉默差不多要闷死我了。

这并不是假话,里面不含有一点夸张。短短的十几个字也是由痛苦的经验堆积起来的。

说痛苦,大概谁也不肯相信。在这个国家里就充满着把幻想当作现实而靠着幻想生活的生物。对于他们,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光,只有花,只有爱。

然而我的眼睛却看出了不同的景象,我的耳朵也听见了不同的声音。甚至在黑夜里我的眼睛也是睁开的,同时还有各种声音继续送进我的耳里来。光么?周围是黑漆的一片;花么?我闻不到一点儿香气;爱么?这里是如此地寒冷。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坟墓里罢,死床上罢,"狭的笼"内罢。我怎能够知道!也没有人来告诉我。好寂寞呀!我竟然看不见一个人。为什么呢?我真的死了吗?可是我明明还有一口气!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水星》第一卷第三期。

好闷呀！我简直透不过气来。有什么东西压在我的胸膛上。是这样地重！我想动，但是我的手脚都似乎变硬了。不，是谁把它们给我绑住了。我居然这么糊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怎么办呢？老是纳闷，老是焦急，这是不行的。我实在受不下去了。我要嚷。可是我的舌头不能够转动了。为什么？我的舌头被谁割掉了罢。我用尽力气也嚷不出声来。话到了喉管又缩了回去。我在吞自己的话。我咽了一肚皮的话。怪不得胸膛上是那么地重。

我算是完结了。手脚没有用，舌头也没有了。我老是躺着。然而我也得明白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一定是被谁关在笼子里面了。我并不是一个只会讨人欢喜、给人玩弄的小生物。我又不会伺候人，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的喜怒。那么……我会被当作一只野兽吗？可是我并不曾咬过人，我根本就不曾见过一个人呢！

挣扎罢，找谁理论罢。没有一个人。黑暗里在我眼前仿佛晃动着一些奇怪的影子。它们是这么淡，这么模糊，耳边又只有一些啾啾般的叫声。不管这地方是坟墓，是死床，是囚笼，我总是孤单单的一个。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以前我不还是自由自在的吗？那是从什么时候起的？昨天吗？不会这么快！怎么一霎眼我就到了这个境地！这经过我完全不明白。我只记得有过一个时候，我昂着头在阳光下面走路，我张着嘴唱歌。然而不知不觉间我就到这个地方来了。

老是躺着，这不成！我得活动一下。可是身子僵硬了，连膀子也动不得。我的血似乎凝结了，不，给什么东西吸光了。什么东西到现在还在吸我的血！我的膀子痛得要命。那个东西用力在吸！不止一个，许多许多。它们比蚊虫厉害过千百倍。我全身都是这些东西。它们拚命在吸我的血！我的血快光了！我得动一动！我要救我自己！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要动我的膀子。可是我没有力气。身子是这么软……怎么？我真的给人绑住了手脚吗？绳索究竟是粗还是细，我看不见，摸不到。我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完结了。

完结了。就这样简单地完结了吗？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呀！从前我不是也跟在别人的后面昂起头，挺起胸，呐喊过吗？难道现在我就只知道完结了？没有力气。可是我还有知觉，我还知道怎样用力呀！

没有舌头，也得咬紧牙关。膀子不能动，拳头也得捏紧。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既然我是一个年轻人，就得拚命地挣扎一下！

咬紧牙关。我不怕！我说过不会怕。啊，我有一点儿力气了。我在动。我的手动了。我继续用力。奇怪，仿佛并没有绳索。我用力动着手。我的右手动了，左手也动了。我的手并没有被人绑住。我一定是做了一个噩梦。一个多么可怕、多么痛苦的梦啊！可是我战胜自己了。

我胜利了。奇怪，我的舌头动了。我居然嚷出声来了，我的舌头明明在我的口里！

我在什么地方？……我知道！
我明明坐在我的书桌前面。

1934年秋在上海。

《黑暗之势力》之考察*

一

托尔斯太逝世的时候，教会的当局把他认作他们一道的人。他们说："他是我们中人。"这一件事情便使我联想起一篇关于苍蝇和耕牛的俄国寓言。牛拚命地耕田，苍蝇休息在牛角上，一事不做，然而牛弄得精力竭尽回家的时候，苍蝇却夸大地说："我们耕了田了。"教会的当事人对于托尔斯太的举动恰和寓言中的苍蝇一样。诚然，托尔斯太把他的人类关系之概念基础在《福音书》之新的解释上面。然而他和现在的基督教是离得很远很远的。

托尔斯太是最后的真正基督教徒，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所以他把教会的要塞及其一切恶毒的黑暗之势力，一切罪恶，一切残酷的暴行完全摧毁了。

因为这个缘故，他便受着"圣公会"(宗教议会)的迫害，被处以破门罪而逐出教会；因为这个缘故，他便为沙皇及其刽子手所嫉恨；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著作在俄国曾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芾甘。

被禁止。

托尔斯太之所以能够逃脱其他伟大的俄罗斯人的命运，其唯一的理由是他的力量要超过于教会，要超过于贵族，甚至要超过于沙皇，他是俄罗斯伟大的良心，他把她的罪恶展现在文明世界之前。

托尔斯太对于当时诸大问题的感受是何等地深切，他对于人民的关系是何等地密切，这在他的各种著作中都曾明白地指示出来的，然而未有比在《黑暗之势力》一剧中描写得更为有力者。

以上是高德曼批评托尔斯太的一段话。

二

《黑暗之势力》是贫困和愚昧之悲剧。它描写一群浸在贫乏与黑暗中的农民的生活情形。这种可怕的情形，特别是关系女人的情形，已被剧中的一个人物明白地说出来了。

密特里：你们女人和姑娘有数百万，然而你们都是和森林里的野兽一样。她那样地生，她也那样地死。她连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曾听说过。一个男子是多少会学得一点东西的；如果没有别的地方可学，那么至少在酒店里，或者因偶然的机会，进得监牢，再不然像我这样在军队里学到一点东西。然而一个女人呢？关于上帝的事她一点也不知道——不，她连日子也分别不出。她们乱爬

着像瞎眼的小狗一般，把她们的头贴在粪堆里。

富农彼得病得快死了。然而他非常爱钱，而且奴使着他年轻的妻子阿尼西，他底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和他雇用的长工尼其泰。他不愿意他们有一点儿休息，因为他既怕死，又非常爱金钱。阿尼西恨她的丈夫，因为他强迫她作苦工，而且他又老又病。她爱尼其泰。年轻的尼其泰是不能够拒绝女人的，女人便是他的主要弱点，他在女人面前是毫无力量的，他未到彼得田庄上来的时候，已经和一个孤女马林发生了关系，那女儿有了孕，便求助于尼其泰的父亲阿奇姆。阿奇姆是一个单纯而诚实的农人。他逼着他的儿子娶那女儿，"因为骗一个孤女是一件罪恶。"他向他的儿子说："尼其泰，当心！一滴犯罪之泪不会白白流过去的，它会流在一个人的头上。当心，否则你自己也会遇着这样的报应。"阿奇姆的良善和朴实处处受着他妻子玛德邻的贪心和恶念的反对。结果尼其泰依然留在彼得的田庄上。而阿尼西受着玛德邻的指使竟毒死了老彼得，偷了他的钱。

阿尼西的丈夫一死，阿尼西便嫁与尼其泰，把彼得的金钱让给尼其泰挥霍。尼其泰做了一家之长，不久便变成了一个浪子，一个专制者。他本来所有的好处都被这种有闲而有钱的生活消灭得干干净净。金钱本来足以毁灭人性败坏良心，何况又加上一种自觉，一种悔恨，明白他自己曾经间接地参加过阿尼西的罪恶呢？这样一来，尼其泰对于阿尼西便由爱而变到深恶痛恨了。他把彼得前妻的十六岁的女儿，又聋

又笨的阿库林作为情妇，而强迫阿尼西来服伺他们。阿尼西有力量来反抗她的前夫彼得，然而对于她所爱的尼其泰，她便无力反抗了；她爱他，这爱情就使她变成弱者，而甘愿屈服于他。"我一看见他，我的心就软了。我没有勇气反对他了。"

老阿奇姆因为家里的马死了，要另外买一匹马，便跑来向他的新近发了财的儿子要一点钱。他很快地便明白他儿子沉在罪恶的沼泽里。他要救他，他要使他觉悟过来，他要唤起他的好心。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用处。

阿奇姆不能留在罪恶丛中。他离开了尼其泰，甚至于他先前向尼其泰要来购买一匹马的钱也退还了。

> 阿奇姆：罪孽是互相连结的，做了一个，便要做第二个。尼其泰，你是被罪孽缠住了。我明白你是被罪孽缠住了。你被罪恶缠得非常之紧。我听说现在他们连父亲的胡子也要拔了，——然而这只是向着毁灭的路上走的……你的钱在这里。我要去乞食，不愿拿你的钱。……让我去。我决不留在这里！我宁可在篱边过夜，不愿意留在你的污秽丛中。

阿奇姆之为人及其性格在下面一段对话中被托尔斯太表现得非常活灵活现。

> 密特里：比方你有钱，我的田地正荒芜着；春天，而我没有种子；或者我没有钱完纳粮税。我便跑到你这里来，说："阿奇姆，请借十个卢布给我。我等到秋天收获的时候，还给你，另外还加上十分之一的利息。"比方，你看

见我还有一匹马或者一头牛，可以被榨取，你便说："我要两三个卢布做利息。"绳子已经套在我颈项上了，没有它，我是不能够进行的。我说："很好，我愿借这十个卢布。"到了秋天，我卖出了一点东西，把钱还给你，你另外榨取了我三个卢布。

阿奇姆：然而这是一件不公道的事。一个人要是忘记了上帝，是不行的。

密特里：等一会儿，且等我说完：你把我的钱榨取了。比方阿尼西也有钱放着不用。她没有存放的地方，而且因为是一个女人，又不知道拿钱来做什么事。所以她便跑来找你："我能够用我的钱生点利吗？"你便回答道："是，你能够的。"那么我便等着。第二年夏天我又来找你，我说："再借给我十个卢布，我还要付利息的。"你便注意着，看我的皮剥下来没有，还可不可以在我身上弄出一点钱，如果我还可以被榨取的话，你便把阿尼西的钱借给我，然而要是我连饭也没有吃的了，你晓得我是无法被你榨取了，你便说："兄弟，愿上帝与你同在！"你便去另找一个可以被你榨取的人，把阿尼西的钱借给他。如今银行做的事情便是这样。它就是这样维持下去的。朋友，这真是一件非常聪明的事。

阿奇姆：这算做什么？这是龌龊的行为。如果一个农人做了这样的事，农人们便会把这当做一件罪孽。这是不合天理的，这是不合天理的。这是坏事。有学问的人怎么能够做出——……据我看来，没有钱固然有苦恼，然

而有了钱苦恼更增加一倍。上帝叫人作工。然而你却把钱放在银行里，自己舒舒服服地躺下来睡着，让钱来养活你。这是坏事，——不合天理的。

密特里：不合天理吗？朋友，如今的人是不管什么天理不天理的。他们只想着怎样才能够抢别人的钱。

当阿库林有孕的事还不显著的时候，她和尼其泰的关系也不曾被邻人们知道。然而到后来她生下孩子来了。这时候阿尼西便又回复到了主人的地位。而阿库林却由主人的地位变成奴隶了。她对于阿库林的憎恨，她的被蹂躏了的对于尼其泰的爱情，以及对尼其泰的母亲（马德邻）的恶念联合在一起，便使得她变成了一个恶妇。阿库林被赶进仓里躲起来，因为那一天媒人正到尼其泰家来看人。她的婚事就由她继母和马德邻定夺了。外面客人正在饮酒的时候，她一个人被关在仓里。她"不愿嫁人"，然而别人却把她嫁了。不仅是这样，她的小孩子，她和尼其泰的私生子，她也不能够留着养育，竟被人生生地拖了去，去活埋了。

阿库林在仓里生了孩子，而马德邻和阿尼西却骗尼其泰说这小孩已经死了，而且强迫他去埋在地窖里。尼其泰最初是不愿意的。

尼其泰：你们真缠死我了。我要走。你们要怎样做，你们去做好了。

阿尼西：〔自门内出〕他挖好了坑吗？

马德邻：他不愿意呢。

阿尼西：〔大怒奔出〕不愿意！坐在监牢里喂虱子愿意吗？我立刻就到警察那里去说。要失败就失败，就一块儿失败。我全都说出来。

尼其泰：〔战栗〕你说什么？

阿尼西：什么？全都说出来？谁拿的钱？你！谁下的毒？我！可是你早也晓得，晓得，是和你商量好了的……

果然"罪孽是互相连结的，做了一个，便要做第二个"，尼其泰到底不得不答应去埋小孩了。他接过小孩预备埋葬的时候，他才明白小孩"还活着。还在动"。他"怎么能够下这个毒手呢"？

然而阿尼西能够，她"从他的手里夺下小孩，抛进地窖里去，"还说："赶快埋好了，就不活了。"

不过要把一个活着的小孩生生地活埋，究竟是一件可怕的事，何况这小孩又是自己的孩子呢？这个可怕的打击使得尼其泰的神经昏乱了。在暂时的疯狂之中他用木板盖着小孩，自己坐在板上，口里还在说："还活着！我不能！……他还哭着。"其实小孩已经被他压成肉饼了。

迷信，恐怖以及良心之悔恨，使得尼其泰陷于疯狂的状态中，他的神经受了很大的刺激，被他压死的孩子的哭声好像时时长留在耳边。在这种心理状态中，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着从前的罪恶生活以至于灭亡；一是忏悔过去的罪孽而改营新生活。尼其泰走了后面的一条路。所以第五幕就开始了。

这最后一幕是描写阿库林的婚礼。所有相识的农人都到了场，而家主尼其泰却躲开了。他跑到稻草院内，躲在草堆上。他想自己勒死，但没有实行，最后决定去当众忏悔自己的恶孽。

尼其泰：父亲，听我说！最先马林请你看着我！我对你犯了罪了：我允许娶你为妻，我引诱了你。我欺骗了你，我又抛弃了你；为了基督的缘故，饶恕我罢！

马德邻：呵，他着了魔。他怎样了？有魔鬼附着他的身。起来，不要胡说了。

尼其泰：……〔向阿库林〕我杀了你的父亲，我这条狗又玷污了他女儿。我有力量压制她，我又杀了她的孩子……〔向父〕亲爱的父亲！请你饶恕我这一个罪人！当我开始放荡的时候，你对我说："鸟爪一旦被人擒着，全个鸟便逃不掉了。"然而我这条狗并不注意你的话，一切的事如今果然照你的话实现了。为了基督的缘故，请饶恕我。

这果然是上帝的感化，上帝的启示么？不，绝对不是，尼其泰的觉悟忏悔，乃是他杀了小孩以后所必选择的两条路之一。

尼其泰觉悟了，忏悔了。然而他也就被捕了。他的结局吗？不消说是西伯利亚的惩役。我想他的结局大概和《罪与罚》里的拉斯可尼科夫，《加拉玛左夫弟兄》里的狄米特里二人差不多（二书均杜斯朵夫斯基所作）。他的情人阿库林会像

《罪与罚》里的松尼亚,《加拉玛左夫弟兄》里的格鲁秦加那样,跟着他跑到西伯利亚去。靠了她的力量,他是会终于被得救的。据我看来,阿库林很有做松尼亚和格鲁秦加之可能。而且从最后一场看来,阿库林已经“护”过尼其泰,又“走过来和他站在一起”要求和他共享苦难了,在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俄国文学的特点,也可以认识俄国女性之伟大的力量。

总之《黑暗之势力》是贫穷,愚昧,迷信之一幅真实的,可怕的绘图。正如高德曼所说:“要写出这样的一部著作,单单做一个创造的艺术家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具有深切的同情的人。”而托尔斯太兼此二者。所以他的第一部剧本便是杰作。他是深能了解俄国农民的。他明白农民的生活中之悲剧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坏处,这实实在在是从那个支配了农民之一生的黑暗之势力而生出来的。这种黑暗之势力压着农民,使他们一生一世抬不起头来,使他们永远陷于污泥之中,使他们永远过着猪狗般的生活。

谁读了本剧所描写的农民生活之惨状能不为他们流一滴同情之泪?能不怜悯这些可怜的生物?而事实上养活我们的,正是这般人,靠了他们我们才得生活至今。所以读了本剧的人一定要对现社会制度表示反抗,一定要主张铲除这种黑暗之势力。本剧的使命是在每个人的心中激起正义之感情。因此本剧并不能说是“一部宗教的戏剧”,而是一部描写社会黑暗之革命的剧本,也许著者的本意并不是这样,然而这本戏剧所给与读者的印象确是如此。

《工女马得兰》之考察*

一

记得有一本法文《米尔波评传》说过《工女马得兰》是一本描写思想的剧本(Piece d'idée)而不是描写性格的剧本(Piece de caractére),他这句话自然有道理,但《工女马得兰》一剧也未能以 Piece d'idée 来概括。《工女马得兰》就在描写性格一方面也是一本杰作。

《工女马得兰》是现代的剧本,比较霍普特曼的《织工》,比较高斯华绥的《争斗》都更为现代。而像一线火花那样贯穿着全书的理想也更是现代的理想。

这剧本产生的地点是近代工团主义的发源地的法国,而产生的时代又是工团主义的兴盛时期。剧本上演的那一年正是杜鲁斯会议议决将"怠工",正式采用为法国劳动总同盟的行动方法的时候。至于罢工,则早已采用了。工团主义兴盛的时期也就是劳资冲突厉害的时期,生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米尔波看见了这种情形,便忠实地用他的一管妙笔把这如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芾甘。

火如荼的斗争写了下来，成就了这个剧本。而米尔波之所以能捉住他的时代，使《工女马得兰》成为一篇不朽的名剧，这不仅是因为他能做到艺术的忠实，而且更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书中主人翁让·罗路的理想便是他的理想。要捉住时代，冷静的观察是不行的，必须自己生活于其中，与同时代的人分享甘苦，共同奋斗，才能够体验出他们的苦痛，明白他们的要求。米尔波因为自己苦着书中人之所苦，具着书中人所具之希望，所以他写出的作品才不是空想的，写出的人物才不是虚构的。他能活画出近代各种人的性格来。

还有两件事实对于本剧之作成也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一八九六年西班牙巴塞罗拉地方的宗教的游行之遇炸，和一八九七年暗杀西班牙首相的安觉利罗（Angiolielo）之受绞刑。这两件事和罗路有大的关系。前一次事件发生后立刻有三百多人被捕，大部分是社会主义者和职工组合会员，其中也有些安那其主义者，罗路便是一个。这些人被捕后在最可怕的牢狱里受种种残酷的刑罚，死在狱中的很不少。安觉利罗后来知道了这个消息，便从英国到西班牙，刺死了这事件的负责人西班牙首相。于是这个可爱的孩子安觉利罗也受了可怕的绞刑。他的尸体曝在烈日下，过往的行人指着他说："那是罪人——残酷的凶手。"所以在《工女马得兰》第一幕第九场里（中译本五五页）让·罗路对马得兰说："被牵连在一件安那其主义者的谋乱事件里，我无理由地被捕，无证据地受判，整整在巴塞罗拉地牢里憔悴了两年，出狱时刚刚看见我的好友波那（Bernal Diaz），那个有英雄心的孩子，在一群醉心渴血的群

众中受了绞刑。”波那当然就是安觉利罗。

真正的让·罗路是谁，我也不曾确实地知道，也用不着在这里指出来。然而我新从马得兰的国土归来，我确实见过了不少的让·罗路，也见过了不少的马得兰，虽然他们现在还未享受到那两人的光荣的命运，但我相信他们若处在那两人的环境，他们的所为也不会和那两人不同。这一点我便感到米尔波的艺术的真实，所以我说他在描写性格方面也是成功的。

若有人因为《工女马得兰》是三十年前的作品便说它的时代过去了，那么我要指出他的错误。绝好的证据便是我的几个在让·罗路们作工的那种工厂里作过工的朋友们所告诉我的话，他们在工厂里的生活过得和让·罗路们差不多。

让·罗路所攻击的“坏牧人”，也正是米尔波所深恨痛绝的，本书原名就是《坏牧人》，这足以看见米尔波之着重点。米尔波又在一篇短文里尽力讥笑这类的人。米尔波如今已死了。可是“坏牧人”还有不少咧，大名鼎鼎的法国外交总长白里安也就是一个“坏牧人”，还有做过法国总统的米勒兰。……这样的人中国恐怕也有罢。

二

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之困苦，还不是本剧的唯一长处，因为在《织工》里，在《争斗》里，工人的困苦生活也同样可怕地显露在我们的眼前。而且在这一点上米尔波的描写倒比左拉

在他的小说《萌芽》中所描写的差得远了。左拉的描写是何等有力，何等可怕！

我以为本剧的特点在于能忠实地描写出一、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二、资产阶级的慈悲心；三、感情与理智之冲突；四、资本家的心理。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爱情的力量。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确实是骗人的东西，所以托尔斯太要痛骂它，所以易卜生要痛骂它。米尔波在本剧里对于它的攻击也是很厉害的，不过米尔波用的武器不是热骂而是冷嘲，这冷嘲也许比热骂更要难受。你且听像都卢得“这样的自由党人”的言语：

> 都：……这里的情形总算好极了！工人们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幸福到万分了。……他们有了一切；——很好的工钱，很好的住处，很大的保险费，还有工会。

再听下去：

> 豆：富人们又能给穷人们作出一切社会美德的榜样。
>
> 都：这不是一句可以当作我们的一切组织的铭言的话么？……
>
> 都：我常常做这样一个美丽的“梦”。我只愿有一块小田带一间很小的房子，一头很小的牛，一匹很小的马，再要两千法郎……然后我耕田自食。做个穷人，是多么快活！……但是做这么一个快乐正直康健的穷人就连梦想也想不到的。……因为我有了太多的旅馆、房屋、树林、

猎场、朋友、奴仆了。我是被这一条财富的铁链绊住了。

工人们在府邸外面游行示威，叫起“打倒喇尔江”，“罢工万岁”了。都卢得吓着要走了。“他的帽子显而易见地在桌子上。”然而他却叫：“我的帽子呢？”多么慌张！走了，他的临别赠言是：“我从此讨厌了自由主义。”

假面具揭穿了。无怪乎喇尔江要骂：“唉！可怜的鬼子们！”

再说资产阶级的慈悲心。这可用热勒维耶来代表。《开明月刊》第三号蛰虫君的《对于〈工女马得兰〉之批评》中曾有“戴了假面的虹（？）样慈善心肠的热勒维耶”的话，我是不赞同的。资产阶级的慈悲心固然常常是假的，但也不尽然。热勒维耶并不是知道戴假面的人，她正如她的哥哥罗伯所说“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不知道有爱情”。……“因为应当施给人的不仅是金钱，还应当给信用，应当给希望，更应当给爱情。”然而热勒维耶恰和其他许多有慈悲心的资产阶级一样，“所能做的”只是给穷人以“金钱”，而“不给信用，给希望，给爱情”。她（和他们）不了解穷人，她（和他们）在“安乐的生活里”是不能懂得“穷人们的苦痛”，“因为离他们太远”，“彼此的心隔离得太远”，所以她（和他们）不能了解他们，只觉得他们“都使我害怕，他们都是坏人”。“我对人人都不错，每人我都给了东西，他们反怨恨我。”这样一来，她（和他们）的好意反而变成怨恨。资产阶级的慈悲心之结果大抵如是，这是无益而有害的。真正觉醒了的资产阶级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是米尔波指示于我们的：

做罗伯去。

罗：我自己造出一个脱离了我的阶级的偏见的生活。财产所献与我的青春的一切利益，一切特权，我都不肯接受。我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工人，我靠着我自己的劳力所得的生活。

罗：我除了为人们谋幸福之外无其他野心。为它我已牺牲了财产，牺牲了青春。

这样还不够。“我也还要牺牲我的生命，”结果他果然为救工人的生命而牺牲。这牺牲是极有意义的。而蛰虫君在他的批评里却说道：“伤心的罗伯饮弹比个无名工人的牺牲还低售了他的价值。”我以为他不懂得米尔波，而且也不懂得马得兰在本剧末尾所说的：“这孩子不再是他的了。他是属于我们的”这一段话了。

再说到感情与理智之冲突，这是用罗伯与他的父亲喇尔江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他们父子间思想上冲突到了极点，甚至“彼此相谈相看，不是像父亲和儿子却是像仇敌和仇敌”。然而在感情上彼此仍是相爱。

罗：我爱你，……我爱你。

喇：是的，如果我们彼此不爱了罢，我可怜的孩子，〔略停〕我们还会这样难受么？

第三幕第二场父子间的争辩，写得何等有力！结果：

罗：〔努力〕你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越离越远了。这是一件太……太苦痛的事！……我去了。

喇：〔略停一刻，然后用责备的声音说〕实在！你可以走了。

后来第六场：

喇：〔狂怒地在房里大步走着，突然向罗〕还有你我也撵。我愿意不再看见你！……我愿意永不再看见你。滚！……滚！

罗：啊！父亲！这是你自己要这样做的。

最后罗伯被他的父亲请来的军队的枪弹打死了。而喇尔江呢！

喇：你们这些哭着的人，听我说，你们这些失了儿子的母亲，你们这些寡妇，听我说，我把我的财产全部给你们，我也把我的生命给你们。但是告诉我！给我说，我的儿子在哪里。……玛利亚娜，你看见我的儿子吗？告诉我。……唉，一点也不怜悯我！一点也不怜悯我！……

喇：〔呜咽着，任人牵引像一个小孩子一般〕我的儿，我的儿！

第四，说到描写资本家的心理，下面的一段话真是非常深刻的描写了：

喇：在我的生活里并无他种激情，只有工作。……这并不是为金钱，也不是为财富或奢侈，乃是为这工作所

给我的高尚而强烈的快乐，而且为了近几年来它占住了我的心，使我忘记别的事。我可以替我自己说一句公道话，我的社会的任务，我的巨大工作之任务，会比较那些含糊的学说，无益的允许，不能实现的梦想更有利于人。靠了我所生产的一切物品，我纵然不曾使得小民们变成富翁，至少我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幸福，减轻了他们的困苦。……

自大的资本家的心理却是这样。他们并不是吃人的魔王，他们只是自大的自利主义者。他们以为靠了他们，工人们才能够生活下去，而事实却正相反。什么“增加幸福”什么“减轻困苦”都是些梦话。受了梦话的骗，本来“不是坏人”的资本家却变成吃人的魔王了。他们为满足自己的激情，为求得那种强烈的快乐而工作，在他们以为是正直的行为。不错，这是正直的，然而如果他们一旦把眼睛睁开一点，看见这工作是一个杀人的工作，他们自己能不惊心动魄？

三

描写爱情的力量之伟大，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自然这样的描写在别的书上也是常见的，不过米尔波把它穿插在这样可怕的生死的劳资大斗争里，读起来更觉动人，更觉有力了。

我在许多地方发现出来米尔波的《工女马得兰》是从左拉的小说《萌芽》中脱胎出来的（这理由当在《〈萌芽〉之考察》一

文中详说)。他的马得兰就是《萌芽》里的马二家的(La maheude)而且也就是她的女儿加塞林，虽然她们母女的性格在表面上是多少不同。《萌芽》里的马二家的，也和马得兰一样，在罢工失败，工人被屠杀，她的丈夫饮弹后，她依然保持着对于正义之信仰，当爱及安(《萌芽》里的让·罗路)和她告别时，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在这一次最后的握手中，他依然明白这是同志般的握手，一次长久的默默的紧握，这给他约定在将来再动手的日子里的会期。他完全懂得。在她的眼睛的深处还保留着平静的确信。"而那时候呢，许多的男子已经屈服了。同样在《工女马得兰》里马得兰也是一个最后还保持着对于正义之信仰的人。

《萌芽》里虽写了几个可爱的女人，然而左拉在这书里写爱情恰和他在其他十九卷"鲁公马加尔丛书"中差不多，不是写得叫人流泪，便是叫人打寒噤。你看他写爱及安与加塞林之爱，与鲁格女儿之爱，与马二家的之爱，(虽然马二家的的年龄较爱及安大得多，而且他们俩从没有表示过爱情，然而我们读者是明白的。你看爱及安和马二家的告别时，她最后不是慢声地说："你不记得别人说我陪你睡过觉。天呀！在我的丈夫死过后，只要我是年轻一点，这倒是很可以做出来的，是不是？"吗)写得何等可怕，可哀，和米尔波写马得兰和让·罗路之爱比较起来，未免差得太远了。左拉是一个以人生为实验室的冷静的解剖者(但写《四福音》时的左拉就不同了)，而米尔波是一个热情的安那其主义者，他生活于人群中，同感他们的苦乐，所以他写工人间的爱更能有声有色，他的描写乃是

一副鼓舞人们的勇气和热情的兴奋剂，让·罗路，马得兰两人几次的对话是何等的真诚，何等的美丽。

让：马得兰，不错，我在梦想，我在梦想着一些事业，也许一些大事业。……然而如果我再会有行动的热狂和战斗的欲望，这便是为着你，由着你，同着你。

马：为着我？……同着我？我不过是一个多愁多病的可怜的女子，……我并不美丽。

让：不美丽？啊！马得兰，你没有富家女子的傲慢的美，那是用我们的皮肉和饥饿造出来的……你有我所爱的美，充满了受苦之美，我跪在你的面前。你的可怜的面孔，已经憔悴了，……你的两肩，已经弯曲了，……你的手，你的无血色的小手，……指头已经被工作磨坏了……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已经因了无数的悲哀和眼泪而变红了，……你不知道它们拿了何等神圣而有力的爱情胀满了我的心。……它们还重燃起了我的恨。……不美丽！因为你还不曾有过青春，……因为你永远总是有着太多的困苦！你好比一株永没有见着阳光的可怜的小植物。……然而阳光，如果我给你带来呢？……然而青春，如果我给你拿回来呢？……然而困苦，如果我用我的全量的温柔，把它从你的脸上心上揩掉呢？

马：不要说这个，……不要说这个，……你使得我哭了。

让：还有你的灵魂。你以为我在所有别的灵魂中不

曾认出你的纯洁的牺牲的，平静温柔的英勇气概的灵魂！……不错，我有一件报复与正义之工作要来完成，然而为了这个，须得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伴侣，有你的这样的刚勇的灵魂的妇人。

马：不要给我说这个，我请求你！我没有勇气。你知道我只会哭。

让：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孤独来对付这些可怕的事。如果两个人由爱情结合起来，便什么都不怕了，连死也不怕了。

几个月以后：

让：啊！马得兰！……你的心是何等样的心！我在你的面前觉得自己是何等地渺小了。

马：不要这样说！……然而如果没有你我还会成为什么？你不记得我从前是何等地病弱而胆怯，我的灵魂里是何等地黑暗吗？你来了。我内部一切的黑暗地方，都亮起来了。我的至爱，靠了你的光明，靠了你的光明才造成今天的我。

让：今天！马得兰，今天正是你在扶持着我。当我的勇气在动摇的时候，你便坚定了它；当我灰心消极的时候，你又不停地给我造出新的力量和信仰来。在你的眼里，在你的眼睛深处，我看见了未来的星光闪耀着，而伟大的解放之黎明到底也升了起来。我早已在你的眼泪里猜出，而且看到这一切了。

还有：

让：马得兰！马得兰！我要忍受所能发生的一切！不管还有什么苦难，什么背叛，什么痛楚在等着我，我，也不再抱怨了，因为我既然有一天在我的困苦的路上得着了你的爱情之伟大而高尚的快乐。啊！你的眼睛，我从那里得到了神圣的力量；啊！你的嘴唇，我从那里饮到了奇迹之琼浆。

最后在第四幕第三场，马得兰的一篇演说救了让·罗路的生命，挽回了他的已失的信仰，鼓舞起了群众的勇气，把已怀二心的群众重新团结起来，使他们甘心去为争正义而作壮烈的牺牲，在经过了这样的事实之后：

让：你看，如今是我哭了，是我在你的怀里哭了！……我是你的小孩子。

马：我爱你，我的让！

让：这是狼群，你使得他们变成了绵羊，……这是懦夫，你使得他们变成了英雄！……你的力量是何等地大！

马：我爱你！……

让：他们要杀我，……你把我从死里救出来。……

马：我爱你！……

让：马得兰！你是有高贵的心灵的女人，你是天地间所生的精华中的一个，从前在辽远的时代里，常有这样的人从民众中间产生出来，以唤起已死的勇气，立起已失

的信仰！……你便是这一个。……

马：〔紧抱着让，用她的口盖着他的唇〕这一个爱你的人，让，此外便不再是什么了！

这样的爱情写得何等地真挚，何等地细腻。在写过了前场动的，骚乱的，热狂的，盲目的群众心理之后，又来写这静的，细腻的，充满了刻骨的感激的爱情之话语。读者的紧张的心情至此便宽松了许多，然而同时又有了一个微细的感觉深入读者的心里，这是苦是乐，是酸是甜？我分别不出。"我爱你"三个字和前场的一篇演说有同样伟大的力量，前场里口如悬河的马得兰这时候只能说出这三个字了。在这一点我觉得左拉的《萌芽》写爱情没有这样的美丽，便是"鲁公马加尔丛书"最后一卷《巴斯加尔医生》里那一段最富诗意的最美丽的巴医生叔侄之爱的描写里，克罗蒂的几段美丽的话，也不及马得兰的三个字来得有力。米尔波的《工女马得兰》虽然脱胎于左拉的《萌芽》(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但在这一点米尔波却是"青出于蓝"了。

四

《工女马得兰》译成中文后，并不是不曾引起国人的注意的。"马得兰万岁"，"小母亲"，"人类的母亲"等等呼声也可以常常听到。

然而我要说马得兰并不是一个稀有的女性，她不是某一

个女人。她是全个革命的女性，受苦的女性之象征，之代表。或者再说得宽一点，她是全体女性之代表。我说所有的女子若生来就处在马得兰的环境里，则都可以成为马得兰。左拉的许多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俄国文学的女主人公大部分都和马得兰差不多，《罪与罚》里的松尼亚不是被西伯利亚囚人称为小母亲么？《萌芽》里的马二家的，加塞林，穆格女儿这些女人不是都可以做马得兰吗？从我在《俄罗斯十女杰·序言》内所引证的许多事实看来，俄国女子不是都可以做马得兰么？

似乎左拉在《劳动》里曾说过只要女人还受着苦，世界便不能被救；（但我读《劳动》，是在马赛一家滨海的旅馆的五层高楼上四个晚间临睡前的时光中读完的，现在书又被我友君毅借去了，所以左拉的原语究竟是否如此，我就难担保了。）我要再补充一句：世界只有靠着女人，才能被救，换句话说世界只有由马得兰来救。马得兰并没有死，而且永不会死，我看见过她，我在到处都见过她，那么，这世界是终于会得救的了。

岳煐在《工女马得兰·译本序》里说马得兰的最后两句话“暗示新思想新运动目下虽然失败，但种子却留下了。”我觉得这意思还不大明瞭。“我的儿子没有死！……让的儿子没有死！”这不是暗示，这是事实，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谁能说你们不看见马得兰的儿子？难道我们自己不就是马得兰的儿子？马得兰的儿子不但“没有死”，而且永不会死，只要世界不毁坏，人类不灭亡，马得兰的儿子也不会死的，而马得兰也不会死的。

《党人魂》之考察*

虽然百星大戏院的广告上所说“上海十万人看过，十万人赞美的世界第一革命爱情片，慷慨激昂哀感顽艳之大名剧”等语不见得就可靠，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党人魂》影片是受着上海居民的热烈的欢迎。我因为某种关系在两月之间也曾看了此片三次。每次我的耳朵都几乎被拍手声震聋了；虽然我自己没有拍过掌，但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被感动的。我的朋友中看过此片的差不多个个赞好。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不得不对于这个轰动上海的名片加以一番考察了。

在考察之先，且把本片的情节简略地说一说，所以我便把本片的说明书要约如下：

广阔的俄罗斯国土里浩浩荡荡的伏尔加河边，数十个铁臂苦心的劳动者背着磨筋折骨的纤绳，引着那重载如山的货船溯着那澎湃汹涌的潮流前进，他们在艰难痛苦，人类所不能忍受的环境之中，唱那悲壮的“伏尔加的《船夫曲》”。

离他们不远，在伏尔加的岸边，一座亲王的府第，高踞在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时题为《〈党人魂〉及〈火榴〉之考察》。署名苇甘。

山岩之上，俯瞰着一片鞑靼游民的村落，富贵和贫贱，很分明的显出高低。村落里许多未开化的人民中，有风流跌宕的浪女麦立许，有健壮哑口的铁匠史蒂芬。史蒂芬的铁臂，虽可以得麦立许的钦佩，并被她利用做保护她盗窃物品的利器，然终不能得她的爱情。同时府第中的青年王子狄密德里和美丽的公主维娜，正坐在簇新的汽车里面，讨论订婚的问题，他们遵着普通的习惯，请鞑靼的浪女卜课，浪女得到王子的贿赂，当然讲许多好话帮助他成功。卜课完，两位皇族正预备回府，看见纵横颠倒卧在地上休息的拉纤人，好奇的公主，走过去看一看，巧遇着那壮美的青年船夫费达正在饮水，忽然大有感触，虽然贵贱相悬，心里却未免有情。倒是费达心中有事，漠然无动。在他们谈话的时候，王子来，费达无心把一瓢水泼在王子的脚上。王子搭起贵族的架子命令费达擦干。费达虽然勉强服从他的命令，但他仗着他平民的血性未免说了几句顶撞的话。王子登时大怒，用马鞭力鞭他的双颊。维娜公主于心不忍，竭力把王子拉开，同回府第。

夜阑人静，广境中火堆的四周围坐着许多鸠形鹄面的劳动者。当中立着费达，在演说俄国政府怎样的腐败，贵族怎样的鱼肉平民，听者莫不动容。鞑靼的浪女对他表示爱情。费达因身许俄国，将她拒绝，浪女以为他爱上维娜公主，十分怨恨。天色微明，伏尔加的船夫又动身走他们的长路了。

同时在府第里面，维娜公主和狄密德里正式订婚。

革命发动，狄密德里王子被征从军。数月之中，革命军声势大振，占了俄国的大半。费达也做了革命军的首领。他因

府第中的仆人，被维娜公主的父亲禁止不能出来投军，遂带了他们的党人去质问。

府第中的老王性质倔强，不肯降服。党人即据府第，自由行动，并命老王与公主设宴行酒。公主不肯喝庆祝革命的酒，反完全泼在费达的靴上。费达学王子的故智，命她擦干。她只得服从，但她的老仆义愤填胸，开枪想暗杀费达，不料被费达的同志看见，站起来用身体遮着费达。老仆竟开枪把他打死，党人大怒，鞑靼浪女乘机提议将公主枪毙偿命，众皆赞成。由费达单独行刑，费达允许党人都出室，约五分钟为限，让费达行刑。

费达独对着美丽的公主，再四迁延，五分钟已过，始终无开枪杀她的勇气，反而觉察他自己的良心十分的爱她，同时并绝端的佩服她不怕死的勇气。但是外面党人时时催逼，无路可逃，只得令她躺在地上把红葡萄酒倒在她的胸前，假作伤痕，然后开放空枪，党人进房，以为公主已死，不料鞑靼浪女竟看出破绽，报告众人。费达见众人大怒，只得和公主亡命奔逃，幸而府第的仆人曾预备马车，因此他们能安然出险，逃到一个小旅店里休息。费达因免人盘查起见，只得承认维娜是他的妻室。

是晚狄密德里王子所统辖的王军占据了那所旅店，费达和维娜被擒，维娜自承是皇族。但王军的军官不信，并把她带到酒排间百般侮辱，后来王子知道被辱的是他的未婚妻，大发雷霆。命令在明天开皇家跳舞会的时候将费达枪毙。

次晚伏尔加河边的一座小城里皇家跳舞会开幕，同时并

要枪毙革命军领袖费达。行刑时候到了，维娜从跳舞会出来看见费达将死，竟跑过去用身体遮着他，愿意和他同命。狄密德里正要命令开枪的时候，忽听见轰然一声党人已经袭占了小城。囚人的反被人囚。狄密德里及其他贵族，都立在阶下，受费达的审判。费达解开衣服，露出胸前背纤的伤痕，判贵族男子拉纤溯伏尔加河到革命裁判委员会。麦立许又出狡计提议命皇族妇女一同拉纤。费达见无可挽回，只得宣布自己愿与维娜同拉。于是珠履银舄的贵族只得像牛马一般去拉那磨筋折骨的纤绳。

革命裁判委员会中，有两个犯人，一个是千娇百媚的维娜公主，一个是英武不屈的狄密德里王子。革命的领袖费达，再用他恳切动人的辞锋，请求裁判委员念他为国尽忠赦他们二人。因为他爱维娜，狄密德里也爱他所爱的人。

委员会的决议，允许费达的请求。入党或出境，任他们选择一种。维娜愿意与费达共生死，帮助他建设新俄国。狄密德里愿意出境。堂上允许。维娜和费达齐声同唱他们的努力歌：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努力，奋斗，希望，牺牲！
往前进，向着那光明，
二人同心。

在结构方面。我觉得这影片是成功的，可以当得“谨严”两字的评语。而且借一段三角恋爱的故事来表现革命的斗

争，在技巧上确是非常巧妙。情节的穿插也很适当，这是读者可以从上面所录的说明书中看出来的。

虽然在本片的开始，字幕上便声明并非宣传，其实凡看过本片的人，谁也不能否认本片带着很浓的宣传色彩。它确实是一部带着极强的煽动性的影片，有许多的地方很有震撼观众的力量，而且有人根据原片及说明书写了一部中文小说。

美国人很难懂得俄国，很难懂得革命，所以才制出这种宣传影片，中国人也居然蹈了美国人的覆辙，所以才有人根据此片来写宣传小说（据说这影片是根据一本意大利小说改编的）。其实我们如果把多年来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研究一下，便可指出本片的一大缺点，就是：不曾做到艺术上的忠实。

本片的编者要想捉住时代，然而结果时代却从他的手中飞去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他所要捉住的时代是什么。试问从此片里我们能看出我们是在一九一七年么？不，不能。从本片里我们可以看出 Conspiracy① 式的起义，中国式的造反；我们可以看出革命的“钦差”（？）乘着船到处去发“令箭”式的首领标号；我们可以看出一群乱民去抢劫王公的府第；我们可以看出英雄美人的事迹，什么英勇不屈的王子，什么千娇百媚的公主，什么壮美勇健的革命领袖，什么风流跌宕的浪女；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女人而卖同志卖党，后来又为女人而请求饶恕王军司令官的革命首领；我们可以看出滑稽的革命裁判委员会与其滑稽的判决。我们是在一九一七年吗？不，也

① Conspiracy（英语）：密谋叛乱的意思。

许还要早一百年罢。

在《党人魂》里支持了几年的欧战之影响(俄国革命是离不掉这影响的)一点没有看到;要求"面包与和平"的呼声一点也没有听到;"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人,全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一点也没有听到;二月的共和革命一点也没有见到;城市无产阶级占领工厂及商店,农民没收土地的事实一点也没有见到;总之民众的自发的大运动一点也没有见到。在《党人魂》的俄国革命里,当时遍于全俄的工人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及地方苏维埃,在染受革命潮流极快的伏尔加流域中是完全没有用的,而必定要一个青年船夫做革命领袖,率领起一群鞑靼人像一七八九年巴黎民众攻击巴斯底狱一样去攻击一个无抵抗的崩坏的王公的爵邸。到了里面便大开娱乐会,大吃大喝,而且事事由鞑靼浪女出主意,革命民众又尽是些饭桶,所以他们的副领袖(因为他也有标号)可以任人枪杀,他们的领袖可以任意骗他们。而他们还是吃,喝,玩。一七八九年攻下巴斯底狱的巴黎市民是如是的吗?从这一点看来,《党人魂》影片的编者不但不能了解革命民众的心理,不但不懂得俄国民族性,而且还厚诬了俄国民众。所以《党人魂》后半部表演俄国革命之成功,在一般人看来,虽然是如何替俄国革命党宣传,而事实上的确是在描写革命党人的丑态。革命军胜利后浪女麦立许和铁匠史蒂芬,一个穿上王妃公主的服饰,一个打扮成贵族的样子演出种种的丑态,这种景象,只有令人肉麻。又如最后革命裁判委员会开庭审判狄密德里与维娜公主时审判的情形,法庭的布置已经奇怪了。而更奇怪的是费达向法庭请求释放维

娜公主，理由是“因为我爱她”，并且还请求释放狄密德里，理由是“因为他也爱她”。他的要求居然被允许了。(这是当然的事，不然怎么能够以大团圆来收场，怎么能够使那般以革命首领与美人为毕生的二大愿的人满意？)然而世间果然有这样的事么？我想如果革命两字的真意义还有人懂得，这样滑稽的革命党是不会有的。然而《党人魂》里却有了，所以《党人魂》完全没有做到艺术的忠实。

而尤为荒谬的是编者连俄国革命之进程也完全不懂得，二月革命这一事实就被他一笔勾消，所以那时候就有“党军”了。

然而我也不能够把本片的好处轻易埋没。本片前半部写革命前夕的情形，确实有很大的价值，船夫拉纤一段，费达与王子对话一段，费达足踏维娜公主的手套一段，革命党人秘密会议中费达演说一段，都是非常有力的。还有费达的同志遇害一段，费达预备执行维娜的死刑一段，以及后来维娜被王军军官调笑侮辱一段，狄密德里要在皇家跳舞会场前面枪决费达一段，演来都非常精彩。最使我感动的便是费达用足把维娜落在地上的手套用力地踏着的情景，说不出的无穷的哀怨和憎恨都从这简单的动作表现出来了。还有费达演说时，几个男女“工人”的面部表情也使我非常感动，这不仅表示出多年的哀怨和憎恨，而且还燃着未来的黄金般的希望，只看了这些脸，我们便知道有什么暴风雨要来了。

原片字幕是非常好，译文也能做到短劲而有力，如“我们船夫也有一条宝绶”，“现在我们流血，但不久别人的血也要流

了。"(费达对王子语);"你的歌声高出群众含着意义哩。"(维娜对费达语,其实应译作带着一种使命);"你们这种人哪里懂得!"(费达答语);"我们等了五百年才得自由,你必要等五分钟才死。"(费达对维娜语);"这是领袖的符号。为了你,我卖了党,卖了同志了。"(同上);"我现在要死了,我向你说一句在生所不能说的话";"我爱你,我死了也爱你";"你看,你的人和我的人有何分别,为什么也要用全军人马来杀我一个人呢?"(同上)。像这样漂亮,沉痛而有力的句子,在全片里是很多的。

演员的艺术也很不错,特别是费达和维娜两主角演得好,有些地方真可使人流泪。可惜维娜的性格有点模糊,但这是编剧人的错,演员不负责。

总之《党人魂》虽然够不上说是一部解释革命的影片,但在现今《怪魔》、《漠中情血》、《皇后私奔记》流行的电影界中总算是一部难得的片子,所以我看了一次,两次,三次。

广州二月记*

一　我的憧憬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的脑筋里就被印上了"广州"这两个字，我知道在中国的南部有这么一个城市，那是阳光常照的地方。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谈起去广州的事情，这朋友就对我倾吐了他对于那地方的憧憬。据说在一次病中发呓语的时候，他曾说过许多赞美广州的话。他说那是一个儿童的乐园。那里美丽得像童话里的天堂，无数的儿童快活地生活在里面，他们自由地在街中游戏，街中有各种的小贩，卖着各类的东西，让小孩们自由取用。

自然，这朋友还对我说这不过是一些呓语，他和我都不会相信。但是我自己对于广州的憧憬却也因此加深了。我常常想，如果能够到广州去，不管住多久总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这愿望不久就实现了，似乎来得非常容易。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中学生》第四十三号。发表时题为《广州——地方印象记》。署名马琴。

晚上从香港搭小火轮去广州，第二天大清早船就靠岸了。那一天正是端午节。我本来早已把旧历忘在九霄云外了，然而小火轮一进广州市，我就听见锣鼓的声音，接着两只龙船远远地向着我们这面划过来。无数的手摇着无数的桨，一些人站在船上敲锣，打鼓和欢呼。两只船用最快的速度竞赛着，但是不到一会儿功夫它们就消失在我们的后面了。小火轮缓缓地前进，两岸的街市在我的眼前渐渐地展开来。于是我们的船就在长堤码头停泊了。各种吵闹的声音和各样装束的人包围着我。广州的确是一个热闹的地方。

二　四层楼上

我的旅伴是一个广东人，他时常往来广州，对于这都市是十分熟悉的。他不需要挑夫的帮助，一个人提了两只箱子离了船，我跟在他后面。我们的脚坚实地踏在长堤的土地上面了。

两部"手车"把我们拉到永汉路的一家小商店门前。我以为那朋友会进商店去。但他却走进了商店旁边的一条窄巷。巷子里很黑暗，直到我走进去，我才知道那是楼梯。楼梯很高，走上去有些费力。我们走完一层，看见一个房间，从短门下面露出了一些男人和女人的赤脚。转一个弯，我们又上了更高的一层。大半的路程都是在黑暗里摸索着走了的。到了第四层，我那朋友才走进一个房间去，那是一家广告公司，里面堆满杂志。朋友宽慰地放下了箱子，这时候我已经是汗珠

满额了。

当我在那小商店门口下车的时候，我决不会想到第四层楼上会有这样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建筑在广州是很普通的，好些茶室，好些公司，好些人家都在这样建筑的楼上。所以有时候我稍微不小心走过了那登楼的地方，就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上得楼去。自然，这样的事也并不常有。

三 长 堤

沿着珠江的北岸，躺卧着长堤，这是最热闹的街市，车辆整日就没有停止过。

每天晚上，从河南那面看过来，长堤灿烂地炫耀着一片灯光。我常常站在河南一家建筑的楼上，用望远镜看对岸，那灯烛辉煌的河北夜市和西堤一带的高建筑尽入了我的眼底。

我有时也走过长堤，不过时间总是在夜里，而且我常走的是西堤一带。西堤只是长堤的热闹的一部分。是以永汉路为界的，永汉路以东的街市，那就是属于东堤的范围了。

在西堤一带有不少大的商店，旅馆，酒楼。演粤剧的海珠戏院在这里，那时候正演着薛觉先和月团圆班的戏，这海珠戏院是个高等的戏院。薛觉先是广东最时髦的伶人，据说有不少的大家小姐和姨太太爱着他。每晚上在海珠戏院的门口用电灯泡扎成了这一夜的戏目，如《梦断秦淮月》、《难忍相思泪》、《华丽缘》之类，在行人的眼前闪耀着。厅堂门外坐着一排收票人在那里谈笑，表示这一场的生意又不错。

离海珠戏院不远是明珠大戏院(在广州影戏院的名称是不同的，有的叫“有声画片院”有的叫“有声映画院”等等)，那是映美国影片的地方，有不少的高等华人走进那里面去，男男女女，都穿着华丽的衣服，像在参加时装表演。

同时，在靠珠江一边的路上，或者在海珠公园的废墟上，就站着好些中年妇人和青年女郎，她们穿着普通的服装，香云纱的短衫，不擦粉，看见人就做一个媚笑，娇声问：“叫艇吗?”

她们在那些地方常常徘徊到夜深，她们的笑容看得出来是勉强的，她们躲在半黑暗里，就像一些鬼魂。

珠江到夜间就平静了。在深夜江上只有稀疏的星点似的灯光，许多只篷船都睡在江面上。

我向着东堤那方向走，一会儿就走到了海珠桥下面。桥压在我的头上，许多人在我头上行走。我于是转了弯，走上石级，到了海珠桥上，长堤就躺在我的脚下了。

我站在桥畔，扶着栏杆回头去望长堤。西堤一带还有许多颗明星在霎眼。东堤一带却黯淡起来，只有几辆手车拖着微暗的灯光经过这桥下，往亮的或暗的地方去了。

我再俯下头去看江面。在我的脚下，许多只篷船静静地睡在那里，排列得很整齐，只有几点星子似的灯光点缀了黑暗的江面。

六 河 南

河南是外国人所不到的地方，大概就因为这缘故，才变成了一个和广州完全两样的世界。在这里充满着赌场和烟馆，那是对岸所完全没有的。河南就因为这两样东西而变得繁荣了。

烟馆据说有一百多家，名称都是××戒烟室或高等戒烟室，我每天总要经过许多家戒烟室，可是我却从没有机会进去看过。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那里面人把大烟叫做戒烟药膏。

赌场的数目不会比烟馆少。我可以用拥挤两个字来形容它们的数目之多。名称是××公司，像裕泰、裕丰这类名称都是很普通的。建筑是两层，门口有一个武装兵士守卫，招牌上还写了"楼上银牌"或者"银牌现钱"一类的字样。生意很好，每一家里面都挤满了人，我经过它们的门前时，总要看见不少的头和背影。

有一晚上我和一个朋友进去了。那赌场是一家较大的。楼下靠里放着柜台，铺上席子，一个做庄家的坐在柜台里面，旁边还有两三个帮手。好些赌客就站在这高柜台前面，没有座位，也没有茶。他们的装束和普通人没有分别，但押起注来却很大，有的一伸出手就是好几张十元的港纸，很快地便给庄家吃了进去。这叫做番摊，赌具是一堆围棋子。赌法很简单，人人懂得。

我们走上楼去，楼上屋中间有一个长方洞。洞很大，四面围着栏杆，栏杆前面安放着凳子，这都是赌客们的座位。他们坐在这里看着下面柜台上的棋子押注，楼上有管事，他用一个小篮子把赌客押的注吊下去。楼上的赌客是比较高一等的，他们可以记账，有茶喝，有香烟抽，有红瓜子嗑。他们下的注，数目也就更大，每个人都默默地坐在那里，注意地埋头看下面的钩心斗角的"生存竞争"。

这一个公司里面有许多同样的房间，也就有许多赌摊。若把全个河南的赌摊算起来，那数目就很可观了。据说政府每月要抽去一百数十万的赌税，可见赌场里每月银钱进出的数目是很大很大的。广东人爱赌博的那种豪气，真令人不能相信。

七 茶 馆

在河北茶馆是很多的，大约分三个等级，上等的叫做酒楼，中等的叫做茶室，下等的就是茶楼。上等的我没有去过，只有茶室和茶楼是我常到的地方。

据说饮茶有早茶、午茶、晚茶之分。广州人每天总有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茶馆里面。许多人一天总要进三次茶馆。在习惯上规定的饮茶时间内，每个茶楼里都没有空座位。每一张桌子上都有人在高谈阔论。每隔几分钟伙计就端了一笼点心出来，高叫着走过每张桌子，各人便可以尽量地随意挑选他爱吃的点心。但这时间一过，茶馆里又变得像沙漠般的荒凉

了。所以茶馆一天就只做几次生意。

茶室的顾客大半是学生和官厅的小职员，他们的学校和官厅就在这些茶室的附近，他们到这里吃一点简便的饭食，有时候也约朋友来闲谈，坐到两三个钟头。

还有一种茶楼雇得有两三个女伶清唱，生意自然不会坏，因为它们有一些捧歌女的顾客。这种又不能列在下等的茶馆里面了。

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进了一个这样的茶楼，有两个女伶在那里唱戏，锣声响得太厉害，快把人的耳朵震聋了，我们没福气享受这种中国的音乐，就匆忙地吃了两盘面出来，付账时却发觉价钱比别家茶楼贵了许多。

八 西 关

我很早就听见人说到西关，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许多古旧的大家庭就住在那一带。那里有宽阔的马路，也有旧式的窄巷和石板的小路。

有一次，一个朋友请我到西关的一家酒楼吃饭。那酒楼是一所很华丽的旧建筑，从前大概是一所富家公馆。里面有楼有阁，有廊有厅，有天井，有树木。

我们登了楼，进了一间很精致的楼房。大家坐下来，开开电风扇。露台上摆了好几盆鲜花，檐下垂着竹帘，阻拦了阳光。听不见一点闹声，这地方倒还清静。

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忽然走了进来，向

我们说了几句本地话，一个客人带笑地和她答了几句，她就高兴地出去了。不到一会儿功夫，那妇人又走了回来，在她的身后跟随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和那姑娘的母亲。

这姑娘打扮得很漂亮，有些儿像娼妓。她对着我们点了点头，就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不说一句话，把眼皮垂着，把手里的扇子摇着，不敢看别人一眼，却只管让别人看她。

主人没有这经验，这时候也觉得有些难为情了。就让那个本地客人和她们讲话。我听懂了一部分。那妇人说出来姑娘的身价一千四百元。

大家没有话说了。在座的客人里面并没有谁想买一个姨太太。于是那本地客人从袋里掏出两毫银角给了那老妇人，让她把另外两个女人带走了。那姑娘快走出房门时，还回转身子向我们微微鞠躬。

在中国买卖姑娘并不是一件古怪的事情，但是在公众的场所公开地把女人当作一件商品来招揽主顾，展示给人们看，当面讲价，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想这是开玩笑的事，事实上不会有这样的公开买卖。这个姑娘大概是妓女，不过用这样的谈话，来招揽生意罢了。

九　暑期学校

自然我也有机会和一些文化机关接触。譬如拿学校来说，那号称西南最高学府的××大学就是我常到的地方。

××大学的校址是很大的，全个建筑就只有青白两种颜

色，墙壁是白的，边沿是青的。

那时候学校里刚刚考试完毕，开始放暑假。然而学生们却比平时更加忙碌。我记得我有两天不曾去过××大学，第三天再去时，一切景象都变更了。我从大门进去，由后门出来，中间经过不少的地方，我的眼睛就没有停止过注视。那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类五光十色的暑期学校招生广告。这一处是物理学会的，那一张又是化学会的，还有数学会，历史学会，生物学系，国文系等等的。一个××大学里就办了六七个暑期学校，彼此竞争地招揽学生。单从那些广告上就可以看出彼此间的钩心斗角的竞争。好几张广告上都画着一个时髦的女郎的面孔或半身，头上还戴了一顶方帽。在广告旁边贴了招生简章，解说着进暑期学校的种种利益。

我经过了六七个报名处，看见果然有一些男女学生在里面报名。但我对于这情形还不能够彻底了解。我后来就去问一个朋友，这朋友是××大学的教授，他一定可以解除我的疑惑。

"这有什么难解释呢？"那朋友让我坐下来以后就带笑地对我说，"大学生在假期中也可以想点方法赚钱。"

"那些暑期学校都是学生办的。大学生教中学生，高中学生教初中学生，资格是够的。在这里每逢暑假一来，就有许多大学生、中学生开办暑期学校。生意并不坏。听说去年这种暑期学校很赚钱，所以今年大家就竞争得更厉害。"

"啊，"我似乎恍然大悟了，但我还禁不住问一句："为什么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学生进暑期学校呢？"

“你又忘记了？每个学校学生主办的暑期学校，都是拿读毕课程后下学期有正式升入该校的希望来号召的。当然有许多青年愿意来报名了。”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许多私立中学一经批准立案，就要大开庆祝会。这你也相信吗？”

我没有话说了。我无意间把眼光放到旁边那张小桌上面去，一份当日的《××报》躺在那里，就在封面上排印着几篇鸳鸯蝴蝶派的遗事艳史。

“这便是广州市销路最大的报纸，听说它受人欢迎就是靠了这些文章。”朋友看见我的脸上露了惊奇的颜色，不等我开口问，就这样解释道。

“上海的所谓报屁股，在这里倒变成了报头了。你要在这种报上找一点重要的新闻，真好像要一只骆驼穿过针眼。大部分的广州报纸就是靠这种文章来吸引读者。只有《广州日报》，《民国日报》两三家好一点，它们没有这种东西。它们有新的附刊。”朋友继续说下去，他在广州住了好几年，他知道的事情很多。

“在这里奇怪的事情多着呢，你不看见过电车轨道吗？但是这里却从来没有行驶过电车，据说当时没有一个电车公司担负得起那一笔捐税，现在呢，只好让筑好的轨道荒废了。”

“而且广州还逃不掉外国势力的压迫。市场是给外国货物占据了。香港是个自由港，外国货物可以很容易地流进来，售价不会很高。金融也给外国势力操纵着。广东钞票市价不定，全依港纸为转移。有了一个香港在附近，广州市的自由全

失了。”

十 不景气

“你问我的生意怎样？”一个商界的朋友摇着头对我说。“告诉你，不景气！不景气！今年七十二行生意，没有一行赚得了钱！捐税那么多，今天国防捐三千万，明天航空救国捐又是多少！我们哪里还有钱剩？大家都只有咬紧牙齿，度过这一年，希望明年好一点。但是看这情形，明年也是不会好的。”

“你以为这里的市面繁荣吗？其实全是表面上的，这里的市面是外强中干的。你该知道大部分广东人的钱是从美国来的。但今年受了不景气的影响，美国华侨兑回来的钱只比得上前几年的数目的四分之一。有好些在外国的华侨都快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意了。”

“不景气！不景气，到处都是不景气，”我含糊地应着。

十一 一个谜

我别了那位教授和那位商人，就独自跑到永汉路的一家茶室去。时候是七点钟，那茶室的夜市刚刚开始。我还是第一个客人。

我拣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伙计泡了一碗“菊井”来，我要了两碟点心，一边喝茶，一边掉头去看窗下街市的景象。

对面街旁有一家饮冰室，门面油漆得鲜明夺目，里面灯烛

辉煌，的确是一个热闹的地方。

我望着，我不停地望着那饮冰室。一辆汽车在门口停下来了，一个西装青年带了三个摩登女郎下车来走进了那里面。接着又有一对青年男女进去了。一刻钟以内在那冰店门口顾客的进出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没有一个人不是打扮得十分漂亮的。于是我的眼睛疲倦了，我不再往那地方看了。这时候那商人的话忽然重来到我的脑子里。

我也知道在中国没有一个都市不是一个谜。对于年轻的我，尤其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短期的过客，要了解一个都市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究竟是真正懂得了这个谜，或者是被外表迷了眼睛，连我自己也不能够判断。但有一点我是可以断言的：

广州是一个阳光常照的温暖的都市，假若我们爱春天爱太阳的话，那么广州还是一个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同时我引一段赫尔岑的话来做这短文的收场：

> 住惯了北国的人第一次和南方风景接触，便会充满着庄严的快乐。他觉得自己的年纪变轻了。他想唱歌，他想跳舞，他想哭；一切都是十分光荣，十分明亮，十分快活，十分茂盛。……

童　　年*

我不是一个预言家，我不知道我的前途。

然而像一个做坟墓的工人那样，我已经埋葬了许多许多的东西了。

在江的彼岸，山的那边，我埋葬了我的童年。

童年不是黄金时代，它是萌芽的时期，在那时候绿叶正从一棵生命树上生长出来。那些伴着春来到人间的嫩绿的新叶，我爱它，看见它们一天天地发育成长，我就想到那茂盛繁荣的将来。

我自己就是这样地长成了，从一个小孩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青年；也许还要到将来的某某样的一个中年人和一个老头儿；或者说不定我明天就不得不把生命交还给创造者。但是这一层我自己不知道，别的人也不知道。

然而在这一棵生命树上，新绿的树叶并不曾到茂盛繁荣的时期就纷纷飘落在地上了。我把它们堆在一起，我埋葬了它们，在江的彼岸，在山的那边。从那时到现在我并没有滴过一滴眼泪。有人说或者我是把眼泪滴在肚里了，这我却不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创化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道。可是在我的生涯里就永不会有那茂盛繁荣的前途了。

从那时候起我辞别了山，渡过了江，孤零零的一个身子，向着那大海走去，向着那人间的海洋走去。许多年来我不曾有一次回过头去看江的彼岸，山的那边，我埋葬童年的地方。我说我已经把它忘掉了。

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安慰，一股火烧着我的干枯的心。我像一个强硬汉子那样划着一只独木的小舟，游遍了人间的海，风浪并不曾淹没了我。

是在寒冷的冬夜，暴风打击着我的脸，巨浪颠播着我的独木舟，我的疲倦的身子，我的疼痛的手不能够支持了。

把船泊在一个巨大的岩石的脚下，我得到了暂时的休息。我抬头向天空看，我看见天边现出光芒。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在江的彼岸，山的那边，这时候正放射着光芒。

在那光芒中我看见了我的童年，就像一本书那样，它一页一页地，翻开，每一篇书页上都印着一个曾经被我爱过的面庞，但是它们都已经腐烂在坟墓里了。

如今它们在我的眼前活起来。每一个面庞给我一个微笑，嘴里唤了一声我做小孩时被人唤着的名字，于是许多活泼的人在我四周出现了，他们包围着我，给我一些温暖，一些安慰，我仿佛又变做了一个小孩，回到那广阔的大厦里，那美丽的花园里，听母亲底叮咛的嘱咐，伴着哥哥姊姊们游戏，那时候我爱着人，而我也被人爱着。

每天晚上在我们临睡之前母亲总要把我和另一个哥哥唤到她面前，叫我们摊开她亲手给我们抄写的《白香词谱》，选了

一首词给我们讲解，教我们诵读。过后我们就阖了书听她讲故事，听她叙说种种的事情。每晚，每晚都是这样。她仔细地给我们解说，直到我们完全了解她的意思。她教我们将来长大成人以后应该怎样忠实地去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因为在世间有着那么多的人是需要着爱，需要着帮助的。她把话说得如此美丽。

母亲并不是一个说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永远是忘了自己地去爱人，帮助人的。因了她的好心我才能够在仆婢们的诚挚的爱护中间生长起来。仆婢们把她当作他们底亲人一般地敬爱。在寒冷的冬夜里这爱也曾温暖了那些被幸福遗弃的人的心。

然而很快地她就被一只手拖进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我的呼唤挽不住她。从此每天晚上我和那个哥哥就不再诵读《白香词谱》了。我们常常含了眼泪地问自己：我们将来是否能够去爱人，去帮助人，像母亲所希望的那样。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那一对大眼睛充满了爱怜的眼光看着我，它们是十分明澈的，就像两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幼稚的心。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是我如今长大成人了。

许多的眼睛在我的面前睁开又在我的面前闭上了。我埋葬了一些人和一些事情，我又埋葬了我的全个童年。我辞别了山，母亲就伴着父亲长睡在山喂里；我跨过了江，我的故乡就在江的彼岸。我又越过了更高的山，跨过了更大的海，永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说我已经忘掉了一切。

但是如今那一对明灯似的眼睛又在我的心里显现了。越过了山，跨过了江，它们来到我这里，和从前，它们离开我时没有两样，是一般地明澈，照亮了我的心。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是我如今长大成人了。

两只明灯似的眼睛永远照耀在我的心上，不管这心已经不再是那幼稚的心了。

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诉苦，没有悔恨，依旧是一股火烧着我的心，那心上显现了旧的印迹：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帮助人，这是我的母亲亲手刻印的。只有这寥寥的几个字。那上面并没有"幸福"，并没有"休息"，并没有"光荣"，母亲决不会骗我，因为她是唯一爱我的人。

在这不眠的寒冷的冬夜，在巨大的岩石脚下，那两盏明灯又带了它们不灭的光芒显现了，它们照亮了我的心。我的心上面并不曾刻印着"幸福"，"休息"和"光荣"。这岩石脚下并不是我休息的地方。母亲是不会骗我的，我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诉苦，没有悔恨，我重新拿起桨，划起独木的小舟，再向着广阔的人间的海洋驶去，那两盏明灯悬挂在船头照耀着我的航路。我回过头望，我看不见岩石。海浪已经淹没了它。

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诉苦，没有悔恨，我紧紧地握着桨，向那海的中心划去。我不怕暴风巨浪颠覆我的独木小舟，我只是默默望着船头的两盏明灯。

1932年。

两 个 孩 子*

春天，今年花开得早，公园里桃花开满了半个山坡，从池边望过去，全是灿烂的花朵，就像一片红霞。在这个池边我和英度过了三个早晨和三个黄昏。

英在东城一所女子中学读书，我的学校在西城。她的家离我的学校近，可是我不能够到她家去。每天早晨天刚刚亮我就动身到公园去，在公园门口等她。池边的长椅是我们聚会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安静地过了两个钟头。没有人打扰我们，只有清脆的鸟声从对岸开满了花朵的树上送过来。我们的年纪很轻，都有着单纯的头脑和单纯的心。在这些时候我们畅快地谈着一些不能实现的孩子的幻想。我们忘记了公园外面的世界，其实我们的世界本来也是很狭小的。

我们又快乐，又悲痛。这两个不知世故的孩子遇合在一起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我们本来不应当流泪，本来不应当想到一些伤心的事情，因为我们还只是两个不知世故的孩子。然而奇怪的遭遇把我们的第一个美梦打破了。我们很早就懂得了悲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一期。

我是一个遗腹子，我一生没有见过父亲的面容。我在故乡里生活了十五年，伴着有目疾的母亲，和一个妹子。于是某国① 的铁蹄踏进了我的家乡。在一次大破坏、大混乱以后，我逃出了十五年来住惯了的美丽的小城，跟着一伙难民进了关。然而在路上遇到了一次飞机的追击和掷弹，我便失掉了母亲和妹子的踪迹。我已经陷落在绝望的境地里面了，忽然遇见了父亲的一位好友。靠着他的帮助我才能够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来，继续度过这两年的学校生活。

英生长在这个城市里，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她自小就过得很幸福，一直到六七年前，她先后死了父母。于是她落在伯父的掌心里。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小官僚看中了她的一份家产。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他对待英完全没有亲人的感情。他虐待她，监视她。他整天打主意想办法，要吞没她的家产。伯母也是一样的人，她是她丈夫的很好的助手。

在这情形下面，我和英认识了。这是偶然的事。英的一个女友是我一个同学的爱人。有一次我的同学约了我，那个女友约了英四个人一块儿去逛西郊那个大花园。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同时我也闯进她的世界里去了。

英并不漂亮。她的面貌很平常。她有一张圆圆脸，但是并不十分圆。鼻子不高，眼睛不大，嘴唇小。然而从她的整个面貌看来，她有一种孩子气，尤其是她笑的时候，两颊现出了

① 某国：指日本。

浅浅的酒窝，嘴唇微微动着，像一个逗人爱的小女孩。

我爱看她的笑脸，我爱听她的鸟叫般的声音。于是我们做了朋友。她说她也喜欢我，喜欢我爱淌眼泪。不用说，她是在跟我开玩笑。因为爱哭的是她，并不是我。

她的确是一个爱哭的女孩。事情一旦不如意，她马上把眉毛一皱，就淌下眼泪来。她告诉我在家里看了伯父伯母的带着吃人神气的脸，听了那些藏得有刀剑的话，她只好一个人关起门来躺在床上哭。在家里她找不到一个好心待她的人。

她的身体不算健康，喝了一口冷水也会使她病倒几天。她说这是哭坏了的，她说自从她的父母死后，她在家里不曾有过一天高兴的日子。直到她遇见我，和我来往几次以后，她才有了笑容。

我也是这样，我见着她，我才感觉到生活的乐趣，好像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颗星。这颗星虽然小，但是在阴暗里她却显得十分明亮。

我不懂爱情，她也一样。类似的不幸的遭遇把我们拉在一起。于是我们相爱了。她说她爱我，因为我能够了解她，安慰她；我爱她，因为她是和我一样地有着单纯的心和单纯的头脑的孩子。她是我生活里的唯一的安慰。

起初我们常常见面，那些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地消磨光阴：我们在公园里比较清静的地方，无论草地上，长椅上，半山里坐下来，在一起谈着种种的事情，谈着悲痛的过去，谈着寂寞的现在，谈着做梦似的将来，彼此倾诉着，话永远说不完，仿佛积了十多年的话在肚里，要在这些时候吐个干净。有时候我

们也和那一对相爱的朋友在一起划船，看电影，或者做别的可以使人暂时高兴的事情。那一对朋友年纪比我们大，懂得的事情也比我们多，他们的环境比我们好。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究竟差了许多。

我和英在一起日子过得容易多了。虽然我有时也想起在异国铁蹄下面的故乡，也想起我的失了踪迹的母亲和妹子，不能熄灭的火焰慢慢地从心底升上来，使我寂寞得几乎没有勇气生活下去。但是，她的安慰却给我扫除了这一切。她使我忘掉寂寞，忘掉渴望。她用关心的注视和真挚的同情鼓励了我，她自己并不曾对我说过一句鼓励的话。我们不懂爱情，我们只知道把我们两个寂寞孩子的心系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环境里挣扎下去，两个人手拉手地走那漫漫的长途。于是我们相爱了。

那还是去年秋天的事，如今春天来了。

春天给人带来了勇气和快乐。看见那些枯树发芽开花，看见河水解冻，让鱼虾自由自在地浮上水面，我心里非常快活。这时候我想到将来，我想到我们的前途，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地悲观、绝望了。英也是这样。在公园的池边我们接连地度过了三个美丽的早晨和三个美丽的黄昏。

然而这种渺小的幸福也会遭到妒忌。打击来了。英的脸庞渐渐地在褪色。她好几天不曾真心笑过。于是我们见面的机会渐渐地减少了。我要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屡次追问她，她终于把真相讲了出来：她的伯父、伯母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对她很不满意。他们阻止她和我来往。这个消息使我愤怒。

我起初找不到他们禁止她和我见面的理由，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不愿意把她嫁给外人，他们想吞没她那一份家产。

我劝过她许多次，在口里说，在信上也说，要她拿出勇气来反抗他们，不要听从他们的话，甚至要她跟他们断绝关系。她只是含糊地答应着。她并不是一个刚强的女孩。她在他们的掌握里过了六七年以后，如今不能够自拔出来了。她不敢反抗他们。她太软弱了。

她偷偷地逃出来和我见面，常常是在早晨上课的时间以前，或者下午放学以后，免得她家里的人疑心她。我们这样地常常见面，可是谈话的时间却减少了。她不能够在外面耽搁久一点，否则回家就要受到严厉的责问。她能够这样地忍受下去，她把痛苦吞在肚里，忍在心里。我却不能够。我失掉忍耐心了。

我不断地向她解说反抗的好处。我又说明屈服会产生怎样悲惨的结果。这都没有用。六七年的训练把她的勇气完全摧毁了。终于有一天我哀求地对她说：

"英，你为什么不跟他们闹翻？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毁了你自己，你也毁了我。"

她却流下眼泪，她请我原谅她，她要我把她忘掉。她说她只希望能够早死。十六岁女孩的口里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差不多要哭了。

眼泪也不能消除我的憎恨。我同情她，但是我更恨她的伯父、伯母。我安慰她，我更向她反复解说：她应当反抗他们；她不该牺牲她的幸福来满足他们的野心。我更热烈地说，这

种用家长身份来压迫年轻人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那么就让她拿反抗来惩罚他们罢。

她似乎相信了这些话，她似乎下了决心要照我所说的做去。然而下一次我们见面时她又告诉我她不能够这样做。她请我原谅她，她要我重视六七年来的生活在一个女孩的精神上留下的影响。

希望似乎破灭了。但是我还不相信。我看见她坐在我的身边，我想不到我会把她永远失去。

桃花开始谢了。粉红色的花瓣铺满了半个山坡。然而在对岸的池边再没有了英的踪迹。

我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手里捏着英的一封信：

> 请原谅我。我不能够再和你见面了。我实在是一个没有用的女孩，我只能够听人摆布。你不要来找我，他们不会让你见我……

我不信她的话。我到学校里去找过她，据说她好些日子不曾来上课了。我到她的女友那里去，那位姑娘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我也曾到她的家去过。我知道她一定在家里。但是那里的人不肯接待我。我吵闹也没有用处，正如她所说他们不会让我见她。

她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我再也找不到她。我眼看着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样横遭摧残，却毫无办法。

她除了这封信，就不曾给我留下任何的纪念品，而且连这

封信也是残缺的。她并不曾写完它，我不知道那许多黑点代表的是些什么。

我一个人坐在池边的长椅上，手里拿着她写给我的唯一的信。我望着对岸半山的落红，想起我们从前在这里谈过的那些孩子的幻想，我还在等待她回到我的身边来。

1934年秋在上海。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

大都市的月亮没有光辉。宽广的马路两旁玻璃橱窗里射出来辉煌的灯光，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射出来刺目的红绿颜色。

人走在人行道上看不见月色。他满眼都是电车、汽车、黄包车。大都市的确很热闹。

但是渐渐地大都市有些疲倦了。各种车子也少起来。法租界的大马路也显得清静了。

两个喝醉了的外国水手从一家白俄开的跳舞场里出来，嘴里含糊地说着放肆的话。跳舞场门口有着红、绿、蓝、黄四色的霓虹灯，里面奏着爵士音乐。

"米昔！米昔！"马路上有三个黄包车夫拖着空车向着外国水手跑过去，口里乱嚷着。那两个醉得脸通红的白皮肤的人正走下人行道，就给他们围住了。

他们并不跳上车。年纪轻一点的水手忽然飞起一只脚踢在一个车夫的屁股上，用很清楚的中国话骂着："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新生》第一卷第三十六期。发表时题为《一九三×年·双十节·上海》。

于是车子全散开，让这两个人带笑地走了。

中年的黄包车夫拖了空车慢慢地跨过街心，因为这一踢使他的屁股上那个地方还在痛。羞辱和痛苦压住他的心。他抬起头望着天空，祷告似地喃喃说：

“天啊，为什么我的鼻子不高起来？我的眼睛不落下去？我的头发不黄，眼珠不绿，皮肤不白呢？”

天是不会开口的，它看见任何不公平的事情也不会开口。

中年车夫只得埋下头，继续往前面走了。

“外国人究竟肯花钱啊！”他又这样地想道，因为他从外国客人那里拿到过较多的车钱。然而他马上想起了另一件事情：两天以前他拉着一个外国客人到处跑了两个钟头，只得到四角钱和两记重重的耳光，连鼻血也给打出来了。

“他们肯花钱啊！”这一次他再想到这个就有些发恼。他那时生时灭的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恨又渐渐地在他的胸膛里燃烧起来了。

他慢慢地拖了空车走着，忽然他的左膀给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同时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句清楚的中国话：“走，快走！”

他连忙掉头一看，一个高大的人站在他的身边，高鼻子，黄头发，绿眼珠，白皮肤，从那深陷的眼睛里射出来一股轻蔑的眼光，这眼光代替嘴说出了一个字：“狗！”

中年车夫没有反抗，也没有迟疑，马上放下车子让那个人坐上去，于是拉起车往前跑了。

那个白皮肤的人在车上不停地用皮鞋踢踏板，口里哼着

下流的西洋小调，一面给车夫指路，一面催车夫跑得再快些。然而车夫已经用尽力气了。

在马路旁边一个巷子里车子停了下来。白皮肤的人轻蔑地掷了一个双角在地上，并不看车夫一眼。

石阶上有几家小店，都挂着酒吧间的洋招牌，但都上了铺板。有一家的门半开，从里面送出来男女的笑声，白皮肤的人刚跨进去就给一个有着小孩面孔的红衣姑娘搂住了。

车夫放下车子，就坐在踏板上休息。他想到自己那个被卖掉的女儿，三年来他没有得到她任何的消息。

那家小店的门依旧半开，车夫看见了里面的景象。几个黄皮肤的小姑娘坐在高大的白皮肤的人的怀里，她们的小脸上露出来不自然的媚笑。

车夫心痛了好一会儿，终于疲倦地站起来，拉起车子走了。在路上他抬起头望着天空祷告似地喃喃说：

“天啊，为什么我们的鼻子不高起来？我们的眼睛不落下去？我们的头发不黄？眼珠不绿，皮肤不白呢？”

在那个为白皮肤的人开设的下等酒吧间里面，一个中国小姑娘在膀子上生满了毛的外国水手的怀中哭了。

中国女子的哭常常是有泪无声的。她今年才十四岁呢，然而父母却把她的不曾发育完全的身体卖到这里来，给那些可以做她父亲的人蹂躏了。

她的身体十分娇小，坐在那个高大的外国水手的怀里简直像一只小猫，怪不得他叫她做可爱的小猫了。

年轻女孩向来多幻想，但是现实生活把她的幻想一个一个地打破了。她常常像痴呆一般地坐在高大的白皮肤的人的怀里，让他们玩弄。有时候她却又不能不记起她的父母，她离开他们的时候，母亲正在生病，父亲靠拉车度日。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她以后就跟他们断绝了音信。在这个世界上她就成了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那个水手色情地抓住她的娇小的身子在抚弄。他快活地想："在地中海旁边我们的国家里也不曾见过这样可爱的东西呀！是这样的一种滋味！那些黄皮肤的野蛮人，吃饭不用刀叉，喝茶不放糖，说话就像吵闹，把人当做马来骑，像猪一般活在污秽里，身躯短小，形容萎顿，为了一块钱就会卖掉朋友，卖掉父亲！想不到在他们里面居然有着这样的宝贝！上海的确好过非洲殖民地，也好过号称小巴黎的西贡啊！"

小姑娘给文明人的毛手抚弄着。她抬起泪眼望天，但是天却给屋顶遮住了。她望着新近油漆过的天花板，祷告似地在心里念着：

"天啊，为什么我的鼻子不高起来？我的眼睛不落下去？我的头发不黄，眼珠不绿，皮肤不白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变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呢？为什么我就不早死呢？"

她不能够念下去了，那一张沉重的大嘴压下来，喷了她一脸的酒气，闷得她透不过气来。

对面一条马路的转角，一个高等跳舞场开在那里，五六个高等华人拥了两三位名媛走出来，坐上两部汽车开走了。

"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幸福啊！父母给我们留下那么多

的财产，社会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苦力！……”

那个白净脸的年轻绅士，棉纱大王的儿子在汽车里满意地想道。

1934年10月在上海。

木匠老陈*

生活的经验固然会叫人忘记许多事情。但是有些记忆经过了多少时间的磨洗也不会消失。

故乡的那些房屋，那些街道至今还印在我的脑子里。我还记得我每天到学堂去总要走过的木匠老陈的铺子。

木匠老陈那时不过四十岁光景，脸长得像驴子脸，左眼下面有块伤疤，嘴唇上略有几根胡须。大家都说他的相貌丑，但是同时人人称赞他的脾气好。

他平日在店里。但是他也常常到相熟的公馆里去做活，或者做包工，或者做零工。我们家里需要木匠的时候，总是去找他。我就在这时候认识他。他在我们家里做活，我只要有空，就跑去看他工作。

我那时注意的，并不是他本人，倒是他的那些工具：什么有轮齿的锯子啦，有两个耳朵的刨子啦，会旋转的钻子啦，像图画里板斧一般的斧子啦。这些奇怪的东西我以前全没有看见过。一块粗糙的木头经过了斧子劈，锯子锯，刨子刨，就变成了一方或者一条光滑整齐的木板，再经过钻子、凿子等等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太白》第一卷第四期。署名余一。

具以后，又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像美丽的窗格，镂花的壁板等等细致的物件，都是这样制成的。

老陈和他的徒弟的工作使我的眼界宽了不少。那时我还在家里读书，祖父聘请了一位前清的老秀才来管教我们。老秀才不知道教授的方法，他只教我们认一些字，呆板地读一些书。此外他就把我们关在书房里，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让时间白白地过去。过惯了这种单调的生活以后，无怪乎我特别喜欢老陈了。

老陈常常弯着腰，拿了尺子和墨线盒在木板上面画什么东西。我便安静地站在旁边专心地望着，连眼珠也不转一下。他画好了墨线，便拿起锯子或者凿子来。我有时候觉得有些地方很奇怪，不明白，就问他，他很和气地对我一一说明。他的态度比那个老秀才的好得多。

家里的人看见我对老陈的工作感到这么大的兴趣，并不来干涉我，却嘲笑地唤我做老陈的徒弟，父亲甚至开玩笑地说要把我送到老陈那里学做木匠。但这些嘲笑都是好意的，父亲的确喜欢我。因此有一个时候我居然相信父亲真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对老陈说过要跟他学做木匠的话。

"你要学做木匠？真笑话！有钱的少爷应该读书，将来好做官！穷人的小孩才学做木匠，"老陈听见我的话，马上就笑起来。

"为什么不该学做木匠？做官有什么好？修房子，做家具，才有趣啊！我做木匠，我要给自己修房子，爬到上面去，爬得高高的，"我看见他不相信我的话，把它只当做小孩子的胡

说，我有些生气，就起劲地争论道、

“爬得高，会跌下来，”老陈随口说了这一句，他的笑容渐渐地收起来了。

“跌下来，你骗我！我就没有见过木匠跌下来！”

老陈看我一眼，依旧温和地说：“做木匠修房子，常常拿自己性命来拚。一个不当心在上面滑了脚，跌下来，不跌成肉酱，也会得一辈子的残疾。”他说到这里就埋下头，用力在木板上推他的刨子，木板查查地响着，一卷一卷的刨花接连落在地上。他过了半晌又加了一句：“我爹就是这样子跌死的。”

我不相信他的话。一个人会活活地跌死！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见人说过。既然他父亲做木匠跌死了，为什么他现在还做木匠呢？我简直想不通。

“你骗我，我不信！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做木匠？难道你就不怕死！”

“做木匠的人这样多，不见得个个都遭横死。我学的是这行手艺，不靠它吃饭又靠什么？”他苦恼地说。然后他抬起头来看我，他的眼角上嵌得有泪珠。他哭了！

我看见他流眼泪，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就跑开了。

不久祖父生病死了，我也进了学堂，不再受那个老秀才的管束了。祖父死后木匠老陈不曾到我们家里来过。但是我每天到学堂去都要经过他那个小小的铺子。

有时候他在店里招呼我；有时候他不在，只有一两个徒弟在那里钉凳子或者制造别的物件。他的店起初还能够维持下去，但是不久省城里发生了巷战，一连打了三天，然后那两位

军阀因为别人的调解又握手言欢了。老陈的店在这个时期遭到“丘八”的光顾，他的一点点积蓄都给抢光了，只剩下一个空铺子。这以后他虽然勉强开店，生意却很萧条。我常常看见他哭丧着脸在店里做工。他的精神颓丧，但是他仍然不停手地做活。我听说他晚上时常到小酒馆里喝酒。

又过了几个月他的店终于关了门。我也就看不见他的踪迹了。有人说他去吃粮当了兵，有人说他到外县谋生去了。然而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了他。他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了几件木匠用的工具。

“老陈，你还在省城！人家说你吃粮去了！”我快活地大声叫起来。

“我只会做木匠，我就只会做木匠！一个人应该安份守己，”他摇摇头微微笑道，他的笑容里带了一点悲哀。他没有什么大改变，只是人瘦了些，脸黑了些，衣服脏了些。

“少爷，你好好读书。你将来做了官，我来给你修房子，”他继续含笑说。

我抓住他的袖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告辞走了。他还告诉我他在他从前一个徒弟的店里帮忙。这个徒弟如今发达了，他却在那里做一个匠人。

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老陈。我虽然喜欢他，但是过了不几天我又把他忘记了。等到公馆里的轿夫告诉我一个消息的时候，我才记起他来。

那个轿夫报告的是什么消息呢？

他告诉我：老陈同别的木匠一起在南门一家大公馆里修

楼房，工程快要完了，但是不晓得怎样，老陈竟然从楼上跌下来，跌死了。

在那么多的木匠里面，偏偏是他跟着他父亲落进了横死的命运圈里。这似乎是偶然，似乎又不是偶然。总之，一个安份守己的人就这样地消失了。

1934年秋在上海。

忆

《忆》，一九三六年七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四四年一月，共印行十版(次)。

忆*

啊，为什么我的眼前又是一片漆黑？我好像落进了陷阱里面似的。我摸不到一样实在的东西，我看不见一个具体的景象。一切都是模糊，虚幻。……我知道我又在做梦了。

我每夜都做梦。我的脑筋就没有一刻休息过。对于某一些人梦是甜蜜的。但是我不曾从梦里得到过安慰。梦是一种苦刑，它不断地拷问我。我知道是我的心不许我宁静，它时时都要解剖我自己，折磨我自己。我的心是我的严厉的裁判官。它比 Torquemada① 更残酷。

“梦，这真的是梦么？”我有时候在梦里这样地问过自己。同样，“这不就是梦么？”在醒着的时候，我又有过这样的疑问。梦景和真实渐渐地融合成了一片。我不再能分辨什么是梦和什么是真了。

薇娜·妃格念尔② 关在席吕谢尔堡中的时候，她说过：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作家》第一卷第四号。

① Torquemada：十五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

② 薇娜·妃格念尔(V.Figner，1852—1942)：旧俄民粹派女革命家，在席吕谢尔堡监狱里给关了二十年。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五年侨居国外，后返国。她写了许多回忆录(《难忘的劳动》，1921—22年版)。

"那冗长的、灰色的、单调的日子就像是无梦的睡眠。"我的身体可以说是自由的，但我不是也常常过着冗长的、灰色的、单调的日子么？诚然我的生活里也有变化，有时我还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然而这变化有的像电光一闪，光耀夺目，以后就归于消灭；有的甚至也是单调的。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的头上，一只铁手扼住我的咽喉。所以便是这些灰色的日子也不像无梦的睡眠。我眼前尽是幻影，这些日子全是梦，比真实更压迫人的梦，在梦里我被残酷地拷问着。我常常在梦中发出叫声，因为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曾停止过挣扎。

这挣扎使我太疲劳了。有一个极短的时间我也想过无梦的睡眠。这跟妃格念尔所说的却又不同。这是永久的休息。没有梦，也没有真；没有人，也没有自己。这是和平。这是安静。我得承认，我的确愿望过这样的东西。但那只是一时的愿望，那只是在我的精神衰弱的时候。常常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时期，我的精神上又起了一种变化，我为这种愿望而感到羞惭和愤怒了。我甚至责备我自己的懦弱。于是我便以痛悔的心情和新的勇气开始了新的挣扎。

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① 我的灵魂里充满了黑暗。然而我不愿意拿这黑暗去伤害别人的心。

---

① 在这里我借用了妃格念尔的话。她还说："——在外表上我不得不保持安静勇敢的面目，这个我做到了；然而在黑夜的静寂里我会带着痛苦的焦虑来想：末日会到来吗？——到了早晨我就戴上我的面具开始我的工作。"她用这些话来说明她被捕以前的心境。

我更不敢拿这黑暗去玷污将来的希望。而且当一个青年怀着一颗受伤的心求助于我的时候，我纵不是医生，我也得给他一点安慰和希望，或者伴他去找一位名医。为了这个缘故，我才让我的心，我的灵魂扩大起来。我把一切个人的遭遇、创伤等等都装在那里面，像一只独木小舟沉入大海，使人看不见一点影响。我说过我生来就带有忧郁性，但是那位作为"忧郁者"写了自白的朋友，却因为看见我终日的笑容而诧异了，虽然他的脸上也常常带着孩子的傻笑。其实我自己的话也不正确。我的父母都不是性情偏执的人，他们是同样地温和、宽厚、安份守己，那么应该是配合得很完满的一对。他们的灵魂里不能够贮藏任何忧郁的影子。我的忧郁性不能够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那应该是在我的生活环境里一天一天地磨出来的。给了那第一下打击的，就是母亲的死，接着又是父亲的逝世。那个时候我太年轻了，还只是一个应该躲在父母的庇护下生活的孩子。创伤之上又加创伤，仿佛一来就不可收拾。我在七年前给我大哥的信里曾写道："所足以维系我心的就只有工作。终日工作，终年工作。我在工作里寻得痛苦，由痛苦而得满足。……我固然有一理想。这个理想也就是我的生命，但是我恐怕我不能够活到那个理想实现的时候。……几年来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结果我依旧得到痛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还要以更大的勇气走我的路。"但是在这之前不久的另一封信里我却说过："我在心里筑了一堵墙，把自己囚在忧郁的思想里。一壶茶，一瓶墨水，一管钢笔，一卷稿纸，几本书……我常常写了几页，无端的忧愁

便来侵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胸膛里激荡，我再也忍不下去，就掷了笔披起秋大衣往外面街上走了。”

在这两封信里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么？我的生活，我的心情都是如此的。这个恐怕不会被人了解罢。但是原因我自己却明白。造成那些矛盾的就是我过去的生活。这个我不能抹煞，我却愿意忘掉。所以在给大哥的另一封信里我又说：“我怕记忆。我恨记忆。它把我所愿意忘掉的事，都给我唤醒来了。”

的确我的过去像一个可怖的阴影压在我的灵魂上，我的记忆像一根铁链绊住我的脚。我屡次鼓起勇气迈着大步往前面跑时，它总抓住我，使我退后，使我迟疑，使我留恋，使我忧郁。我有一颗飞向广阔的天空去的雄心，我有一个引我走向光明的信仰。然而我的力气拖不动记忆的铁链。我不能忍受这迟钝的步履，我好几次求助于感情，但是我的感情自身被夹在记忆的钳子里也失掉了它的平衡而有所偏倚了。它变成了不健康而易脆弱。倘使我完全信赖它，它会使我在彩虹一现中随即完全隐去。我就会为过去所毁灭了。为我的前途计，我似乎应该撇弃为记忆所毒害了的感情。但是在我这又是势所不能。所以我这样永久地颠簸于理智与感情之间，找不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的一切矛盾都是从这里来的。

我已经几次说过了和这类似的话。现在又来反复解说，这似乎不应该。而且在这时候整个民族的命运都陷在泥淖里，我似乎没有权利来絮絮地向人诉说个人的一切。但是我终于又说了。因为我想，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我在许多人的

身上都看见和这类似的情形。使我们的青年不能够奋勇前进的，也正是那过去的阴影。我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倘使我们是没有过去生活的原始人，我们也许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来。

但是回忆抓住了我，压住了我，把我的心拿来肢解，把我的感情拿来拷打。它时而织成一个柔软的网，把我的身体包在里面；它时而燃起猛烈的火焰，来烧我的骨髓。有时候我会紧闭眼目，弃绝理智，让感情支配我，听凭它把我引到偏执的路上，带到悬崖的边沿，使得一个朋友竟然惊讶地嚷了出来："这样下去除了使你成为疯子以外，还有什么？"其实这个朋友却忘了他自己也有不小的矛盾，他和我一样也是为回忆所折磨的人。他以为看人很清楚，却不知看自己倒糊涂了。他把自己看作人类灵魂的医生，他给我开了个药方：妥协，调和；他的确是一个好医生，他把为病人开的药方拿来让自己先服了。然而结果药方完全不灵。这样的药医不了病。他也许还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我却知道唯一的灵药应该是一个"偏"字：不是跟过去调和，而是把它完全撇弃。不过我的病太深了，一剂灵药也不会立刻治好多年的沉疴。

…………

我又在做梦了。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不，我的眼前尽是些幻影。我的眼睛渐渐地亮了，那些人，那些事情。……难道我睡得这么深沉么？为什么他们能够越过这许多年代而达到我这里呢？

我全然在做梦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我自

己。好像被一种力量拉着，我沉下去，我沉下去，于是我到了一个地方。难道我是走进了坟墓，或者另一个庞贝城被我发掘了出来？我看见了那许多人，那些都是被我埋葬了的，那些都是我永久失掉了的。

我完全沉在梦景里面了。我自己变成了梦中的人。一种奇怪的感情抓住了我。我由一个小孩慢慢地长大起来。我生活在许多我的同代人中间，分享他们的悲欢。我们的世界是狭小的。但是我们却把它看作宇宙般地广大。我们以一颗真挚的心和一个不健全的人生观来度我们的日子。我们有更多的爱和更多的同情。我们爱一切可爱的事物：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我们像一群不自私的孩子去领取生活的赐与。我们整天尽兴地笑乐，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笑乐。我们从不曾伤害过别的人。然而一个黑影来掩盖了我们的灵魂。于是忧郁在我们的心上产生了。这个黑影渐渐地扩大起来，跟着它就来了种种的事情。一个打击上又加第二个。眼泪、呻吟、叫号、挣扎，最后是悲剧的结局。一个一个年轻的生命横遭摧残。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忆给别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里面不能自拔……

啊，我怎么做了一个这么长久的梦！我应该醒了。我果然能够摆脱那一切而醒起来么？那许多生命，那许多被我爱过的生命在我的心上刻划了那么深的迹印，我能够把他们完

全忘掉么？

我把这一切已经埋葬了这么多的年代，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这样长的梦？这样痛苦的梦？甚至使我到今天还提笔来写《春》？

过去，回忆，这一切把我缚得太紧了，把我压得太苦了。难道我就永远不能够摆脱它而昂然地、无牵挂地去走我自己的路么？

我的梦醒了。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我要摆脱那一切绊住我的脚的东西。我要摆脱一切的回忆。我要把它们全埋葬在一个更深的坟墓里，我要忘掉那过去的一切。

不管这是不是可能，我既然开始了我的路程，我既然跟那一切挣扎了这许多年代，那么，我还要继续挣扎下去。在永久的挣扎中活下去，这究竟是我度过生活的美丽的方法。

1936年5月。

最初的回忆*

"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说的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那间朝南的屋子里做针线的时候，她常常对我们弟兄姊妹（或者还有老妈子在场）叙述她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抬起她的圆圆脸，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想不到却是一个这样淘气娃娃！"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笑了。

母亲很爱我。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来没有骂过我。她让我在温柔、和平的气氛中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子。

---

*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四年第一出版社版《巴金自传》，未在报刊发表过。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我四五岁的光景，跟着母亲从成都到了川北的广元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大概有六七进。

我们住在三堂里。

最初我同母亲睡，睡在母亲那张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者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微光，这是从方桌上那盏清油灯的灯草上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我睡在被窝里，常常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在书房里读书，地点是在二堂旁边。窗外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面貌非常和善。他有时绘地图。他还会画铅笔画。他有彩色铅笔，这是我们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

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几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的功课比我的稍微多一点，他比我只大一岁多。

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母亲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

“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

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少女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

“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耍！”

她高兴地微笑了。

“香儿，你小心照应他们！”母亲这样吩咐。

“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

我们穿过后房门出去。

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一条宽的过道。

桑叶肥大，绿阴阴的一大片。

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

“我们快来拾桑果！”

香儿带笑地牵着我的手往桑树下面跑。

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了我的鼻子。

“好香呀！”

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里送。

我们也吃了几颗。

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

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的两手也是。

“看你们的嘴！”

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给我们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

“我们快去找鸡蛋！”

香儿连忙揩了她的嘴，就牵起我的手往里面跑。

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倒在地上了。

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

草地上一只麻花鸡伸长了颈项得意地在那里一面走，一面叫。

我们追过去。

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

“我们看哪一个先找到鸡蛋？”

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到了那个鸡蛋。

有时候我也找到的，因为我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下蛋。

香儿虽然比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比她少。

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是我的军队。

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

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桑树。

左边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等等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

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

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

凤头鸡，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

麻花鸡，是一只有黑黄色小斑点的鸡。

小凤头鸡比凤头鸡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它跟普通的母鸡就没有分别。

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

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

每天早晨起床以后，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三堂后面去。

香儿把鸡房的门打开了。

我们揭起了每一只鸡笼。我把一只一只的鸡依着次序点了名。

“去罢，好好地去耍！”

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围着啄吃。

我便走了，进书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比较迟一点放学。

我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四堂后面去。

我睡在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觉得自己好像睡在床上。

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

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

“大花鸡，不要叫！再叫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

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上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

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了一点鸡毛，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

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

“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

有时候我同三哥在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

傍晚吃过午饭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到天快要黑了就同三哥一起，叫香儿陪着，去把鸡一一地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照应进了鸡笼。

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曾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

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我忽然发觉少了一只鸡。

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了。”香儿望着我笑。

“杀了?”

“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

不错，我吃过! 那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

我没有话说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

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气得流出眼泪来。

“都是你的错! 你坏得很! 他们捉鸡去杀，你晓得，你做什么不跟我说?”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跟你说就是了。”香儿笑着向我告饶。

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黑鸡的事情。

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

我走过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拐门里遇见了香儿。

“四少爷，我正在等你!”

"什么事情?"

我看见她着急的神气,知道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

"太太又喊何师傅杀鸡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

"哪一只鸡? 快说。"我睁着一对小眼睛看她。

"就是那只大花鸡。"

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长着不少白色斑点。我最爱它!

我马上挣脱香儿的手,拚命往里面跑。

我一口气跑进了母亲的房里。

我满头是汗,我还在喘气。

母亲坐在床头椅子上。我把上半身压着她的膝头。

"妈妈,不要杀我的鸡! 那只大花鸡是我的! 我不准人家杀它!"

我拉着母亲的手哀求。

"我说是什么大事情! 你这样着急地跑进来,原来是为着一只鸡。"

母亲温和地笑起来,摸出手帕给我揩了额上的汗。

"杀一只鸡,值得这样着急吗? 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

"我不吃,妈,我要那只大花鸡,我不准人杀它。那只大花鸡,我最爱的……"

我急得哭了出来。

母亲笑了。她用温和的眼光看我。

“痴儿，这也值得你哭？好，你喊香儿陪你到厨房里去，喊何厨子把鸡放了，由你另外拣一只鸡给他。”

“那些鸡我都喜欢。随便哪只鸡，我都不准人家杀！”我依旧拉着母亲的手说。

“那不行，你爹吩咐杀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只鸡已经给何厨子杀了。”

提起那只大花鸡，我忘掉了一切。我马上拉起香儿的手跑出了母亲的房间。

我们气咻咻地跑进了厨房。

何厨子正把手里拿着的大花鸡往地上一掷。

“完了，杀死了。”香儿叹口气，就呆呆地站住了。

大花鸡在地上扑翅膀，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

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来擦去。颈项上现出一个大的伤口，那里面还滴出血来。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死的挣扎！

我不敢伸手去挨它。

“四少爷，你哭你的大花鸡呀！”这是何厨子的带笑的声音。

他这个凶手！他亲手杀死了我的大花鸡。

我气得全身发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回头拔步就跑，我不顾香儿在后面唤我。

我跑进母亲的房里，就把头放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

“妈妈，把我的大花鸡还给我！……”

母亲温柔地安慰我，她称我做痴儿。

为了这件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时候。

这天午饭的时候，桌子上果然添了两样鸡肉做的菜。

我望着那两个菜碗，就想起了大花鸡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态。

我始终不曾在菜碗里下过一次筷子。

晚上杨嫂安慰我说，鸡被杀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

她又告诉我，那只鸡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为杀鸡的时候，袁嫂在厨房里念过了"往生咒"。

我并不相信这个老妈子的话，因为离现实太远了，我看不见。

"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做菜吃？"

我这样问母亲，得不着回答。

我这样问先生，也得不着回答。

问别的人，也得不着回答。

别人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始终不懂。

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对于我，它却是我的伴侣，我的军队。

我的一个最好的兵就这样地消失了。

从此我对于鸡的事情，对于这种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活着的鸡的事情，就失掉了兴趣。

不过我还在照料那些剩余的鸡，让它们先后做了菜碗里的牺牲品，连凤头鸡也在内。

老妈子里面，有一个杨嫂负责照应我和三哥。

高身材，长脸，大眼睛，小脚。三十岁光景。

我们很喜欢她。

她记得许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我和三哥常常找机会躲在她的房里，逼着她给我们讲故事。

香儿也在场，她也喜欢听故事。

杨嫂很有口才。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

我们听完了故事，就由她把我们送回到母亲房里去。

坝子里一片黑暗。草地上常常有声音。

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声在石阶上很响。

杨嫂手里捏着油纸捻子，火光在晃动。

我们回到母亲房里，玩一会儿，杨嫂就服侍我在母亲的床上睡了。

三哥跟着大哥去睡。

杨嫂喜欢喝酒，她年年都要泡桑葚酒。

桑葚熟透了的时候，草地上布满了紫色的果实。

我和三哥，还有香儿，我们常常去拾桑葚。

熟透了的桑葚，那甜香真正叫人的喉咙痒。

我们一面拾，一面吃，每次拾了满衣兜的桑葚。

“这样多，这样好！”

我们每次把一堆一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给她看，她总要做出惊喜的样子说。

她拣几颗放在鼻子上闻，然后就放进了嘴里。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吃桑葚。

我们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红红的，嘴也是。

“够了，不准再吃了。”

她撩起衣襟揩了嘴唇，便打开立柜门，拿出一个酒瓶来。

她把桑葚塞进一个瓶里，一个瓶子容不下，她又去取了第二个，第三个。

每个瓶里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南唐李后主：《忆江南·怀旧》

从母亲那里我学着读那叫做“词”的东西。

母亲剪了些白纸订成好几本小册子。

我的两个姐姐各有一本。后来我和三哥每个人也有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

母亲差不多每天要在小册子上面写下一首词，是依着顺序从《白香词谱》里抄来的。

是母亲亲手写的娟秀的小字。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的灯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亲站着。

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我们读着小册子上面写的字。

这是我们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

我们跟着母亲读出每一个字，直到我们可以把一些字连接起来读成一句为止。

于是母亲给我们拿出来那根牛骨做的印圈点的东西和一盒印泥。

我们弟兄两个就跪在方凳子上面，专心地给读过的那首词加上了圈点。

第二个晚上我们又在母亲的面前温习那首词，一直到我们能够把它背诵出来。

但是不到几个月母亲就生了一个妹妹。

我们的小册子里有两个多月不曾添上新的词。

而且从那时候起我就和三哥同睡在一张床上，在另一个房间里面。

杨嫂把她的床铺搬到我们的房里来。她陪伴我们，照料我们。

这个妹妹大排行第九，我们叫她做九妹。她出世的时候，我在梦里，完全不知道。

早晨我睁起眼睛，阳光已经照在床上了。

母亲头上束了一根帕子，她望着我笑。

旁边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声。

杨嫂也望着我笑。

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是我睡在母亲床上的最后一天了。

秋天，天气渐渐地凉起来。

我们恢复了读词的事情。

每天晚上，二更锣一响，我们就阖上那本小册子。

“喊杨嫂领你们去睡罢，”母亲温和地说。

我们向母亲道了晚安，带着疲倦的眼睛，走出去。

“杨嫂，我们要睡了。”

“来了！来了！”杨嫂的高身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她常常牵着我走。她的手比母亲的粗得多。

我们走过了堂屋，穿过大哥的房间。

有时候我们也从母亲的后房后面走。

我们进了房间。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我同三哥睡的，另一张是杨嫂一个人睡的。

杨嫂爱清洁。所以她把房间和床铺都收拾得很干净。

她不许我们在地板上吐痰，也不许我们在床上翻斤斗。她还不许我们做别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并不恨她，我们喜欢她。

临睡时，她叫我们站在旁边，等她把被褥铺好。

她给我们脱了衣服，把我们送进了被窝。

“你不要就走开！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她正要放下帐子，我们就齐声叫起来。

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给我们讲故事。

有时候我们要听完了一个满意的故事才肯睡觉。

有时候我们就在她叙述的中间闭上了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什么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我们都不去管了。

生活就是这样和平的。

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只有平静的喜悦。

然而刚刚翻过了冬天，情形又改变了。

晚上我们照例把那本小册子阖起来交给母亲。

外面响着二更的锣。

"喊你们二姐领你们去睡罢。杨嫂病了。"

母亲亲自把我们送到房间里。二姐牵着三哥的手，我的手是母亲牵着的。

母亲照料着二姐把我们安置在被窝里，又嘱咐我们好好地睡觉。

母亲走了以后，我们两个睁起眼睛望着帐顶，然后又掉过脸对望着。

二姐在另一张床上咳了几声嗽。

她代替杨嫂来陪伴我们。她就睡在杨嫂的床上，不过被褥帐子完全换过了。

我们不能够闭眼睛，因为我们想起了杨嫂。

三堂后边，右边石阶上的一排平房里面，第四个房间，没有地板，一盏瓦油灯放在破方桌上面……

那是杨嫂从前住过的房间。

她现在生病，又回到那里去了，就躺在她那张床上。

外面石阶下是光秃的桑树。

在我们的房里推开靠里一扇窗望出去，看得见杨嫂的房间。

那里很冷静，很寂寞。

除了她这个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里。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迟。

我们以后就没有再看见杨嫂，只知道她在生病，虽然常常有医生来给她看脉，她的病还是没有起色。

二姐把我们照料得很好。还有香儿给她帮忙。她晚上也会给我们讲故事。

我渐渐地把杨嫂忘记了。

“我们去看杨嫂去！”

一天下午我们刚刚从书房里出来，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声对我说。

“好！”我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们跑到三堂后面，很快地就到了右边石阶上的第四个房间。

没有别人看见我们。

我们推开掩着的房门，进去了。

阴暗的房里没有声音，只有触鼻的臭气。在那张矮矮的床上，蓝布帐子放下了半幅。一幅旧棉被盖着杨嫂的下半身。她睡着了。

床面前一个竹凳上放着一碗黑黑的药汤，已经没有热气了。

我们胆怯地走到了床前。

纸一样白的脸。一头飘蓬的乱发。眼睛闭着。嘴微微张开在出气。一只手从被里垂下来，一只又黄又瘦的手。

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女人就是杨嫂。

我想起那张笑脸，我想起那张讲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瓶的桑葚酒。

我仿佛在做梦。

“杨嫂，杨嫂。”我们兄弟两个齐声喊起来。

她的鼻子里发出一个细微的声音。她那只垂下来的手慢慢地动了。

身子也微微动着。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

眼睛睁开了，闭了，又睁开得更大一点。她的眼光落在我们两个的脸上。

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笑。

“杨嫂，我们来看你！”三哥先说，我也跟着说。

她勉强笑了，慢慢地举起手抚摩三哥的头。

“你们来了。你们还记得我。……你们好罢？……现在哪个在照应你们？……”

声音是多么微弱。

“二姐在照应我们。妈妈也来照应我们。”

三哥的声音里似乎淌出了眼泪。

“好。我放心了。……我多么记挂你们啊！……我天天都在想你们。……我害怕你们离了我觉得不方便……”

她说话有些吃力，那两颗失神的眼珠一直在我们弟兄的脸上转，眼光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和善。

她这样看人，把我的眼泪也引出来了。

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只手是冷冰冰的。

她的眼光停留在我的脸上。

“四少爷，你近来淘不淘气?……多谢你还记得我。我的病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的。”

我的眼泪滴到她的手上。

“你哭了！你的心肠真好。不要哭，我的病就会好的。”

她抚着我的头。

“你不要哭，我又不是大花鸡啊！”

她还记得大花鸡的事情，跟我开起玩笑来。

我并不想笑，心里只想哭。

“你们看，我的记性真坏！这碗药又冷了。”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转，瞥见了竹凳上的药碗，便把眉头一皱，说着话就要撑起身子来拿药碗。

“你不要起来，我来端给你。”

三哥抢着先把药碗捧在手里。

“冷了吃不得。我去喊人给你煨热！”三哥说着就往外面走。

“三少爷，你快端回来！冷了不要紧，吃下去一样。你快不要惊动别人，人家会怪我花样多。”她费力撑起身子，挣红了脸，着急地阻止三哥道。

三哥把药碗捧了回来，泼了一些药汤在地上。

她一把夺过了药碗，把脸俯在药碗上，大口地喝着。

她抬起头来，把空碗递给三哥。

她的脸上还带着红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边的药渣，颓然地倒下去，长叹一声，好像已经用尽了力气。

她闭上眼睛，不再睁开看我们一眼。鼻子里发出了轻微的响声。

她的脸渐渐地在褪色。

我们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间里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阴暗起来。

“三少爷，四少爷，四少爷，三少爷！”

在外面远远地香儿用她那带调皮的声音叫起来。

“走罢。”

我连忙拉三哥的衣襟。

我们走到石阶上，就被香儿看见了。

“你们偷偷跑到杨大娘房里去过了。我要去告诉太太。”

香儿走过来，见面就说出这种话。她得意地笑了笑。

“太太吩咐过我不要带你们去看杨大娘，”她又说。

“你真坏！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们不怕！”

香儿果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责骂我们。她只说我们以后不可以再到杨嫂的房间里去。不过她并没有说出理由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杨嫂的病不但不曾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

我们经过三堂后面那条宽的过道，往四堂里去的时候，常常听见杨嫂的奇怪的呻吟声。

听说她不肯吃药。听说她有时候还会发出怪叫。

人一提起杨嫂，马上做出恐怖的、严肃的表情。

“天真没有眼睛：像杨嫂这样的好人怎么生这样的病！”

母亲好几次一面叹气，一面说。

但是我不知道杨嫂究竟生的是什么病。

我只知道广元县没有一个好医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

又过了好几天。

“四少爷，你快去看，杨大嫂在吃虱子！”

一个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学出来，在拐门里遇到香儿，她拉着我的膀子，对我做了一个怪脸。

“我躲在门外头看。她解开衣服捉虱子，捉到一个就丢进嘴里，咬一口。她接连丢了好几个进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骂。她后来又脱了裹脚布放在嘴里嚼。真脏！”

香儿极力在摹仿杨嫂的那些动作。

“我不要看！”

我生气地挣脱了香儿的手，就往母亲的房里跑。

虱子、裹脚布，在我的脑子里无论如何跟杨嫂连不起来。杨嫂平日很爱干净。

我不说一句话，就把头放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母亲费了好些功夫来安慰我。她含着眼泪对父亲说：

“杨嫂的病不会好了。我们给她买一副好点的棺材罢。她服侍我们这几年，很忠心。待三儿、四儿又是那样好，就跟自己亲生的差不多！”

母亲的话又把我的眼泪引出来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义了。

可是杨嫂并不死，虽然医生已经说病是无法医治的了。

她依旧活着，吃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怪叫。

每个人对这件事情都失掉了兴趣，谁也不再到她的房门外去偷看、偷听了。

一提起杨嫂吃虱子……，大家都不高兴地皱着眉头。

"天呀！有什么法子使她早死，免得受这种活罪。"

大家都希望她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的办法。

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母亲第一个反对。

但是杨嫂的存在却使得整个衙门笼罩了一种忧郁的气氛。

无论谁听说杨嫂还没有死，马上就把脸沉下来，好像听见了一个不祥的消息。

许多人的好心都希望着一个人死，这个人却是他们所爱的人。

然而他们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在吃午饭。

"杨大娘死了！"

香儿气咻咻地跑进房来，开口就报告这一个好消息。

袁嫂跟着走进来证实了香儿的话。

杨嫂的死是毫无疑惑的了。

"谢天谢地！"

母亲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好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

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谁也无心吃饭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

健康的杨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泼地出现了。

我终于把饭碗推开，俯在桌子上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同时我想起了杨嫂的最后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对我们谈起了杨嫂的事情：

她是一个寡妇。她在我们家里做了四年的老妈子。

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就只有这一点点。

她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却不能够跟着我们回成都去。

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所以我们就把她葬在广元县。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坟前有没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么字。

“在阴间（鬼的世界）大概无所谓家乡罢，不然杨嫂倒做了异乡的鬼了，”母亲偶尔感叹地对人说。

在清明节和中元节，母亲叫人带了些纸钱到杨嫂的坟前去烧。

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

我也喜欢读书，因为我喜欢我们的教读先生。

这个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种种办法取得我们的敬爱。

“刘先生。”

早晨一走进书房，我们就给他行礼。

他带笑地点点头。

我和三哥坐在同一张条桌前，一个人一个方凳子，我们觉得坐着不方便，就跪在凳子上面。

认方块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

母亲曾经叫贾福传过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管教我们。

但是我从不知道严厉是怎么一回事。我背书背不出，刘先生就叫我慢慢地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去，三哥也是。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更喜欢书房。

而且在充满阳光的书房里看大哥和两个姐姐用功读书的样子，看先生的温和的笑脸，看贾福的和气的笑脸，我觉得很高兴。

先生常常在给父亲绘地图。

我不知道地图是什么东西，拿来做什么用。

可是在一张厚厚的白纸上面绘出许多条纤细的黑线，又填上各种的颜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还有许多奇怪的东西，例如现今人们所称为圆规之类的仪器。

绘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绘，刘先生那种俯着头专心用功的样子，仿佛还在我的眼前。

“刘先生也很辛苦啊！”我时时偷偷地望先生，这样地想

起来。

有时候我和三哥放了学，还回到书房去看先生绘地图。

刘先生忽然把地图以及别的新奇的东西收起来，笑嘻嘻地对我们说：

“我今晚上给你们画一个娃娃。”

这里说的娃娃就是人物图的意思。

不用说，我们的心不能够等到晚上，我们就逼着他马上绘给我们看。

如果这一天大哥和二姐、三姐的功课很好，先生有较多的空时间，那么用不着我们多次请求，他便答应了。

他拿过那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是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涂上了颜色。

“这张给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脸上总要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

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图画。因为这些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

图画一张一张地增加，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几十张图画了。

我一直缺少玩具，所以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

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和房屋……它们在我的脑子里活

动起来。

然而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张更大的图画：有狮子、有老虎、有豹子、有豺狼、有山、有洞……

这张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书上见过。先生不肯绘出来给我们。

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讨图画。

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寂寞罢。

我们站在旁边看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

忽然墙外面响起了长长的吹哨声。

先生停了笔倾听。

"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啊！"

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

"他现在又要换马了！"

于是轻微的马蹄声去远了。

那个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是用专差送达的。送信的专差到一个驿站就要换一次马，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

先生花了两三天的功夫，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我渴望了许久的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有豹、有狼的图画绘成功了。

我进书房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着那张画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给我的。"

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绘出来给我了。

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

"先生，我要！"我红着脸，跑到刘先生的面前。

“过几天我再画一张给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不可！”

我马上就哭出来，不管先生怎样劝，怎样安慰，都没有用。

同时我的哭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

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说他是坏人。

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向我解释。

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了母亲的房里。

母亲带着严肃的表情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我止了泪，倾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她还要贾福去传话请先生打我。

我埋着头让贾福牵着我的手再到书房里去。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

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系好散开了的鞋带。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全送给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莫名其妙。

“我都不要！”我毫无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近乎“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嫩绿的春天。到处散布生命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布满了芝麻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

蚕卵陆续变成了极小的蚕儿。

蚕儿一天一天地大起来。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的事情忙着。

大的簸箕里面摆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它们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两间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天晚上半夜里，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者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着，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在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浅绿色的蚕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一片沙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就觉得心里像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一发病就要痛三四天。

“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会得到这种病，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看见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个病的药方，那时候在广元似乎没有好医生。但是老妈子的肚皮里有种种古怪的药方。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痛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黄酒是买不到的。母亲便请父亲托人在合州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母亲养蚕的事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回她忘记加桑叶，蚕因此饿死了许多。后来她稍微疏忽一点，又让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去。她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害怕她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背誓的恐惧时时折磨她，

她终于下了养蚕的决心。

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生了效。不过后来母亲就同薛太太结拜了姊妹。

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下了几个茧子来玩。

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丝车。

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吃，他们不绝口地称赞味道的鲜美。

“做条蚕命运也很悲惨啊！”我有时候会这样地想起来。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案。

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人(公差)，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案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

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人就把犯人按倒在地上，给他褪下裤子，露出屁

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个混账东西不肯说实话！”

“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啊！”

那个人趴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啊！”

“胡说！你招不招？”

那个犯人依旧哭着喊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人就停住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啊！”

“你这个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一直打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由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

“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个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打屁股差不多是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人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由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

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好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罢！"

我在心里要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好跑开了。

我把这件事对母亲讲了。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跟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人。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我并不听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不曾回答我的问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到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房里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些犯人实在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不杀一个人。”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伴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我们就回成都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也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产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了。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总是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戴枷的犯人蹲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却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离新年还远，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父亲知道了，就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人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望着彼此的脸。

“喊你们给我打！”父亲更生气了。

差人大声应着。但是没有人动手。

刘升他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一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

这时候差人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

我心里很难过，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我听见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说了些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仍旧很亲切，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

又有一次，我看见领九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九妹在出痘子，依照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特别锐敏。她会在奶妈的嘴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露出

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前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明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人拉着她的两只手，另一个差人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轻的奶妈临走的时候脸色凄惨，眼角上还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后来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个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感到后悔。她说那个晚上她忘记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件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了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向他解释：

"丫头同老妈子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记住。"

三哥埋下头，不敢说话。香儿高兴地在旁边暗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地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我的话。你懂得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云片糕去。喊香儿陪你们去耍。"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现在母亲也做了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件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官回成都去了，虽

然那个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的生活我的确过得很愉快，因为在这里人人都对我好。我们家添了两个妹妹：九妹和十妹。

这两年中间我只挨过一次打，因为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磕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胁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挨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是我始终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挨母亲的鞭子。

从小时候起我就讨厌礼节。而且这种厌恶还继续发展下去。

父亲在广元做了两年的县官，回到成都以后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还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而且不久革命就爆发了。

我当时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做革命，更谈不到拥护或者害怕，只有十月十八日的兵变给我留下了一个恐怖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仍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一天听见教书先生（他姓龙）用激动的声音讲起当时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开说出反对清朝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大的尊敬，而且他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两年。他们的辫子是在日本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剪掉了辫子），现在他们戴上了假的辫子。有些人在背后挖苦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

我的脑后垂着一根小小的、用红头绳缠的硬辫子；我每天早晨都要母亲或者老妈子给我梳头，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倒喜欢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

*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四年第一出版社版《巴金自传》，未在报刊发表过。

旧历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冥寿)，家里的人忙着摆供。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家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到变兵的光顾。

其实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二伯父的公馆虽然离我们这里很近,但是在当时谁也失掉了判断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遭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小的骚动，众人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里去想"逃难"的办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大家就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圆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圆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顶楼板上面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来，把我们弟兄姊妹带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地拉起轿帘看外面的街景。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擅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轻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嘈杂的人声。好像离这里只有十几步路的赵公馆给变兵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带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

天是红的。几株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我们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叹息。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墙并不高。一个老妈子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躲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到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

母亲一晚上都在担心家里的事情。第二天十九日的上午外面平静了，她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

父亲告诉我们：昨晚半夜里果然有十几个变兵撬了大门进来。家里已经有了准备。十几个堂勇端起火药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排成了两排，再加上三叔的两个镖客（三叔在南充做知县，刚刚从那里回来）。变兵看见这里人多，不敢动手，只说来借点路费。父亲叫人拿了一封银元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只损失了这一百圆。以后再也没有变兵进来过。

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祖父也到别处去了。

这一天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是家里已经忘了这件事情。

从此我们就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知给谁拿去了，父亲叫人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找到。

赵尔丰被革命党捉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印象。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被杀头的事情。

共和革命算是成功了。

二叔和三叔头上的假辫子也取了下来。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在一个晴明的下午，仆人姜福（他不知道从哪里刚学会了剪发的手艺）找了一把剪发的洋剪刀，把我和三哥的小辫子剪掉了。

接着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仆人中有一两个不肯剪的，却不留心在街上给警察强迫剪去了。

我们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照例由父亲管这些事情。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小杯子在大圆形的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代表当时的十八省。

我对于做国旗的事情感到兴趣。但是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家里又把大汉旗收起，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为革命而感到悲哀。父亲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三叔还是一个诗人，写过不少诗词。祖父也是诗人，还印过一册诗集《秋棠山馆诗钞》送人。父亲和二叔却不常做诗。

至于我们这一辈，虽然大都是小孩子，但是对于清朝政府的灭亡，都觉得高兴。

清朝倒了。我们依旧在龙先生的教导下面读书。但是大哥不久就进了中学。

两年半以后，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死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旧历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痛苦的。一直到最后一天，她还很清醒，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们到病床前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兄弟姊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也不能够安慰她，减轻她的痛苦。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她临死前五天还叫大哥到一位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看，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对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样痛苦的病中还想到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个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老妈子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含着眼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两个人手里拿着红绫的两头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以后几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个时候饱看她。

红绫终于放下去了。它掩盖了母亲的遗体。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个人就抬着棺盖压上去。

二姐和三姐不肯走开，她们伤心地哭着，把头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听见签押房里两个姐姐的哀哀的哭声。我不能够闭上眼睛。我的眼泪也淌了出来。我怜悯我的两个姐姐。我也怜悯我自己。

早晨我也会被她们的哭声惊醒。我就躺在床上，含着眼泪祷告母亲保佑我的两个姐姐。

白天我常常望着签押房里灵帷前母亲的放大照像。我心里想着这时候母亲在什么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们三弟兄匍匐地跪在灵前蒲团上，听着张

二表哥诵读父亲替我们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

诵读的声音很可笑。我不过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我细嚼着这两句话的滋味，我的眼泪滴在蒲团上了。

第二天灵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殡在城外一座古庙里，后来安葬在磨盘山。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好了两个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果然睡在那个穴里面了。

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恢复了原状。母亲房里的陈设跟母亲在时并没有两样，只多了一张母亲的放大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进父亲的房间，看不见母亲，还以为她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了一声"妈"。但是我马上就想起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了。

我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跟有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接了一个更年轻的母亲来。

这位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并不能够医好我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像死去的母亲那样地爱我，我也不能够像爱亡母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原是两个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的光景二姐也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痨”的病。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病了。有一次她几乎死掉，后来有人介绍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来治好了她。

因此母亲叫人买了刀叉做了西餐，请了四圣祠医院的几个“洋太太”到我们家里来吃饭。这是我们第一次跟西洋人接触。她们都会说中国话。我觉得她们也很和气。

母亲同那几个英国女医生做了朋友。她带着我到她们的医院里去玩过几次，也去看过病。她们送了我们一些西洋点心和好几本书。我很喜欢那本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不过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去读它。母亲死后，我们就没有跟那几个英国女医生来往了。

母亲一死，二姐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大概是过分的悲痛毁坏了她的身体。

她一天天地瘦弱起来，脸上没有一点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她常常提起母亲就哭，我很少看见她笑过。

“妈，你看二姐多可怜，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姐啊！”我常常在暗中祷告。

但是二姐的病依旧没有起色。父亲请了许多名医来给她诊断，都没有用。

冬天一到，二姐便睡倒了。谁看见她，都会叹息地说：她瘦得真可怜。

旧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是祖父的生日，从那一天起，我们家

里接连唱了三天戏。戏台在大厅上，天井里坐了十几桌客。全家的人带着笑容跑来跑去。

二姐一个人病在房里，听见这些闹声，她一定很难受。晚上客人散去了大半，父亲便叫人把二姐扶了出来，远远地坐在阶上看戏。

二姐坐在一把藤椅上，不能动，用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戏台。我不知道她眼里看见的是什么景象。

脸瘦成了一张尖脸，嘴唇也枯了。我的心为爱、为怜悯而痛苦了。

“我要进去，”二姐把头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样子低声说。老妈子便把她扶了进去。

三天以后二姐就永远闭了她的眼睛。她也死在天明以前。那时候我在梦里，不能够看见她的最后一刻是怎样过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到了一个坟场。地方很宽，长满了草。中间有一座陌生人的坟。坟后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仿佛是在春天的早晨。阳光在树梢闪耀，坟前不少的野花正开出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两三只蝴蝶在花间飞舞。树枝上还有些山鸟在唱歌。

我站在坟前看墓碑上刻的字，一阵微风把花香送进我的鼻子里。忽然坟后面响起了哭声。

我惊醒了。心跳得很厉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声依旧在我的耳边荡漾。我分辨出来这是三姐的哭声。

我感到了恐怖。我没有疑惑：二姐死了。

父亲忙着料理二姐的后事。过了一会儿，姨外婆坐了轿

子来数数落落地哭了一场。

回到成都以后我还是一个小孩。能够同我在一块儿玩的，就只有三哥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还有几个仆人。在广元陪我们玩的香儿已经死了。

大哥已经成人。他喜欢和姐姐、堂姐、表姐们一块儿玩。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男男女女很多。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就忙起来。姐姐、堂姐、表姐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子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评论《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当时虽然不曾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中的人物和事情。

后来有两个表姐离开了成都，二姐又跟着母亲死了。大哥和姐姐们的聚会当然没有以前那样地热闹，但是也还有新

的参加者，譬如两个表哥和一个年轻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参加过两三次。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讲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戏。可园演的有川戏，也有京戏。我们一连看了两三个月。父亲是那个戏园的股东，有一厚本免费的戏票。而且座位是在固定的包厢里面，用不着临时去换票。我们爱看武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斤斗，翻杠杆。

父亲喜欢京戏。当时成都戏园加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这种事情大半由他主持。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之前常常先到我们家来吃饭。自然是父亲请客。他们有时也在我们的客厅里清唱。

有一次父亲请新到的八九个京班名角在客厅里吃饭。饭后大家正在花园里玩，那个唱老旦的宝幼亭(我们先听过了他的唱片)忽然神经错乱，跪在地上赌咒般地说了好些话。众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我们在旁边觉得好笑。我和这些戏子都很熟，有时我还跟着父亲到后台去看他们化装。

一个唱青衣的小孩名叫张文芳，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当时在成都也受人欢迎。他的哥哥本来也唱青衣，如今嗓子坏了不再登台了，就管教弟弟，靠着弟弟过活。他也到我们家里来

过一次。他完全是个小孩，并没有一点女人气。然而在戏里他却改换面目做了种种的薄命的女人。我看惯了他演的那些悲剧，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有一次离新年不远，我跟着父亲到了他们住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戏园里面)，看见他穿一身短打，手里拿了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舞着，我不觉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会儿，问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亲来带我回家的时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罢。

然而说句公平的话，父亲对待戏子的态度很客气，他把他们当作朋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并没有玩过小旦。

三叔却不同，他喜欢一个川班的小旦李凤卿。祖父也喜欢李凤卿。有一次祖父带我去看戏。李凤卿包了头穿着粉红衫子在台上出现以后，祖父带笑地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

李凤卿时常来找三叔。他也常常同我们谈话。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会写一手娟秀的字。他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是举动和说话都像女人，有时候手上、脸上还留着脂粉。

有一次三叔把李凤卿带到我们客厅里来化装照相。我看见他在那里包头，擦粉，踩蹻。他先装扮成一个执长矛的古代的女将，后来就改扮做一个旗装贵妇。这两张照片后来都挂在三叔的房里，三叔还亲笔题了诗在上面。

李凤卿的境遇很悲惨。后来在祖父死后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还是三叔出钱把他安葬了的。

三叔做了一副挽联吊他，里面有“……也当忍死须臾，待侬一诀”的话。

二叔也做过一副挽联，我还记得上下联的后半句是："……哪堪一曲广陵，竟成绝响。……惆怅落花时节，何处重逢。"

后来二叔偶尔和教书先生谈起这件事情，那个六十岁的曹先生不觉惊讶地问道：

"××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位风雅士！"

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县的时候，曹先生是那个县的教官。曹先生到我们家来教书还是三叔介绍的。李凤卿当时在南充唱戏，三叔在那里认识了他。

听见"风雅士"三个字，就跟平日听见曹先生说的"大清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浃沦肌髓"的话一样，我觉得非常肉麻。

二叔对曹先生谈起李凤卿的生平。他本是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给仇人抢了去，因为他家里不肯出钱赎取，他就被人坏了身子卖到戏班里去，做了旦角。

五叔后来也玩过川班的旦角。他还替他们编过剧本。

我们组织过一个新剧团，在桂堂后面竹林里演新剧。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张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主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种种方法强迫她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她们走。

父亲也被我们拉来了。他居然坐在那里看完我们演的戏。他又给我们编了一个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二哥和三哥扮着戏里面两个主角表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父亲也哈哈地笑起来。

在公馆里我有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跟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跟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爱管闲事，我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们一起玩，常常向他们问这问那，因此他们都叫我做“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我就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那个柴灶里去。他们打纸牌时，我也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帮忙。有时候他们也诚恳地对我倾吐他们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评主人们的好坏。他们对我什么事都不隐瞒。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我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也毫不吝惜。

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种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跟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后来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离开我们家，到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当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然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活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

人也无法制止他的愤怒。

我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那些老轿夫在烟灯旁叙述他们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下听到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我同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到我离开成都的时候。不过我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后，就很少有时间在门房和马房里面玩了。接着我又参加了社会运动。

我早就不到厨房里去了，因为我不高兴看谢厨子和老妈子调情（他后来就同祖父的一个老妈子结了婚，那个女人原是一个寡妇），而且谢厨子仗着祖父喜欢他，常常欺凌别人，也使我不满意他，虽然我从前常常到厨房去看他烧菜做点心。

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那些虚伪的礼节和应酬。有两次在除夕全家的人在堂屋里敬神，我却躲在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外面有许多人叫我，我也不应。我默默地听着爆竹声响了又止了，再过一会儿我才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家里平日敬神的时候，我也会设法躲开。我为了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是我始终照自己的意思做。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个人合作办了一种小说杂志，名称就叫《十日》，一个月出三本，每本用复写纸抄了五六份。

我是杂志的第一个订户。大哥把他那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说在《十日》杂志第一期上面发表了，所以他们也送他一份。

还有一个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们家里大哥是第一个写小说的人。他的小说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旧句开始的。奉表哥的小说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诸如此类的公式文章。把"女郎"两个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说。小说的结局离不掉情死,后面还有一封情人的绝命书。

我对于《十日》杂志上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兴趣。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小说时分明摊开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牍,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说和杂志。小说里每段描写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从尺牍或者文选上面抄来的。他们写小说并不费力。不过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非常佩服。

《十日》杂志出版了三个月,我只花了九个铜元的订费,就得到厚厚的九本书。

民国六年春天成都发生了第一次巷战。在这七天川军同滇军的巷战中,我看见了不少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这时候二叔的两个儿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白喉症死了。我在几天的功夫就失掉了两个同伴。

他们本来可以不死,但是因为街上断绝了行人,请不到医生来治病,只得让他们躺在家里,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后来两个轿夫背着他们跨过战壕,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医院时,

他们已是奄奄一息了。

战事刚刚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们的病还没有好，父亲就病死了。

父亲很喜欢我。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在他的病中他听说我的病好多了，想看我，便叫人来陪我到他的房里去。

我走到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脸，叫了一声"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抚摩我的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拚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常来看我啊！"罗嫂是在我们病中照料我们的那个老妈子。

父亲微微笑了。

"好，你回去休息罢。"过了半晌父亲这样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他第一次昏过去的时候，我们围在床前哭唤他。他居然醒了转来。我们以为他不会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钟光景，他又开始在床上抽气了。我们看着他一秒钟一秒钟地死下去。

于是我的环境马上改变了。好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变。

满屋子都是哭声。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走进来，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们弟兄三个痛哭起来。

自从父亲接了继母进来以后，我们就搬到左边厢房里住。

后来祖父吩咐把我们紧隔壁的那间停过母亲灵柩的签押房装修好，做了大哥结婚时的新房。大哥和嫂嫂就住在我们的隔壁。

这时候嫂嫂在隔壁听见了我们的哭声，便走过来劝慰大哥。他们夫妇埋着头慢慢地出去了。

父亲埋葬了以后，我心里更空虚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因为父亲平时不大喜欢坐轿，常常带了我在街上慢步闲走。

但是一走到行人拥挤的街心，跟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从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够有一个的父亲了。

父亲死后不久，成都又发生了更激烈的巷战。结果黔军被川军赶走了，全城的房屋烧毁了很多。不用说我们受了惊，可是并没有大的损失。

我们自然有饭吃，只是缺少蔬菜和油荤。

在马房里轿夫们喝着烧酒嚼着干锅魁(大饼)来充塞肚里的饥饿，他们买不到米做饭。

枪炮声，火光，流血，杀人，以及种种残酷的景象。而且我们偶尔也挨近了死的边缘。……

巷战不久就停止了。然而军阀割据的局面却一直继续下去，到现在还没有打破。

三哥已经进了中学，但是父亲一死，我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有人出来

替我讲话。

我便开始跟着香表哥念英文。每天晚上他到我们家里来教我，并不要报酬。这样继续了三年。他还帮助我学到一点其它的知识。祖父死后我和三哥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我就没有时间跟着香表哥念书。他后来结了婚，离开了成都，到乐山教书去了。

香表哥(他的本名是濮季云)是一个真挚而又聪明的青年。当时像他那样有学识的年轻人，在我们亲戚中间已经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缚了他，使他至今还在生活的负担下面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呻吟，白白地浪费了他的有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满了感激。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是得到两个人的帮助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大哥，大哥买了不少的新书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完了它们。而且我和三哥一块儿离开成都到上海，以及后来我一个人到法国去念书，都少不了他的帮助。虽然为着去法国的事情我跟他起过争执，但是他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里永远藏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蠢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蠢的、孤僻的人罢。

父亲的死使我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我的眼睛好像突然睁开了，我更看清楚了我们这个富裕大家庭的面目。

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

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我的身子给绑得太紧了，不能够动弹。我也不能够甩掉肩上的重压。我把全部的时间用来读书。书本却蚕食了我的健康。

我一天一天地瘦下去。父亲死后的一年中间我每隔十几天就要病倒一次，而且整个冬天一直在吞丸药。

第二年秋天我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祖父知道了这件事情，也不干涉，因为他听说学会英文可以考进邮局工作，他又知道邮局的薪水相当高，薪水是现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稳固，不会因政变或其它的人事变动而失业。我的一位舅父当时是邮局的一个高级职员，亲友们都羡慕他的这个"好位置"。

我在青年会上了一个月的课就生了三次病。祖父知道了便要我在家里静养。不过他同意请香表哥到我们家里来正式教我念英文，还吩咐按月送束脩给香表哥。其实所谓束脩的数目也很小，不是一元，便是两元。

自从父亲死后，祖父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地改变。他开始关心我、而且很爱我。后来他听见人说牛奶很"养人"，便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常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对我亲切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常常叫人把我找去。我站在他的床前，望着他。他的又黑又瘦的老脸上露出微笑，眼里却淌了泪水。

以前在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感情。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是害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作专制、压迫的代表，

我的确憎恨过他。

但是在他最后的半年里不知道怎样，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对他也开始发生了感情。

然而时间是这么短！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旧历)，我就失掉了他。

新年中别的家庭里充满了喜悦，爆竹声挨门挨户地响起来。然而在众人的欢乐中，我们一家人却匍匐在灵前哀哀地哭着死去的祖父。

这悲哀一半是虚假的，因为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的光景，叔父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处分了他的东西，而且后来他们还在他的灵前发生过争吵。

可惜祖父没有知觉了，不然他对于所谓“五世同堂”的好梦也会感到幻灭罢。我想他的病中的发狂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曾祖死后，做了多年的官，后来“告归林下”。他买了不少的田产，修了漂亮的公馆，收藏了好些古玩字画。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一女，还见到了重孙(大哥的儿子)。结果他把儿子们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期争斗的根源，他自己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并没有人真正爱他，也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更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拿旧礼教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封建时代的生

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争斗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一天地增加，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

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卫道者那样地消失了。对于他的死我并没有遗憾。虽然我在哀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是同时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我们家里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

祖父死后不到半年，在一九二〇年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读到预科、本科，在那里接连念了两年半的书。在学校里因为我没法交出中学毕业文凭，后来改成了旁听生，被剥夺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这件事情竟然帮助我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学业同三哥一路到上海去。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保全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离开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旧家庭并没有留恋。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但是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呻吟憔悴地等待宰割，我因此不能不感到痛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间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旧的礼教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一个理想在前面向我招手，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我怀

着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七年的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的刊物，并且在刊物上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

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信仰与活动*

你的美丽的信和抱朴同志①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说出我是怎样深地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出活动的革命家。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水星》第二卷第二期。发表时题为《信仰与活动——回忆录之一》。

① 一九二五年秦抱朴同志介绍我和高德曼通信，当时她在英国。

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

从爱玛·高德曼写给我的信函里我摘出了上面的两段，在这里借着她的话我第一次明显地说出了我的信仰。她的第一封信我在南京接到。

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她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有后来我读到Roussanoff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

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① 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象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

① 这里是指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

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

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走解放的路。

我所说的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

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姊，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给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姊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她便禁止六姊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1]命的传单。

---

① 这里的"草"字是传单上印错了的。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小小的经验*

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我们出版了一种半月刊。其实这句话就有语病，我并不是那刊物的创办人。大约在刊物出到八九期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到刊物编辑部去。他们回了信，一位编辑又来找我谈话。我便和他们做了朋友，他们邀请我参加刊物的工作，后来我就做了编辑。

《半月》出到十期以后，就碰了一个小钉子。事情是这样的：学生会演剧筹款办平民学校，军人来捣乱。学生和军人发生了冲突。风潮扩大起来。一个朋友在刊物上写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刊物出版，我们就接到公事，要我们先把那短文抽去，才准刊物发卖。另一个朋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到刻字铺去刻了一个长条的图章，用朱红印泥盖在那篇文章上面，然后再用墨笔把文章的前后勾了两下。这期刊物原样地摆在书店的货柜上，任人购买。读者们痛快地读完了那篇攻击当局的文章，被激昂的辞句所感动。他们在用黑色油墨印成的文章上面，惊奇地发见了一行横印着的朱红色的较大的字："文本奉×××××命令抽去"。这五个×是我随便加上的，用在这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文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

里作为一个代替的符号，至于所代替的是什么呢？是省会警察厅，是戒严司令部，是城防司令部，还是别的机关？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我们大家都称赞那个朋友的聪明，我们就这么容易地把那根小钉子拔出来，踏进泥土里去了。

但是《半月》出到二十四期，我们正准备举行周年纪念庆祝会的时候，刊物就突然被禁了。查禁的理由，说起来也许没有人相信，就是提倡女子剪发。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倘使你公开反对女子剪发，那么别人不说你是一个拜物狂（关于这个，希特勒的对头希尔席费尔特①很有研究），就会骂你脑筋封建。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女子剪发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我们骂过"水漩儿公"②不要紧；我们鼓吹革命也不要紧；而且我的第一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也不曾引起任何的麻烦，那个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小孩，会写些带感情的话。我大胆地凭个人的直觉，否定了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而且有一股傻劲，觉得为一篇文章杀头也算不了一回事。那篇文章在今天发表也会成为问题，可是在当时却平安地过去了。这也不要紧。要紧的却是——

当时四川有三个女学生剪掉了辫子，社会轰传，我们高兴。所谓"省会警察厅"马上出了布告禁止女子剪发，我们的

---

① 马·希尔席费尔特（1868—1935），德国精神病学家。希特勒封闭了他创办的性科学学院，烧毁了全部的藏书和文件。

② "水漩儿公"：当时的统治者刘成勋的绰号，"水漩儿"和"滑头"同一意思。

刊物上接着来了一篇不客气的批评。以后大概还发表了两三篇这一类的文章，有一篇还是那三个女子中的一位写的。这一来警察厅觉得应该维持面子了，便派了两个人来找我们办交涉；他们要我们以后不再提这件事情，并且把前几期的刊物存数全部交给他们带走。他们的态度还算客气，他们准备来跟我们讲条件。可惜我们这一群傻孩子，做事只知道走直路，从来不会拐弯，更不知道让步妥协。我们拒绝了他们的条件，跟他们起了争执。结果他们拿走了二三十本存书，我们却不断地写信到警察厅去质问。最后他们就下了查禁的命令。可是他们已经显得被动了。以后我们还秘密地出了一期停刊号，详细记载这件事情的经过。那里面的两篇长文的确写得慷慨激昂，是出于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的手笔。我读着它们，血就沸腾起来。这位朋友不久在高等师范毕了业，便因为生活问题到别处去了。以后我也没有机会和他再见面。听说他在大革命中为革命事业奉献了生命。

我们的刊物在当时算是畅销的。每一期出版，不到半个月就完全卖光。不过收账不大容易，所以每期大亏本，使得我们每期只能印一千份，又无法再版。为这刊物我出力不多，而且我一共只写过三四篇文章。但是朋友中有几个人的牺牲精神却使我十分感动。有一个朋友常常为着刊物当衣服，他为了使思想和行为一致起见，曾经抛弃了学业到一家裁缝铺去做学徒，晚间弄得满指头都是针眼跑到社里来服务。我当时很崇拜他。这朋友现在还活着，不知道他活得怎样。让我在

此地祝福他。

那时候有几个年纪较大的人正要创办一种《警群》月刊，听说我们的刊物被封，就托人来约我们参加他们的工作。他们原想利用我们。但是我们这几个傻孩子不通世故人情，也不懂得客气。他们要我们发表意见，我们就发表意见。他们让我们做编辑，我们就做编辑。

第一次开编辑会议，没有什么争论。五个编辑里面双方各占两个，还有一个算是总编辑，可以说中立派。在第二次的编辑会议里我们应该将第一期月刊的稿子集好，大家不能够随便敷衍了。我们这方面提出两篇关于女子剪发的文章，两篇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总编辑还好说话，对于我们提出的文章，他都通过，有一篇他说可以留到下期发表，我们却坚持登在创刊号上。他也就同意了。

他们那方面的文章大半是些"之乎者也"的东西。平时不作声的我，这一次居然也发表了意见。结果除了那两个编辑的文章外，别的都没有被通过。

那两个编辑中有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半新不旧的老先生。他自然不高兴我。他拿起我的文章躺在籐椅上，跷起一双脚，用国文教员看课卷的态度看了一遍，结果发出一声冷笑，说："这篇文章会把鼓打响的。"

"不要紧，我负责！"我强硬地说。

"哼！"他皮笑肉不笑地望了我一眼。

谁知道两三个月以后，这个人居然做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监，我正在那个学校读书。我每天和他见面。他好像不认识我，我自然不会对他点头。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学校翻造房子，我为了方便便把办公室当做过道走了好几次，校长都没有说话，他却拦住我不让走。我望着他那张带黑色的瘦脸，不觉想起了编辑会议的情形。

第一期《警群》月刊出版，我们胜利了。想利用人的先生们反倒被人利用。学监之类就暗暗地跑到警察厅去告发。警察厅不来管我们。我们却因此跟他们起了争执，结果我们这方面的八个人登报脱离，而他们也就把刊物停了。

半年以后我们又办了一种周刊《平民之声》。这次由我主持编辑事务，通信处就设在我家里。第一期刊物编好，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天天到印刷局去看校样，我们在旁边守着工人把铅版上架。印刷局这次一定要我们把稿子送到警察厅去检查，我们只得把清样送去了。是那个学裁缝的朋友送去的。我们几个人就在印刷局里望着印机转动，注意地望着每两份连在一起的刊物一张一张从印机上飞下来。我们兴奋得甚至忘了晚饭。

傍晚时分一千份刊物印成了，我们把它们带到作为发行部的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我从那里走回家。一个警察在我们公馆门口徘徊，好像在等候什么人似的。

"四少爷，这封信是你的不是？"看门的李老头看见我跨进门槛，就站起来把一封信递到我的手里。

信封上写着"送新世纪杂志社收启"，地址没有错。我拿出一张名片把警察打发走了。

我连忙拆开信看。里面全是官话，但意思很明白：第一期刊物看见了，言论过激，"对于国家安宁恐有妨害"，所以不能许可发行，但是希望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做，"庶不背乎造福社会之宗旨"。措辞总算客气。这真叫做"自讨没趣"！我们不送检查，他们倒也不管；送去反而招来了麻烦。可笑的是刊物上面横排着"新世纪一九二一年"字样，他们却把"新世纪"当做刊物的名称，而"平民之声"四个大字却没有人看见。

第一期的周刊依旧半公开地在外面发卖。不过我们在第二期上面登了一个简单的启事："本刊第一期警察厅禁止发售，对于订户无法补送，敬请原谅。"

第二期出版，倒很顺利。第三期上有一篇短文被删去一段，我们用墨笔轻轻一勾，就对付过去了。从第四期起我们换了一家比较便宜的印刷局，他们很认真，我们以前的办法，是一面付印，一面送检查。这家小印刷局却要等到清样检查完毕发回来以后才肯开印。刊物第四期上开始连载我的一篇题作《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的长文。这自然说不上研究，唯一的秘诀是抄书。第五期周刊上正发表到论托氏的社会思想的一段，开头有五六行被检查员用红笔勾去了，便没有能够印出来，但也注明被删去若干行的字样。

这一来，我们倒觉得讨厌了。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检查员既然认真做，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第六期的文章便来得更厉害，每个人的文章都遭了砍头刖足的重刑。我们知道检

查员快要被我们弄得发狂了。我们便想出种种方法来激怒他（或他们）。我们想他（或他们）大概不懂外国文，便故意从北京的刊物上选了一篇《支加哥的殉道者》转载，这篇文章很长，而且译笔欧化到十二分，我们读起来也很吃力，这一次检查员总算吃了我们的亏。我们从发回来的清样上可以看出来他（或他们）这次是煞费了苦心的。

但是在第八期上报复来了。恰巧在这期我们又换了印刷局。新的印刷局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们不知道这家印刷局的负责人比耗子还胆小，刊物付印时我们去迟了半天，刊物已经完全印好了。我们拿起一张来读，任何一篇文章，我们读来读去，都读不出意思来，连写文章的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我们翻到第四版，奇怪，连《支加哥的殉道者》这个标题也不见了。原来印刷局不得我们同意，就把被勾去的字句检出，单将文章接连地排在一起，结果弄得每篇文章变成了狂人的谵语。

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这么"的"这"字没有了；"那么"的"么"字没有了；"社会"的"社"字没有了；"运动"的"动"字没有了；至于"的""呢""了""吗"之类，更不必说。"支加哥"大概是什么暗号，"殉道者"一定是俄文或法文，"秋天的太阳以它的抚人的微风接吻每个自由的人的双颊时"，在这纠缠不清的欧化句子里，"它"这个字，中国本来就没有。"抚人""接吻"都是猥亵字眼。微风更不会和人亲嘴。"自由"又是违碍的字眼。所以结果被改成了"秋天太阳微风每人双颊"。

我们起初很生气，但是后来仔细一想又觉得好笑，从这里我们不是很清楚地看出了一个人的教养、思想和恐惧吗？结

果被检查的倒不是我们的文章了。

这位可怜的老先生想拚他的老命来阻止洪水的泛滥，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不是一幕 farce ① 中的一个很好的场面吗？

我们印了一张“刊误表”附在报纸内送给订户。在那张“刊误表”上面我们还想写着“这一期的刊物应该是历史的资料”一类的话，但是并没有实行。

以后我们和检查员的关系变得更坏了。我们的兴趣也从刊物移到了检查员的身上。我们专门研究他的心理，分析他，试探他，激怒他，欺骗他，各种的花样都用过，而且屡试屡效。②

---

① farce（英文）：笑剧的意思。

② 这篇文章一九三五年春天在日本东京写成，是故意写给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图书杂志审查会的老爷们看的。（一九五九年注）

做大哥的人*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

---

*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四年第一出版社版《巴金自传》，未在报刊发表过。

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了。

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

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

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

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到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场。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

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

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它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

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

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过承担了一切，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病”。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同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 G. F.女士唱的"Sonny Boy"①，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的手里夺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表弟们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

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起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

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

① "Sonny Boy"：格蕾西·菲尔兹唱的《宝贝儿子》。

信。他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

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两个月以后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几页的遗书。在那上面我读着这样的话：

>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①，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罢。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

---

① 因为在他的病中好几家银行倒闭了，他并不知道。

这就是大哥自杀的动机了。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但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我只知道他不愿意死，而且他也没有死的必要。我知道他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甚至在第四次的遗书里他还不自觉地喊着："我不愿意死。"然而他终于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吞食了自己摘下的苦果而死去了。结果他在那般虚伪的绅士眼前失掉了面子，并且把更痛苦的生活留给他的妻子和一儿四女(其中有四个我并未见过)。我们的叔父婶娘们在他死后还到他的家里逼着讨他生前欠的债；至于别人借他的钱，那就等于"付之东流"了。

大哥终于做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者而死去了。他这一生完全是在敷衍别人，任人播弄。他知道自己已经逼近了深渊，却依旧跟着垂死的旧家庭一天一天地陷落下去，终于到了完全灭顶的一天。他便不得不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拿毒药做他唯一的拯救了。

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取。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在门槛上”*

前两天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Porog)，这首诗使我想起好些事情。

知道屠格涅夫写过一首叫做《在门槛上》的散文诗，是好些年前的事了，大概是从高德曼的一篇文章里知道的。我当时买过一本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英译本，但我翻遍全书却找不着“On the Threshold”这一个题目。问朋友，也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终于找着了这首诗的法文译文，第一次是在比安斯托克的《俄国革命运动史》内的一个注里发见的。那时的快乐和激动，现在回想起来，还叫我的心发颤。接着我又在司特普尼亚克的《沙皇政治与革命》里读到它，我如今记不起了比安斯托克是否从司特普尼亚克的书里转引了这首诗，但我却记得帕夫洛夫斯基关于屠格涅夫的书里也有《在门槛上》，而且说明是从司特普尼亚克那里转引来的。

我那时正和两个朋友在法国玛伦河上一个小城里度那安静的幽长的夏日，我正开始写我的一本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在那书的序言里我引用了《在门槛上》的译文，是我自己翻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水星》第二卷第三期，题为《在门槛上——回忆录之一》。

译的。

我为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作传这是第三次了。去法国的途中，在Angers轮船的三等舱里，我伏在床铺上参照着司特普尼亚克的《地底下的俄罗斯》(是宫崎龙介的日译本，名《地底の露西亚》，英法文译本后来才买到)，金一的《自由血》和一篇从以前在日本发行的《民报》上抄来的无首君的《苏菲亚传》，写出了苏菲亚的生涯的轮廓，寄给上海的一份秘密刊物发表。第二次是在巴黎拉丁区的五层楼上，那时候我多读了几本书，而柏洛夫斯加亚的影象在我的脑筋里也变得更具体了。我差不多是带了感激的眼泪来写这文章的。

第三次我不仅给柏洛夫斯加亚作了传，我还绘出了妃格念尔，沙苏利奇，海富孟，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巴尔亭纳这些女人的面影。巴尔亭纳给与屠格涅夫的印象是很深的，据帕夫洛夫斯基说，屠格涅夫读了巴尔亭纳的法庭演说辞，曾俯下头去吻那张报纸，另一个诗人波龙斯基为她写了一首诗，我在狄科米洛夫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俄罗斯》里读到它，而且也译了出来，引用在上面说过的序言里面。狄科米洛夫后来转向了，做了一个保守派，但他从前的著作确实是有价值的。这书里有巴尔亭纳的演说辞，可惜不全。蒲烈鲁克尔的《俄罗斯的英雄与女杰》里有一篇巴尔亭纳的略传，这书是厚厚的一大册，还有好些插图，我非常喜欢它，但早绝版了，一个英国朋友，老 Thomas Keell 把它借给我，我曾托同住的一个友人把里面的一部分插图重摄下来，然而没有一张成功的。这书里没有薇娜·沙苏利奇的照片，我最近在东京早稻田一家旧书

店买到的蒲氏的另一本小书里却有了它。沙苏利奇这个姓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里全欧美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据说屠格涅夫的《处女地》中的玛利安娜就是她的写照，但写得太不像了。

最近买到一本威奈尔的论俄国人民的书，是二十年前的旧作了。里面有一章是《在俄国女人的地位和影响》，也曾引了巴尔亭纳的演说辞，自然不全，但至今读起来依旧很有力量。我很可惜，我托朋友从蒲烈鲁克尔书里复制的巴尔亭纳的照像没有成功，所以我只能够在四年前我自己印行的一本叫做《过去》的画册（只印了四十本送人）里印出一张手指头大小的巴尔亭纳的像，而且不甚清晰。

威奈尔的书里论述的俄国女人的地位和影响，我好些年前就在别的许多书里见到了。我一九二八年给那本传记写的两万多字的序言就全是建筑在这类材料上面的。实际运动者司特普尼亚克根据他的经验甚至说过俄罗斯女性点起了解放运动的圣火一类的话。雷翁·独逸奇的《西伯利亚的十六年》里列举了好些动人的事实。写出了两册《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的佐治·克南在冰天雪地里会见了布列斯科夫斯加亚，他说是她鼓舞着他认识正义，为正义奋斗的。赫尔岑的回忆录《过去和思想》① 里曾叙述过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姊妹们的勇敢的行为。尼克拉索夫更使跟着丈夫到西伯利亚矿坑去的除伯次奎王妃和伏尔恭斯基王妃永存在他的长诗《俄罗斯女人》里

---

① 《过去和思想》：现译《往事与随想》。

面。在这五年后一八三〇年塞瓦斯托颇叛乱中就有三百七十五个女人因参加叛乱被处死刑。

我当时还从《俄罗斯的英雄与女杰》里译出了《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这一章，后来和司特普尼亚克的《三十九号》（我从《沙皇治下的俄罗斯》里译出）一起印了一本小册子。现在绝版了。这是俄国女人争自由求知识的故事。主要题材是假婚。俄国女人的环境原是很困难的，除非她结婚，她就没法脱离家庭的羁绊，她的父亲有着支配她的全权。她要是结婚，她父亲的权力就会移到她丈夫的手里了。许多女人因为读书问题不能解决而自杀。关于这父女间的斗争许多书里都有着惨痛的记载，克鲁泡特金的自传里也描写过。但是这种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前进的青年出来设法和那女人结婚，做她的名义上的丈夫。他们夫妇一旦离开了丈人家，马上就成了没有关系的人。她可以自由进学校读书，而他呢，他也许以后永没有机会和她再见。这种假婚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可以说这是革命团体的工作之一。布拉克美尔的关于布列斯科夫斯加亚的书里也曾说到这个。不过我译的那故事是后来弄假成了真的。新婚的晚上新郎睡在箱子里，没有问题。但分别以后他们居然有机会再见面，在一起工作，而且最后还来一个"爱情的自白"。以后两人同居了，可是不久男的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女的也跟了去，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是很困苦的。

我以前喜欢读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他的女主人公总是比男主人公强，她们有勇气，有毅力，而他们却能说不能行，没有胆量，没有决心。我常常想不透这是什么缘故。直到我预

备写俄国女革命家传记的时候，我的疑问才得到了解答。对着那么多的事实，我还能有什么疑惑呢？

在我的那本书出版以后，我得到M.G.编的《革命诗选》（英文），里面也有屠格涅夫的那首诗，不过是由M.G.译成了韵文，而且题目也改作了《革命家》。我读了这译文很受感动，就写了一篇题作《在门槛上》的小说，后来收在《将军》集里。但这也是三年前的事了。

上星期我在一家旧书铺里买到几本《屠格涅夫集》（俄国丛书本），无意间在《布林与巴布林》里找到他的散文诗，其中也有这《门槛》。这一次我才有机会读到了屠格涅夫的原诗。

从第一次翻译《在门槛上》到现在，七年是白白地过去了。想着这七年中间的变化，我不能够没有一点感触。但是一想到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些女人的一生（她们里面有的在监牢里过了二十多年，出来时依旧是生龙活虎般的人），我的心又不觉强健起来了。这短短的七年算得什么呢？

以上的话全是凭着记忆写出来的。我提到那些书名，并没有卖弄的意思，因为现在读一本沙士比亚的戏剧或一本《袁中郎集》，才是光荣的事情；读我所说的那些书也许还是一个罪名，而且现在差不多没有人要读它们了。但是我喜欢它们，它们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爱读别人不读的书，这固然是我的怪脾气。然而那些书并不是古董，它们是用活人的血写成的。所以我七年前读过它们至今还能够清晰地记起来。

我离了北平*

火车外是一片雪。我的心冷了。我昏迷似地在车厢里躺了许久，直到天色阴暗了，我才清醒过来。周围只有车轮的单调的响声。车厢就如一个坟墓。我几乎相信我已经死了。然而我的心却跳得很厉害。我的眼睛甚至在黑暗中也能够看见事物。我躺着，我绝望地躺在寂寞的车厢里。我真想大叫几声来冲破这沉闷的空气。我并没有叫出声来。这时候，我又看见了你们的手。朋友，你们的手还在我的眼前晃动。这无数的挥动着的手就把我的心抓得那么牢！你们也许不会知道我当时是用怎样的眼光来看这些手的。我说，倘使能够的话，我在那一瞬间真想用以后几十年的时光来换取这可宝贵的一瞥。

这几年来我的一双脚就不曾停止过，我的嘴也是的。我像一个乞丐，飘流到各地方，向一些善心的人，讨得一点施舍，来维持我这个微小的生存。我的确是一个心灵的穷人。朋友，你们是好心的，你们却不知道在那些"疑惑不安的日子里"，你们的友情曾经怎样地温暖过我的心。我平静地领受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时题为《别》。

这些施舍，我不曾说一句感谢的话。我的嘴没有停止过，有时候我甚至说话像一个豪华的富翁，或者像一个倔强的汉子。我不明白你们会不会把我当作一个忘恩的人，倘使你们果真这样做，你们也是有权利的。

然而，朋友，我怎么能够使你们了解我的这种心情呢？不错，我写过一两百万字，而且我甚至反复地写着某一些话。你们在我的文章里面很容易看出来重复的地方。你们也许以为我的文章已经写得太多，太多了。可是你们却想不到我如何绝望地努力，想找几句更雄辩的话来表白我的心情。我反复地写了那么多的字，但是我自己时时刻刻愿意让人知道的那些话却始终没有写出一句来。要表白我自己的一点感激的心情，那么多的文字还不够。朋友，你们看，我是一个多么笨拙的人。但是从这里你们也可以看出来我是怀着怎样绝望的痛苦来向你们求助啊。

世间有不少的人喜欢表现自己。我也可以算是这一类的人罢。然而我想表现的却不是自己的长处，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就没有美点。我有一个信仰，我愿意人知道它；我有一颗心，我愿意人了解它。我写文章，就为着想把自己的一切放在那里面给人看个仔细。然而写了那么多的字以后，到今天我还在绝望地努力，找话语，找机会来表白我自己，好像我从前就没有写过一个字似的。我甚至希望我能够用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把我的胸膛剖开给你们看，让你们看明白藏在我心里的对你们的感激和重视。

我又看见了你们的挥动着的手。这几年来它们就时时在

我的眼前晃动。码头上、月台上的景象，我永远不能够忘记。我说长年的奔波应当使我的感情变迟钝了。在人前我也能够笑，而且能够像傻子一般地大笑。我给你们看的就只有一张笑脸。但是从你们的身边退出来，一个人留在陌生人中间，那时候，想到你们，想到你们赐给我的一切，我也曾偷偷地落下眼泪，我说这是感激的眼泪。我把那时的感情分析得很清楚。在那些时候，我真愿意使自己做一根木柴，燃烧得粉身碎骨，来给你们添一点温暖。

然而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东西，我最近曾这样地写过。我还说：话语并没有力量。我不知道我以后有没有用行动来表现自己的日子，倘使没有的话，那么我这一生也许是完全白费的了。过去的我的精力就是零碎地浪费了的。所以到今天我还在费力地找寻话语来求你们原谅；不仅原谅，我还求你们的帮助。朋友，正如我先前所说，我愿意做一根木柴，望你们点个火来使它燃烧罢。

在火车里我就只看见你们的手。你们不会知道那些手给了我多么大的鼓舞。倘使没有它们，我也许不会活到现在。记得你们中间的一位对我说过："照你这种生活方式活下去，居然不死，而且活得很好，这道理，我不明白。"朋友，倘使你们仔细想一下，就明白这个奇迹全是你们的赐与。是你们的友情给了我精神的力量，来支配我的身体。是你们的爱护给了我够多的活力来消耗在文字上面。要是没有你们，我也许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有人说我孤僻，有人疑我阴沉。有人甚至在我跟他们中

间看见了一堵墙。只有你们才知道我是一座雪下的火山。我怕雪垫得太厚了，会灭了火；我又怕雪很快地溶了，会有一个大爆发。我的心里包含了那么多的火种，我不让你们知道。也许将来临到爆发的时候，我会来向你们求救。也许我会像一个硬汉那样把打落的牙合了血吞在肚里，让自己毁掉。然而那时候我对你们的感激仍然是不会消失的。

我现在愈走愈远了。我明白我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面离开你们。我又记得我当初是怀了怎样的心情来看你们如何在焦虑中过日子。三个星期中间我没有停止过笑，我仿佛是一个感觉迟钝的孩子。但是你们不知道我并不曾放过藏在你们心里的焦虑。其实这焦虑也是我的，我至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而且单说焦虑也不够，我还应该加两个字：悲愤。朋友，我写到这里，我放下笔，拉开窗帷，窗外是一片漆黑的天。我看不见一线光明。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不同的是我离开你们去了，我回到遥远的地方去了。我撇下你们在黑暗里，我的心是痛苦的。在三个星期中间我听够了你们的叹息、呻吟和呼号，这些至今还清晰地在我的耳边回响。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一次的会面会给我留下一个这么痛苦的印象。但是我并不悔恨。甚至在黑暗的夜里我也能够分辨出你们的和善的面颜；单是看见它们也够使我的心温暖了。我不曾给你们留下一点东西，但是我自己却带着你们的赐与走了。我感谢你们，而我的心也就和你们系得更牢了。

但是，朋友，当整个民族的命运陷在泥淖里的时候，当人类的一部分快要沦于奴隶的境地的时候，个人的悲欢还值得

絮絮地提说么？所以倘使我以上的话打扰了你们，就请你们原谅我，让我再说几句别的话罢。我在这里屡次用了绝望的字眼，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就失掉了信仰。朋友，在这时候我们就全靠信仰指路。在黑暗中人常常会滑脚，走错一步就会落进无底的深渊。熟习了黑暗的人就知道这只是一个假象，跨过它，便横着光明的前途。我常常在最浓的夜色以后看见了黎明。所以我有这样的确信。

朋友，不要以为我故意拿空泛的话来安慰你们，你们应该相信我，对于你们我是没有欺骗的。不管我怎样跟着你们叹息、呻吟，不管我怎样像一个心灵的穷人四处漂荡，但是我却常常昂然地说："我不怕……我有信仰。"甚至在阴云满天的时候，我也不曾失掉我的信仰。

这一年来我说过我要沉默，我果然变得沉静了。我几乎被活埋进了坟墓里去。朋友，在那时候我曾经违背过你们的劝告。但是如今我要站起来，我要在人前大声叫号。我要使人相信目前的黑暗只是假象，跨过那黑暗就立着黎明的将来。我要使人人有这个信仰。我要使人人有这个希望。

热情在我的心里汹涌。我的身子快要燃烧了。朋友，给我一个火种，来把它点燃罢。只要我能够贡献出一点温暖，我也愿意早一天使自己粉身碎骨。像木柴一样，一次就痛快地燃烧干净，总比冻僵在坚冰下面好些。

朋友，明天我又要搭火车往前面走了，你们的手还在我的眼前晃动，它们把我抓得很牢，它们就像要把我抓回去似的。但是我仍然要往前面走了。在那边也还有我的朋友，他们也

像你们那样系住我的心。我现在又得看他们怎样在焦急中过日子。我真不知道我应该怎样地分配我的这一颗心。我到现在才明白我的心确实是太小，太小了。所以朋友，我希望你们给我一把火，让它化为灰烬，飞到你们每个人的身边罢。

别了，朋友，明天的事情如何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然而不管我们遇到怎样的命运，我绝不会失掉信仰。那么我也绝不会忘记你们，我说甚至在阴云满天的时候，我还相信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一起看见黎明的将来。记住：所有的黑暗都是假象。

“我不怕……我有信仰。”那么让我来祝福你们。

去年十一月我在北平住了将近三个星期。这个月三十日下午三点钟我搭平沪通车回南方。一些朋友到车站送行，火车开动时我还看见他们的挥动着的手。那一天落着大雪，全个古城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我的心差不多冷了，就靠着这些手它才得到一点温暖。在车厢里我想起了种种的事情。回忆使我苦恼，现实使我悲愤；未来使我耽心。但是甚至在那时候我还没有失掉信仰。我觉得我应该对朋友们说几句话。我中途下车在天津我哥哥的宿舍里住了两天，我说我要看这个大城市怎样在强敌的手里毁灭，结果我看了一些令人发呕的丑剧走了。在离开天津的前夜我写了这篇文章。每一句话都是从我的心里吐出来的。现在我重读到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我的耳边还响着人们的呼喊，但这已经不是去年的了。那只魔手更逼近了我们的咽喉，我们除了更勇敢地斗争外别无生路。甚至在这时候我还可以坚定地重复着去年说过的话：“我不怕……我有信仰。” 1936年6月附记。

断片的记录*

一

才十点半钟，为什么四周是这样地静！桌子上放着一只表。我在夜间写文章的时候，手边总要放一只表。我并不想知道时间的早迟，我却想听见一点声音，哪怕是单调的声音也好。不然我说不定会疑心自己已经死了。

像我这样的人会成为所谓著作家，这件事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若论我的才份，我的性情，我的修养，我都不配做一个著作家。我深知道自己，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我本来应该找个安份守己的事情来做，然而不知道怎样，我开始写了文章。我写文章好像是顺从一种冲动。我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笔写。写完就仿佛从一个噩梦中醒过来似的，觉得心上的重压去掉了，身子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的心才有片刻的安静。

但是这样的安静并不会继续多久。一篇文章刚送出去，第二篇又不得不开始了。好像那个推动我的力量就没有一个时候肯把我放松。我疲倦，但是我不能休息。好几次我忍不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时题为《片断的记录》。

住要发出一声叫喊：饶了我罢。然而我并不曾得到饶恕。

写作渐渐变成了一种惩罚，一种苦刑。可是我的作品却一天天多了起来。起初看见一本新书出版，我自己也感到快乐。可是后来连这种快乐也渐渐地消失了。有时候我甚至憎厌我自己写的东西。

我常常希望我能够忘掉我自己写的书，然而事实上却做不到。我只要在书桌前面坐下来，一提起笔，我就看见那些书堆在我面前，不，它们是堆在我心上的。它们重重地压住我的心，使我有时候甚至透不过气来。我说我要自由，然而我却甩不开这些黑影。

于是我怜悯我自己，诅咒我自己，我只希望我能够永远不提笔写一个字。

二

我又在书桌前面坐下了。我提起笔来。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张脸，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另一个我坐在对面看我写字。我写了一行，两行，……一页，两页。我放下笔，抬起头看对面。另一个我正在用检查的眼光望我。我自己在探索我的心。我变成了两个，而且成了两个彼此不肯放松的人。

我在那一张脸上看出了轻视、狞笑、责备。有时候我忍受不住，羞愧地把头埋在书桌上。我怕看那一个我，我怕看我自己。

“你为什么就不能够打破矛盾？你为什么甘愿做一个懦

弱的人？"我常常听见另一个我在责备写文章的我。我对这种责备不敢发出一声怨言。我的确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

我好几次想不再提笔了。我说我要消除那个矛盾。自然我的矛盾很多，那个却是较大的一个。譬如前年年底我去日本，那时候我的确抱了搁笔的决心。然而我刚刚到了那里，我的决心就动摇了。后来甚至在极不方便的情形下面，我也偷偷地写了《神》、《鬼》、《长生塔》这三个短篇和一些散文。我写这些文章并不是想得稿费，因为我在日本写的文章的发表费全送给国内的朋友了。我在一个地方说过，我写文章为的是排遣寂寞，这当然有理。但是另外还有原因。这个原因要深得多，然而我却不能够明确地说出来。

总之，到了日本以后，我虽然忙着读书，却也不曾搁笔。从日本回来，我也还不得不时时拿起笔写点东西。我最近说过我发明了"搁笔"两个字敷衍各位编辑先生，其实这句话也不对。我自己的确真诚地希望我能够搁笔。然而同时我又时时自动地提起笔来。

这种内心的激斗是长久的，而且痛苦的。我好比站在十字路口，倘使我再强健一点，我便会毅然地挑选了一条路走：或者抛弃文学，或者死抱住文学。然而我两样都做不到。结果我一定会在夹攻中毁掉自己。

三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在成都加入了一个青年学生组织的

团体。那个团体办了一种刊物。我的新朋友要我写文章，我当时就惶恐地想道：像我这样低能的人怎么能够写文章呢？我从来没有起过写文章的念头。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然而到现在我还能够了解那种心情。我甚至愿意年光倒流，回头去过那时的生活。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没有矛盾的。我或者在大街上散传单，或者在商场楼上跟朋友们一道抬杂志社的铺板，或者做别的事情，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十分快活。我只有一个希望：谦逊地牺牲自己，不要人知道我的姓名，知道我的一切。我的心中只有对朋友们的友情和对人类的空泛的爱。一本小册子就是我们的福音，一句话就可以叫我们牺牲性命。现在有许多朋友认为我有着过多的热情，却不知道那时候我的热情更多。我那时候的确抱着《告少年》，抱着《夜未央》和那本戏里的人物一起哭、笑过。那个时候我的热情是不断地向外发散的。我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哭一声，叫一声，我走的路总是直线的，那个时候我的确幸福。

后来我写了文章。当时的环境还允许我自由地说话，所以我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十分激烈。以后我还写了介绍世界语的文章。自然免不了大抄书，因为我当时知道的实在有限。不过那时我完全没有表现自己的心思。我只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点东西，让别人也知道。我忘记了我的幼稚，我的低能，就这样被我的信仰鼓舞着，开始做了我没有能力做得好的事情。以后我继续写文章。自然还是在抄书。不过那时我仍然走着直线的路。我随处散发我的热情，我没有矛盾，没有

痛苦。

然而现在情形却不同了。几年前我开始写了小说，换一个漂亮名辞来说，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从那时起我就有了更多的矛盾。这十几年来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也许像巴罗哈的朋友对巴罗哈说的，是“没有进步”)，可是我走的路却变成曲线的了。我停止了发散热情，却把热情向内贮藏起来，愈积愈多，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有人说热情是一把火，我便说我是一座火山，一座雪下的火山。我贮蓄了那么多的热情，我害怕会有一个大爆发。

有些朋友为着这个替我担心，他们却不知道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消磨热情的东西，那就是内心的激斗。那是矛盾。我努力消除那个矛盾，我在心里整天地斗争，然而结果矛盾依然原样地存在。这可以说我自己在反复熬煎自己。

我为了写小说曾经受到几个朋友的责备。最近还有一个青年朋友表示，我不该把时间浪费在文字上面。他并不曾直接写信给我，他写给我的另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却把信发表在他们的一份小刊物上面了。我感谢那个年轻的朋友。我把那份刊物读了好几遍。那份刊物我每期都非常热爱地读过，我甚至在那些平常的字句间看出了深的友情和信仰，并且我看出了十几年前的我的面影。这时候我好像受到一次祝福。但是以后我又感到一阵绝望。我仿佛是一只折断了翅膀的老鹰，我不能够再在广阔的天空里飞翔了。我的绝望只有我自己知道。

四

我说过要沉默，我说过要抛弃写作生活，我没有做到。这是我的弱点。这是我的不幸。朋友们因为这个责备我，我只有低头承受。

然而另一些朋友却又怪我不该沉默。我还接到过好些信。譬如最近几个没有署名的青年读者来信就说："我们知道你近来沉默了。但你为什么要沉默呢？我们想也许是社会环境对你不好罢，但是你为什么要做一个顺从环境像觉新那样的人而沉默着呢？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像觉慧那样的人和社会奋斗继续创作呢？……我们热烈地望你的作品继续出现。我们不要你再沉默。"

对于这样的信，我怎么能够回答呢？我果然是顺从环境吗？我有着不少爱我的朋友，我差不多就靠着友情生活，然而当我徬徨在这样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却找不到一个人来给我帮忙了。我自己知道我应该抛弃文学，但是我的感情和环境又抓住我，我的理智不甘心这个，又要反抗。我这时正需要人鼓舞我毫不顾惜地把写作生活抛弃，正需要人来帮助我保守沉默。要这样我才能够保持我的心境的和平。然而别人却不要我沉默。我的另一个自己却因此而得势了。

人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唯其我活了这许多年，所以我和初生的孩子不同。过去的生活在我的身心两方面所留下的影响是不能够消灭的。虽然我大哥因为顺从环境而灭亡了，我

反抗环境而活到如今。然而我依旧是过去环境的产物。我不能够一下子就把过去的阴影完全从肩头甩掉。我不是一个强健的人。倘使在那长久的内心的激斗决定胜负之后，我还健康地活着，那时我或许会成为强健的人也未可知。现在我决不是一个强健的人。

五

我开始有了一种新的感觉。我的心情改变了，我对于写作的信心和勇气渐渐地消失了。我得承认写作生活的确给过我大的满足。有一个时期我疯狂地写了不少的文章，那时我感到满足，感到快乐。那时我还相信文字的力量。

然而如今情形完全改变了。写作的事不再能使我满足了。我甚至写出“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东西”的话。我已经不能承认文字有什么力量了。

我观察生活，我研究历史。我看遍了过去和现在的人民的大斗争。我看出来在那些斗争里文字的力量(换句话说，文字没有什么力量)，而且我明白在那些时候“纯粹的”文人所尽的任务是何等地小。在宫廷里当弄臣，在贵族爵邸里做食客，在贵妇人的沙龙里做装饰品，给当权者歌功颂德——这些倒是“纯粹的”文人的拿手好戏。现在文科学生都知道说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如何伟大。然而，我却更喜欢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几位。这些人据新近一位中国批评家“严格地说”来，并不是“纯粹的作家”。但是我觉得

他们比但丁、莎士比亚等等大文豪更可爱。

这似乎是题外的话，其实并不是。譬如说但丁罢，他可以把他的政敌都送进地狱，他可以请他所爱的女人引他进天堂。我却不能够。这一类的事情我没有勇气做。所以在“私的”(personal)方面我不能够从写作上得到满足。在“公的”(public)方面我又看见文章和现实的环境相比，等于拿一个鸡蛋去碰石头。一番动人的演说可以使激动的群众马上做出一件事情，一篇文章只可以在短时间内感动人，但是不久就会被人忘记。不纯粹的作家的作品，自然经过一个短时期便归于消灭。但是纯粹的作家的不朽的名著，过几百年或者一两千年也会变做藏书家的所谓珍本，而成为风雅绅商沽名钓誉的工具了。

做一个纯粹的作家大概可以从文章上得到满足。所以日本的文豪久米正雄和松冈让这两个情敌就拿小说做过武器再来一次情场的战斗。久米也许想把他的生活里失去的东西在小说里找回来。当然在这方面他占了优势，他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同情。别的一些日本的“巨匠”也做过这一类的事。然而真的事实就被这些“巨匠”的笔抹煞了，因为做他们的对手的常常是一些柔弱的女子。

文人的笔有时候能够玩出种种的花样。倘使要从文章上认识一个人，就会常常受骗。青年人容易相信别人，所以更容易受骗。我自己也就受过骗。我自己也曾把文章和人拿来比较过。自然我也见过人比文章好的事情。但是我却看见更多的人在文章里是一个面目，在生活里又是一个面目。有的人

文章写得很漂亮，做起事来却卑鄙龌龊。然而这却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现在我们有了不少青年的导师。然而真正配得上领导青年的究竟有几个？文章常常成了骗人的东西了。

我去年在日本写过一篇题作《文人》的短文。这篇东西，经过几个朋友的手却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也许是编者害怕得罪人的缘故罢。现在我把文章的最后一段引在这里：

> ……写到这里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但是我不想说下去了。以前写文章是暴露别人的丑态，现在却轮着我来暴露自己的丑态了。写这短文并不想替自己辩解，只是证明一件事：文人的一管笔能够把事实歪曲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权力阶级豢养文人来做工具，给他们歌功颂德，那是再便宜没有的事情。然而可悲的是到现在，还有一些青年真正相信文人如何高尚，还伸起脖子老等着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来救拔我们这个快沉落在深渊里的民族呢！

我时时在写文章，我却又时时说文章是骗人的东西。我竟然有这么一个大的矛盾。所以我若在这里说我恨文章，也许会有人把我当成一个喜欢说谎的骗子罢。

我依旧坐在书桌前面。周围还是死一般的静寂。我的表停了。外面落着雪，雪花沙沙地响起来。我的脚冷得很，我的手也快冻僵了。我手边积了七张原稿纸。这几个晚上就只写了这一点。我又发了这些牢骚。但是文章究竟有什么用处？……我没有勇气再写下去了。

后　记

大前年（一九三三年）第一出版社计划出自传丛书，要我写一本自传。我说我不能写自传，我只能写些零碎的回忆。来交涉的朋友说这也可以。我便写了一本《断片的回忆》送去。原稿在书店里搁了一年多，直到前年（一九三四）年底出版时它却变成《巴金自传》了。

那时我在日本。又过了大半年我回到上海来，才看见所谓我的《自传》。我不满意它，因为除了错字多、售价贵以外，它还比我的原稿少一章，那是被审查会删去了的。① 最近我已通知那个出版社把这所谓我的《自传》停版了。

但是我得声明一下：这本回忆录里面有三章（即《最初的回忆》、《家庭的环境》和《做大哥的人》）是从《自传》中取出来的。

巴　金 1936年6月28日。

---

① 删去的那篇即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版散文集《忆》的第四篇《信仰与活动》。



点　滴

《点滴》，一九三五年四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四九年二月，共印行十一版(次)。

序*

在一个城市里住了三个月，现在要搬到另一个更热闹的城市[1]去了。不凑巧搬家的前一天落起雨来。这雨是从正午开始落的，早晨太阳还从云缝里露过面。但是报纸上“天气预报”栏里就载了落雨的事情。

一落雨，就显得凄凉了。虽说这地方是一个大港，每天船舶往来不绝，但是我住在僻静的山上，跟热闹的街市和码头都隔得很远。山上十分清静。在我的房里只听得见下面滨海街道的电车声，和偶尔响起来的小贩车上的铃声。电车声也并不显得吵闹，而且不多。

我的房里有两面窗。打开正面的窗望出去，望得见海。推开侧面的窗，下面就是下山的石级路。每天经过这石级路的人，除了几个男女学生外，就少到几乎没有。而且学生是按照一定的时间走过的。有时我早晨起得较晚，就可以在被窝里听见女学生的清脆的笑声。

山下的房屋大半是平房，就是楼房也只有那么低低的两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水星》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雨》。

① 指日本东京。

层。日本的房子矮得叫人发笑。但是因此我每天可以在房里望见海上的景象，没有高耸的房顶遮住我的眼光。轮船开出去，就似乎要经过我的窗下。而帆船却像一张一张的白纸在我的眼前飘动。其实说飘动，并不恰当，因为帆船在海上动，我的眼睛不会看得清楚。在那些时候海的颜色总是浅蓝的。海水的颜色常常在变换，有时是白色，有时深蓝得和黑夜的天空差不多。在清朗的月夜里，海横在天边就像一根光亮的白带，或者像一片发亮的浅色云彩。初看，绝不会想到是海。然而这时的海却是最美丽的。我只看见过一次，还是在昨天晚上。恐怕一时不会再看见了。本来以为今晚还可以看一回，但料不到今晚却下了雨。

雨一下，海就完全看不见了。我灭了房里的电灯，推开窗户去看外面。只有星星似的灯光嵌在天空一般的背景里。灯光因为雨的缘故也显得模糊了。别的更不用说。

外面风震撼着房屋，雨在洋铁板的屋顶上像滚珠子一般地响。今晚不会安静了。但这些声音却使我的心更加寂寞。我最不喜欢这种好像把一切都埋葬了的环境。一遇到这个我就不舒服。这时我的确有点悲哀。但并非怀恋过去，也不是忧虑将来，只是因现在的环境引起的悲愤。这意思很容易明白。我并不是看见花残月缺就会落泪的人。虽然明天便要跟一些人，尤其是三个月来和我玩熟了的几个小孩分别，而且以后恐怕不会再来到这个地方，但我也没有多大的留恋。因为我的心里已经装满了许多、许多的事情，似乎再没有空隙容纳个人的哀愁。

因这风雨而起的心的寂寞，我是有方法排遣的。一个朋友最近来信说我“最会排遣寂寞”。他似乎只知道我会拿文章来排遣寂寞。其实这只是方法的一种而已。不过这三个月来我就只用了这个方法。因此才有在《点滴》的总名称下面写出来的十几篇短文。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今天上午我的叫做《点滴》的小书也编成寄回上海去了。这本小书是我三个月来的一点一滴的血。血这样流出，是被贱卖了。另一个朋友常常责备我“糟蹋”时间，他自然很有理。我编好这个集子，就这样平淡地结束了我这三个月来的平淡的生活。这里面也附了几篇从前的北平或者上海写下的补白之类的东西。这些文章和明朝人的作品不同，句句是一个活着的现代青年的话，所以我喜欢它们。

我正要放下笔，侧面的窗外响起了木屐的声音。从那细小迟缓的脚步声，我知道是一个女人从下面上来走过石级路往山后去了。在这样的雨夜，还去什么地方呢？我这样想。过路人自然不会知道。脚步声寂寞地响了一会儿，仿佛连那个女人的喘息也送到了我的耳边。于是声音消失了。接着是一阵狂风在屋后的山茶树和松林间怒吼，雨不住地像珠子一般落在屋顶上面。

1935年2月在日本横滨。

生　　命*

我接到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他说愿意跟我去死。这样的信我已经接过好几封了，都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人寄来的。现在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的窗前种了不少的龙头花和五色杜鹃。在自己搭架的竹篱上缠绕着牵牛花和美国豆的长藤。在七月的大清早，空气清新，花开得正繁，露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面屋脊上站着许多麻雀，它们正吵闹地欢迎新生的太阳。到处都充满着生命。我的心也因为这生命的繁荣而快活地颤动了。

然而这封信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的心渐渐地忧郁起来。眼前生命的繁荣仿佛成了一个幻景，不再像是真实的东西了。我似乎看见了另一些景象。

我应该比谁都更了解自己罢。那么为什么我会叫人生出跟我去死的念头呢？难道我就不曾给谁展示过生命的美丽么？为什么在这个充满了生命的夏天的早晨我会读到这样的信呢？

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三期。发表时题为《点滴》。署名余一。

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然而这一切到了我的笔下都变成另一种意义了。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同时另一种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够说这样话的人是有福的了。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能够说这样话的人也是有福的了。

但是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

1934年7月在北平。

海 的 梦*

我整整有一年没有看见海了，从广东回来，还是去年七月里的事。

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信似乎写到这里为止。其实我应该接着写下去：那山一般地涌起来的、一下就像要把轮船打翻似的巨浪曾经使我明白过许多事情。我做过"海的梦"①。现在离开这个"海的梦"里的国家时，我却在海的面前沉默了。我等着第二次的"海的梦"。

在这只离开"海的梦"里的国土的船上，我又看见了伟大的海。白天海是平静的，只有温暖的阳光在海面上流动；晚上起了风，海就怒吼起来，那时我孤寂地站在栏杆前望着下面的海。

"为什么要走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句问话，其实不用看便明白是自己对自己说话啊！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四期。署名余一。

① 一九三二年春天我写过一本叫做《海的梦》的中篇小说。

是的，虽然我也有种种的理由，可以坦白地对别人说出来，但是对自己却找不出话来说了。我不能够欺骗自己，对自己连一点阴影也得扫去！这一下可真窘了。

留恋、惭愧和悔恨的感情折磨着我。为什么要这样栖栖惶惶地东奔西跑呢？为什么不同朋友们一起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一些事情呢？大家劝我不要走，我却毅然地走了。我是一个怎样地不可了解的人啊。

这时候我无意地想起一百年前一个叫做阿莫利(Amaury)①的人在一封信上说过的话：

> 我离开科隆，并不告诉人我到什么地方去，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愿意离开一切的人，甚至你我也想避开……
>
> 我秘密地躲到了海得尔堡。在那里我探索了我的心；在那里我察看了我的伤痕。难道我的泪已经快要尽了，我的伤也开始治愈了吗？
>
> 有时为了逃避这个快乐的大学城的喧嚣和欢乐，我便把自己埋在山中或者奈卡谷里，避开动的大自然去跟静的大自然接近。然而甚至在那些地方，在一切静的表面下，我依旧找到了生气、活力、精力。这都是那个就要到来的春天的先驱。新芽长出来了，地球开始披上了新绿的衣衫，一切都苏醒了起来；在我四周无处不看见生命

① Amaury：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阿莫利》的男主人公。

在畅发的景象。然而我却只求一件事情——死。……

啊，这是什么话？我大大地吃惊了。我能够做一个像他那样的怯懦的人吗？

不，我还有勇气，我还有活力，而且我还有信仰。我求的只是生命！生命！

带着这样坚决的自信，我掉头往四面看。周围是一片黑暗。但是不久一线微光开始在天边出现了。

1934年11月在日本横滨。

过　年*

书桌放在窗前，每天我坐在这里，望着时光悄悄地走过去。看着，看着，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的心海里涌起了波涛。

一年一年这样地过去，人渐渐地老起来，离坟墓越来越近。这是事实，然而使我如此感动的原因却不是这个。我是在悔恨我自己又把这一年大好的光阴白白地浪费了。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有什么感伤。悔恨和感伤是不同的。

过去的年华像一座一座的山横在我后面。假使我回过头去，转身往后面走，翻越过一座山又一座山，我就会看见我的童年。事实上我有时候也作过这样的旅行。于是我在一座山的脚下站住了。

在我这个房间里不是常有小孩来玩么？六岁的，四岁的，三岁的。他们今天忘了昨天的事，甚至下午就忘了午前的事情。一分钟哭，过一分钟又笑。他们的世界是何等的简单！我最近也曾略略地研究过他们的心理，虽然不能说很了解，但是像一个狂信者那样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态度我倒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水星》第一卷第四期。

有些明白。有一个时候我也曾经是这样的孩子!

旧历大年初二，母亲出去拜客了。我穿着臃肿的黄缎子棉袍和花缎棉鞋，一个人躲在花园后面一个小天井里燃放"地老鼠"之类的花炮，不知道怎样竟然把自己的棉鞋烧起来了。我当时不知道自己脱鞋，却只顾哭着叫人，等到老妈子来时，右脚上已经烧烂了一块，以后又误于庸医，于是躺在床上呻吟了两三个月。我后来身体不健康，跟这件事情多少有点关系。

但是不管这个，我当时仍然过得很幸福，脚一好我也就把那件事情忘掉了。我一天关在书房里念那些不懂的书，一有机会就溜出来玩，到年底听说要放年假，心里的快活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孩子们喜欢新年，因为新年里热闹，而且可以毫无顾忌地痛快玩十多天。

在那些时候我做过种种黄金似的好梦;但是我绝不曾想到世界上会有这种种的事情，像我现在所看见的。那时我也曾有过能够早早长大的愿望。但是长大到了现在，孩童时代的幻梦都跟着年光流去了，只剩下这一颗满是创伤的心。而且当时我所爱过、恨过的人大半都早已安睡在寂寞的坟墓里面了。我是踏着尸骸走过长途，越过万重山而达到现在这个地方的。

黄金的童年啊!如果真像一般人那样感叹地这么想着，那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了!

所以四十几年前逝世的俄国诗人拉特松① 有过一首叫做

---

① 谢·雅·拉特松(С. Я. Надсон，1862—1887):俄罗斯诗人。

《床边》的诗：

孩子，在温暖、柔软的小床中，
你在梦里发出了这样的低语：
“啊，上帝啊，我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呢？
啊，只要人能够生长得更快一点啊！
那些讨厌的功课，我不要再学了，
那讨厌的琴调我不要再练习了；
我要常常去找朋友们玩呢，
我要常常到花园里去散步呢！”
我正埋着头做事，便带了忧郁的微笑，
默默地倾听着你的话语……
睡罢，我的宝贝，趁着你还在父亲的保护下
不曾知道世间的种种烦恼的时候……
睡罢，我的小鸟儿！那严酷的时光
无情地快快飞去了，并不肯等着谁……
生活常常是一副重担。
光荣的童年就像一个假日，会去得很快……
要是我能和你掉换一下，那是多么快活：
我只愿能像你那样地快乐，歌唱，
我只愿能像你那样高兴地笑，
吵闹地玩，无忧无虑地四处观看！

这不是在译诗，这只能算是直译俄文的意思。我奇怪拉特松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他一共不过活了二十五岁，即使

这首诗是他临死的那年写的，也嫌早一点。二十五岁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他死得早，大概因为他的心被这种忧郁蚕食了。

我跟他不同。我虽然有“一颗满是创伤的心”，但是我仍愿带着这颗心去走险途。我并不愿意年光倒流重返到儿时去，纵使这儿时真如一般人所说，是梦一般地美丽。孩子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人。但这个世界存在而且支配着他的事实却是铁铸一般地无可改变的。

做一个盲人好呢？还是做一个因为有眼睛而痛苦的人？我当然选取后者。而且我还想为这种痛苦做一点点事情。

在这一点上我倒应该给拉特松一个公道。因为先前忘记说下去，在中途便停止了。拉特松也写过像《那些心里还存着对于黎明的将来的愿望的人，醒来罢！》（多么长的一个题目！）一类的诗，有着“和夜的黑暗斗争，好让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的句子。并且据说拉特松有一个时期也很为青年们所欢迎，他的诗集也销过二三十版，因为他表现了当时青年的热望——爱被虐待受侮辱的同胞，为崇高的理想，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但可惜的是那些诗我还不曾有机会读过。他的诗我只读了四首。

算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比拉特松多活了好几年了。我对于同时代的青年的热望，又做过什么事情呢？我们这时代的青年的热望不也就是——爱那被虐待受侮辱的同胞，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吗？

固然我写过几本小说之类的东西（我只说类似小说，因为

也许有些正统派的小说家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说它们并不是小说)，但那是多么微弱的呼声啊！所以在回顾快要过去的一九三四年的时候，我又不觉为这一年光阴的浪费而感到痛悔了。

做孩子的时候，每到元旦，总要给父亲逼着在红纸条上写几个恭楷的字，作为元旦试笔。如今父亲已经在坟墓里做了十几年的好梦，再没有人来逼我写这一类的东西了。想到这里我似乎应当有一点点感伤。但是我并没有。也许我这颗心给生活的洪炉炼成了钢铁了。

1934年12月在横滨。

话*

天没有黑尽，半开着的窗户还把最后的阳光送进房里来。但是我坐在书桌前却看不清楚书上的字迹了。山下面许多人家早燃了灯，从一些烟囱里缓缓地冒上了烟，是预备晚饭的时候了。我看表，还不到六点钟。

这些时候我静静地坐在藤椅上，也不去开电灯。我只顾向窗外看，许久都不动一下。我在做什么呢？勉强地解释罢，我在思索。每天每天都是如此。

我好几年不曾有过仔细思索的时间了。生活在朋友们中间，他们给了我许多东西。我得到了温暖，得到了友情，得到了帮助，总之，我得到了生活里所需要的东西。我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下去。在这一点我是过分地幸福了。但因此我也许成了一个不知恩的人罢。朋友们原谅过我，厚待过我，姑息过我，他们那么大量地爱着我这个不值得爱的人。

我当时只顾任性地生活下去，从不曾体会到这些。尽管我放任着自己的感情，有意或无意地许多次辜负了朋友的好意，也没有人对我露过白眼。但是如今我离开了我那许多朋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四期。发表时题为《话语》。署名余一。

友，孤零零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寂寞使我思索到许多不曾想过的事情。交友的事也是其中之一。直到如今我才明白我是怎样辜负了朋友们的好意了。可是我能够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补偿呢？而且我那些朋友中有的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其余的又散布在各个地方，他们连接起来就看不见落日。我怎么能够使他们知道我这时的悔恨的心情呢？

最近我给几个朋友写信都说：希望我自己以后更深沉些，更大量些，更谦逊些。但这样说，我以前果然有过一点点深沉、大量、谦逊的表现吗？原谅我罢。

话是没有力量的，而且离开了行动，话就成为骗人的东西了。

“等着罢，终于有一个时候我会拿行动来表现，来证实呢！”

我日课似地这样自语着，就站起来，关了窗，拉上帘子，伸手去扭电灯的开关。

1934年12月在横滨。

沉　　落*

离开上海以前我为《文学》杂志写了一篇《沉落》，给一个朋友看见了，他说这篇小说可能得罪不少的人。我原先并没有想到这个，给他这么一说，我倒有些为难了，这个短篇会给我招来许多意外的误解，这是很可能的。但是我终于毅然地把文章交出去了。另一个朋友劝我改用一个笔名，我也没有听从他的话。

这篇小说发表后不久，果然从北平一个关心我的朋友那里来了劝告。他以为这文章可以不必写，写出来不是和《剪影》① 之类的东西差不多么？他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

我诚心地感谢这位朋友。我是常常把他当作畏友的。但是对于他这个劝告，我却不得不原封地璧还，因为他似乎不曾了解我那篇文章的主要思想。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和无数的平凡人一样，我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激情。我的眼睛也能够像平常人的那样地看，我的脑子也能够像平常人的那样地思维。所以即使我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文学》第四卷第二号。

① 《剪影》：指当时的报纸副刊和小报上发表的那些《文人剪影》等等。

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白纸上消磨自己的生命，我依旧是一个平凡的人。我的血依旧要沸腾，我的激情依旧要燃烧，我依旧要哭，我依旧要笑，我依旧要发怒，我依旧要诅咒。所以我永远写不出冷静的文章，所以我永远不能抱着艺术的招牌做白日的好梦。老实说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即使我没有能力，但是我的确想过拿我的笔尖做武器。虽然我不断地在文章里犯错误，但是从我那十几本没有艺术价值的小说里面，贤明的读者总可以看出我的本意来罢。

然而这里所谓"泄气"和我那朋友所说是不同的。我个人并没有仇敌，反而我有着无数的慷慨的朋友。而且我从这个社会所得到的一切已经大大地超过我应得的了。就个人来说，我对这社会，对这生活，对人不应该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怨言。然而在这个时代个人的一切算得什么？个人是随时随地都会灭亡的，可是社会却将永远存在下去。那么对于目前的种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倾向、风气和势力，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够闭着眼睛放过它们。我说这话自然有点夸张，因为事实上我并没有做到这样。但是如果能够向着这方面努力，即使遭遇更多的误解不也是很好的事情么？至少我自己是从"沉落"的境地中爬起来了。

从这一点来看《沉落》，我至今仍然觉得我没有错。《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势力之一。这一点是那位朋友没有见到的罢。他的眼光也许比我的更远一点，他似乎看漏了我们民族当前的危机而仅仅迷信着将来。事实上这将来还得看我们

今天的年轻人的努力。要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正在“沉落”的途中挣扎的民族拉起来，那么将来才有黎明留给我们。否则一批教授和博士也救不了谁的。四万万人以及后来无数的子孙的幸福与目前的教授、博士们的光荣比起来，这其间的轻重是很容易分辨的罢。我现在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些。那危机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怕了。假如说我写文章是为着泄气，那么我是替现在和未来的无数的青年悲愤地叫出了一声：“少为我们造下一点孽罢！”或者更狂妄地嚷道：“我们要活！”

这一点是我无日无夜不痛彻地感觉到的。若说像我这样的人会如此地关心到一个民族的命运，也许不会有人相信罢。那么把我当作乱咬人的疯狗看，这种人是一定有的了。

但是，朋友，你该不会这样地看待我罢。那么即使我辜负了你的好意，固执地走那条使你为我担心的路，你也可以原谅我罢。然而如果我更进一步，要你也做一两件事情，来拯救我们这个在“沉落”中挣扎的民族，你会怎样地回答我呢？你会以为这也是疯狗的狂吠么？朋友，请你原谅我。

1935年1月在横滨。

书*

在大街上几家古本屋里耽搁了两个钟头，抱了十多本《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出来，这里面有了森鸥外，岛崎籐村，有岛武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人。金一圆五十钱也。确实是很便宜的罢。上了自动车，心里还颇高兴，因此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离开上海的前两天，无意间买了一本美国版的《沙宁》，是有插图的大字本，而且是作为新书买来的，价三元。我觉得很便宜。不过据一个朋友说在别的书店去买，也只要花这样的价钱。就是这同样的书，北平北京饭店内的法文图书馆的伙计曾向我讨过二十圆的高价。相差得这么多！书贾们的赚钱的欲望也就大得可惊了。我并没有听错话，因为说话的是中国人，而且同去买书的还有我哥哥。结果那天我花去四圆买了一本"现代丛书"版的，译文是一样，却是没有插图的小字本。这种版本在别处只售价三元的事情，我并不是不知道。

在上海红鸟书店买法文书也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有一次我要买一本小册子，大概是在巴黎公社殉难的 Varlin 氏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文学》第四卷第二号。

纪念册罢，原价两个法郎，以为花四五角钱，就可以了。问那位中国伙计，他却毫不客气地向我要两块钱。他的那副吃人的面孔和声音就把我吓跑了，以后我几乎不敢再进这书店去。过了几天我有一次路过环龙路，又记起了那书，终于壮了胆子走了进去，这一次遇见的是一个法国人，结果付了八角大洋把那小册子拿走了。这样看来外国商人的贪心远比那给他帮忙的中国伙计的贪心小一点罢。而在外人卵翼下做奴隶的中国人对于同胞的那种气焰，也就够叫人齿冷了。

在中国西洋书店里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邮政局是衙门，早有人说过。西洋书店是衙门也是真的事情。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仿佛摆过衙门的架子呢！现在大概是改良了。还有，在中国我很少到大的商店里去买东西，因为我走进那些地方，就好像进了衙门去递呈文。这心情我在法国，在日本却没有感到。

这些话似乎离题太远了。我应该回转来说说图书馆的事情。在中国假若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我们也就可以少受书店伙计们的闲气了。譬如倘使北平图书馆有一本英译本的《沙宁》的话，我也不会像朝耶路撒冷似地在各西书店去搜求这本书了。我不妨明白地说一句话罢，北平图书馆作为一个装饰品，是无愧的。而作为一个为人民设备的图书馆，那就完全放弃它的责任了。一般人不需要的那样堂皇的建筑在那里是有的；而一般人需要的普通的书籍在那里却常常缺乏。我找过 E.Zola，找过 H.Ellis，找过 E.Carpenter……，他们的重要著作却没有一部。我更可以夸张地说，我要读的书，那里全没

有。我为了找书不知道白跑了若干次，但如今北平图书馆却以“为国家搜集善本书的责任”自豪了。事实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价买来的《金瓶梅词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难道果如那些文化膏药式的学者所说一民族的存亡全系于文化，而文化的精华就在于这般“古董”么？

自动车走过海边的一站停了，我望见一只刚开出的轮船。这轮船是往中国去的罢。我不觉把眼睛抬得高高地往西边看。

〔附记〕 听说北平图书馆方面发表了答复我的文章，可惜我没有机会读到。一个朋友写了文章为我“声援”，这也近乎多事。又一个做过北大教授的朋友对我说：左拉的书那边有，曾有一本法文目录寄给他。这当然是真话。不过在馆内的目录里却查不着，我要看也无法看了。至于霭理斯的七卷《性心理》，加本特的《全集》等等，我查了好几次目录，都没有查着，也许这种书是有的，只是不做教授的我们不配看罢了。我应该道歉，因为我以前不明白文化城里的图书馆的特别的使命，现在明白了，所以人也就变聪明了。

“支那语”*

一个朋友要我教他中国话，这并不是什么苦事。然而因为课本的缘故，这却成了难忍的苦刑。

我手边有的尽是这岛国里的“支那语”界的名著。号称“支那语界的三权威”的宫越健太郎，杉武夫，清水元助三位在这岛国里是没有匹敌的。但是给我受罪的正是这三权威的杰作。

朋友读的“支那语”教科书的《会话篇》，是宫越氏和杉氏两人合编的，出版期是去年三月，已经销到八九版了。但在附录《惯用语应用会话》里面还装满了前清的老话，什么点翰林，放知府哪，这样的话题到处都是；假若那两位作者不是别有居心，就是糊涂到连世界也看不清楚了罢。此外还有许多中国人嘴里说不出来的话，现在要我来读这样的书，说这样的话，这实在是一件难堪的事，所以我好几次向朋友表示这书编得不行，但他只是含糊地答应着，好像不相信我的话似的。在他看来那是两位大权威，而我只是一个中国学生，我的话大概不可靠。日本人的精神就在这一点。这从许多地方都可以看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九期。署名余一。

出来。

"支那语界"的权威在中国话的课本里夹用了不少满洲的口音，土话，材料。而同样教科书的《时文篇》(宫越，清水两氏合编)里竟堂皇地选入了法令，外交部宣言，声明书，时评等等，若不看内容谁也想不到这些全是伪满洲国政府组织法，伪满洲国外交部宣言，伪满洲国报纸的时评，以及溥仪的即位诏书。这又是一种障眼法罢。更奇怪的是杉氏编的教科书的《作文篇》里会有"我爱满洲国好像爱我的身体一般"的话。这是从日本人的嘴说出来的。杉氏在他的《最新支那语讲座》开讲辞里又说过："……这样以共存共荣的对华政策却白白地招来排日打倒帝国主义的喊声作报酬。"这意义不是很明显的吗？

宫越氏主持的"支那语界"的杂志《支那语》常常有人选了《大公报·小公园》里面的文章来译注。这《小公园》大概便是他们眼中的现在中国文坛了。作为第一权威的宫越氏曾编过一本《支那现代短篇小说集》，选入了刘大杰氏的《黄鹤楼头》等小说，这是五年前的事。去年一月号的《支那语》杂志，又载了宫越氏称赞《昙花庵的春雨》的文章，这短文已经有人译成中文发表过了，不知道这位权威的人也许还会以为他是一位了不得的文艺批评家。但在同期杂志的扉页上却印出二三等旦角何佩华扮的苏三的照片。何佩华的戏我在北平就领教过了的。

权威们的努力是很可佩服的；但是做了中国人而来读这种奇怪的中国文和中国话，落进了这样恶运的我也该是值得怜悯的罢。

知识阶级*

一八五一年批评家柏林斯基逝世的时候，历史家格朗诺夫斯基①作文哀悼他，里面有这样的话："柏林斯基得以早死还是十分幸运的事！那般有力量的人都陷入了绝望中，对他们周围的事情完全不作声了。啊，怎样才能够把这个愁苦的世界化为灰烬啊！到处都听得见怨恨之声。然而力量在哪里？这生存的重担我们实在挑不起了！"

比这再早十五年，即一八三六年，诗人恰达耶夫②在他的《哲学书札》中也曾写过："我们国家的过去是空虚的，现在是难堪的，将来是无望的。"

再过几十年，到了小说家契呵夫逝世以后，一个女人读到他的全集，她说："我开始读契呵夫，我一本一本地热心读着，到后来，我痛苦到了极点，忍不住对自己说：'不，我实在不能够再读一个字了。'……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世界，充满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太白》第一卷第二期，署名余一。知识阶级：即知识分子。

① 吉·尼·格朗诺夫斯基（T. H. Грановский，1813—1855）：俄罗斯科学家与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世界史的教授。

② 彼·雅·恰达耶夫（П. Я. Чаадаев，1794—1856）：俄罗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

意志薄弱和没有意志的人，全是些失败，全是些患忧郁病者。”

契呵夫的确写出了当时的知识阶级的真面目，而且他也是用了那么忧郁的笔调来写的。

事实证明出来，知识阶级是怎样懦弱地逃避掉他们的历史的任务了。

过去如此。现在仿佛也是如此。对于知识阶级，我们似乎不应有所苛求了。

记得尼罗王君临罗马的时候，圣保罗还劝人“要惧怕战争，用诚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一番大道理堂皇地保留在《新约》里面，给后人诵读。所谓西方圣徒尚且如此，那么生在今日，玩玩古董，游览山水，提倡明朝人文章，甚至仿效明朝人生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呢？……

1934年9月在上海。

自白之一*

近来我常常做噩梦，醒来后每每绝望地追问自己：难道那心的探索在梦里也不能够停止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如此严酷地解剖自己？

一个朋友说过有信仰的人是不应该有痛苦的。我并不迟疑，并不徘徊，我甚至在最可怕的黑暗里也不曾失掉过信仰。但是我却永远摆脱不掉痛苦，因为我永远在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中挣扎，在思想和行为的矛盾中挣扎。我也许是一个懦弱的人。然而我却不曾放松过自己，我努力给自己找机会要取得勇气。

这样的挣扎是痛苦的。在这长的路程中我就拿了自己的血和泪做代价，在梦里流的血和泪只有自己才能够看见。我后来就把它们洒在我的文章里，然而别人却在那里面嗅出了别的气味。我也知道我的文章是不值得看重的，但是为了它们，我就把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青年时代的光阴浪费掉了。甚至到现在我还不得不拿起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还不能够另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余七

走一条生活的路。我的痛苦不是没有原因的。

心啊，饶恕我罢，难道我这一生就没有一刻心的安静的时候么？

1934年1月在北平

繁　星*

和朋友梁一起从木下走到了逗子车站。不过八点多钟，但在我却仿佛是深夜了。宽广的马路在黑暗中伸出去，似乎通到了无尽处。前面是高大的黑影，是树林，是山，也许还是疲倦的眼睛里的幻影。天覆盖下来，好像就把我们两个包在星星的网里面。

“好一天的星啊！”我不觉感动地这样说。我好久没有见过这样的繁星了，而且夜又是这么柔和，这么静寂。我们走了这许久，却只遇见两个行人，连一辆汽车也不曾看见。

这时候正在起劲地谈着悲多汶，谈着尼采，谈着悲剧与音乐，谈着梦与醉的梁也停止了他那滔滔不绝的谈话，仰着头去看天空了。

我们默默地望着繁星，一面轻轻地下着脚步，仿佛两个人都屏了呼吸在倾听星星的私语。

“这时候仿佛就在中国，”我不觉自语似地说了。

“中国哪里会有这样安静的地方？”梁用了异样的语调回答我的话，仿佛我的话引起了他的创痛似的。我知道在中国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文学》第四卷第一号。署名余一。

他留下的痛苦的记忆太多了。对于他也许那远迢迢的地中海畔的法兰西，或者这太平洋上的花之岛国都会有更多的自由空气罢。

我和他在许多观点上都站在反对的地位，见面时也常常抬杠。但是我们依旧是朋友，遇在一起时依旧要谈话。这一次在他的话里我看出了另一种意思，也许和他心里所要表示的完全不同。可是这句话却引起了我的共鸣了。

到今天还大谈恋爱自由似乎有点陈旧了。但是现在还有为情而死的青年，也有人为了爱情不圆满而懊恼终生。甚至在今天的中国还充满了绝情卫道的圣人。梁似乎要冲破这个藩篱，可是结果他被放逐似地逃到这个岛国来了。他也许有一些错误，我可不明白，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说法。而且他那种恋爱观在我看来就陈旧得可笑，虽然也有人以为这还是很新的。但是他有勇气的事情却是不能否认的。不过这勇气可惜被误用了。

恋爱这种事在今天很可以暂时束之高阁了。即使它和吃饭是一样地重要。但是如今饿死也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我说这种话并不是替卫道的圣人们张目，我以为跟卫道比起来，倒还是讲恋爱好些。但是在中国难道就只有这两条路吗？

说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合理，不让人来触动它们，这就是卫道；不承认这个的人算是抗道。那么这条路还是很宽广的罢。说宽广也许不是。抗道的路也许是崎岖难行的。但既有路，就会有人走，而且实际上已经有人在走了。

梁为了要呼吸比较自由的空气，到这个樱花的岛国来了。

在他的观点上说，他的确得到了那样的东西，在松林中的安静生活里他们夫妇在幸福中沉醉了。我在他那所精致的小屋里亲眼看见了这一切。我若还说他过的是放逐的生活，他一定不承认。他也许有理。

但是我呢？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我所要求的自由这里不是也没有吗？离开了崎岖的道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求暂时的安静，在一些无用的书本里消磨光阴：我这样的生活不就是放逐的生活吗？

普照大地的繁星看见了这一切，明白了这一切。它们是永远不会坠落的。

望着这样的繁星我不觉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叹息。

1935年1月在横滨。

雪*

接到美国朋友寄来的《雪》①，正是落雪的时候。"是我写的东西吗？"望着书面上的"雪"字，不觉这样地问起来。

窗外院子里堆着雪，像洒满了白糖似的。山下面也是白茫茫的一片。平时看见的灰色、红色、绿色的屋顶都没有了。但是长春树的绿叶还遮不尽，就像画在白绸子上一样。

我看见雪想起了白糖，并不是因为每天看见这里的房主人把一汤匙一汤匙的糖倾在茶壶里的缘故。我这时想起了从前看过的一部影片。据说路易十五为了取悦于狄·巴利夫人，曾叫人把行宫的地上铺满了白糖，给她坐雪橇玩。不要忘记这是夏天里的事情。当时国王的命令可以完成一切，就如有些人相信爱情可以完成一切那样。但是路易十六，这个平庸的人，后来上断头台，跟这类事情多少也有点关系罢。自然路易·加伯自己也干了不少的坏事、蠢事。可是他代祖先赎罪的事也是无可否认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水星》第一卷第六期。

① 《雪》原名《萌芽》，一九三三年初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禁止发行。第二年改名《煤》在上海开明书店排好后，又因当时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干涉停印。一九三四年年底自费印行一千册，托辞在美国旧金山出版。

我推开书斋的窗户，冷气迎面扑来，还有些雪片在空中无力地飘舞。但是不久雪也止了。天空仍旧是没有开展希望的灰色。地上却发着光。我回头看"寒暖计"，是华氏四十度的光景。并不太冷。房里火钵内燃着"炼炭"，煤臭正往四面散布，开了窗倒使人特别感到这触鼻的气味了。我就把头伸出窗外去。

在书桌上躺着从美国寄来的《雪》。窗内是雪，窗外也是雪。这不是夏天。在地上发亮的也绝不是白糖，但是我却想起路易十五的故事了。将白糖当做雪的事也许是出于影片制作者的臆造。然而那个时候法国宫廷的荒淫，我们却可以从许多历史的记载上看出来。而且就在今天，许多游过凡尔赛宫的人也会为路易十四的豪华所惊倒。不过倘使路易十五在坟墓里面能够知道他的孙儿在一七八九年以后所过的日子，那是多么有意思啊！但是可惜死了的人不会有知觉了。活着的人之所以不惜屡屡重复着死了的路易十五或者路易十四的故事，大概因为活着的人死了以后也不会有知觉罢。眼睛一闭，便什么都看不见。这的确是很好的办法。自己满足了：以为把万世不替的大业遗留给子孙了。谁又会知道那所谓万世不替的大业就只是两根杠杆和一把斧子[1]呢？

今天落的雪和一百几十年前落的不会是不同的罢。而且和一百几十年后还要落的也不会有什么差别罢。那么这真理和一百几十年以前或以后的又会有什么差异呢？窗外的雪明

① 两根杠杆和一把斧子：指断头机。

后天就会溶化。窗内的雪却是任何强烈的阳光也不能使它消灭的。假若就拿它来作证人，谁在一百数十年以后读到它，对于写出这本书来的我的思想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雪不会骗我——我至今仍有这样的确信。

1935年2月在横滨。

《论语》的功劳*

据说“自《论语》提倡语录体以来，小品文之风遍天下，一洗五四以后鲁里鲁苏的白话文言调的恶习。……这未始非《论语》的一点小小功劳。”(见《论语》第四十九期第二十七页)

一个《论语》的同志在今年新年节得到“至友×君”的信，他“读后不懂，赶紧复信，委婉地劝他熟读《论语》，到了暑假来书，便大大不同。”这是一件真事，我们有下面的两封信作证。

一封是未读《论语》时写的：

> 别的没有比这更重要，开始就祝你光明，——一九三四年时间带走了我一切，——快乐与惨痛。啊！人谁不惋恋过去，怅惘目前！也许你更达观些？超越了这两种情绪？但是，一个被环境波动的人，怎么摆脱得了……所谓要做人的一些烦难？自然我是这样。(第一段开头)
>
> 过去现在英文枷锁着我。(第二段节录)
>
> 元旦日没有什么赐福，仅仅送来一些呻吟声，目前是黯淡的。(第三段节录)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五期。署名余一。

另一封却是读了《论语》后写的：

> 近领手书，非不想复，实则天气困人，有所偷懒。比日起居何似？张奶妈来，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夏日悠哉！想有佳作。每念昔日北海之游，诚不可忘，今仍居旧地，但没有去年那般乐趣。犟石西城婴病，莹苦功课羁身，虽风清月白，亦只随便度去。有时闲暇，即至屋外草园中，与莹燕坐，莫孤明月也。假中生活，无值告你。摇扇而外，常与麻雀为朋．晨间清凉，乃温英语数张，午中炎热，坐以呻吟：如此现象，故人得毋笑我无聊乎？

把这两封信拿来比较一看，我们就知道那位×君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半年前他写信还写不通，半年以后他就可以写出像明朝人所写的那样漂亮的信札了。

不过有一层是那位《论语》的同志忘记了提说的。×君在未读《论语》时，虽然写不通文章，但他还知道“光明”，还知道时间给他带走了什么，还知道什么东西“枷锁着”他，还知道“元旦日没有什么赐福”，还知道“目前是黯淡的”。至少他还是一个现代的人。可是等到他读过《论语》以后，情形便不同了，他现在只知道“天气困人”，只知道“偷懒”，只知道“夏日悠哉”，只知道“风清月白”，“莫孤明月”，只知道“常与麻雀为朋”，只知道“无聊”。试问我们能够从这些话句里嗅出一点现代人的气息么？

把一个现代的人变做过去的人，这也是“《论语》的一点小小的功劳”罢。

以上是我三四个月前读《论语》半月刊的什么纪念号时写下的一段小杂感。本来早已忘掉了，因为最近无意间见到《论语》五十五期里“《论语》戒条第十一决不回骂想以骂我们而成名或推销其刊物的人……”等话，才又记起它来，把它编进这小书里。倘使骂《论语》就可成名或推销刊物，则《论语》是什么样的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到现在还未成名，但既然骂了《论语》，也许不久就会成名。不过不知道成名以后我是现代人呢？还是变做了明朝人？这一层《论语》戒条中未提及。也许《论语》不理，就会使我不成名也未可知。

木 乃 伊*

我和别人一样，也会做种种的梦。梦做得太多了，没有一个能够长留在我的记忆里，所以我写不出记梦的诗和小说。我也曾读过几本德国和奥国医生著的关于梦的书，但大都是用“性心理”来分析梦，把我的脑筋弄得更糊涂了，所以读过就忘记，跟没有读过一样。

我也曾发过一次梦吃，因为是大梦，所以记得住，而且能够写下来。这次是梦着自己被什么东西压在身上，喉管被棉花堵住似的，心里明白，却不能发声叫喊。但是自己不甘心，拚命挣扎，终于叫出声来，就这样地醒来了。这梦不必要什么德、奥医生著书分析，我们也能明白：睡觉的时候让厚被或者枕头压在胸膛上，所以有这个恶梦。我的睡法有些特别，就跟我做人一样，简单地说：不讲规矩，不爱整齐。但和夏目漱石君的“哥儿”① 的睡法比起来，却是没趣了。那个“哥儿”睡觉时非“砰的一跌，仰天倒了下去”不行，否则“便不觉得像曾睡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六期。发表时题为《梦》。

① 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小说家。“哥儿”是他的名著《哥儿》的主人公。

过的样子”。但是这种奇妙的睡法，在中国做不到，别人会来干涉。

最近我梦见了木乃伊。提起木乃伊也许会有人想起金字塔和斯芬克司，但是我并没有梦见它们。我的木乃伊是在洋房里出现的。那时我仿佛坐在十几层大厦中的一间小屋里，木乃伊推开门进来。

他的赤裸的身子带着发亮的金黄色，身材异常短小，脸上只有一层黄皮，眼睛也陷了进去。他走路没有声音，有点像小贼。他走到我的写字台对面，在活动椅上不客气地坐下了。

我安静地对他点一个头，好像他是我的一个熟朋友。

“今天又走了远路回来了。”木乃伊说的是中国的官话，这应该是可惊奇的事，但是我并不惊奇！

“又去了那里么？”我照例似地这样发问，我好像知道他去过了什么地方。

“是的，”他不快活地答道，俯下头去。

“在那里耽搁得很久吗？”我又问。

“是，”他颓丧地答应，并不抬起头。

一股异香沁入我的鼻孔。

“见着她了吗？”我嗅着这几千年前的香味，身子微微地颤动起来。一下子他一生的悲欢都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看见一个比克利阿帕特拉[1]更美丽的女郎。

“是，见着了；其实还不如见不着好，”他痛苦地说，把头抬

---

① 克利阿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69—30)：埃及的非常美丽的女皇。

了起来。

他脸上没有眼睛，只有两个黑洞。他作过将相王侯的事情我在这张脸上看不出来。我仿佛记得他是一位出名的将军，后来做过高僧，似乎埃及文的历史上有着这样的记载。还有，他为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又还了俗，甚至走遍天下去追寻那个女子。虽说是天下，但木乃伊的天下是很窄小的。书上说他没有找到女人就病死在一个小镇里。可是他对我说今天见到她了。

“见着她，当然是好事。几千年来的宿愿得到报偿了。她说了什么吗？”我平淡地问，就像在翻阅一本古书。

“唉！”想不到木乃伊的叹声也是“唉”，和我们的一样。他张开口，露出两排零落的白牙，他把那瘦得和鸡爪差不多的右手托着下颔，沉思了一会儿，忽然悲痛地说：“可是她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女人啊！”

我注意地望着他，因为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好奇心。

“我为她牺牲了一切，我死也是为着她死的。我爱她，我的爱是纯洁的、热烈的。我爱她，我活着爱她，死了也爱她。我上下四方地追寻了她这么几千年，我为她历尽了千辛万苦。我终于寻到她了。……可是她……她……”连木乃伊也哭起来了。

我不插嘴，静静地望着在金脸上发亮的木乃伊的眼泪。

“她并不爱我。她连我唯一的要求也不肯答应，”木乃伊抽泣地说。那种使人窒息的古香料的气味又一次在房里散布着。我觉得我的身体快要腐烂了，可是自己并不感到痛苦，倒

像喝醉了酒似的。

“那么她以前就不曾爱过你罢，”我含糊地说。

“不会的，不会的！”木乃伊起劲地分辩道。

“在尼罗河畔我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她和她父亲在一只华美的船上，她唱着那么美丽的歌，把我的整个心神都震摇了。我只看见她的一对眼睛，她对我带着希望地笑一笑。这一笑，绝不是无意的。第二次，我经过她的门前，在露台上现出她的身子，她看见了快要跪倒在下面的我，她对我指着月亮，给了我将来的希望。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不就是这同样的月亮吗？”他说着，就伸手往外指，奇怪！月光就明亮地从窗户射进来。

“以后呢？”我迷惘似地问。

“以后……我追求了这么几千年，今天终于在那个茅舍里看见了她。她却不认识我了。我绝不会认错人。她没有大改变，只是比从前更美丽、更纯洁。”

我不作声，让月光在房里移动。

“她为什么不肯给我那个东西呢？”他绝望地反复呻吟着。

“我贡献了我的全量的爱，经过了这几千年，我追寻她，要求她实践她的诺言。但是她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似地把我拒绝了。她连那样微小的东西也不肯给我。她辜负了我的爱。可是我没有那东西……”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你向她讨过什么吗？”我打岔说。

“灵魂，灵魂，灵魂啊！”他绝望地吼起来。小小的身子在活动椅上像发了寒颤似的猛烈地抖动。古香料的气味渐渐地

淡了下去。月光也消失了。

我这时完全明白了。木乃伊没有灵魂是不能够生存的。

“木乃伊找到他所爱的女人，哀求她给他一个灵魂。那个女人不肯给，她不爱他，因为她是一个活人，他却只是一个木乃伊。这就是你的故事吗？”我这样问。

他像患了重病一般地蜷缩在椅子上，但是嘴里还发出含糊的应声。

“你想木乃伊能够从活人那里得到灵魂吗？还是进你的玻璃棺材去，在博物院里做你的好梦罢！”我生气地责斥道。

我听不见应声，注意地一看，原来他已经散落在地上，成了一堆白骨。这件事情发生得这么快，我一点也不觉得。

尸骨旁边有一张画像，是一个女人的像，她的确生得漂亮。

于是我就醒过来了，是地震把我惊醒的，这个月里有过两次地震了。我醒在被窝里时，梦里的事情还记得很清楚。

这个梦虽然奇怪，但是若要我来分析也不难。我前两天在东京上野科学博物馆里看见过两个墨西哥的木乃伊（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个婴孩），所以会梦见木乃伊的事情。至于那个女人的面貌，倒很像一幅名画里的文艺女神的风姿，不过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那幅画，现在却记不起来了。

1935年2月在横滨。

月　　夜*

有月亮，天空又很清朗，虽然十二月的晚风吹到人身上也有冷意了，我吃过晚饭，依旧高兴地穿着高屐子一个人在屋前小小的园子里散步。

山下面的人家都燃着灯，但大半被树木遮住了，只有星点似的光送到我的眼里来。一层薄雾盖着它们，不，不仅罩着这些灯火，并且还罩着山下面静静的街市。

清朗的天空中除了半圆月外，还稀疏地点缀了一些星星。在这房屋的正对面，闪烁着猎户星座的七颗明星；挂在四个角下方的猎户甲星，就是那较大的一颗，只有它在这无云的蓝空里放射着红光。远远地在天际是那一片海，白蒙蒙地在冷月下面发光。

望着这星，望着这海，我不禁想起日光岩①下的美丽的岛上风光了，我不用“往事”这个带感伤性的字眼。

不止一次，我在日光岩下的岛上看过这七颗永不会坠落的星，看过和这海相似的海。那些时候我都是跟朋友们在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水星》第一卷第六期。

① 日光岩：在福建厦门对岸的鼓浪屿。

起的。那些朋友的年纪和我的差不多。

就像怀了移山之志的愚公一样，我们这一群年轻人把为人类找幸福的船这个重担子不量力地放在肩上胡乱地忙碌过了。我是最不中用的人，但是生活在那些朋友的中间我也曾过了一些幸福的日子。

龙眼花开的时候，我也曾嗅着迷人的南方的香气；繁星的夜里我也曾坐了划子在海上看星星。我也曾跨过生着龙舌兰的颓垣。我也曾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我也曾踏着长春树的绿影子，捧着大把龙眼剥着吃，走过一些小村镇。我也曾在海滨的旅馆里听着隔房南国女郎弹奏的南方音乐，推开窗户就听见从海边码头上送来的年轻男女的笑声。

这些也许会引起年轻诗人的灵感罢。可是我们当时却怀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或者说起来就想流泪似的感动。山水的美丽在我们的眼前都变得渺小了。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只是那在新的巨灵前战栗着的旧社会的垂死的状态。

时间是骎骎地驰过去了。我们的努力也跟着时间逝去了。一堆废墟留在我们后面，使得好些人叹息。我们不能不承认失败了。也许还有人会因为这个灰心罢，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一阵绝望之际也曾发出过痛苦的叫号。……

如今在这安静的月夜里，望着眼前这陌生的、但又美丽的景物，望着天际的和日光岩下的海面类似的海，望着那七颗随时随地都看见的猎户星，虽然因此想到了以前的一切和现在横在那里的废墟，我也没有一点感伤，反而我又一次在这里听见旧社会的垂死的呻吟了。同时在朦胧的夜雾中，我看见了

新的巨灵像背负地球的阿特拉斯[①]那样在空中立着。这新的巨灵快要来了罢。他会来完成我们所不能完成的一切！

1935年2月在横滨。

① 阿特拉斯(Atlas)：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人，被罚用头和双手(一说用两肩)支持天空。

神*

还不到十点钟，但在山上已经是静夜了。我把久俯在书上的头抬起来，用疲倦的眼光看窗外的黑暗，想听听静夜的气息。常常在这时候便响起了金属敲着火石的声音，清脆的，一声，两声。我吃了一惊，又绝望地把眼光放回到书上。事情是很平常的，我那位朋友又在啐经，而我的安静又被他扰乱了。

这朋友是一个安份守己的好人。但我的朋友中信神的，他是唯一的了。我以前并不知道这个，倘使知道，我们也许不会做朋友罢。又，这朋友虽说是一个虔诚的拜物教徒，而其实信神也只有几个月的光景，我若是早同他做朋友，也许可以挽救他罢。现在迟了。

我是神的敌人。这也是无足奇怪的。因为无神论的思想在今天已经是很平常的了。这个世界里没有神存在的事实，稍有知识的人也都明白。

然而这种人又是多么愚蠢啊：本来生在这个世界上，却又想精神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却又希望能够在另一世界中获得。把自己的一切大量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署名余一。

地贡献给空虚里的神，想从那里得到更多的报酬。这样对同类的人就没有丝毫顾念的余暇了。所以信神的人常常是自私的。譬如中国的许多无知的女人就是这样地行为着，结果依旧劳苦贫困地死在空虚里，留下永不能实现的希望给她们的亲人。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欺骗。然而我在一个温情的异邦女人的信函中看到了"信神的人的伟大"一句话，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啊。将懦弱看作伟大，将愚蠢看作崇高，将自私看作仁慈，将空虚当作实在，人类的历史就几乎陷落在泥淖里拾不起来了。

然而还亏了那无数的能够面对生活的勇敢的人，他们在语言和行动里表现了真理，他们把历史从泥淖里拾了起来。他们给我们的东西比那般信神的人希望从神那里得到的还更多。无论在什么时候，人的力量都显得比假想的神更伟大，这是极其常见的事实，我们用不着去读雨果[1]的《诸世纪的传说》("La Légende des siècles")里赞颂人类的伟大的诗篇了，也用不着在北欧神话里找神的灭亡的故事了。

但是到今天在知识分子中间还有着信神的人，这事情将怎样解释呢？其实如果我们将这个包含着无数矛盾的社会仔细考察一下，就能够容易地明白这一切了。

然而信神的路终于是懦弱的路。不满意现状，而逃避现实去求救于神，这样愚蠢的行为是不会有好处的。所以对于做出了种种可笑的行为的这位朋友，我常常怜悯地起了救助

① 雨果(V. Hugo，1802—1885)：法国伟大作家，他的长诗集《诸世纪的传说》(或译作《历代传说》)，共三卷。

的心思。自然他不知道，而且也许他还以为我更需要向他求助呢！他有一次就对我暗示了要我信神的意思。但后来他也知道这只是徒然的努力了。

现在夜已深了，我又听见他在苦苦地啐经，同时我想起了那个温情的女人的话。她至今还站在神的门外，不知道什么缘故会使她在信里写了那样的话。我无意间想到她将来也会像这位朋友一样地信神时，我就为一种绝望所压倒了。前几天我已经在这里看见了一个新改宗的人。那是一个学生。我看见他穿着制服跪在地上念经的样子，就仿佛看见一个人在受苦刑。这个景象是很残酷的。我一面怜悯他，而一面对使他改宗的这位朋友的一群（虽然我知道他们的行为也是出于好意）起了反感。但是如今从第三个人，而且是一个温情的女人的口里又来了"信神的人的伟大"的话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啊！

起来，更努力地从事你们的工作！显出比神的更伟大的力量来！——这是对于每个有真诚的心的年轻人的警告。

从空虚里出来的神还是把它送回到空虚里去罢。这时候是岛上的冬夜，寒风正吹着屋后的树林飒飒地响。那几树山茶花在一夜里会给吹落多少罢。我忽然想到写了《神的灭亡》三部曲的郭源新君①，不觉起了感激的怀念。

1934年12月在横滨。

---

① 郭源新：郑振铎的笔名。《神的灭亡》是他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中的一篇。

直　　言*

林琴南氏翻译的《十字军英雄记》是七八年前读过的了。里面有两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就是："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这是一位中世纪的英国公主对她所爱的将军说的话，但在中国所谓"奴在心者"如今不是正在各处得意地活着吗？而且这类人不是还在骄傲地非笑那般"奴在身者"吗？做奴隶的人，常常是自己不觉得的。因为他们的良心都被贱价地卖给主子们了。不管主子们是中国人是外国人，是古人，是今人。其为主子，则没有差别。"奴在身者"是出于不得已；而奴在心者便是自甘堕落了。对于自甘堕落的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中国人似乎只知道现在。过去忘记了；未来还想不到。人一到三十岁仿佛就得换个面目，到四十岁再换个面目。从前骂人怎样怎样，后来自己又被人骂着怎样怎样。自己不以为怪，仿佛是当然的事情。有些人靠着"历史"吃饭，但同时又出卖了"历史"。譬如因提倡新的什么，反对旧的什么而得到青年的信仰因而做了名流学者以至什么什么的，现在却也翻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七期。

一个觔斗颠倒来拥护旧的什么，反对新的什么了。这样不由得青年们不起“受骗了”的感想。

自然他们现在是很得意的了。他们忘记了过去。但是未来却不能忘记他们。会有人把他们的这一切记载下来留给后代的青年们看。那么他们在未来的青年的眼里将现着怎样的一张鬼脸呢？我想到这，也有些替他们担心了。

在中国要认识一个人的真面目是不容易的。过了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还没有露鬼脸的，这个人大概就不会改换面目了。不过不露鬼脸的人常常是很不得意的。

《红楼梦》里秦可卿给凤姐托梦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句话太女儿气了。我们另外找句话来说：没有社会现象是永远固定不变的。从这点看来我更不得不为那般得意的人担心了。

1935年2月。

《蓝 天 使》*

最近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是关于大学教授的，但同时又和《蓝天使》有关。雅宁斯① 主演的《蓝天使》影片几年前在上海很流行。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大概不少。自然《蓝天使》(日译名《悲叹的天使》)在日本也曾受到欢迎。至于改编成舞台剧在东京歌舞伎座上演，却是一星期以前的事。但是这一次却激怒了日本的大学教授。

日本全国大学教授联盟认为这个剧本侮辱了大学教授的尊严，便由该联盟的通报局长小松雄道氏向歌舞伎座提出抗议，而歌舞伎座却置之不理。这一来教授们更气得没有办法，只好去找文部省和警视厅② 帮忙。结果歌舞伎座把剧本改动了一点点，算是教授们得到了胜利。因此小松氏很得意地宣言道：

"那样的德国影片居然原样不改地作为日本舞台剧上演，实在是太无见识。在外国侮骂学者的舞台剧大概是不要紧的，然而在日本却决不能容许。今后要严重监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七期。署名余一。

① 艾·雅宁斯(E. Jannings)：德国电影明星。

② 文部省和警视厅：分别为日本政府的教育部和警察厅。

那么改动的是什么地方呢？歌舞伎座的人说得明白："脚本完全没有改动，只是学生多说个'阿门'[1] 罢了。"这是真话。加入的地方只是"教授"死的时候学生出来念着"阿门"祈祷，对"教授"表示敬意。这是《蓝天使》影片里所没有的。大概亨利·曼[2] 的原作小说里也没有这个尾巴罢。

这种改动和"早晨四个晚上三个"式的改法完全一样，却想不到居然能叫大学教授们满意，一场纠纷就此烟消云散，这似乎是个奇迹。

但其实仔细一想，我倒觉得大学教授联盟的抗议似乎有点"没见识"。《蓝天使》本来就跟他们不相干，他们却偏偏要拉到自己身上来。《蓝天使》里面的老教员实际上只是一个中学英文教员，影片上解释得很明白。但是熟读德文的日本大学教授们会把中学英文教员认作大学教授，这倒有些令人不解了。既然身为大学教授，身为"学者"，似乎应该分辨得出外国大学和中学的程度的差别。倘使连 gymnasium[3] 是个什么东西还不知道，就胡乱地发出什么抗议，这种教授即使死后学生出来多叫几声"阿门"，也不能叫人家看得起。

我没有做过教授，自然也没有一个学生，不仅死后没有人出来为我叫一声"阿门"，就是活着写文章时也没脸写出"我的学生怎样怎样"的话。这在旁人看来也许是很不幸的罢，但在我却是一生的大幸事。

---

① 阿门(Amen)：基督教徒祷告时的结尾语。

② 亨利·曼(H. Mann，1871—1950)：德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③ gymnasium(德语)：文科中学校。

以上是我一时的感想，拉杂写出来，大概于中日邦交无碍罢。

1935年2月在横滨。

河　　马*

一

今天和一个朋友到上野动物园去，在那里玩了三个多钟头，看见了河马，并且还买了一张河马的照片。晚上回到房里对着河马的照片，就想起了下面的一段故事：

两个青年扭缠着到一个裁判官那里去告状。裁判官问他们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甲说乙无缘无故殴打他。裁判官便问乙："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打人？"乙说："他五年前骂我做河马。"裁判官便带笑问道："他五年前骂了你，为什么你直等到今天才打他呢？"乙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直到昨天才在动物园里面看见了河马，原来是那么丑的东西。"

这故事我是从鹤见祐辅氏的讲演里听来的。鹤见氏用它来说明他的，或者他的先生夏目漱石氏的文学观。我却想把它应用到别的事情上去。

青年乙五年前被人骂为河马而不生气，也许他还很高兴，因为他没看见过河马，却只听见人说河马是一个庞然大物。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八期。署名余一。

直到他自己站在河马的面前，他才看清楚了他所崇拜（？）的偶像的真面目，而深深感到幻灭了。

也许有人会非笑青年乙，说他的脑筋不灵敏，其实像青年乙这样的人不是到处都有的吗？

二

最近在中国某日报副刊上看见一篇恭维希特勒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莫索里尼在三日之间将全意大利的自由思想家驱逐出境，希特勒在一夜之间烧毁了若干万的书籍。中国人也应该学学他们。"那位作者也许只听见人说希特勒是一位如何了不起的大人物罢。我想假若有一天他能够看见希特勒的真面目，那么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他既然劝中国人学希特勒，那么他应该知道希特勒究竟在干些什么。这两天希特勒正被人骂为欧洲的刽子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手。这自然是有些冤枉他，一个人不能负这责任。但我说希特勒会断送德国，这倒是可靠的。因为人类决不能用疯狂来完成伟业，而摧残科学践踏文化的希特勒正如一个美国教授所说，是一个狂人。

我们静候着欧洲时局的开展罢。

三

鹤见祐辅氏在东京中华留日青年会演讲《文艺与人生》。

有个中国人做消息介绍他“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他在日本的地位和胡适在中国的地位一样。”这一来把我弄得更糊涂了。胡适氏在中国究竟占着怎样的地位，我至今还不明白。

鹤见氏大概连一个钟头也没有讲满(因为翻译者占了一小半时间去)，这没什么关系。但奇怪的，是他始终没讲到《文艺与人生》的本题上。他除了叙说几个笑话外，就再也没有给我们什么东西。他拿河马的故事来说明他的文艺观，这文艺观是从夏目漱石氏来的。夏目氏给文学下的定义：——F+f。F是Facts (事实) f是feelings (感觉)事实不变，而感觉因人因地因时而变，这样文学就成立了。所以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在同样一丛竹林面前，会写出三种不同的诗篇，所以五年前被骂为河马而不怒，必要等到在动物园里看见了河马才发生感觉，因此做出报复的行为来。再转下去，要了解一个民族，最好研究他们的文学，中国学生到日本来，无论学什么总得研究日本文学，才能够了解日本人的思想，而且将来好带了成绩回去创造东方文化。

我听了如此奇怪的议论，我不禁痛苦地疑惑起来：为什么中国学生会请了这样的一个人来这里演讲？而且会有这么多的安静的听众？据说两年前菊池宽曾在这里对中国学生演讲过一次，而且是花了钱请来的。这一次不知道送了鹤见氏多少钱。想到这，我只有愤然地掷了我的这管秃笔。

读书杂记*(四则)

陆凡的第二部小说

德塞沙尔的诗集里面有一首题作《陆凡的第二部小说》的诗。这陆凡便是罗曼罗兰的剧本《爱与死的搏斗》中的瓦勒。

陆凡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一个吉隆特党人，吉隆特党失败后，党员有的被捕受刑，有的逃亡。陆凡和三个朋友一块儿离开了波多。在途中一个朋友往南方去了，只剩下他们三个。没有人肯款待他们。天落着雨，道路泥泞着，饥饿和疲倦折磨着他们。他们去叩一个朋友的家门，那朋友竟然不肯接纳。他们连避雨的地方也找不着，只得站在树下淋雨。这一天是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陆凡这时候忽然下了决心：回到巴黎去！他知道人家正在那里悬赏缉拿他，他知道断头机正在那里等候他，但是在那里也有他的洛多意斯加，想起那个女人，他仿佛在黑暗中看见了灯光。他说：他愿意让他的头落在断头机的筐子里，只要他的嘴唇能够在头落之前和他的爱人接一次最后的吻。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七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三期。署名马琴。

于是他辞别了两个朋友，动身走向那虎狼穴去。经过了许多次危险和困难以后，第二年四月六日他公然进了巴黎的城门，见着了他的爱人，然后两个人安全地逃到瑞士去。而和他同路的三个朋友却先后地被捕受刑了。

这便是陆凡的第二部小说，这是用他自己的血和泪写成的。他的第一部书是“Faublas”。关于这件事情他自己也写了一本回忆录。

因此历史家米席勒在他的《大革命史》第六卷中便说道：“爱把陆凡救了。”

龚多塞的最后

米席勒说过：“爱救了陆凡。爱却断送了德木南(因为它鼓舞、坚定了他的英勇气概)。对于龚多塞的死，爱也有同样的责任。”

四月六日陆凡进巴黎来看他的爱人，龚多塞也在那一天离开了他的隐匿处，为了保全他的妻子。

哲学家龚多塞当时正藏匿在卢森堡监狱旁边一间阁楼上写他的最后的杰作《人类精神之进步》。他的年轻的妻子苏菲住在市外，每天要步行到巴黎来，她要维持她丈夫和家人的生活，她开了一家洗衣店，在楼上她还留着一个小房间替人画像。生意自然不会好。她的情形是很苦的。她没有一天不为她的丈夫的安全担心。有时候在晚上她偷偷跑到丈夫那里去，和他见一面，她虽然极力掩饰她的困苦的情形，但这无论

如何瞒不过龚多塞。她爱他，他也爱她，但在这种情形下她是一天天衰弱下去了。

龚多塞知道他的妻子的巨大牺牲，他不能忍受这个。他爱她比爱生活更甚。然而在他的面前却横着一个更重大的工作，那历史和科学的著述。历史和科学是什么？这是攻击死的战争。他的书也是为征服死而著述的，为拯救人类而著述的。他整日整夜地忙碌着，为了要早日完成他的工作。在四月六日他写下了最后的两句话："科学要征服死。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死了。"

就在这天早晨他把帽子压着额，穿着他的工衣，一个袋里放着毒药，另一个袋里放一本拉丁文的诗集，他昂然地走下楼跨了门限出去。

他想从此他便可以使他的苏非安宁了。

两 个 女 人

一七九四年埃伯尔、德木南等相继上断头台以后，他们的妻子也被逮捕了，囚禁在一个囚室里面。

埃伯尔夫人是个尼姑，自小就在修道院里度寂寞的生活，她后来爱上了埃伯尔，和那个人在一起的生活也是很不幸的。德木南夫人却是另一种典型的女性，德赛沙尔的诗里说她是："小孩儿，小鸟儿，母亲的心，芦苇的身"。

有一天这两个年轻女人在囚室里谈起话来。埃伯尔夫人悲哀地说："革命不过给了我一线的自由和不幸。爱上一个全

世界都憎恶的人，这是可怕的。我记念他，别人决不会宽恕我，我会死，也许会拿死为我所最惋惜的放肆行为赎罪。至于你呢，夫人，你是幸福的。你不能有什么罪名。人家不会把你和你孩子分离开。你会活着。”

德木南夫人回答说：“那些胆小的人会杀死我，然而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女人的血会激起人民的心灵里的愤怒。在罗马把十大行政官推倒的，难道不就是一个女人的血吗？让他们杀死我罢，那暴政会跟着我倒的。”

然而几天以后这两个女人都在断头台上消灭了。

塞西尔·莲诺

诗人拉玛丁的两千余页的大著《吉隆特党人史》，诚如它的题名所暗示，是一部有偏见的书，它不能够给我们解释自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革命之发展的阶段。但也自有它的长处，它不是一部历史家的著作，它是诗人的著作，那文字的优美常常使读者不忍释手。

关于塞西尔·莲诺的事，米席勒的书里面只提到一个皇党女郎在罗伯斯庇尔家中被捕，而英国加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拉玛丁的书都说得比较详细。

莲诺是一个纸商的女儿，一个充满着好奇心的，二十岁的漂亮姑娘。有一天她瞒了父母偷偷去见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是不能让普通人看见的。她便嚷起来，人家把她抓住加以搜查，在她的篮子里发见两把小刀，和一堆换洗衣服。于是

他们便将她逮捕起来，她给牵连在行刺罗伯斯庇尔的案件里。

受审的时候，她天真地回答道，她想见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受了好奇心的指使，她想看看所谓暴君(tyran)究竟像个什么样子，是否能够引起她的爱或恨。她说那换洗衣服是预备着在监狱里用的，她知道人家会把她送到那里去，她甚至知道她会被送上断头台。

她的推测果然不错，她被判决了死刑，她的全家都陪着她上了断头台。在囚车里她还向她的父母谢罪，说她不该起那种奇怪的念头。

附 录 一

关 于 翻 译*

《译文》月刊出版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读了创刊号，最使我感动的就是那几个负责者的严肃的，忠实的态度。我希望它能够在这恶草丛生的翻译界中洒播一点新的花种。

从《译文》月刊我就想到了近来成为问题的王××君的翻译。记得几个月以前有人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上介绍过他翻译的左拉的两部小说：《娜娜》和《屠槌》。那位先生还希望他能够早日把左拉的全集译成华文。这个希望似乎大了一点。因为王君就并没有这个能力。我读了《图书副刊》介绍的那两部书，曾惊讶地疑惑过：左拉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像王君翻译的东西能够是轰动过世界的名作么？让那些能够读法文、英文或任何一种欧洲文字的人来判断罢。《文学月刊》上马君的批评并不是多余的。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应该在这里提说的：王君凭着什么理由来改译左拉原书的题名呢？把《下等酒店》译作《屠槌》，这还可以说是由他的武断生出的错误；至于在序言里把《萌芽》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余一。

译作《共和历第七月》，则表示他完全不懂得左拉了。《萌芽》一书题名的由来，该书的最末一段说得很明显，决不会使任何读者发生误会。共和历第七月和这书的内容并没有一点关系，而且那时候共和历早已废置不用了。这样看来，倘使王君果然下了翻译左拉全集的决心，那么我们在《屠槌》之后不是还会有《共和历第七月》，《饿鹰》等等出版么？这简直成了王××的全集了。

可见翻译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说正文，便是书名也常常被人译错。我希望那些写世界文坛消息的先生们以后小心一点，宁可多查查字典，千万不要再做出把《七罪》译作《桃实累累》的事情。

附录二

几段不恭敬的话*

无意间翻了改造社版的《芥川龙之介集》来看，又见到《长江游记》，久违了；还是八年前读过的呢。

“现代的中国有什么东西呢？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全都堕落了吗？尤其是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果真有一件可以自豪的作品吗？”

这是十年前芥川氏在芜湖唐家花园的露台上对着友人西村氏发表的意见，那时露台外的槐树顶正寂静地浸在月光里。再望过去，白壁的市街的尽处一定是扬子江的水罢。这水汪汪地流着流着，会流到那梦里蓬莱似的日本的可怀恋的岛山去。他因而起了快回日本去的念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不知道聪明绝世的芥川氏回国以后也曾把这同样的问题中的“支那”两字换作“日本”来问过日本人么？芥川氏如今已成了文学史上的人物了，他是否曾怀疑过日本有着什么可以自豪的艺术作品的事，我们没法知道。那么就让我来发这个问题罢。

“你不要提日本音乐罢，日本人是没有耳朵的，”一个东京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太白》第一卷第八期。署名余一。

帝国大学的日本学生这样说。

绘画呢，第十五次帝国美术展览会的成绩堂堂皇皇地摆在人的眼前。花了一圆的代价我看遍了那无数的堆在纸上的各种颜料，千篇一律的笔致，景色，而且是那画匠手笔一般的细致的刻画，在我这门外汉的眼睛看来，和那颜料堆积起来的广告画是没有什么分别的。自然这话说得过分一点，我承认。但这里面就有什么可以自豪的作品吗？在罗浮尔宫里我认识了艺术的伟大，而在这集全国之视听的帝展中我倒感到艺术的渺小了。

文学罢，据说这在日本已经有了可惊的发达。就翻开眼前的报纸来看罢，那触目的巨幅广告：什么"堂堂的御出马"哪，文坛的什么什么哪；菊池宽，吉川英治，大佛次郎，加藤武雄这一类的通俗小说作家的名字；忠臣藏，加藤清正这一类的题材。侠客和恋爱代表了日本的通俗小说。这类小说的流行，许多作家的低头不是表现着日本文学已经堕落到了怎样可惊异的程度吗？

撇开现在的这种堕落的现象罢。我们随便翻翻几位在文坛上已有地位的作家的东西来看看。第一对于享过盛名而且被称为"现代日本文坛的鬼才"的故芥川氏的作品我就不能不抱着大的反感了。这位作家的确有一管犀利的笔和相当高的文学修养。但是此外又有什么呢？就是说除了形式以外他的作品还有什么内容么？我想拿空虚两个字批评他的全作品，这也不能说是不适当的罢。在这五百余页的大本《芥川集》里面，除了一二篇外，不全都是读了以后就不要读第二遍的作

品吗？

手边又有一本长与善郎，久保田万太郎，室生犀星三人集的合本，也是改造社版的《日本现代文学全集》里面的。我想略略说几句关于长与氏的作品的话，因为许多中国读者曾经从《亡姊》和《山上的观音》两个短篇里认识过他。但我读了《长与善郎集》里面两篇戏曲的代表作（集中还有一部长篇小说《竹泽先生这人》，我还没有读）《陶渊明》和《五祖与六祖》以后对于长与氏在日本文坛上有着怎样的地位一事就根本怀疑起来了。这两篇用中国题材写成的戏曲，无论在技巧方面，思想方面都是很幼稚的作品。而且像《五祖与六祖》那样的短剧竟分成十三“出”，用了九幕不同的布景，每换一幕布景，只让剧中人说寥寥的几句对话，如在第一出里就只有一个老僧对一个乡下姑娘说的短短的两句话和一点呆板的动作。这样的戏剧能够上演，真是残酷地浪费了人的精力了。那么这么多的场面和布景究竟表现了些什么呢？其实并不会比中国所传述的那故事多一点。而在以“陶渊明万岁”声结束的《陶渊明》一剧中，却把陶渊明写成了一个极可笑的人物。这样的作品却堂皇地走上日本的文坛了。

最近也读过了所谓自然主义的划时代的名著《棉被》，不幸又感到了滑稽的心情。说是自然主义，但我们可以在这和左拉的作品中间找到什么共通点吗？读左拉的小说时总感到严肃的心情。左拉的主人公的悲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左拉的悲剧与其说是那绝对不能摇动的命运之力所产生，毋宁说是被当时的支配阶级的社会组织力造成。）而竹中时雄

的经历，如果可以说是悲剧，那么这悲剧就全是不必要的了。据说这是花袋氏自身的经验谈，又说这是大胆的作品，但实际上竹中时雄不是一个怎样胆小可怜的男子吗？而表现这种心理，全篇贯彻着这种心情的作品，这是多么怯懦的作品啊！在实生活里像一个胆小的人的样子而行为过了。却又将这行为“重温旧梦似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与其说是大胆地分析自己，不如说是再一次“暂时的将那女子完全占有”而满足自己的欲望罢，这满足的方法也是怯懦的。但是一个女子将因这文章受到怎样的影响，这该是很容易明白的事实罢。

假若《棉被》是可信赖的话，那么把竹中时雄作为明治时代（甚至大正时代及其后）的文学家的影子看，总是不错的罢。同样岛崎藤村的《新生》又把岛崎氏的真面目表现出来了。仿佛《文化集团》对岛崎氏就有过极其严厉的攻击。

将自己和女人的关系真实地写在小说里，这风气在日本文学家中间很流行。武者小路实笃就写过了好些，而久米正雄和松冈让这一对情敌甚至拿小说做武器又一次开始了他们间的情场的战斗。胜利者的松冈氏曾因为鲁迅氏不写恋爱小说便吃惊地发过怨言。但事实上松冈氏贬责过的鲁迅氏的某几篇作品和所谓日本文学的精华比起来也不见得有什么愧色罢。关于这方面我在所谓“巨匠”岛崎藤村身上找到了最坏的例子。

和自己的侄女暗地发生了关系，又为这关系感到了良心的责备，而痛悔，于是为避免这苦痛而远游法国。结果为求自己良心的慰安终于不顾自己的哥哥（即侄女的父亲）的劝阻，

不顾念到侄女的将来，而将这关系毅然地向世人公布了。岛崎氏固然因《新生》增高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但那位节子姑娘一生的幸福却从此断送了。岛崎氏大概仿托尔斯太题名《复活》的意思，将这忏悔录之类的东西叫做《新生》。但这哪里是新生呢？托尔斯太的伟大正和岛崎氏的怯懦成了比例。而《复活》的主人公和《新生》的主人公的行为也就大相径庭了。一个是历尽千辛万苦去对那自己所损害过的女人做一点补偿的事情；一个是坚持着将和侄女的关系向世人公布，以求自己心境的安宁。这《新生》的主人公是一个多么自私多么怯懦的人啊，然而岛崎氏却浪费了那么多的笔墨企图将自己表现作一个很伟大很大胆很真挚的人物了。这企图自然是失败了的。

总之，真正的艺术，它的重要使命是在把人类联合起来，而不是将人类分离的，这是大家应该承认的一点罢。那么日本文学实在是无足观的了。个人的悲欢离合，英雄侠士的超人事业，我们不是有着太多了么？故意雕琢刻画，在文字上玩尽了巧妙的把戏。这样穿着漂亮服装的死骸不是到处都有的吗？

以上不过是一点个人的感想。并不是什么文艺评论，所以不觉放肆地说了许多不恭敬的话。

可惜这样不恭敬的话不能给故芥川氏听见了。



控　　诉

《控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烽火社初版．为“烽火小丛书”第一种。迄一九四〇年七月，共印行五版(次)。

一九三九年九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行排印，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共印行二版(次)。

前　　记

我把五六年前发表过而未收入集子的两篇散文和最近三四个月中写的一些短东西集在一起，编成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现在我诚恳地将它献给关心我的行动的读者诸君。

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心情虽略有不同，用意则是一样。这里面自然有呐喊，但主要的却是控诉。对于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

巴　金 1937 年 11 月在上海。

从南京回上海*

日军开始进攻闸北的那个夜晚，我正在由沪开京的火车里，所以我很安全地给火车从丹阳载回南京了。是的，我是很安全的，虽然南京方面的朋友曾写信到上海去打听我的下落，上海和各地的朋友又耽心我会葬身在闸北的火窟，但是我终于把这个身体和这个生命保全下来了，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惊恐。

一月二十九日早晨四点钟，我在寒气的包围中进了下关的火车站。天还没有亮，电灯光显得暗淡，一些失望的男女乘客缩着头坐在长凳上等候天明，另一些人集在一处激昂地谈论上海的事。我找不到一个座位，就在各处徘徊一直到七点钟。这三个钟点的时间在我一生里恐怕是最长的了。我有几次竟然疑心我是在做梦，我问自己："这些人在这里究竟干什么呢？我为什么也在这个地方？"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大陆》第一卷第一期。

这篇文章在当时上海的一种短期的抗日救亡的日刊上连载过，后来作为附录印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海的梦》的后面。以后我编印《控诉》(1937)和《旅途杂记》(1945)时，又把它收在这两本小书里面。这几本书的印数都很少，因此这篇文章的读者并不多。（一九五九年注）

有一次我在一个警察的身边站住了。这是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北方人，他带着激动的表情用激昂的声音叙说上海的冲突："在电话机上听得见机关枪的声音，在上海北火车站上正有人在喊救命！"这几句话沉重地进到我的耳里，我的心痛着，我觉得整个的世界都在动摇了。在和平的地方用机关枪屠杀和平的人民，有人在喊救命。无论南京和上海隔了多少远，无论我的眼前现出了怎样和平而凄凉的景象，这个消息也可以使我的血沸腾。憎恨迷了我的眼睛，我在心里发出恶毒的诅咒，在一个短时间内我几乎忘记自己了。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冷气打击我，使我渐渐地清醒起来。我偶然埋下头去看我的身子，我看见右手拿的那根朋友送给我的手杖和左手拿的一本书。失望猛然来袭击我的心。我第一次发见了我自己的脆弱。在这个时候书本还有什么用？啊，你读书的人有祸了。

天终于亮了。在晨光熹微中我回到了那个冷清清的旅馆。一路上尽是安闲的景象，我所看见的一切都给我否定刚才的消息。看见缓缓地走着的行人和车辆，听见各处的笑声，我不禁放了心安慰自己道："很安静的，没有什么事，那不过是梦魇。"于是我走进旅馆睡觉了。

下午醒来，到一个朋友那里去。朋友看见我便惊喜地说："原来你回来了！我们正在替你耽心。"我很感激朋友的关心，但是我看见桌上的一张《新民报号外》，我的心又被沉重的石头压紧了。"闸北大火；居民死伤无算。"我固然安全了，但是那许多人呢，那许多住在闸北的人呢？我三年来朝夕看见的人，朝夕经过的地方如今怎样了？这时候，在这大灾祸来临的

时候，我还能够为自己的安全庆幸么？

“你的地方恐怕烧掉了，真可惜！不知道还有些什么东西？”朋友惋惜地说。

“不过一些旧书，索性烧掉了也好，我已经被书本累了一生了，”我带笑地回答说。这一次我骗了自己了。那许多书是我十多年来辛辛苦苦地搜集起来的，难道我能够没有一点痛惜的感情么？

“看这情形，上海是没法回去的了，天津恐怕也危险。你还是准备在南京多住几天罢。住旅馆不方便，搬到我这里来住好些。”这是朋友的殷勤的劝告，在平时我很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这时候它们却把我的希望杀死了。上海有我的许多朋友，有我的住处，有我喜欢的那些书；那里还有……而且，在日兵用大炮轰击、用机关枪扫射、用炸弹炸毁上海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不能够安静地住在南京。我没有回答朋友的话，我只有苦笑。我却在心里说：“如果找不到机会牺牲我的生命的话，我至少也应该回到上海去经历那许多人在这些日子里所经历的痛苦。在南京太安静了，太寂寞了！”

在朋友那里所谈的只有愤激的话和痛苦的话。朋友也是一个有心而无力的人，他的身体比我的坏得多。他患肺病，最近还吐过血。他是需要静养的。① 我和他多谈话，只有增加他的痛苦。我看见他那没有血色的脸上怎样燃起了愤怒的火。然而他和我一样能够做什么呢？他有一张口、一双手，和我一

---

① 这位朋友就是散文作家缪崇群。

样；但是我们的口只能够在屋子里叫，我们的手只能够拿笔。总之，我们太软弱了。我不能够安慰他，我也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力量。我们就这样凄凉地分别了。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甚至疑惑这是否我们最后的一面，我疑惑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是否还有机会继续生存在这个时代里面。

从朋友处出来，天已经黑了，晚风吹着我的脸，我坐在黄包车上，任车夫把我拉过荒凉的街道。我伸起颈项向天空望，我想看见上海的大火，我想听见被屠杀者的挣扎的呼号，我想听见大炮的怒吼。然而天空中只有黑漆漆的一片，周围又是死一般的静寂。于是车子又走进了热闹的马路。是辉煌的灯光，是笑语的人群，是安闲的行人。我用力注视这一切，我想证实这不是假象。我的心似乎得了一瞬间的安慰。然而一个孩子的叫喊又把我的梦惊醒了，这是叫卖晚报的。"看东洋人在上海打败仗！"他大声叫道。他的身边马上聚集了一小群人，于是晚报一张一张地散布出去了。我想买一张来看，可是我的车子已经把卖报小孩抛在后面了。我的脑子里还留着"东洋人在上海打败仗"一句话，而我的车子已经走过一家灯光辉耀的电影院门前了。

不用说，卖报小孩带来的并不是坏消息。对于屠杀人民的日兵的败亡，我是万分欢欣的。然而这个消息同时却给我带来一幅悲惨的图画：烧毁的房屋，残废的尸体，逃难的居民。这样的图画对我来说，并不是新鲜的。我这一生已经见过不少这样的图画了。然而像这一幅侵略者有计划的大屠杀的图画，我却是第一次见到。我的耳朵已经被凄惨的哭声充

满了。我的眼睛也不能够分辨周围的景物了。我在一家书店门前下了车，呆呆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柜台上放着晚报，几个店员聚在一处埋下头热心地读着。我也把头伸了过去。报上的重要消息都是《新民报号外》上刊载了的，只多了一些日兵暴行的记载。

“这一次非打个死活不可，这是我们唯一的生路了，”一个年轻店员挣红脸说。

“今天十九路军开拔赴前线，经过这里，我们首先放鞭炮欢送。兵士自动地喊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年纪较大的老板说。

我默默地望着他们。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日本兵到南京来屠杀的时候，这些和平的市民也会跟敌人拚个死活的。这些手看起来似乎软弱，但是有一天它们拿起刀来，也会向屠杀者的头上砍去罢。我虽然是一个反战主义者，但是为自卫、为抵抗强权的战争，我却拥护，而且认为是必要的。

中国人也并不尽是阿Q主义者罢，只要我们能够不顾一切的牺牲、起来为反抗强权而战斗，我们还是有望的，也许比帮助本国军阀去屠杀异国人民、或者在这时候还袖手旁观的日本人更有望罢。——我去找另一个朋友的时候，他对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二十九日过去了，三十日也过去了。在南京我还没有看出什么大的变化。人们依旧在准备过旧历新年，电影院依旧在开映什么巨片，饭店酒楼里依旧坐满了客人。所不同的是装有无线电收音机的商店的门前，在一定的时间内站满了带

着严肃表情的群众，因为中央党部每天要播送两次上海的电讯。《时事新报》分馆的门前也是非常拥挤，在那里贴满了许多新到的“电讯”。我住的旅馆离那个地方很近，我也常常去看“电讯”。它们带来的自然是好消息，但也有坏的，如日军残杀和平市民、焚烧市房之类。当我读到“日兵大败，死伤无算……”这一类句子的时候，我也和那许多的观众一样，差不多要欢叫起来。我并不曾想到那些人也有家人父母，他们的死也会给某一些和平的人带来不幸；我只感到痛快。我是被憎恨迷住眼睛了；憎恨不仅迷住我的眼睛，而且还种了根在我的心里。

找朋友谈话是我在这些日子里的唯一的事情，我们所谈的全是关于上海的事件。朋友中没有一个不主张跟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到底，没有一个不希望日本兵在上海败亡。然而大家都觉得这里离开战地太远了，不能够听见大炮的怒吼，不能够听见兵士的呐喊。在冷静的环境里，热情只有使我们痛苦，我们第一次感觉到隔岸观火的痛苦了。“回上海去！”差不多成了我们几个朋友的口号，这些朋友都是因为种种事情从上海来的，他们被这次事变阻留在南京了。

三十一日的早晨，天落着微雨，我刚刚起床，一个朋友就从中央研究院打电话来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坐车去了，他一见面就告诉我“政府搬家了”。于是从他的口里我知道了本日报纸上的一些重要消息。他又约我同去看另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新近被选做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我们想从他那里打听那些报纸上不能够发表的消息。然而我们失望了。那个朋友

连政府搬家的消息也不知道。他又去把同住的另一个中央委员找来，那个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候报纸来了。大家读着报。我读了国民政府迁都的宣言，没有说什么话，心里想：这也许就是在准备“长期抵抗”罢。

我别了那两位中央委员，跟着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到他的未婚妻那里去。她已经准备回家了。据说昨夜迁都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有人“宣传”日本飞机要来炸毁北极阁的军用无线电台，害得中央大学的女生一夜没有睡，今天早晨就有许多人动身回家了。

我们从那里出来，一路上看见来来往往的搬运行李的车辆。南京人骚动起来了。市民虽然没有发表宣言，实际上也开始在迁居了。到了另一个朋友那里，我们遇见了一位青年政治家，他得意地解释迁都之必要。我笑着回答道：“洛阳太近了一点，最好是迁到迪化去，那里军舰开不到，飞机也要飞两天才到得了那里。那里才是安全的地方。”青年政治家没有说什么，他似乎觉得我太过虑了。

我又到患肺病的朋友那里去，房间里已经坐了同住的四五个人，我在他那里耽搁了许久。我们叫人去买《新民报号外》，据说这一天没有号外，因此我们疑心上海方面一定发生了不利的事，或者无线电报也不通了。有人打电话到各处去问消息。后来消息来了：日兵和美国兵在虹口冲突；日军派飞机三十架向长江上游飞来；南京下关原有日本兵舰三艘，中国政府限令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日方不但不答应，反而增加了四艘军舰。这些都不是好的消息。南京似乎马上就要发

生惊天动地的巨变。那个送手杖给我的朋友是有家眷的，他显出了焦虑的样子。我安慰他说："不要紧，就是日本飞机来丢炸弹，也未必就会落到这里来，况且南京也还有中国飞机。"这位朋友苦笑道："我是不怕的。"

临去的时候我还向那个患肺病的朋友借了一笔路费，因为我回到上海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我本来还想到天津去看我的哥哥，他或许以为我已经葬身火窟。但是"回上海去"四个字无一刻不在我的脑子里盘旋。

这一次别了这几个朋友，心里倒很感伤，我想该不就是诀别罢。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谁能够保证自己会活到明天，况且我又要回到上海的火窟去！

在黄包车上看着周围黑暗模糊的景色，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眼前的一切都已经和我不生关系了。我的脑子里只有火花；我的耳边只有炮声。荒凉的街道走完了，我看见了灯光辉煌的马路。我望着，我茫然地望着。忽然，我的眼前什么也没有了，马上就出现了一个黑暗的世界。"电灯熄了，"车夫惊讶地说，于是放慢了脚步，他害怕撞到迎面来的车子。我的车上虽然点得有油灯，可是灯光很暗。车夫在黑暗中摸索着。我在短时间内竟然分辨不出路的方向。偶尔有铃声在我的耳边响起来，我明白有车子在我的身边走过。忽然车子停了。我才知道现在到了鼓楼的一个旅馆。

我有两个从汉口来的朋友住在这个旅馆里。他们本来要到上海去，现在也给阻留在南京了。我在黑暗中摸索了好一会儿，才走到他们的房门口。没有灯光，我想我也许白跑了。

但是我叫了一声。男的在里面答应，一面擦了火柴出来。随后他点燃了洋烛，我看见女的还在吃馒头，桌上摊开了一个纸包的冷肉，现在只剩下几片了。这就是他们的惨淡的晚餐。这位朋友告诉我：另一个朋友已经带了家眷到河南去了；还有一个朋友就要搭船到上海去。火车只通到苏州，他曾去下关问过。我想既然有船开到上海，还是搭船回上海去罢，纵使冒一次险也值得。于是我和这两位朋友决定了一块儿到上海去，就由他明天到中国旅行社去打听船期。

因为想知道一些更确实的消息，朋友便约我去看一个在某某部做事的友人。我们辛辛苦苦地从城北坐车到城南，快要到了那个人的寓所时，我的车夫忽然迷失了道路，只有那位朋友才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一点也不能给车夫帮忙。这时我们在一个泥泞的巷子里，黑暗和寒冷从四面包围过来。我的车夫拚命用他的疲倦的声音喊他的同伴。没有一点应声，也没有人出来问话。我焦急地坐在车上，我只得叫车夫回转去慢慢找寻。后来在十字路口两个车夫碰见了，他们互相抱怨。朋友告诉我，我们拜访的那个友人在一夜的功夫搬走了，只剩下一间空屋子，不知道他一家人搬到了什么地方。这时候电灯突然又放光明，我们心里也轻松了些。

二月一日早晨，汉口的朋友到我的旅馆来。他说刚刚到中国旅行社去问过，说一日、二日都没有轮船开往上海。但是我翻看当天的报纸，上面又明明载着二日有下水船开。我对朋友说，最好是亲身到下关轮船码头去看看。我们约定明天同去。但是朋友却有点迟疑，他说中国旅行社一定知道得更

清楚。

过了一会儿，中央研究院的朋友来了。他本来约定昨晚上在一个地方和我见面，然而到那个时候中央大学的电灯突然全灭了，整夜没有亮，他的未婚妻非常害怕，要他留在那里陪伴她，所以他失了约。他现在要送未婚妻回家去，就在京沪线上一个大城市里。他们两个都希望我到那里去暂住几天。他的邀请不消说是十分恳切，但是我谢绝了。这个时候我只想回上海去。他扫兴地走了。临行他还嘱咐我在南京等他，说是两三天内就回来，不过我想一定不会有这样快。

我送走了这两位朋友，便出去看一个城北的友人。他的夫人正在收拾行李。他对我说，打算出去在城南找一家旅馆，搬过去暂住几时。他说昨晚上房东招呼他们在十点钟就熄灯，说是怕有日本飞机来丢炸弹，这一番话把他们夫妇吓坏了，所以他宁愿牺牲预先付了的一个多月的房钱马上搬到城南去。城南究竟安全得多。我又陪着他出去找旅馆。一路上许多载行李的车子在我们的身边跑过。城北的人络绎不绝地往城南搬。旅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住满了客人。我们费了许多功夫，问过了许多家旅馆，才找到了两个房间，房里没有光线，而价钱却不便宜。

我又会见了几个朋友，有两三位好几年不曾见面了，却想不到在这里遇着。我还应该感谢一个在贫儿院做事的年轻朋友，在这几天里他给我帮了不少的忙。后来我对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朋友说起回上海的话，他便告诉我，下水船一定不会开，因为一则过吴淞口会被日本兵舰开炮轰；二则上海租界

当局怕界内粮食缺乏会禁止搭客登岸。我并不相信这种话。我说，只要有下水船开，即使冒危险，我也得去试一试，留在南京太没有意思了。

回到旅馆已经是夜间十点多钟了。我接连打许多次电话找人，都没有打通。我很疲倦，便早早地睡了。我刚刚上了床电灯突然灭了。恰恰在这时候一个处在和我同样情形里的朋友进来了。他本来约定在我这里睡，却来得这样迟，我还以为他不来了。这时我便叫茶房给他铺了床。我问他外面有什么消息，他说："不知道。"我就不再说话了。

二日早晨我打电话，依旧打不通。汉口的朋友来了，他告诉我昨晚下关的日本军舰向城内开炮。鼓楼方面落了一个炮弹。许多人一晚没有睡。而我和朝鲜朋友(就是昨晚上睡在这里的那个人)简直不知道。《中央日报》上并没有战事的消息。我们出去，市面上的景象似乎有些不同了。店铺没有开门，行人的脸上带着慌张的颜色。沿途搬行李往南走的黄包车和汽车接连不断。时事新报分馆的门前贴了大张的号外，说昨晚十一时日本军舰向下关和城内开炮，下关的时事新报分馆也中了弹。日本兵竟然在南京开炮了！在国民政府迁走以后，难道还有轰击南京市民的必要么？这个消息使得许多人愤怒。是的，昨晚下关的炮声打破了南京市民的沉默了。我亲耳听见身边的一个市民说："为什么炮台不还炮呢？难道还要坚持不抵抗主义吗？"我默默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这是一张瘦削的脸，微微有几根胡须，衣服穿得并不好，看不出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如果日本兵真要把上海的惨剧搬到南京来重

演的话，即使政府仍然不抵抗，人民也会起来保卫自己跟侵略者拚命的。中国人究竟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猪羊。

汉口的朋友走了。他回去收拾行李，约定我吃过中饭到鼓楼去找他，再同到下关去看船。我又去看一个湖南朋友，他住在我的旅馆的斜对门。他告诉我说，他的夫人昨晚听见炮声吓得哭起来，一夜不敢睡。他详细地向我叙述昨晚的恐怖的情形，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应该感谢梦，它使我免掉了这些多余的恐怖。他约我一道出去，在夫子庙一个茶楼里吃了作为中饭的点心，同去的一共五个人，谈到上海战争的前途，我和朝鲜朋友热烈地争论起来。这争论使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忘记了我和汉口朋友的约言，等我回到旅馆退了房间再到鼓楼去会那位朋友时，那里只剩下一个空房间了。朋友并不曾给我留下一张字条。我失望地在这个空房间里站了一会儿。我摸桌上的茶壶，里面还有热茶。我想他们走得不会远。但是我在什么地方去追他们呢？我到账房里问去，据说："某先生已经搬走了，不过等一会儿还要再来。"这答话又使我踌躇了，他们究竟把行李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既然搬走了，为什么又会再来呢？我便留了一张字条在房间里，说我到下关去看船，等一会儿再来。

在去下关的平坦的马路上，搬运行李的黄包车和汽车排成了一条长线，简直没有尽头。到下关去的车辆并不多。只有一些装载行李的汽车，大概是比较阔一点的人离开南京了。车夫拖着车子慢慢地走，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我拉到了下关

火车站。车子经过城门的时候，我看见人们正在堆沙袋，跟我在上月二十五晚上离开上海时在宝山路上看见的情形一样。

火车站里人很拥挤，卖票的洞口挂了“客满”的牌子。我去问一个站丁，据说京沪线的车只开到苏州。我又到江边轮船码头去看，道路泥泞，我走得很慢，一路上尽看见关了门的店铺，也有一两家商店开了门在搬东西。江边很少行人，白茫茫的水面上不见一只轮船。我问一个站岗的警察，他说恐怕没有下水船开，叫我到一个票房去问。但是那个票房已经关了门。我没有办法打听到消息了，只得怀着失望的心回到火车站，然后再搭公共汽车到鼓楼去。

在汽车里挤了好久，我才被挤到鼓楼来了。进了那个小旅馆，我在空房间里发见了先前我留下的字条，并没有人动过它。我又到账房去问，据说：“某先生已经搬走，不会再来了。”答话的是同一个人，却说了两样的话，害得我白跑一趟。但是那两个汉口朋友的踪迹就这样地消失了。下关今天没有船开，下关的旅馆里也没有人，他们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坐车到中国旅行社去。在那里人们告诉我今天有下水船开，但是船还没有来，而且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因为现在还没有得到电报。我要先买船票，他们又不肯卖给我。我在三个钟头以后再到那里去，门已经上锁了，外面贴了一张告白说：现在交通情形变化莫测，只得暂时停止办公。这一次我是步行到那里去的，走了很多路，而且肚里又饿。但是我仍然不停地问自己：回上海去的希望果然断绝了么？

我回到旅馆，又到斜对面湖南朋友那里去，在门口遇见他

出来说要去借一辆汽车把家眷送到杭州。我吃过晚饭，再去看他。他回来了，据说他跑了许多地方都借不到一辆汽车。在外面租一部车子到杭州租价涨到了五百圆以上，便是搭京杭路的长途汽车，一张票也涨到了几十圆，而且又挤得要命，他身边只剩有五六块钱，所以连逃难也没有地方可逃了。

这一天的晚报上刊载了飞机投弹的防御法。一个朋友来看我，他说，政府准备今晚解决日本军舰，警察向各家店铺吩咐十点钟熄灯，免得日本飞机来投炸弹；他又说五圆钞票已经不用了。后一个消息我也知道，因为我拿了一张五圆钞票，找不到地方换，去买东西说是找不出。

三日是一个阴天，早晨就落起微雨，风刮得厉害，天气突然变得很冷了。我走出去，外面空气很沉闷，没有什么消息。依旧听不见炮的怒吼和人的呐喊。日本飞机并没有来，军舰上的大炮也未见施放。我们太安全了，安全得自己惊扰起来，自己造出谣言来扰乱人心，又借这个来谋利。钞票不容易使用了。交通工具涨价了：几十块钱租一辆汽车从下关搬运行李进城；几百块钱租一部汽车到杭州，也成了极平常的事；便是人力车夫的索价也涨到了五六圆。有钱的人把交通工具垄断了。贫穷的人只有留在危险的区域里挨炮弹，或者等着做难民，让所谓慈善家来收容。旅馆自然会乘机涨价。只要有机会可以赚钱，谁也不肯放松。

汉口朋友仍然没有消息，他们一定离开南京了。今天我听见人说还有一条路通上海，就是乘火车到苏州，由苏州搭小火轮到嘉兴，再由嘉兴乘沪杭车到上海南站。他们也许就是走

这条路到上海罢。不过，沪杭车现在能否开到南站，还是问题。我害怕陷在中途，不愿意走这条路。但是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坐津浦车到天津去看我的哥哥。我本来打算到天津去，我要找他商量家里的事情，而且我还可以从天津搭海轮到上海。我把这个意见告诉朋友们，他们都不赞成。他们劝我留在南京，说是天津也许比南京更危险，在南京毕竟方便得多。遇到什么事情，还有朋友们照应。他们又说，也许下关江面已经封锁了。然而我还是坚持我的主张，我要到江边去试一试，看究竟有没有渡轮把我载到浦口去。

雨已经住了。我在旅馆门口雇了一辆黄包车。到下关的车价很便宜，因为这时候，只有人从下关搬东西进城来，到下关去的人却很少，凡是可以离开南京的人都已经走了。一路上风很大。我只得把大衣领拉起来，不去看迎面过来的那些搬运行李的车子。下关到了，是一个荒凉的下关，除了车辆和警察而外，还有稀少的行人。先前走过中国旅行社时，我看见那里的告白说，浦口的渡轮照常开驶。我便放心地走了。车夫把我一直拉到江边。我本来打算在津浦小火轮码头停住，忽然走过来一个湖北人，问我是不是要到上海去。我顺口问他今天有没有船开。他说有船，不过靠在江中，他有小划子可以把我摇过去。我问他是什么船，他说是太古公司的“武昌”。

我马上改变了计划：我不到天津了，我回上海去。我和那个湖北人讲好了价钱，便跳上划子。船上还有一个半老的人，两个人划着船，在风浪中前进。这一天风浪很大，船夫一下桨，便激起很高的水花打进船来。有一两次船摆动得很厉害，一

个大的波浪打过来，几乎把船淹没。我这一天只有在上午吃了点心，我的空肚皮里这时候起了一阵绞痛。我抬起头望轮船，还隔得很远，不过轮廓已经看得分明。又经过了一些难堪的时候，我们的划子才到了轮船的边上。我把船身的题字望了一下，“大英国。武昌。”我心里更不好受，又羞又气：我现在竟然托庇在帝国主义的屋宇下面了。

轮船上的人不肯放下梯子，我费了大力才跳上去。一个茶房看见我，便说：“什么时候开船没有一定，要等上海的电报来。”我问道：“要是上海的电报来了。船几时开呢？”他回答说：“大概三四点钟。”好，我就在船上等着罢。我便成了这个茶房的主顾了。他把我领进统舱里，租了一个铺位给我。因为我没有行李，他又租了一床又脏又臭的铺盖给我，要我出一圆的代价。

我很疲倦，好像要生病的样子，在船上没有事情，舱外风又大，只好在铺位上躺下来。舱里空气沉闷，没有阳光，只有几盏黯淡的电灯。几个湖北人在谈宋美龄的故事，一个妇人在叙述她的不幸的遭遇。我没有心肠去听他们，我模糊地睡去了。

吃晚饭的时候，那个茶房来把我叫醒。我问他开船不，他说今天开不开没有一定。乘客们已经在抱怨了，大家盼望早点开船，可是上海的电报还没有来。后来有人说，电报已经来了，不过要等“安庆”船开到后开船。总之，今晚是不会开船了。舱里摆好了两桌麻将，一个军队里做事的和一个上海大学生都参加打牌。大家玩得很高兴，不知道怎样发生了争执。

我被他们吵得不能睡觉。后来那个照应我的茶房出现了。他对我说他的家在闸北川公路某里某号，家里有一个妻子，不知道她如今逃在什么地方，又不知道房子烧了没有。他耽心这个旧历新年过不好，他说话时露出焦急的样子。但是几分钟以后他的同伴们约他在我的铺位下面掷骰子，他又高兴地在那里叫喊了。

船依旧不开。我没有到外面去。舱外很冷，据说已经落雪了。但是我们还在南京。

四日早晨我到舱外去看，只看见一片白色。下关被雪盖住了；紫色的山横在一边，现在积了雪，白白地在发亮。依旧刮着北风，依旧漫天地飞着雪花。我立在甲板上往四面望去。我几乎认不出来我昨天分别的南京了。"安庆"就停在前面，英国国旗在那里飘扬，"大英国"三个字又一次映入了我的眼帘。

"'安庆'已经到了，为什么还不开船呢？"一个中年的乘客不能忍耐地抱怨起来。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问话。外面很冷，我便回到沉闷、黑暗的舱里去，几个广东人正在跟茶房吵架，他们说船许久不开，他们不能够再等了，要上岸去。茶房却一定要他们付出讲好的铺位钱。这争执不知道怎样解决了，我只听见人的吵闹声。我心里想：今天再不开船，恐怕就没有开船的希望了。我颇后悔不该改变了去天津的计划，不然明天上午就可以到达天津了。现在我却躺在这里白白消耗时间！我又沉沉地睡去了。

十二点钟光景，听说要开船，我起来到舱外去看，仍然没有一点消息。后来账房出现了，他回答一个人的问话道："现

在就要开船，直放上海。"他开了账房门进去了。他的话使得舱里起了快活的骚动。几个茶房在叫："要开船了！"一些客人惊喜地互相询问。我走进舱里又走出来。船依旧没有动，也没有人来起锚。几个茶房在那里谈论，为那个上岸去买小菜的厨子担心。一个说："要等厨房回来才开船。"另一个翘起大拇指说："你想，外国人会等中国人吗？"这时候正有一只划子向着轮船摇过来。茶房们欣喜地说："买小菜的回来了。"等到划子近了，他们才发见"原来是几个客人"，就是起先闹着要上岸的广东人。

我回到舱里睡了。茶房来把我叫醒，要了一圆七角钱去买船票。但是一刻钟以后又有人来把船票收去了。这时是两点半钟，船已经开了。舱里充满着希望。麻将牌又响起来了。茶房在谈论怎样到上海去过年。他们又在我的铺位下面推"牌九"了。

沉闷的空气，黯淡的灯光，不和谐的闹声，呆板的、狡猾的面孔，失眠的夜……时间是这样地长！

我过了一个焦急的夜晚，轮流受到希望和疑惧的折磨。第二天早晨我非常疲倦，躺在铺位上不想起来，一直睡到吃中饭的时候。听见有人大声说："到吴淞口了！"我才走出舱去。

轮船缓缓地前进，岸上有树木、有房屋，有几只狗在跑，也有一两个行人，似乎并没有战争的气象。看了这些，我几乎不相信上海的灾祸了。我安静地在甲板上散步。我沉溺在思索里。

"看，那边的房屋打得一塌糊涂！"一个茶房大声叫。我跑

过去看。许多人的头遮住了我的视线。但是我也能够看出被弹毁、被火烧的房屋的废墟。船不停地往前面走，而且在转弯。

“看，飞机！”几个人齐声叫起来。我也抬起了头，在天边现出了一些黑影，好像是老鹰在飞翔。一只，两只，三只，在炮台的上空盘旋，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看见炮台了。“一共有九只飞机，”有人断定地说。“六只，”另一个说。我却只看见了三只。我抬起眼睛在天空中搜寻，居然在一个角里又发现了三只。它们接连地飞翔，和先前的三只隔得并不远。我忽然听见了响声，三只飞机正从后面飞过来，渐渐地飞到了我们的头上，飞得很低，使我们看得清楚两只翅膀下面画的红太阳。先前还有人疑心是中国的飞机，现在谁都在说“东洋飞机”了。这三只飞机一直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好像要侦察这只轮船似的。一个人无意地说：“东洋飞机要来丢炸弹了。”舱面上马上起了小小的骚动。有些人跑进舱里去了。一个茶房镇静地说：“不会的，船上插得有大英国旗。这是大英轮船，东洋人不敢丢炸弹。”他的话生了效，大家都站住了。不久三只飞机也飞到后面去不见了，只剩下隐约的机声。我再看那边，还有三只飞机在炮台的上空盘旋。

这三只飞机渐渐地向后面飞去，似乎要离开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它们又飞回到原处。我正走进舱里去拿东西，忽然听见外面在叫“丢炸弹！”我连忙跑出去，看见岸边的水溅起来有一丈高，好像鲸鱼在喷水。水花落下去了，水面平静了。前面的一只飞机上又落下来一粒黑点，我的眼睛几乎迷失了它。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落到了水面上，水花又向上面溅起来。接着后面的一只飞机又掷了一个炸弹，这一次炸弹落在沙滩上，把沙石向上抛起来。飞机马上就往后退了，好像要逃走似的，可是炮台方面并没有开炮。

我们以为飞机不会再来了，谁知几分钟以后又看见它们飞到了炮台的上空。它们接连地掷了三个炸弹，两个落在水里，只有一个落在树丛掩盖的房屋上，把断枝碎瓦炸得在空中飞。它们还不肯走，还在那里盘旋。于是炮台开炮了。轰的一声巨响进了我们的耳朵，只有这一声。三只飞机很快地转换了方向逃走了，飞得很快，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赶似的。在短时间以后天空中再也看不到飞机的踪迹了。

我忽然埋下头看水面，我才惊奇地发现船已经停了。我问茶房，说是因为轮船拖带了一只小船，要等到公司派小火轮来把小船拖去，轮船才可以进口。问小火轮什么时候会来，回答说没有一定。茶房是这样说，他的话是否可信，谁也不知道。事实是船不走了。它拖带的小船安静地靠在大船的旁边，上面有人在吃饭。这一天来不为人注意的小船，这时候却成了抱怨的目标，众人都叹气说被小船害了。

又过了一个钟头还不见开船。我想难道是日本兵舰不许商船进吴淞口么？但是我们只看见两只英国军舰停在那里。吴淞口外很安静，没有谁开炮。一只中国的商船从后面驶来，经过我们的身边向前面走了。这是招商局的“江安”。中国船既然还可以进口，那么决不会有日本兵舰封锁吴淞口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这只船又为什么不进口呢？真的是等小火

轮么?

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起锚。我失望地走回舱里，我想今天多半不能上岸了。我倒在铺上，把那幅又脏又臭的铺盖拉来盖住头。我怕见那阴暗的电灯光，我怕听那些抱怨的话，我已经把一切的希望抛弃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茶房从外面进来大声叫:“马上就要开船了。”有人问:“小火轮来了么?”回答说:“小火轮没有来，是大菜间的外国客人等得不耐烦了，逼着船主开船。”一个下江人接口说:“外国人真是刮刮叫。”我苦笑着。大餐间楼梯上八个字的告白又在我的脑子里现出来:“洋人在上，闲人止步。”我对自己说:这一次“闲人”又沾了“洋人”的光了。

船进了吴淞口，没有遇到一点阻碍，而且依旧走得很快，似乎要补偿先前浪费掉的时间。走在中途，小火轮就来了，把小船拖了去。小火轮上面的人从上海带来了一个消息:北四川路已经烧光了。许多人惊恐地叹息说:“上海滩真个要变成地狱了。这个新年怎样过?”北四川路烧光，租界上拥挤着十五六万失业的人，闸北的居民一部分还陷身在火窟里，这时候还耽心着新年过不好!放心罢:租界上很安全，在外国旗下面舒服地过新年的人多着呢!

船渐渐地走得慢了。江面并不很宽，两旁的建筑物看得很清楚。那都是外国公司的工厂和堆栈，以及别的建筑物，上面有各种国旗在飘扬。我看见了几只日本兵舰，有几个中国人在搬运东西上船。英、美、意三国的军舰都看见了。美国的小军舰最多，每一处停着三艘，很有好几处，上面写着号码。

号数是二百零几到二百三十。船上的茶房热心地找寻英国军舰，看见了，便指着它得意地说："这是大英兵船！"

船在慢慢地转弯。现在我看见上海了。许多高楼大厦耸立在那里，安然无恙。外白渡桥上行人拥挤；外滩马路上载行李的车辆往来不绝。我站在甲板上，我仰起头向天望。北面的天空被黑烟遮住了。这黑烟不住地向南扩张，一层盖上一层，快要遮蔽了整个的天空。炮声隆隆地怒吼，中间夹杂着机关枪密放的声音。许多人发出了惊恐的叫喊。一个女人的尖锐的声音说："天呀，怎么得了？"我冷静地看着黑烟的蔓延。我咬紧我的嘴唇，不让它们发出声音。我觉得我的血已经冷了，冷得结冰了。漫天的黑烟！上海真正成了一个大火窟。烧罢，让它痛快地烧罢。让它烧热我的血，烧热我的血来洒到那些屠杀者、侵略者的脸上。我不再为我的被烧毁的书本痛惜了；我也不再为那些被屠杀的人民和被烧毁的房屋痛惜了。我只听见大炮的怒吼和机关枪的密放。我只看见火势的蔓延。我知道一个大的变动快要来了。烧罢，你屠杀者，像尼罗王那样把整个上海当作罗马城来烧罢；杀罢，你屠杀者，像尼罗王那样把中国人民当作初期的基督徒来杀罢。历史上没有一次的血是白白流了的。我们的血会淹没了你。我们的血会给我们带来解放。为了求得自由，没有一个人害怕流血！没有一个人害怕战争！

轮船停在浦东的码头。我不等船靠定，就跟着三个水手离开船，又和他们一起上了小划子，很快地我们就在外滩太古码头上岸了。

一辆电车在我的面前驶过。我默默地站在坚实的土地上，我用力抖动我的身子，我要证实我不是在做梦。我如今确实回到上海来了，回到上海来看中国人的血怎样地流；看屠杀者的刀是怎样地锋利；看我们的房屋怎样被烧毁；看我们的弟兄怎样地被杀害！

“这时候你跑回上海来干什么？”一个朋友和我见了面就关心地这样问道。我苦笑着。我淡淡地回答道：“不是打算在必要时交出自己的生命，就是准备做一个难民，等候慈善家来收容。”我再没有第三句话了。

1932年2月10日在上海写完。

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芦沟桥的炮声应该把那般所谓和平主义者的迷梦打破了。这次的事变显然又是“皇军”的预定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我们不会不知道。倘使一纸协定、几个条件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野心，那么我们和这强邻早已相安无事了。哪里还有今天的“膺惩”？我们和日本的交涉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难道我们还不明白那一套旧把戏？从前我们打起维持东亚和平的空招牌处处低头让步，结果东亚的和平依旧受威胁，而我们自己连生存的机会也快被剥夺光了。我们每次的让步只助长了敌人的贪心，使自己更逼近灭亡。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这就是“抗战”！“屈服”（或者说得漂亮点，“和平”）不是一条路，那只是一个坑，它会把我们活埋了的。

在日本，人把我们看作苟安怕事的民族。让我们的“抗战”的呼声高高地喊起来！要全日本国民都听得见我们的呐喊！我们要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声音答复在那边人们对我们的侮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二卷第七号。

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这战争是为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要是这武力不背叛民众，安那其主义者是不会对它攻击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可走！

1937年7月20日。

站在十字街头*

一九三二年上海抗战的时候，中国代表颜惠庆博士在为上海事变召集的国联特会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是站在十字街头了。在我们面前横着两条路，就是战与和。"

在五年以后的今日。我们又站在十字街头了，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忍辱屈服，或是继续奋斗。

提起忍辱屈服的话，差不多会使每个中国人气愤得发狂。这一个月来北方的兵士和人民牺牲了生命、职业、财产，忍受着一切苦辛和侵略者抗战，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胆怯。一百几十磅的炸弹、引火的燃烧弹、大规模的纵火焚烧、文化机关的炸毁。许多的房屋烧毁了，许多人的生命牺牲了，许多的心血化为灰烬了，天津的市区、北平的郊外，芦沟桥、宛平一带的废墟上堆满了腐烂的尸体，涂满了黑红的腥血，充满了新鬼的哭号。然而北方战区的民众、兵士依然高声在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从全中国的兄弟姊妹们的口中发出同样响亮的回声来。这声音虽然是多么勇敢，但里面却含着许多人的血泪！这又是何等惨痛的挣扎！这其间我们安慰自己说：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国闻周报·战时特刊》创刊号。

“等着罢，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然而我们是一步一步地在退让了。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逼近沦亡的命运了。二十多天的苦斗毕竟不能阻止汉奸把北平送给敌人。接着又是天津的沦陷。在最近一星期的沉闷时期中，我们就只看见敌人铁骑的纵横。当敌军完全占领天津，纵火焚烧房屋屠杀徒手贫民的时候，不知道有若干人流泪痛哭，不知道有若干人呼吁着复仇的时代来临。然而同时那些出卖民族的汉奸却在摆设他们的庆功宴！

现在我们还能够屈辱地去接受敌人的条件，贪图那苟安的和平吗？不，我们不能！

是的，经过了这样惨痛的牺牲以后，再想到忍辱屈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纵然我们的血液快要干枯了，我们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我们也不能够跪倒在屠杀者的面前答应去做屈辱的奴隶。

我们要抗战，我们要继续奋斗。纵使抗战的意思就包含着个人生命的毁灭，我们也要昂然向着抗战的路走。何况这时我们还有够多的勇气，还有够多的精力来和屠杀者奋斗。我们还有希望获取最后的胜利，我们为什么就必须放下武器，跪倒在我们的敌人面前呢？

其实我们的敌人的营部还是建在沙地上面，并不是十分坚固的。经济的恐慌，工农阶级的不满，党派的纠纷，国际的嫉视等等都足以致它的死命。只要我们能够不惜任何牺牲，抗战到底。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拚命进攻，我们很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现在不是可以犹豫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再向前跨一步。不管在前面等候着我们的是“胜利”或是“败亡”，我们都应该记住从前P.亨利① 说过的话：“难道生命竟是如此可贵，和平竟是如此甜蜜，须得用奴隶的镣铐来作代价吗？……给我自由，不然便给我以死。”

1937年8月7日。

---

① P.亨利（1736—1799）：美国革命的政治领袖。

一 点 感 想*

在这个时候提起笔写文章，我实在感到惭愧。别人贡献的是血，我们却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也许有一天我会用我的血洗去这个耻辱罢。

死并不是一件难事。在几个小时以后，许多地方就完全改变了面目：建筑物毁了，村庄毁了，城市毁了，人们成千上万地死亡。

"大世界"前广场上落下炸弹的那个下午，我在电车里看见两边人行道上人们成群结队，身上带血，手牵着手默默地往西走去。全是严肃的面容，并没有恐怖或悲痛的表情，好像是去成仁、就义一样。

"大世界"前的血迹后来给雨冲洗干净了。但是十几辆炸毁了的车子还留在马路上：有汽车、黄包车、老虎车。各个阶层的人同样地为着一个目标献出了生命。没有人在死的面前踌躇过；活着的人也没有一个发出一声怨言。

我今天走过某一条街口。一两百具死尸躺在一块空地上，排列得非常整齐。头和脚全露在外面，只有身上盖得有东西。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呐喊》创刊号。

大卡车刚刚卸下棺材开走了。一些人在工作，把棺材一具一具地放好，然后将尸首一一地放到棺中去。这些死者也许是被炸死的人，不然就是战死的士兵，现在由慈善机关来做掩埋的工作。

在这时候每天都有人死。许多人在一起死，死并不是一件难事。

个人的生命容易毁灭，群体的生命却能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面，换句话说，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存在一天，个人也决不会死亡。

上海的炮声应当是一个信号。这一次中国人民真正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完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我们民族的生存虽然奋斗到粉身碎骨，我们也决不会死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面。为大众牺牲生命的人会永远为大众所敬爱；对于和大众在一起赌生命的人来说，死并不可怕，也不可悲。

关于这个，这几天来在前线，在后方，我们已经见到不少的例子了。我们用这个精神和这个信念跟敌人搏斗，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

1937年8月16日在上海。

应该认清敌人*

五年前"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政府派遣陆军来上海作战，那时大阪等地的劳动者相继罢工并举行示威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到中国去！""不打中国的兄弟！"

现在日本政府又派陆军到上海来了。我不知道在日本还有这种示威运动没有。我想一定有的，而且这次的运动一定更扩大，更激烈。

日本的兵士(大半是农民)并没有到上海来侵占中国土地，屠杀中国人民的必要；同样日本劳动者也没有赞助这种行为的理由。

A.法朗士说过所谓欧洲大战只是替几个资本家抢钱。那么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也不过是替少数军阀政客浪人寻求升官发财的捷径。日本人民在这战争中所能得到的也只有负担加重，生活困苦，甚至生命毁灭。日本的军阀政客浪人拿全国国民的命运做他们的投机事业的资本。

但是抗战的呼声在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上响起来了。中国士兵的浴血抗战，中国民众的热心服务，正对着日本的野心家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呐喊》第二期。署名余一。

的头颅下了一个重的打击，中国的抗战呼声应该得着日本民众的响应。

日本野心家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这就是日本民众获得幸福的第一步。所以中国战胜，对于日本民众也有好处。日本的民众，应该认清敌人，的确不该打中国的兄弟，只应去打国内的仇敌。

1937年8月21日。

自由快乐地笑了*

一

血染红街市，
人在刺刀下呻吟，
房屋被炸成灰烬，
铁蹄踏遍古城，
黑夜里听不见正义的呼声；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火舌舐食繁华的市区，
昨日的高楼——今日的废墟，
孤儿在街头寻觅失去的父亲，
新寡的妇女在避难所中叹息，
千万和平的居民被屠杀了；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七期。

六年来的屈辱压在肩上，
一个民族的命运握在手里，
英勇地举起反抗的旗帜高呼“前进”！
成千成万的勇士把热血洒在北方的原野；
从角落里响起了和平的呼声；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二

平津沦陷，川越① 动身来沪的时候，上海的天空布满了大片的乌云。好像被一只魔手扼住了咽喉似的，每个人都闷得透不过气来。勇气、信心、热情都被关于和平的谣言渐渐地磨洗干净了。接着来的是失望、疑惑与不安。在那个时候我写了上面的一首诗。我的心情正和我前年旅居东京翻译屠格涅夫的《俄罗斯语言》时的心情相似。当时日本的报纸上接连发表“新生事件”② 的交涉及其解决的经过。国内的“恐日症”把我的勇气和希望摧毁了。我坐下来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又借用它来激励自己，安慰自己。我想到了我们的语言，我的勇气恢复了，信心加强了。我也想说：“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

① 川越：当时日本驻华的公使。

② “新生事件”：当时日本政府硬说上海《新生》周刊上发表的文章《闲话皇帝》侮辱日本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媚外的国民党政府因此查封了《新生》，并且把编辑人判罪下狱。

在痛苦地担心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①我也想说：“要是没有你，那么谁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我也想说：“然而这样的一种语言不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同样，当和平的叫嚣开始搅乱上海人心的时候，我听见了“自由”的哭泣。我写了诗发泄我的悲愤，我又用诗来激励自己。然而甚至在那个时候，我还期待着黑暗中的一线亮光，我还期待着黑云密布之后的一阵骤雨。我相信当时有这种心情的人，在上海，在全中国，一定不止我一个。

果然我的诗还没有发表，闸北的炮声终于响了。这炮声打破了我们的疑惑、不安与失望。这炮声带回来我们的勇气、信心与热情。这炮声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团结成一个坚实的整体。前线士兵的浴血抗战，空军将士的英勇牺牲，后方民众的热心服务……一个星期的抗战就已经把“自由”的旗帜坚定地插在上海的土地上面了。侵略者用他们自己的腥血偿付了他们一部分的欠债。他们那些自己制造的枪炮会造就他们的坟墓，会促成他们的灭亡。是的，侵略者一定会失败，会灭亡的，只要我们的炮声继续响下去，不仅在闸北，在虹口，在杨树浦，在浦东，而且还要响遍华北，响遍满洲。

这是战争。但这是争取自由与生存的战争。这一次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齐声怒吼起来了。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挡这四万万五千万人争取“自由”的怒吼呢？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无可

---

① 引自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下同。

怀疑的了。

我们要自由！这真是“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语言”① 啊！现在不再是“自由在黑暗中哭泣”的时候，我应该说：“自由快乐地笑了。”

1937 年 8 月 22 日。

① 引自屠格涅夫的《俄罗斯语言》。

我　　们*

外面是火光、枪声、兽的叫喊、人的哭泣……

屋子里是黯淡的灯光、急促的呼吸。

我陪伴着躺在病榻上的弟弟。

我失掉了父亲和母亲。在我的生活里唯一的亲人就是这个十三岁的小弟弟了。

外面街上，那些新进城的高举太阳旗的兵在抢劫，在放火，在杀人。受害的就是我们那些贫苦的弟兄，也就是我常常在街上看见的那些人。我听见他们的哀号和求救声。声音响成了一片，里面也有妇人和小孩的声音。我明白我们的弟兄们遭到残酷的屠杀了。

那些血，那些尸体，那些毁了的家——我不敢想。

我守住弟弟的病榻，不敢出去。

我等着太阳旗进来，我又祈祷着太阳旗不要进来，为了我的弟弟。

弱者的恐怖，弱者的耻辱，弱者的悲哀——我全感到了。

外面仍然是火光、枪声、兽的叫喊、人的哭泣……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一号。

"哥哥，"弟弟忽然坐起来，高声狂叫。他那只发烫的手紧紧捏住我的手。他望着我的眼睛。我连忙把眼睛掉开，我害怕看到他眼里的强烈的火光。

"哥哥，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人更高贵的生物罢，是不是？"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么我们算不算是人呢？为什么还有比我们更高贵的呢？"

对于这样简单的问话我平日不假思索就可以答出来。然而现在我能够说什么呢？外面街上是火光、枪声、兽的叫喊、人的哭泣……我们的弟兄们让人任意侮辱、残杀，像一只狗、一头猪。我在屋子里怀着恐怖的心情等待死亡。我能够回答弟弟说，我们是人吗？

"为什么我们应当像猪似地让人宰杀呢？为什么我们应当做别人的枪靶子呢？"他不肯放松地追问下去，他用力摇我的胳膊。"我们不也是人吗？为什么我们生来就受虐待、受侮辱呢？哥哥，告诉我，为什么他们要来占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呢？"

我没法回答他。他的叫声刺痛了我的心。

"为什么不回答呢？你这个胆小鬼！"弟弟狂怒地骂起我来。他捏紧小拳头朝我的身上乱打。我一点儿也不躲避。我的心痛得更厉害了。

弟弟终于拿开了手。然而他低声哭了起来，而且哭得很伤心。

“哥哥，你把我杀死罢！”弟弟忽然大声央求我。“这种做别人的枪靶子的生活，我不要再过下去了。我迟早会被他们杀死的。……那么还是请你杀死我罢。死在哥哥的手里倒强似活着去吃别人的刀尖和子弹……”他抓住我的胳膊哀求、狂叫。

“轻声点，不要让日本兵听见，他们会跑进来的，”我恐怖地说，就伸出手去蒙他的嘴。

他推开我的手，只管说下去：

“哥哥，我们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吗？在这个世界上不全是一样的人吗？……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就有光，有热，有花，有爱，我却应当做枪靶子呢？为什么我们的亲人要被他们杀死，我们的房屋要被他们烧光呢？……哥哥，为什么呢？学堂里、教科书上明明说我们的身体构造和他们的完全一样，我们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好地活下去？我们应当把自己养肥来给别人做枪靶子呢？哥哥，我不要活了，请你把我杀死罢。……你哭了！哥哥，我知道你爱我。你不肯杀我。那么你愿意让日本兵来杀死我吗？……”

我望着我的手，我的手在打颤。我抚摩我的胸膛，我的心也在颤栗。我害怕我真会用我自己这双手杀死我的弟弟。

弟弟说得对。他活着，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花，没有爱。他活着，只是为了给别人做枪靶子。像这样地活下去，还不如死了好。与其留着给高举太阳旗的兵开刀，还不如由做哥哥的我亲手杀死。

然而我看见弟弟那张可爱的脸，那张让眼泪打湿了的、被热情烧红了的圆圆脸，我的心又软了。我连忙扑过去，抱着我

的弟弟，我狂吻他的脸颊。我坚决地说，我要保护他，决不让日本兵来伤害他。我要用尽一切力量不让他受到丝毫的损害……

外面是火光、枪声、兽的叫喊、人的哭泣……

1931年9月29日深夜。

给 死 者*

我们再没有眼泪为你们流，
只有热血才能洗尽我们的悔与羞；
我们更没有权利侮辱死者的光荣，
我们还得忍受更大的痛苦和艰辛。

我们曾经夸耀为自由的人，
我们曾经侈说勇敢与牺牲，
我们整天在危崖上酣睡，
一排枪、一阵火毁灭了我们的梦景。

烈火烧毁年轻的生命，
铁骑踏碎和平的田庄，
血腥的风扫荡繁荣的城市，
留下——死、静寂和荒凉。

我们卑怯地在黑暗中垂泪，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呐喊》第二期。

在屈辱里寻求片刻的安宁。
六年前的尸骸在荒冢里腐烂了，
一排枪、一阵火又带走无数新的生命。

“正义”沦亡在枪刺下，
“自由”被践踏如一张废纸。
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安排庆功宴，
无辜者的赤血在喊叫“复仇，雪耻”。

是你们勇敢地从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呼声，
是你们洒着血冒着敌人的枪弹前进：
“前进啊！我宁愿在战场作无头的厉鬼，
不要做一个屈辱的奴隶而偷生！”

我们不要把眼泪和叹息带到你们的墓前，
我们要用血用肉来响应你们的呐喊，
你们，勇敢的战死者，静静地安息罢，
等我们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中国的平原。

1937年8月6日。

给山川均先生*

夜很静。似乎一切都落进了黑暗里面。重炮声突然隆隆地响起来了，接着是一阵机关枪的密放。我的房间起了轻微的震动，这时候我正读着你的《华北事变的感想》。我读你的文章，我并不是把你看作一位中国的友人，不过我知道你过去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期望你的笔下多少带给我们一点正义。但是你却毫无掩饰地把你的另一种面目露了出来。我才知道真正到了你所谓的"剥皮"的时期，一个"文化人"也可以一下子变为浪人棍徒。对于这个，我感到憎厌。

你愤愤地提出了"支那军之鬼畜性"这个问题，你骂中国人是"鬼畜以上的东西"。在你是极尽毒骂的能事了。连贵国那般惯于谩骂、造谣的新闻记者也仅仅用了"鬼畜"两个字。

先生，我不想向你辩明我们是不是"鬼畜"，或者它以上、以下的东西。我们同是人类一分子，身体的构造也没有两样。我们同有理性，同受教育，同样需要自由，需要生存。无论用"人"或"畜"的名称称呼，我们在本质上确实没有差别。所以我现在把你看作一个和我同样的"人"，而诉于你的理性。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十月三日《烽火》第四、五期。

所谓“通州事件”使你感到愤怒，使你发出诅咒似的恶骂，我并不想把它掩饰或者抹煞，像贵国的论客掩饰你们“皇军”的暴行那样。我们愿意了解那里的情形。然而一切消息都被你们的“皇军”封锁了，我们只能从贵国报刊的记载上知道冀东保安队反正的时候，有两三百通州日侨被害的消息。

通州事件自然是一个不幸的事变，但它却决非“偶然的”，它有它的远因和近因。这个连在通州遭难的铃木医师也早预料到了。他生前给他父亲的信里就说到当地保安队的态度只是表面的亲日。“真正的中日亲善还是很远、很远的事情。”贵国的“皇军”种了因，贵国的官民食其果，这是无足怪的。对于熟悉历史的人，这类事变的发生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已经见到不少的先例了。

我不是一个偏狭的爱国主义者，我并不想煽起民族间的仇恨，我也不想盲目地替我们军人的任何行动辩解。在你们那里有不少的论客整天梦想着大和民族的黄金时代，夸大地做着“皇军”堂皇地征服世界的迷梦。而我们这里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却只有同样一个谦逊的目标：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自由，维持我们的生存。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为了这个我们可以毫不顾惜地牺牲我们的一切。

通州事件的发生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个解释。在“皇军”的威压与贵国官民的欺凌下过了将近两年屈辱日子的保安队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忍耐到了最高限度，悲愤的火终于燃烧，少数武器并不精良的军人不顾环境的恶劣，站起来用血和肉争取自己的自由与生存。在混战中，每个人的生命的毁灭都

是一瞬间的事。仔细的考虑没有了，复仇的念头会占据他们的心。血会蒙蔽他们的眼睛。当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抗征服者的时候，少数无辜者连带地遇害，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何况这回的死者还是平日惯于在那个地方作威作福的人，而且大半是卖白面，打吗啡，作特务工作的。根据一个外国通讯社的电报，我们还知道在通州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有四百名保安队兵士因有不稳的嫌疑被贵国的“皇军”枪杀，那么报复的行为也并不是不可以解释的了。……

在这里实在没有提出“残虐性”的必要。你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也跟在贵国新闻记者的后面，“用咒骂，陷害，中伤的言词去打动人们的偏狭的爱国心！”你是有意地落在贵国军阀的圈套中了。我们并不能拿残虐性来区分种族。自视极高的西方人素来喜欢宣传东方民族的残虐性。他们表示最高度的残酷时，使用的形容词常常是“东方式”。然而事实上罗马屠杀基督教徒之凶残，中世纪异教审讯所之暴虐，在东方也难找到同样的实例。革命者的被残杀、平民群众的被蹂躏和街市的流血，在每一个西方国家中都保存着惨痛的记载，而且绝不少于我们在东方所能找到的。人性是相同的。我们没有根据断定东方人更残酷，也就没有理由承认中国人比你们更暴虐。你难道忘记了曾经做过你的友人的大杉荣君？在震灾的混乱中偷偷把他们夫妇拘捕绞杀的不就是贵国“皇军”的大尉？连他的一个六岁的外甥也不能保全生命。作为凶手的甘粕正彦却被人视作英雄志士而获得特赦了。在大震灾中被虐杀的贵国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工人以及朝鲜人不知有多少！这事件中

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为何不曾激动你的良心？我不知道是你健忘，还是你故意为“皇军”掩饰！

残虐性并非某一民族所单独具有。助长它的是愚昧无知。只有文明教化才可以使它减少以至于消灭。和平帮助了文明教化的发展和普及。战争则摧残了它。用虚伪的言辞，欺骗的手段挑拨民族间的仇恨，使不曾相识、不曾接触的人变为仇敌，甚至把他们骗上战场互相残杀——这种行为充分地发挥了残虐性。一艘一艘的军舰载了贵国年轻的兵士来到中国，一艘一艘的商船又载了残毁的身体和骨灰回去。贵国军阀政客主持于上，财阀从中援助，而新闻记者、文人论客复宣扬、歌颂于下。战争是制造成功了。你们的另一论客室伏高信先生虽然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东亚两大民族的宿命，”他甚至要这两大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躲在障碍物里或从轰炸机上跳下来，相互杀戮”。先生，这难道不是残虐性的表现么？

先生，你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忘记自己眼中的梁木了。贵国空军在上海一带所建的伟绩，你不会不知道。南站、北新泾、松江等地的轰炸，遭害者达千余人，都是手无寸铁的难民，其中大半是妇人和小孩，他们平日并未担任抗日的工作，这时也不曾直接或者间接参加战争。他们正准备离开上海，而且有的已经在路途上了。他们对于“皇军”的行动是没有一点妨碍的。然而贵国的空军将士却偏偏选择了这种机会以显示“皇军”的威力，派遣大队飞机去屠杀非武装的人民。轰炸不足，又继之以机关枪的扫射，一定要看见无辜者的鲜血把土地与河面染红、尸体狼藉地阻塞着道路，才从容地飞去。

九月八日，贵国空军轰炸松江车站的“壮举”，在贵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罢。以八架飞机对付十辆运送难民的列车，经过五十分钟的围攻，投下十七枚重磅炸弹。据一个目击者说，当飞机在列车上空盘旋的时候，拥挤在车中的难民还想不到会有惨剧发生。然而两枚炸弹落下了，炸毁了后面四辆车。血肉和哭号往四处飞迸。未受伤的人从完好的车厢里奔出来。接着头等车上又着了一颗炸弹。活着的人再没有一个留在车上了。站台四周全是仓皇奔跑的人。飞机不舍地追赶着，全飞得很低，用机关枪去扫射他们。人的脚敌不过飞机的双翼。一排一排的人倒下了。最后一群人狼狈地向田里奔逃。机关枪也就跟着朝那边密放。还有一部分人躲进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泥坑，正在庆幸自己侥幸地保全了性命。然而贵国的空军将士又对准那个地方接连地掷下三个炸弹，全落在坑里爆炸，一下子就把那许多人全埋在土中。

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你不能在这里看见更大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么？自然，你没有看见一个断臂的人把自己的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膊挟着走路；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拊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了的母亲的手腕还紧紧抱着她的爱儿。哪一个人不曾受过母亲的哺养？哪一个母亲不爱护她的儿女？中国的无数母亲甘冒万死带她们的年幼的儿女离开战区，这完全是和平的企图，这是值得每一个母亲和每一个有母亲的人同情的。难道日本的母亲就只有铁石

的心肠？难道日本的母亲就不许别人的母亲维护她们的儿女？通州事件的残虐性怎及这十分之一？自己躲在上空挟最新式的武器攻击下面没有防卫能力的人民，杀死逃避战祸的母亲，流年轻儿女的血。这不仅是冷静的屠杀，便称之为卑劣的胆小的谋害，和变态性的虐他狂的表现也不为过。一个民族以此种行为骄傲于全世界人士之前，这是很可悲的事。两年前我的一个友人在贵国牛达区警察署里控诉贵国当局的措施不似文明人行为，而备受贵国“刑事”[1]的殴打。现在贵国空军却将“野蛮”二字作为光荣的标记广向世界宣传了。

夜已深。周围仍然清静。炮声断续地响着。机关枪声却听不见了。我知道这时侯就在上海的附近，两个民族中的精英正在前线肉搏，许多锋利的枪刺戳进年轻士兵的身体，无数有为的生命跟着炮弹毁灭。是什么一种力量使得这两个民族必须互相杀戮呢？难道一个民族的独立真会妨碍另一民族的生存？你们的论客室伏高信说这是宿命。但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你能够相信这样的一种宿命么？

战争是残酷的，破坏的。人类并没有被迫着参加战争的宿命。然而战争却不断地发生，文明的民族有一天会像野兽那样地互相吞食。但这绝不是宿命，造成这“勋业”的乃是不合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而一些嗜杀的野心的军阀、政客却利用这制度以满足他们的私欲。在战争中得利

① 刑事：日本的便衣警察。

的大有其人。一代的人种了因，一代的人食其果。人们制造战争，又会为战争所毁。武力主义和侵略主义可以煊赫一时，但不久即与露水同消。室伏氏说“国民是遵守法则的”。然而国民的法则绝不能与人类繁荣的法则违背，违背这法则的国民纵然目前生活得异常富裕，也必归于灭亡。战争是违背了人类繁荣的法则的。所以鼓动战争、想用武力获得一切的国民绝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许多国民繁荣过，但又消灭了。连强盛的罗马帝国也有崩溃的一天。这才是宿命！想到这里我不禁为贵国的命运担心了。

先生，这并不是我的过虑。你们把贵国的命运交付给军阀、政客去作孤注一掷，换取他们个人的禄位。军阀、政客之流知识窳陋，目光浅短，他们怎能知道民族盛衰的因果，人类繁荣的法则，社会进化的途径！然而你们是应该知道的。如今你们却让他们把大和民族驱向灭亡的路上走了。你们跟着他们躺在悬崖上做征服世界的迷梦。有一天你们也会跟着他们堕入黑暗的深渊，把后世子孙置于万劫不复之境。那时你们纵然醒悟也来不及了。

然而人类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世界上并无以武力维持万年霸业的民族，也无任人宰割苟安永世的国民。人类繁荣的法则是不能违反的。人类是第一义，其次才是民族。任何民族不能背弃人类而梦想单独的“发展飞跃”。这是做不到的事。室伏氏曾夸耀地预言大和民族进入了黄金时代，毫不量力地把铸造新世界的责任担在他们自己的肩上；据说凡阻碍他们的道路的，皆将灭亡。可惜他忘记了日本人也是人类的一

分子；他们也不能阻碍人类发展的道路。在欧洲大战初期大露头角、煊赫不可一世的荷痕若南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未尝不想凭借武力为子孙树立万世不灭的基业，正如今日的大和民族一样。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就只能在历史上找寻这两个名词了。战争促成了德、俄两大帝国的崩溃；从前为了维持这两大帝国的光荣不知道流过多少万壮士的赤血。纵然若干变节的社会主义者用花言巧语把青年们骗上战场去牺牲，也挽救不了叶卡特林堡[1]的悲剧。好战者的狭小的两肩上是担不起铸造新世界的责任的。

现在轮到你们这些人用花言巧语来欺骗青年了。你们把一群一群的青年兵士送到中国南北两地的战场，用了欺瞒、陷害的言词打动他们的偏狭的爱国心，鼓舞他们去杀人，去送死。你们跟在军阀、政客的后面，一手造成了远东的大屠杀。这责任你们不能轻易卸掉。倘使我控诉你们为刽子手，将你们置于被告席中受全世界良心的裁判，你们是无所逃罪的。

我常常翻阅贵国的报纸，我接触过一二贵国的人士，我也受过贵国"刑事"的"取调"[2]和拘留所中的款待。两年前在横滨友人的书斋里我和一个贵国商人有过短时间的谈话。他问我四川人是不是坏人，因为他知道"在北方的中国人都是坏蛋"。他又问中国人为什么要抗日，要欺负日本侨民；为什么不因为"皇军"赶出满洲的马贼而表示感谢。我佩服那个商人的坦白，我更怜悯他的无知，但同时我不由得要诅咒贵国新闻

① 叶卡特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里被枪决。

② 取调：侦查和审问。

记者的恶毒的用心了。这就是他们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

像贵国报纸那样的东西，在全世界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个。真实的消息，正确的报导，似乎和贵国报纸没有一点关系。造谣，中伤，像是贵国新闻记者的惯技。夸耀自己民族的伟大，暴露其他民族的缺点，用捏造的事实和带煽动性的言辞挑拨民族间的恶感，然后利用其完善的设备和雄厚的资本以鼓动侵略的战争，为野心的军阀、政客张目——这仿佛就是贵国报纸的唯一任务。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怜的是一般受人欺骗徒供牺牲的贵国国民。

我们素来憎恶战争。但我们绝非甘心任人宰割的民族。当我们的自由与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怎样起来防卫的。这是做人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倘使连这也放弃，则人就近于鬼畜了。我们是被迫而拿起武器的。我们是站在自己的土地上防卫自己的利益的。我们是顺着人类繁荣的法则，而给阻碍人类发展的力量以打击的。而你们遣派重兵远涉重洋来毁坏文明的都市、和平的乡村，你们是为了什么而作战的呢？难道真如室伏氏所说，你们是命定了必须杀害我们的么？或者如贵国新闻记者所说，是因为我们无理地发动抗日运动，你们来"断然膺惩"么？这样的论断，别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国民一定不会承认。但是如今连你也说："通州事件可以说是中国政府一心一意普及抗日教育、培植抗日意识、煽动抗日感情的结果。"在这里，你和贵国的军阀、政客以至新闻记者、浪人、棍徒一样，将因果倒置而混淆黑白了。产生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乃是贵国军阀的暴行，而抗日运动也是贵国政府历年来

对中国土地的侵略行为所促成。是你们的“皇军”亲手普及了抗日教育，培植了抗日意识，煽动了抗日感情。是你们用飞机，用大炮，用火，用刀，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明白“抗日”是求生存的第一个步骤，并非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抗日的感情的。要达到“共存共荣”之境，唯有凭借“真正亲善”的桥梁。侵略和“膺惩”只能激起憎恶，而必然遭到坚强的抵抗。你深居岛上也许不知道“皇军”和浪人历年来在中国土地上的种种暴行。但是从各种事变的记载里，你应当明白近二十年来中日两大民族间那笔愈积愈多的血债。中国人民是流了够多的血以后才来发动抗日运动的。这是自发的民众运动，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也没有力量可以抗拒它。现在是偿还血债的时候了。

窗外月明如昼，飞机声隐约地送进了我的耳里，连珠似的高射炮弹在天空电光般地闪烁。那震耳的声音！这时战斗正酣罢。我想起贵国飞行员某氏阵亡后身畔遗留的敏子姑娘的深情的信函了。在海的那边，在凄凉的家里，有着这样的一个少女时时刻刻祈祷着她的出征的情人的安全。为什么而战呢？敏子姑娘是不明白的。而且恐怕大部分贵国的国民也不会明白罢。然而她毕竟贡献了最大的牺牲了，许多别的人也贡献了最大的牺牲了。

大量的血又在几公里以外畅快地流着。这两大民族间的残杀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很难说。你们期待着我们的“屈膝”和“反省”。但是被迫着发动决死的抗战的我们，已

经没有这样的余裕了，该“反省”的应该是你们。你们好像在玩火，如今已烧到眉尖，再一迟疑，就会酿成抱憾终身的巨祸。贵国的政客、军阀之流梦想着中国“屈膝”。中国人民是不会屈膝的。没有一种宿命能使中国灭亡。而日本帝国的崩溃倒是指顾间的事。你，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一个即将崩溃的帝国的最后的光荣，你还能够做什么呢？你等着举起反叛之旗的人民来揭发你背叛的阴谋吗？山川先生，我期待着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反省”！

1937年9月19日在上海写完。

给日本友人*

一

现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钟以后了。弄堂里非常静。但是我的眼前还现着一片红光。大火在烧，大半个天空映得通红，像是夕阳一抹，像是血光一片，从昨天一直燃烧到今天，在我的眼前燃烧，在我的心里燃烧。

昨天我在南京路一带看了闸北的大火，沿途听见市民们的绝望的呼吁，怀着隔岸观火的痛苦心情，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我一晚上尽做噩梦。我万想不到会梦见了你，而且是在战场上，作为两个彼此不能宽恕的仇敌而相见的。

武田君，这个梦景太离奇了。我相信它不会成为事实。但是早晨醒在床上，我就听见炸弹爆炸的声音。你们的空军将士又向着没有防御能力的难民和不设防的城市轰炸了。是什么一种疯狂的力量驱使他们这样做呢？这种屠杀和平人民的权力是谁给与他们的？全世界的良心一致谴责这种罪恶，而你们却支持了它。你们让这罪恶发展下去。终于有一天连我们这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二十一日《烽火》第十、十二期。

些非武装的人也会被逼着拿起枪勇敢地跑上战场，去维护人道和正义的原则，保卫一个民族的生存。那时候难保我们两人不在战场上作为仇敌而相见！这是可悲的事。我并不希望有这样的一天。我和你两人中间只有友情。我也怀念着你那温顺的妻子和秀丽的芳姑儿，天真烂漫的喜姑儿。在某一个时期你们曾把我看作家族的一员给了我温暖，用体贴和关心安慰我旅中的寂寞。友情通过了国籍的不同和信仰的差异，把两颗心拉在一起。我曾经为这友谊欣喜。但是在三年以后的今天，另一种力量却突然插进来企图把这两颗心分开了。

对这力量我看你是不会反对的，你不但不反对，而且你会跟在它后面走，你会盲目地支持它。我知道你的性情，我也知道你们一般人的性情。在这里我并不想提说贵国的军阀、财阀、政客、浪人之流。我指的是你们那般安份守己、勤苦耐劳的人民。我从未把你们看作敌人，在你们中间我还有不少敬爱的师友，但是我也不能放过你们一般人的缺点。你们安份守己，所以你们常常闭着眼睛任统治者以你们的名义胡作妄为；你们忠厚老实，所以你们容易受人欺骗。你们崇拜在上面统治你们的当权者；你们相信你们的上司的话。在学校你们视教师的讲演为天经地义；进了社会你们又把报纸看作生活的指针。你们的脑子里装满了错误的观念和虚伪的消息，这使你们不认识世界，也不知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其结果你们完全成了傀儡而甘心供野心家利用。

以上的话并非毫无根据的妄语。我在你身上就找到了例

证。你可以算是贵国人的一个最好的典型，只除了迷信佛教的一点，但是贵国人中间有这种程度的迷信的人也并不少。一九三五年元旦后一天在你的家里，你的一个年轻友人从东京拿了孙俍工著的《续一个青年的梦》来，那个青年怒气冲天地说了许多话，你在旁边附和着。你们的论调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你的话比较温和。那时我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你们的谈话，但我也明白你们的愤怒是因为孙君在那本书的序言里对贵国军阀侵占东北四省的行为表示了愤慨而起的。孙君把书寄给武者小路氏，因为他还尊敬《一个青年的梦》的著者，他还信任白桦派的领袖作家为中国的友人，如武者小路氏一度所自称过的；他诚恳地诉于人道主义者的武者小路氏的良心，希望他出来对这危害人类繁荣的野蛮势力加以抨击。然而武者小路氏却在罪恶之前沉默了。这个非战论者辜负了异国信从者对他的信任。这还是两年前的事，最近听说武者小路氏更继山川均、林房雄之后而为军阀、政客张目。连武者小路氏也变到这样的地步，无怪乎自由主义者的室伏高信会成为军阀的爪牙，而高唱“非迅速战胜中国不可”了。

你们盲目地接受了新闻纸的虚伪的报导，你们盲从地听信了军阀、政客的恶毒的宣传，你们从不运用理智加以判断。是你们的“皇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做了种种的暴行。你们的军人烧了中国百姓的房屋，毁了中国人民的财产，害了中国人的生命。却从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带着凶器踏上你们的国土。在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想过到你们那里去妨害你们的和平生活，或者将种种暴行加到你们的身上。我们的人民从前甚至

不曾想过伤害你们的一根头发。甚至对于来到这里的贵国侨民我们也诚心地加以款待和援助。中国人常常是没有种族观念的。事实上人类本来是一个整体，不能因为种族的不同而有所歧视；民族间本无所谓仇恨，一切纠纷皆由少数野心家挑拨煽惑而起。这个你们应该知道，而且我想你们也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在你们那里也曾得到一部分居民的友好的帮助，甚至使得一个友人写下了美丽的诗篇。我们从没有起过把你们看作仇敌的念头。有时候我们反而视你们为亲密的兄弟。这个也有事实为证。但是你们终于听信统治阶级的宣传，落入军阀的圈套，受到政客的利用，甘心背叛了这兄弟一般的情谊。大震灾时期中对于手无寸铁而同样遭难的中国侨民的屠杀事件，构成了贵国历史的最卑污的一页。

将无可挽救的天灾归咎于和平的异国侨民，这就是你们不用理智判断事物的表现。我们若把这个视作开端，便应该知道这类事情以后愈演愈烈终至于不可收拾，所谓“一步走错，步步都错”，不过如是。所以到今天你们居然相信贵国占领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傀儡溥仪乃是真命天子；你们的“皇军”赶走了满洲的“马贼”，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你们的军人在中国真正保护侨民；中国人是一群毫无原因地发动抗日的狂人。这些都是渺茫的神话，你们却当作真实而接受了。我看见你给文姑儿代拟寄守卫满洲的兵士的慰劳信稿。你借那个十一岁姑娘的口吻感谢他们保卫你们的“功绩”，我当时并不曾和你争论。但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知道：纵使没有贵国的“皇军”在满洲占领土地，残杀居民，你们也可以安居乐业。你们

所害怕的满洲的“马贼”(？)是不会杀到你们的岛上来的。

贵国的“皇军”占据满洲的结果，固然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你们也并不曾得到好处。在你们的肩上增加了一笔负担，在你们中间死亡了二十万子弟，到现在满洲还只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浪人棍徒的发财捷径，并没有一个善良的侨民能够在那里安居乐业。然而少数的军人却由于这个机会升了官，得了勋章。

这是一个明显的教训，它应该把你们从迷梦中唤醒起来。然而你们至今还是无动于衷，甚至发出来对于“王道的新天地”的歌颂。你们竟然愚昧到掩着身上的创伤跟在给你们以损害的军阀、政客的后面歌功颂德了。

不但这样，就是在昨天，在今天，当贵国的“皇军”在闸北纵火、焚烧中国平民的房屋、屠杀未及逃出的老百姓的时候，你们东京市民却在举行庆祝大会，成群地跑到皇宫和海陆军省的门前高呼“万岁！”，我的一个朋友从无线电收音机中听到那疯狂的“万岁”的叫声，竟然悲愤地落下了眼泪。

武田君，你看，你们和平的人民竟然把贵国的军阀纵容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中国人民横遭残杀，刽子手虽为“皇军”将士，而你们也不能辞其咎。

炮声冲破了沉寂的空气。贵国的“皇军”又在表显他们的威力了。武田君，你想想看，倘使有一天你对面的山上架起了中国的大炮，向着你那所精致的小屋轰击，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你能够把这个认为正当的行为，作为对于你们轻侮中国的一种“膺惩”么？我想你是不会的。那么对于贵国军阀的行

为，你们怎么能认为正当而加以拥护呢？

1937年10月28日。

二

窗外又是一片火光。这一次是那个古老的城市在焚烧了。许多人的生命，许多人的财产会跟着这场大火化为灰烬。爱、和平、幸福、青春、希望，在半天的功夫全成了烟云。散了，散了，一切美丽的东西全完了。在南市有十万以上的难民鹄立在街头等候租界铁门的开放，为的是逃避贵国“皇军”的枪刺。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充饥，他们已经在民国路一带站了三四天了，天上落着下不尽的细雨，初冬的夜是十分寒冷的，一边是吞噬一切的火光，一边是冷硬的铁门，你们“皇军”的枪刺又在不远处发亮。恐怖、痛苦、疲倦、寒冷、饥饿使这些人在三四天里就失了形。看见那无数的挥动着的手，看见那惨白的瘦削的面颜，谁想得到他们在几天前还是和平甜蜜的家庭中的父母、夫妇、子女呢？是什么人使他们堕入在这惨苦的深渊？是什么人夺去了他们的和平与幸福？武田君，这个是你们不会知道的。你们知道的只是贵国的“皇军”在那些废墟上向世界夸耀军事的胜利。你们看见的只是贵国军官的得意的笑颜。你们的目光常常是这么浅短的。

武田君，我相信你们大部分人的忠厚与诚实，这使我能够和少数贵国人士结了亲密的友谊。但是你们中间一小部分人的狡诈与狠毒却是不可宽恕的。要证明那一小部分人的卑劣

的行为，在华北和南方便有不少的实例。我想你一定知道，因为你也曾游历过华北，住过上海，这个我且不说。但是无论别人怎样花言巧语，你能够相信在南市忍饥挨饿、家毁人亡的十多万难民都是凶恶的“抗日分子”而必须身受“皇军”的“膺惩”么？武田君，我想你会相信的。然而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都是安份守己的市民，从前并不知道抗日是怎么一回事情，他们从来不是抗日分子，但是从最近起他们都变成那样的人了。这切肤之痛会在和平人民的心上留下不灭的痕迹。中国的政府从前忽略了他们。而贵国的军人现在却用刀、用枪、用火、用大炮、用炸弹把他们教育了。是“膺惩”产生了抗日行为的。这因果关系你们应该知道。

武田君，我知道在你们那里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在做征服中国的好梦。记得几年前九洲帝国大学教授某氏游历了华北返国后，就得意地发表了他的“中国必亡论”的演讲。他的论据是十分奇特的：他在天津看见一对夫妇在街上吵架，女的披头散发地哭骂不休，做丈夫的反而低声下气地安慰她。某氏说这是反常的行为。从这反常的行为他就断定了中国的必亡。连大学教授的某氏也发出了这种议论，可见你们的朝野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图谋着中国的“必亡”了。但是你们的论客还口口声声嚷着“中国无理抗日”的话。

武田君，你应该劝告你的同胞不要做征服中国的痴梦了。单用武力永久征服一个民族，并不是可能的事。单独的民族的繁荣是不会久远的，纵有一时的美景，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留下来的只是灭亡。能够长存不朽的乃是人类的繁荣。这样的

繁荣只能由各个民族的联合的努力来实现。而联合的努力又必须立在友爱与互助的基础上。你们的论客到今天还在梦想着大和民族的单独的“发展飞跃”。可惜他们不曾凭吊希腊、罗马的废墟，没有思索秦皇、汉武的霸业，与夫拿破仑、成吉思汗的雄图。这一切只给了后人一点点渺茫的憧憬，而成为历史家舞文弄墨的资料了。那么你们的一批一批的青年兵士到上海，到华北来作战又是为了什么呢？

武田君，听说熊本师团的一部分已经到上海作战了。你是后备役，大概目前还轮不到你。那么你还在你那精致的小屋中过你的书生生活罢。啊，我想起文姑儿给我的信函了：“已经是连虫声也静下去了的深秋了。×先生在这样静寂的夜里读书的姿态还在我的眼前浮现。”这封信给了我一些美丽的回忆。我想起我从前在你那和睦的家庭里度过的一些恬静的日子，我想起你那美丽的友情，我想起那精致的小庭园和在那里看见的山下的奇丽的街景和海景。但是这些都被炮声冲散了，大炮横在我们两人的中间。大炮毁坏了我们在这边所努力建立起来的一切，而且以后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损害。但是你那精致的小屋与和睦的家庭恐怕也难永久保全罢。

所以你应该出来有所动作了。我并不是来求助于你，我并不代表那无数受了损害的中国人民来求你们给一点点同情。决不是这样。我要求的，只是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反省，希望你们起来和我们共同努力，毁灭那个破坏人类繁荣的暴力。

11月15日。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这里是一具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那里是一堆一堆建筑物的余烬。
杀啊，抢啊，烧啊！——在疯狂的欢呼声中，
武士道的军人摇着太阳旗跑过去了。
机关枪——长铳——大炮！
许多兄弟的工作白费了，
许多兄弟的房屋烧毁了，
许多兄弟的生命丧失了。
我们哀哀地哭着。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一号。

黑暗的夜，恐怖的白昼。
火光，枪声，兽的叫喊，人的哭泣。
枪刺上挂着小孩的尸体，
鲜红的血一点一点往下滴；
大街上蜷伏着老妇人的瘦躯，
武士们拿她当作了死狗乱踢。
许多母亲，许多儿子，
我们的，我们兄弟的，
就这样地给人屠杀了。
我们哀哀地哭着。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我们的眼泪……我们兄弟的眼泪；
我们的哀泣……我们兄弟的哀泣。
武士们的屠杀……刽子手的屠杀；
武士们的狂欢……刽子手的狂欢。
武士们的酒……我们的血、泪；
武士们的肴……我们的骨、肉。
武士道，江户儿，大和魂，
我们的血，我们的泪，我们的心。
武士们得意，狂笑，

我们哀哭，呻吟……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得太多了！

给武士们当枪靶子的生活也过得很够了！

我们的血管里还流着人的血，

我们的胸膛里还跳着人的心：

我们要站起来，像一个人。

我们要坚决表示：不是任人宰杀的羊群，

我们要靠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1931年9月29日深夜。



致树基(代跋)

树基：

关于第十二卷，我想作一点解释。

第一篇《海行杂记》是我最早的著作，一九二七年二月写成，从巴黎寄回国内给我的两个哥哥，先寄到三哥那里，他看过再寄给成都的大哥。

这"杂记"是在去马赛的轮船上动笔的。船在西贡停了四天，我上岸去买过两本法国学生用的作业簿，用它来记录我旅途的见闻。我写游记并不是为了出版，动笔的时候，我仿佛站在两个哥哥面前讲故事。一九二七年三月将游记包好寄出，刚好写满一册，以后我也就忘记了它，因为我对大哥讲故事这不是第一次，一九二四年在南京我还寄过两本"作业"给他，我记得第一本是《写给母亲的信》，另一本是《鸿爪集》。不用说，两本都写得很伤感，都是在想家想得最深的时候写的，让大哥流了不少眼泪。

我大哥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成都自杀后过了一年多，我向嫂嫂要回我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包括那几本"作业")。我烧了它们，只留下最后一本"作业"，作为游记整理出版。新中国书局刊行的初版本书名《海行》，一九三六年改由开明书店重版，

夏丏尊先生建议加上"杂记"二字，我同意了。《海行杂记》应该是我的第一本著作，散文随笔集吧。但我的第一本书不是它，那是《面包略取》，一本翻译；第二本书是《伦理学》，原著者都是克鲁泡特金。第三本才是小说《灭亡》，也就是用巴金的笔名出版的第一本书。

《旅途随笔》是我的第二本游记，它记录了我一九三三年南方旅行的见闻，也写了我对朋友们的感激之情。第二年我把随笔集全稿交给生活书店。书店当时承受着各种压力，不得不把原稿送到上海市党部，让图书杂志审查员过目，然后将通过的全稿交印刷所排印，因此《旅途随笔》的"目次"中有四个标题下面多了一个"阙"字，而在正文中却找不到这四篇文章，原来都让审查老爷勾掉了。它们是

《捐税的故事》，

《海珠桥》，

《薛觉先》，

《鬼棚尾》。

既然别人不准它们在《随笔》中出现，我就给它们另外安排一个去处。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要我写一篇介绍广州的文章，我便把《海珠桥》等三篇改写成三节放在《广州二月记》里面。《中学生》杂志不需要送审，也就不曾遇到麻烦。不久郑振铎兄为商务印书馆编丛书，向我要稿，我把未收进集子的散文、杂文、评论等等编成一册《生之忏悔》，也将《广州二月记》和《薛觉先》塞了进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不受审查，四篇文章都在《生之忏悔》中重现了。不过应该声明：我并不一贯

正确，《薛觉先》文中就有偏激的言论，为了要活下去，为了不做亡国奴，几乎连祖宗也不要了。当然在那个时候我才写出那样的文章。《海珠桥》也闯了祸，连累出版《中学生》杂志的开明书店在《广州日报》上向市政府公开道歉，因为我错误地引用了一位朋友的话，说这是向瑞士买来的旧桥。

《生之忏悔》可以说是一碗“大杂烩”，我对自己这种编辑方法也不满意。书印出来，我翻开一看，不能不皱起眉头。幸而它只印了一版。一九三九年初我从桂林回上海，有时间整理旧作，印刷所又比较空，因此以前印过的书都经过改订重排了。只有《生之忏悔》未重印。在新版的《旅途随笔》中审查老爷删去的四篇除《捐税的故事》外均已补入。《捐税的故事》因为当时手边没有原稿就让它阙着，这次编印《全集》才补了进来。但《海珠桥》和《鬼棚尾》两篇既然收入《广州二月记》与《薛觉先》一起作为《生之忏悔》的篇目和读者见面了，就让它们留在这碗“大杂烩”里吧。我没有精力再作或大或小的改动。《生之忏悔》中原有序文、代序等九篇已全部编入后来出版的《序跋集》(花城版)，在这里只是“存目”就够了。

写完上面这一段，我才想起你最近来信说，《巴金文集》十一卷中的《旅途随笔》已收入了《海珠桥》和《鬼棚尾》，而且未经删节，你主张根据《文集》本排印，我同意，我看索性把《薛觉先》也还给《旅途随笔》吧。这段话不必勾去，我“声明作废”就行了。

关于散文集《点滴》我不想多说，但是我应当说明《几段不恭敬的话》一篇是我自己删去的。那是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底五

月初我访问日本回国的时候，你在人文社接管了《巴金文集》的事情，第十卷已经打好纸型就要付印了，我写信要求抽去《几段不恭敬的话》，你感到为难，但是你办到了。收在《点滴》中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写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在日本经常受歧视，我感到不痛快，拿起笔就有气，《几段不恭敬的话》便是为“泄气”而写的。而且早在一九二六年我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了。当时我读了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长江游记》，他骂得太厉害了，引起了我的反感，特别是他那样公开的指责：

> 现代的中国有什么东西？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全都堕落了吗？尤其是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果真有一件可以自豪的作品吗？

八年以后我的气还未消，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年底写了这样一篇泄气的杂文，署名“余一”，在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月刊上发表了。这文章写得早一些，刊出时未遇到一点阻力，几个月后我在东京为上海的《漫画生活》写的一篇杂感《日本的报纸》就无法与读者见面，连手稿也找不回来了。

今天回想起来，我倒愿意这《几段不恭敬的话》当时给别人抽去，见不了读者，那么我也不会为自己过去讲的、写的不公平的话感到羞耻，感到后悔了。你知道印在纸上的字是揩不掉的。一九六一年你答应在我的《文集》里删去那篇泄气文章，这次编印《全集》，你就只能同意把它作为附录移到卷末了。

我想这样也好，赖债是不行的，有错就改嘛。

关于《忆》，我主张恢复“文学丛刊”本的本来面目，保留《小小的经验》，仍用《信仰与活动》代替《觉醒与活动》，把编《文集》时改掉的再改回来。你如同意就请照办。我的理由仍然是：不赖债。

最后一部分是《控诉》，它是我自己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编印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初版只印了五百册。五十年代编《文集》，我找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诗《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插页），就收在这里面，因为这也是控诉啊！

巴　金 1988年11月11日。

再致树基：

最近病中重读《忆》和《忆》的前身《巴金自传》（一九三四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刊行），发现第一部分《最初的回忆》中漏掉了九妹，便作了一点改动，关于这，我以后在别处还要作较详细的说明。

巴　金 1989年10月26日。